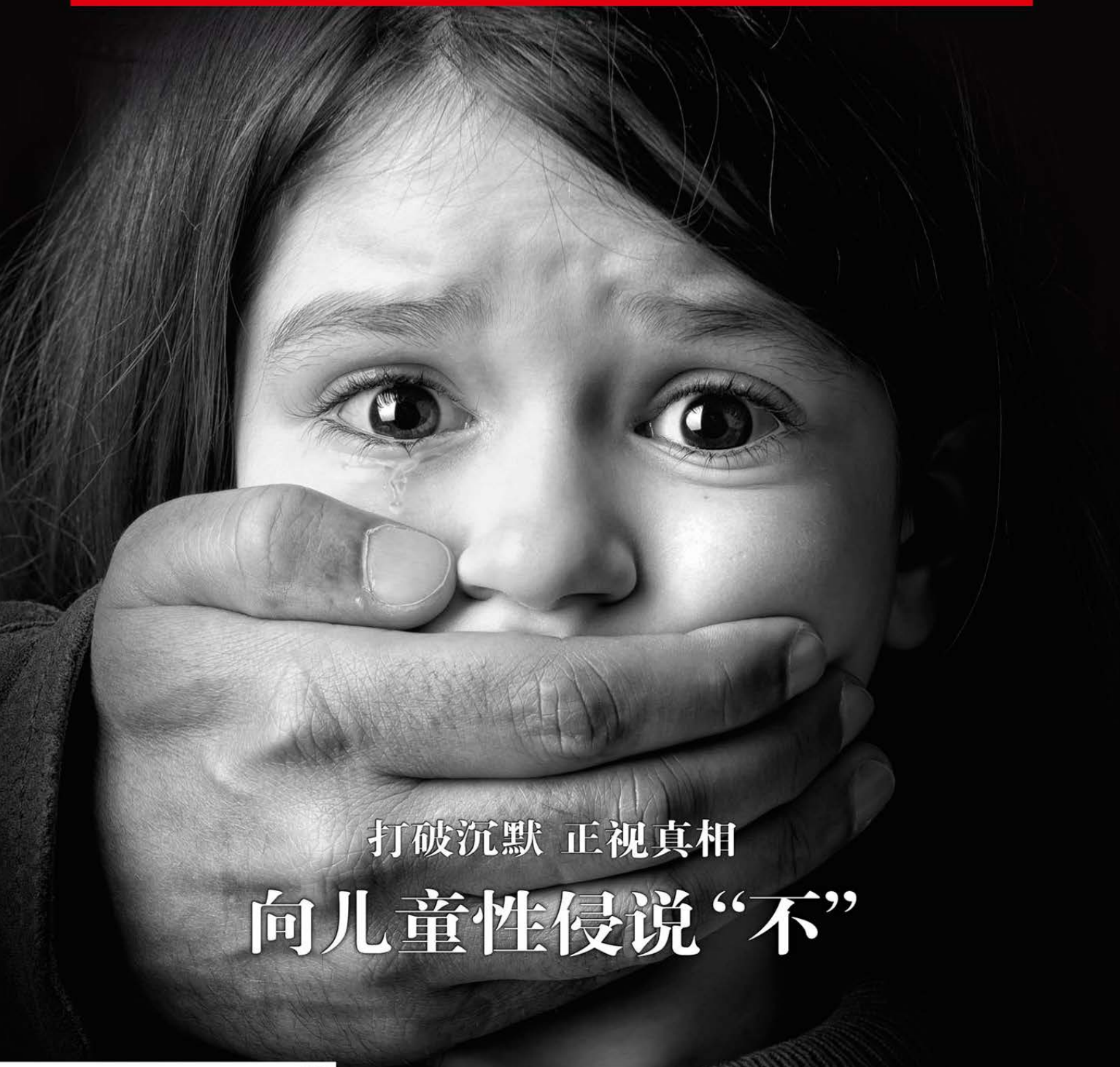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

2017.9.11
2017年第37期
www.lifeweek.com.cn



打破沉默 正视真相

向儿童性侵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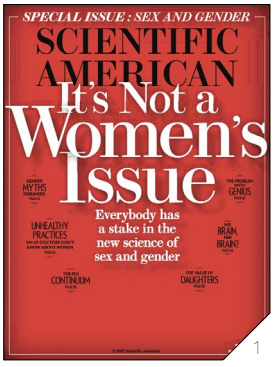
953

生活周刊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明镜》(德国) 2017.9.2

任期将满的默克尔

今年 9 月，默克尔将再次参与下一任国会大选。9 月 3 日，默克尔将与社会民主党马丁·舒尔茨进行一场电视辩论，把未来四年双方的政治主张呈现给广大民众。在接受《明镜》的独家专访中，默克尔表示："在这一任期的四年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捍卫民主。"并且谈论了对权力的沉迷、德国汽车行业对政治的影响以及她试图在右翼赢得选民的支持等问题。



1

2

3

4

1 《科学美国人》(美国) 2017.9

性别的新科学

教科书上对于性别的区分非常简单——性染色体为决定个体雌雄性别的染色体。而最新的研究发现，就生物学层面而言，仅凭一对性染色体并不足以区分男性和女性。两性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引起了更广泛的讨论，如今性别歧视仍然存在于全球范围内，21 世纪女性的权益依旧得不到保障。而新的性别科学有助于公众形成新的观念。

2 《经济学人》(英国) 2017.9.2

挡不住的"哈维"和大洪水

飓风"哈维"自 8 月 25 日夜间登陆美国得州，目前已造成至少 44 人死亡，也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全球性的气候变暖成为导致灾害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够清晰明确的财政补贴和不完善的应急机制也使得洪水没有得到及时遏制，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当洪水褪去，其破坏性才凸显出来，留下的是被毁的汽车、肮脏泥泞的房屋和被淹死的尸体，休斯敦也再次陷入洪水困境。

3 《哈佛商业评论》(美国) 2017.9

超额组织

如今几乎每个知识型员工都同时从属于多个团队。组织和团队领导人通过创造一个多层次人才共同成长的环境，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员工资源。但其中涉及团队的相互协调、各项目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工作优先级安排等，在管理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当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团队的人员成本时，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4 《新科学家》(英国) 2017.9.2

数学大脑

数学可以帮助人类理解宇宙难以置信的复杂性，但是，计算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人类的后天发明？回答这个问题涉及神经学领域的热门争论，以及需要重新思考数学是什么。然而，很多人讨厌数学，数学家大卫·伯林斯基在他的书《1，2，3》中说，这归因于数学符号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符号性语言需要集中的注意力，却又没有明显的回报。

8.

P32 封面故事

打破沉默，正视真相

向儿童性侵说“不”

34 儿童性侵，海面下的冰山

46 受伤害者的隐秘联盟

52 儿童性侵：从忽视到保护

62 一次救助的复杂结果

68 “美国模式”：一个国家的动员

80 当我们谈论儿童与性时，我们在谈什么

P96
摇滚的“新晋网红”：黑豹乐队 30 年

P112
为什么“嘻哈”会这么火？

社会

热点：加拉帕戈斯群岛被扣的中国渔船 88
热点：人脸识别与主流应用，准备好了吗？ 92
热点：摇滚的“新晋网红”：黑豹乐队 30 年 96
调查：北京小区内围栏之争：阶层差异的困境 106

经济

市场分析：集体土地试建租赁住房 86

文化

文化：为什么“嘻哈”会这么火？ 112
电影：《二十二》：深情凝视还是直面历史？ 122
电影：《猩球崛起 3：终极之战》：恺撒的最后一役 126
电影：超级巨猩如何养成？ 130
话题：死于独特 134
收藏：第一代旅美画家朱沅芷在纽约 136
时尚：格子，格子，还是格子 138
新知：天才与疯子 142
思想：向原始人学习 154
书评：遇见巴迪欧：从爱的哲学而来 156

专栏

邢海洋：ICO，通缩货币与实体经济悖论 18
苗千：宇宙是否经过“微调” 148
张斌：运动国度的年轻态与健康度 152
宋晓军：关岛只是个“幌子”？ 153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8

环球要刊速览 2
读者来信 10
天下 12
理财与消费 20
好消息·坏消息 22
声音 23
生活圆桌 24
好东西 28
个人问题 160

2017年第37期，总第953期，2017年9月11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10.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21）63769858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2100585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8834187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90339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0791）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天津天智书店（022）23683854
河　北：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83993043
安　徽：合肥皖新书店（0551）64252409
新　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0991）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22203426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拍摄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sina新浪网 新浪微博 weibo.com 鳳凰網 ifeng.com 腾讯网 qq.com youku 优酷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 1 · 宾利
3 · IBM
4~5 · IBM
19 · 三联全媒体
45 · 苏富比
51 · 北五环咖啡
67 · 《十年一鉴青曲社》
85 · 生活周刊
121 · 广汽软文
159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茶园
封底 · 广汽传祺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敦刻尔克

敦刻尔克大撤退并不是一次胜利，但“敦刻尔克精神”代表着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东西：面对逆境时的勇气、决心和团结。读过这期杂志后带着这种视角去观赏电影，就能理解导演这种克制的表达，三条线索，对白不多，依靠真实的战争场景还原去呈现战争本来的面貌。诺兰不是在讲故事，也不是在塑造典型人物，他做的是呈现战场中士兵“回家”的过程，就像文中指出“回家”是诺兰一直关注的主题，在《星际穿越》中是，在《敦刻尔克》中也是。

（@胡程）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医院，想说爱你不容易

我在广西边防服役，妻子在苏州上班。后来，我考到上海军校里读研究生，这样，“牛郎织女”就可以变成“每周一歌”了。

妻子去年1月怀孕了，在苏州一家医院定期做检查，而我利用考研和休假的机会，偶尔可以陪她去。每次去医院，都要大清早起来，赶早班车，到门诊部一楼挂号，但排队挂号的人还是排到了门口。

9月，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在上海等待宝宝的降生，军校的纪律很严格，虽然离得很近，也不能经常回去。我只得用工资里的大半租了个大点的房子，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照顾妻子。10月份，预产期临近，妻子在产前最后一次例行检查被诊断为羊水偏少，需要提前住进医院，然而，此时却没有床位。母亲焦虑地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举目无亲的苏州，我能有什么办法，为了宝宝，我只好穿上军装，来到医院院长的办公室，恳请他们能够拥军一次。第二天，妻子住进了医院，一周后，女儿出生了，我想，我和医院“缠绵”的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了。

然而转眼到了12月，宝宝40天的时候，突然咳嗽发烧，我不得不带着她们再次来到医院并挂了专家门诊。“专家”是个老太太，一上午只允许挂20个号，我们排16号。到了我们看时，她很不耐烦地听我讲病情，然后开了个单子要我们去拍X光片，诊断为“婴儿肺炎”。我和妻子都很着急，焦急地问：要不要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医生却冷冰冰地回答：“原因要问你们自己了。”妻子说：“如果我们知道原因我们也就当医生了。”很快，我们一家被扫地出门，只开了两盒药。我把母女俩送回了家就去了火车站，要超假了。在火车站，妻子发来短信，说药品说明书上写着“6个月以下的儿童禁用”，可宝宝出生只有40天啊。

此时我已经愤怒了——换医院。第二天，我们换到了另一家医院，医院的服务态度很好，医生告诉我们，肺炎对成人来讲没什么，但我女儿还太小，不及时治疗会影响发育，必须住院。但情况依旧是没有床位。医生怜悯地看着不到两个月大的女儿，拿起电话，从一病区到十五病区，一个一个地询问，要他们无论如何要空出一个床位。下午，宝宝终于住进了病房。

深夜，我终于回到了学校，躺在床上的我，心情依旧很沉重。在住院期间，病人第一天的费用在第二天会送到你的床头，只检验过大小便，吊了两瓶水的女儿，一天就用掉了近2000元。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为前途深深地担忧。我在学校拿营职干部工资，每月不到7000元，妻子在休产假，只有基本工资1000元，我们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不够宝宝住3天的医院，每个月还需付房租水电费等近3000元。幸亏读军校的研究生是免学费的，我当军官7年来4万元的积蓄没有动，可这钱能维持多久呢？宝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院呢。我在床上迷迷糊糊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没有，只是感到浑身不舒服，第二天，我也住进了医院。

读者 宫春科

给小费

年初，找了个机会跟团去柬埔寨吴哥窟旅游了一趟。几天下来，除了古老雄伟的吴哥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外，在柬埔寨给小费也是令人非常感慨。

在旅店休息时，柬埔寨的导游就告诉我们，这里兴给小费，每天出门时，要在床头柜上放点小费。于是，我们就按导游的要求，每天放2000柬元（1

元人民币约合500柬元），当然，如果你直接给人民币则更受欢迎。有一天，一个房间的旅客出门忘了放小费，路上还在嘀咕这事，我们安慰说：应该没关系的。等晚上回到房间一看，还真有不同！原来每天要给房间送的2瓶矿泉水，这次却没送来，是否与没给小费有关呢？我们虽有疑惑，但后面几天，大家都特别注意，起床第一件事，先把小费放好。

吴哥窟周围有通王城、吴哥寺、圣剑寺、巴戎寺、塔布笼寺等景点，连接它们之间的路况较差，此时，我真切地感到，跟团游最大的好处就是用车方便。司机看起来有40多岁，车开得很稳，每次接送都是汗流浃背地忙前忙后。尽管导游已有提示，我们这一车游客，还是十分情愿地每人每天给小费，每次基本上是5元人民币。

吴哥窟里有不少维护治安的警察，我们有几位游客很好奇，招手让几位警察过来一起合影。这些警察也很配合，也很会摆Pose，大家嘻嘻哈哈很高兴。末了，这些游客掏出一把柬元，给了每个警察1000柬元。后面团队的游客一看，也跟了过来合影……

吴哥窟里古迹很多，我边看边拍照。这时，一个当地人主动走过来比画了一下，那意思要给我拍照。助人为乐吗？于是，他拿着我的相机，找了几处背景拍照，大概过了十多分钟，他领我走到一个僻静处，又照了几张，然后就看着我。我想，是不是要小费呀？于是，我拿出10元人民币给他。谁知，他用手指了一下我包里的“壹佰元”。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胃口挺大呀！于是，我又拿出10元，他还是摆摆手，再指着那个“壹佰元”。看样子，碰到个难缠的了。最后，我拿出50元了事。这个小费给得真憋屈！

旅游结束，出关前导游又一次叮嘱，为顺利出海关，护照里夹小费人民币10元。由于我的柬元还没用完，于是我过关时，在护照里放了5000柬元。谁知，海关那个盖章的人瞄后，直接用中文说：美元！看样子他不要柬元，望着他桌上一堆的人民币，我一掏是个20元的票子，他快速接过，然后挥挥手。嗨！多给的10元也不退回了，这小费给得真滑稽！

武汉 王东

一个刺瘊

一年多前，姑妈的脸颊上长了一个刺瘊。对此，年过七旬的姑妈并不为意。可最近一段时间，刺瘊有增大的趋势，出于防患于未然的想法，头几天，平素身体相当健康的姑妈便自行去当地的一家乡镇医院进行了咨询。当地负责手术的医生很明确地告诉她，对于生长较迅速的刺瘊宜及早进行手术切除。当然，这样的手术很简单，当地乡镇医院的接诊大夫对此手术也很有把握。因为姑妈多年前也曾经因为在下巴长了一个刺瘊而在当地医院做过手术，所以，姑妈没有征求晚辈们的意见，便自己决定在当地医院做手术。可表哥和表姐得知后，认为“小医院”不安全，还是去大医院诊治更放心。

姑妈就诊的“大医院”是位于我所在县城的一家地（市）级别的医院，最近刚被评定为三级甲等医院。医院无论从基础设施还是配套设施上看，都堪称“高大上”，对于在乡镇医院治疗“不放心”的表哥和表姐来说，这样的医院一看就让人觉得心里踏实。

然而，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姑妈一家人的意料。姑妈被安排住院后，先得进行相关的术前检查。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这是手术前必须检查的“三大常规”项目。姑妈年事已高，进行心电图检查、肺部拍片检查也在情理之中。检查完这些之后，医生又以刺瘊生长在颜面部、为了确保安全为由，让姑妈再进行了颅脑的MR（磁共振）检查。当表哥拿着MR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的报告单向主管医生抱怨近千元的MR检查费白花时，主管大夫的一句“难道你愿意MR检查结果有问题吗”的反问，让表哥哭笑不得。

把姑妈推进手术室，表哥觉得此后总算再也不必折腾各种检查了。然而，手术进行了十几分钟，手术大夫便将切下的部分组织交由表哥送病理室，以明确病变的性质为由，进行病理检查。

手术后，为了预防感染，姑妈又在医院进行了输液治疗。表哥大致统计，从住院到手术结束，姑妈住院的所有费用已经超过7000元。姑妈没有医疗保险，所有住院费用全部自理，在农村靠种田为生计的表哥有些吃不消，姑妈几次申请出院，但都被主管大夫以种种理由搪塞。

我恰好有一位中学同学小徐，就在姑妈所住的病房当护士。她说由于另外几家医院相继入驻我们所在的县城，受竞争的影响，最近医院的效益有些下滑，他们所在病房的住院病人和病床数比例严重低于医院规定的平均数，因此，为了不拖医院的后腿，延长病人的住院时间实在是无奈之举。

据姑妈说，大约10年前，她在当地乡镇医院做同样的刺瘊切除手术，当时总共花费还不到70块钱，而且没有住院。即便加上物价上涨的因素，本次近8000元的治疗费用还是让人觉得实在有些不靠谱。近年来医患关系日益紧张，这其中固然与患者或家属对医疗行业的偏激认知有很大关系，但造成这尖锐矛盾的背后，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和解决。

山东临清 卢长平

本期截稿时间：9月4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14.

15.

北爱尔兰 | **国王大道**

8 月 29 日，4 名演员穿着与美剧《权力的游戏》里相似的服装，骑马走在黑暗树篱小道（Dark Hedges）上。黑暗树篱小道两旁粗糙的山毛榉树种植于 18 世纪，因成为美剧《权力的游戏》里国王大道（Kingsroad）的取景地而声名鹊起。

16.

英国 | **环保**

（右图）8 月 31 日，西班牙艺术家在伦敦泰晤士河畔放置了一个《未来尘埃》装置，供来往游人观赏。这个装置中的物品都是艺术家从泰晤士河中捡出的塑料垃圾，然后按照颜色进行归类，艺术家想借此装置向人们宣传水污染问题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新西兰 | **痛**

（左页上图）8 月 31 日，新西兰罗托鲁瓦的一名母亲拿着她于 2015 年自杀的儿子的照片，并把 2016 年到 2017 年间自杀的 606 个人的鞋子摆在地上，希望唤起市民对防止自杀的关注。

意大利 | **威尼斯电影节**

（左页下图）9 月 2 日，乔治 • 克鲁尼与妻子阿迈勒 • 阿拉姆丁出席第 74 届威尼斯电影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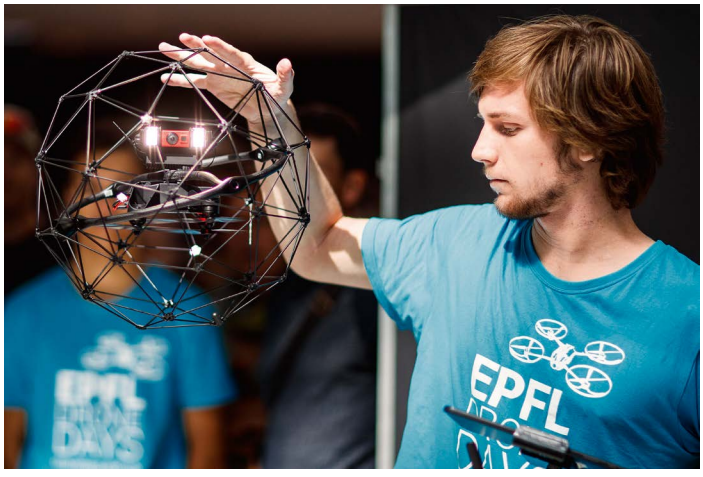
18.

印尼 | **古尔邦节**

（左图）9 月 1 日，印度尼西亚城市日惹南部的广场上，当地穆斯林民众聚在一起庆祝古尔邦节。今年 9 月 1 日是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古尔邦节。古尔邦节的主要内容有：举行会礼，穆斯林聚集在大清真寺或公共场所，举行盛大的仪式和庆祝活动；宰牲，一般的穆斯林都在节日之前准备好到时要屠宰的牲口，牲口要求必须健康，分骆驼、牛、羊三种，根据家庭的经济情况来决定。屠宰后的肉要分成三份，留作自用、赠送亲友以及施舍给穷人。

瑞士 | **科技**

（下图）9 月 3 日，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举办无人机展示日，科技达人们展示了各式远程遥控无人机。



ICO，通缩货币与实体经济悖论

文 邢海洋

凡·高的一幅画上亿美元，第一套生肖猴票价比黄金，同样限量并有着独创概念的比特币在“挖矿”变得越来越艰难时迎来大涨，这合情合理。可当比特币试图与实体经济相连，ICO却可能使这一本应在收藏领域存在的品种遭遇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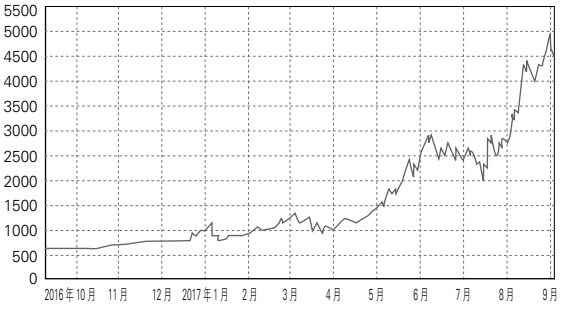
9月3日，比特币中国暂停ICOCOIN充值、交易和提币业务。这是监管层对如烈火烹油的ICO业务发出的最为明确的信号。几乎同时，原定在乌海举行的、有权威部门和业界大佬出席的区块链大会被叫停，梦想着一个比特币赚一栋别墅的创业家们一时间神经紧张起来。所谓ICO，和证券市场的IPO颇为类似，不同的是ICO发行不同于比特币的全新代币。顾名思义，ICOCOIN是一种数字代币，是一家专事ICO发行的平台发行的货币，投资者用比特币购买它以支持这家平台的创建，等于是承认了这种货币的“合法性”，并希望这家平台做大做强，最终使这种代币甚至比比特币还受爱戴，还更值钱。

当中本聪发明的比特币因具有挑战主权货币的一种可能性而红火起来后，人人都渴望步其后尘，“不劳而获”。可追随者很难被公众认可，只有最早出现的几种流行开来，新进入者苦兮兮地要么做矿工，要么买进卖出，做着风险和收入对等的炒家行当。当然，数字王国的创业者们也在千方百计地尝试新技术、创造新概念。比特币开创了去中心化密码货币的先河，可比特币网络里只有比特币一种符号，这个网络就无法交易股票或者债券等，其程序语言也有缺陷，结果导致了硬分叉危机。以太坊，一个平台和一种编程语言，就是旨在解决比特币的多种不足的一款能够在区块链上实现智能合约、开源的底层系统。以太坊诞生三年半时间，全球已有200多个以太坊应用诞生。而以太币，数字货币中第一个ICO品种，也从一年前的11美元暴涨至如今的近400美元。

比特币和以太币的成功可遇不可求，然而渴望在数字网络中大造其钱的冒险家们还是深受鼓舞。区块链技术中还有哪儿需要突破的？很多ICO项目不得不闭门造车、有交易黄金的平台、有信贷服务的平台、有去中心化的服务网络，大有区块链一夜春风，现实世界中所有的实体交易都搬到了区块链中的势头。问题是，既然以太坊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底层技术，留给这些ICO创业者的空间在哪里？难道以民主和去中心化为旗号的未来交易方式仍将停留在这些烦琐细碎的细分市场里？即便如此，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到如此程度，科技巨无霸公司只手遮天的今天，这些毫无技术创新与资金实力的企业，也面临着一道道巨大的门槛，而让它们的名字“扬名立万”，从而使自己的代币为普通大众接受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更有一些ICO项目完全与实体经济联系在一起，如同利润共享的IPO，这就更加压缩了附着于代币身上的想象力，令人怀疑其中虚拟货币中的价值。如第一个主权国家的ICO，爱沙尼亚所募集的资金就要投入到与建设数字化国家的用途中。

全球货币林林总总，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定货币，可用于国际贸易的无非那样几种，ICO泡沫后又有几种代币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尤其是，数字货币都是通缩货币，挖矿越来越难，货币价值高企，在一个商品流通社会，消费者更倾向于存钱，而非消费。对于ICO企业而言，当他们聚敛了大量比特币和以太币以后，面对着不断升值的货币，怎么可能有动力把钱花出去，购买不到贬值折价的机器设备，以建立许诺中的平台？最终，即便虚拟货币完全占领了全球交易媒介的地盘，通缩货币的先天不足也将窒息全球经济的活力。

近一年比特币价格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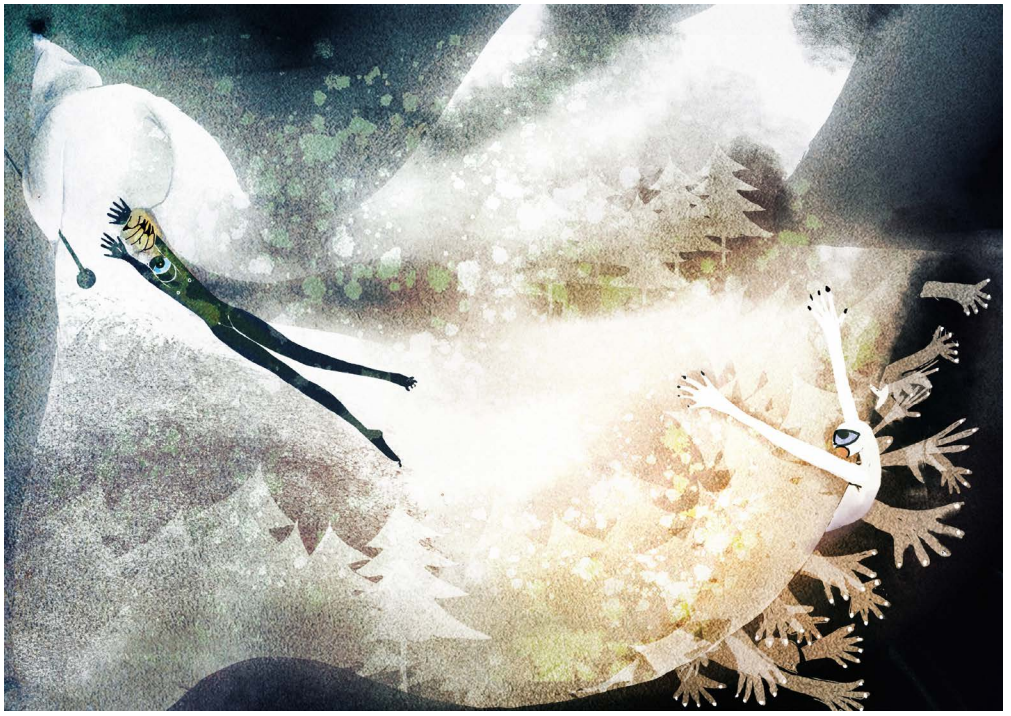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谜 松果 节气 中读 ZHONGDU 新知 WISSEN 三联爱乐 PHILHARMONIC



栏目插图 | **范薇**

飓风之后

飓风“哈维”虽已消退，约占美国 10% 的炼油产能仍处在中断中。8 月 28 日，汽油期货价格上涨 3.6%，原油却跌去 1%。汽油涨而原油跌，是因为供应中断汽油紧缺，原油需求则下降了。通常，汽油价格会在出现大型风暴的两周内升至峰值，上涨 20 ～ 80 美分 / 加仑。随后，汽油价格通常会在 2 ～ 4 周内回落至风暴前水平，甚至更低。据初步估计，此次风暴将造成 300 亿～ 400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ICO 爆棚

ICO 正迎来指数级增长，全球 2016 年区块链项目通过 ICO 的方式总共筹集了 2.36 亿美元，而 2017 年上半年，国内已完成的 ICO 项目就有 65 个，融资规模折合人民币达 26.16 亿元，参与人次达 10.5 万。甚至有传言，国内参与 ICO 的人数达到 200 万人。几天甚至几分钟筹集千万美元，此后暴涨 100 ～ 300 倍的项目不在少数，大有比肩海外 ICO 项目之势。不过，大约 90% 以上的 ICO 项目都不靠谱，骗钱明显。

“恶毒谣言”

8 月末有传言称，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及家人在天津机场被扣留并被禁止出境。8 月 28 日万达旗下万达酒店发展股价一度下跌 11%。万达随后发布声明称，近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炮制关于董事长王健林的恶毒谣言，该谣言最早出现在 8 月中旬，后因王健林赴兰州考察，谣言不攻自破。辟谣后，万达酒店发展股价恢复原价。

万亿级“神电”

国资委发布消息，国电与神华两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两行业巨无霸合并所涉及的资产超过 1.8 万亿元，发电装机容量则将达到约 2.26 亿千瓦，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发电集团，资产规模远超此前央企重组形成的宝武集团、五矿集团、中车集团等。在钢铁、煤炭、重型装备、火电等方面，联合意味着平稳熨平经济波动，便于调控。以此推断，钢铁、煤炭、火电等领域的央企重组后，重型装备很可能成为下一个领域。

人民币 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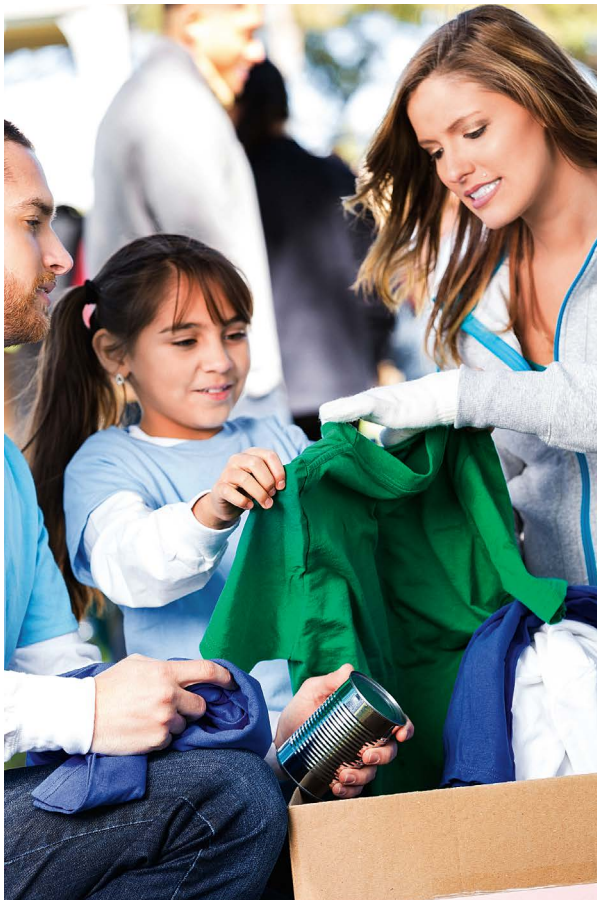
8 月 29 日，人民币延续大涨势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突破 6.6 这一重要心理关口，离岸则连续第十天上涨。朝鲜连射导弹，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令美元进一步下挫，欧元趁机一举拿下 1.20 关口。欧元的急涨，也带动了人民币的攀升。在人民币近月出现明显升值态势后，结汇资金涌出开始成为推动人民币持续走强的力量。不过人民币表现已遥遥领先于其他亚洲货币，有分析师开始警示其超调风险。

配置些黄金

自 7 月初开始，不到两个月时间黄金闯关夺地，价格从 1200 美元 / 盎司涨至 1330 美元 / 盎司。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雷 • 达利奥（Ray Dalio）表示，市场政治风险不断上升，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应该资产配置 5% ～ 10% 的黄金。支持黄金上涨的因素包括：美国和朝鲜互相叫板，如果不是虚张声势，就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战争。而美国国会无法提高债务上限的可能性上升，若不能，这将导致技术性违约，政府临时关门，从而使美元愈发脆弱。

关闭交易大厅

全球主要市场中所剩无几的交易大厅之一，使用了 31 年之久的港交所交易大厅将在 10 月关闭。高峰期千人出市场面早成记忆，如今每日只有 30 名经纪出市交易，且几乎所有交易都是电子交易，与经纪在场外买卖股票的方式一样。但一些出市交易员仍希望像纽交所那样保留大厅，他们致信香港政府，抱怨关闭大厅的决定和独立经纪长期面临的困难。



继往不易

虽然人们常常带着怀旧之心感慨现代社会中公益之举的消失，但根据德国科隆大学管理、经济与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结果，当需要对自己身边的既有公益事业的命运做决策时，由于维护模式牵涉更多的相互协作沟通，多数人都会选择相对不那么麻烦的弃旧迎新模式。发表于《自然•人类行为》上的论文指出，积极参与以保持现有的社区慈善和义务工作固然有益于节约自然资源，但出于不愿让他人搭便车的心理，以往承担了主要职责的人一旦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常常宁愿重搭班子，从头再来，以财力和物力的浪费换取更小的人力摩擦。

好消息

蚂蚁合作社

大树旁边为什么经常有成群的蚂蚁出没？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研究小组在《生态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这原来是一种互利互助的合作模式。树木分泌的富含糖分的汁液为蚂蚁所喜，而蚁群吃掉叶片后的排泄物可以为树木提供肥料。此外，蚂蚁还可克制众多危害性更大的害虫。

为了青春早餐吃好

摄入充足蛋白质可延缓因年龄增长而导致的肌肉流失，从而降低通常与衰老相伴随的体弱多病、不良于行和容易摔倒的发生。但根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蛋白质的摄入不仅是量的问题，还与频率相关。三餐均衡摄入肉蛋奶的人，要比只在午饭、晚饭大快朵颐的人肌肉更强壮。

坏消息

吸引力无法则

许多约会网站宣称，人工智能可以在两个人见面之前就预测出彼此是否来电。但以美国犹他大学为首的研究小组日前在《心理科学》杂志上指出，即便是最先进的算法，预测某一类人是否喜欢另一类人或被喜欢的准确率也在 30% 以下，而当具体到个人时，则根本没有任何的参考意义。

人脉之度

众多求职者寄希望于通过拓展社交网络人脉来获取面试机会和理想工作，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和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小组调查了 424 名领英网站用户后发现，除非对方此前就已经与你打过交道、有着相对密切的关系，否则聊天点赞的次数越多，收到面试或录取通知的可能性越低。

世界会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因此要找时间去外面玩。长大后你会很忙，所以我们希望你花时间闻闻所有的鲜花，把你想要的树叶都放到你的篮子里……童年是神奇的。人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童年。不要为了未来太过担心。我们会为你和所有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扎克伯格喜迎二女儿“八月”的出生，给她写了一封公开信。“八月”这个名字源自拉丁语，是“奥古斯都”的变形，表示令人敬畏，多用作男子名

我们常说“幸福的瞬间”，但在哲人和智者看来，真正的幸福不会转瞬即逝，而是一种持久的状态，是辛勤工作、意志坚定、奋发图强才能获得的结果。实际上，我们混淆了快感与幸福的概念，我们总是在花样翻新地找乐子，浑然忘记了追寻内心深处持久的幸福。

——弗里德里克·勒努瓦，《与哲学家谈快乐》

一百年前，工厂工人成立工会并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限制工作时间。如今，硅谷的员工却颂扬自己遭受的剥削。一款流行T恤上写着“朝九晚五属于无能者”……真相是，这些创业者和他们的员工付出的额外努力中，很多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彭卡韦尔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一周工作超过56个小时几乎不会带来生产率的增加。

——丹·里昂斯，《破裂：创业泡沫历险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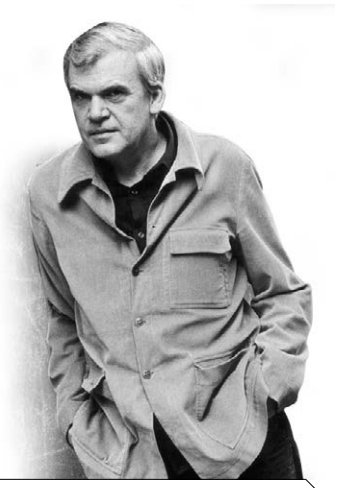
一旦你驻足观看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就会从中发现最有趣的一点：真实的、脆弱的人类仍然在运用自己潜藏的压迫感和对观者无声的恳求不屈不挠地寻求着关注。

——奥利维娅·莱恩，《孤独的城市》

（插图 山辛胡）

一个混蛋就是一个混蛋，哪有什么奥秘？存在之谜消殒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确定性对于谜都是不屑一顾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人们有丰富的生命经验，在通过历史的磨难之后，却依然愚笨，一如走入磨难之初。

——米兰·昆德拉，《相遇》



数字

10
米

美国国土安全部确定了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的设计方案，从方案图中可以看到，在边境隔离线上首先有一道栅栏，然后是一个约35米的监控区，在靠近墨西哥一侧则是一道近10米高的水泥墙。

13
厘米

8月30日，马特·达蒙主演的电影《缩身》为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幕。这部讽刺性电影讲述了人们缩小到约13厘米高，作为解决人口过剩和全球变暖方案的故事。

42
天

美国记者谢默斯·麦格劳说，飓风“哈维”在得克萨斯州沿海地区倾泻的雨水将多达15万亿加仑。如果所有这些水从水龙头而不是从天空中倾倒下来，那么根据2010年美国人的用水量来估计，这些水足够美国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使用42天。这是卡特里娜飓风的2倍多。

节俭心得

文 Harps
图 谢驭飞

世道不景气，一些人仍然能大笔拿钱来买房子，另一些人则从财务自由变得不那么自由，家庭预算从宽裕变得紧巴。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皆是艺术，自古骚人墨客皆不能免。苏东坡流放期间也要数着钱串过日子。文人自己理家的时候都忍不住谈两句节俭的心得。周作人在散文中说物价高涨，菜钱不够用，吃臭豆腐最合适。这东西味道鲜美，可以下饭，但又因为咸，也吃不了许多。

严肃地来说，节俭不仅仅是省钱，而是在收入固定的前提下，全面系统地优化家庭开支，达到最小支出最大获益的目的。钱、时间和人的健康都是成本。一味撙节，疲于奔命，甚至衣食不周，节俭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单纯教人省钱是行不通的。有些节俭之道看似合理，其实要搭上大量时间，只省下了一点点钱，根本不划算。某个自言不会煮饭、一概外食的作家谈俭朴生活，建议人们用空的玻璃瓶当茶杯，把穿旧的衣服裁开做成包裹东西的方巾和抹布，把泡过的茶叶渣晒干用于冰箱除味和填塞枕头。看似有理，其实没有什么实践的空间。每家人有几张嘴？用得过来这许多空的玻璃瓶瓶罐罐泡茶？城市里人们住公寓，寸土寸金，谁家会腾出一片地方经年累月晾晒湿茶叶渣，还得防止腐烂生霉？旧衣服质地各异，有些爱掉毛，有些不吸水，根本没法用作抹布。要节俭干脆别买，反正衣服很难穿坏。

讽刺的是，富裕比贫穷要“便宜”。中产阶级的消费场所充满了耐用货品，成本平摊到使用时间里，比用了不久就坏的便宜货要实惠。《多收了三五斗》里卖米的农民，指望能多卖一点钱，买整听的洋油，比零买要便宜。可是米价大跌，整听的洋油价钱咬手，还是只能向小贩零沽。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奇为《大西洋月刊》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昂贵的贫穷》，通过亲身经验告诉人们：穷人付不出房租押金，只好住日租价格更贵的小旅馆；因为没有厨房甚至微波炉，他们没法更为经济地为自己做饭，只能吃快餐。他们的车坏掉时，付不起彻底整修的价格，于是只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车子毛病只会越来越大。穷人如果没那么穷，他们的生活成本能显著降低。这样的荒谬表述在这个荒谬世界上竟然是非常真实的。节俭这种艺术，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学习掌握。

在这个又大又复杂的世界上生活了若干年，我的节俭心得是：尽可能自己煮饭烧菜，材料拣好的买也比在外面随便吃要便宜。能买散装的蔬菜水果就别买包装好的，能买整块的鸡鸭鱼肉就别买分解切碎的。分量够重的大玻璃罐用来做酸豆角和泡菜，小的果酱罐子用来装香料。逛街的时候穿球鞋，别化妆——这种状态下穿起来还好看的衣服才是值得花钱买的好衣服。

回长沙

文 爷是小白兔
图 谢驭飞

我每年回到长沙，都是一年之中最热的几个星期。天热会让很多东西变味儿，包括情绪和计划。飘在外地、异域总会有些想家的情绪，总想着下次要见见什么人，吃吃什么菜，到什么老地方走走。可是关于长沙的一切回忆，关于归来后的一切计划都在走出飞机场、火车站的那一瞬间变得黏黏糊糊，因为实在太热了。

于是，我每次回到的长沙不过是一间空调房，一张沙发床。躺在铺着竹凉席的沙发上，把一头躺热了，就换到另一头。盖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毛巾被总也不能按照我妈的指示盖在肚子上，要么在脚头揉成一团，要么掉在地板上。眯着眼看各种根本看不下去的电视节目，看几分钟就会睡着，电视一关，马上就醒。所以，只要我在家，我爸妈就不再管电视了，由它开着，夜以继日，由我躺着，晨昏颠倒。到了吃饭的点从来也没饥饿感，上了桌却又停不下筷子。撑到半死，回到沙发上继续躺着。过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还能吃得下我妈递过来的西瓜或葡萄。

一些人羡慕我的勤奋自律，也有人骂我变态工作狂，但每次回到长沙就是烂泥一堆。智商和情绪都留在了外地和异域，跟我回来的只有一些性发育以前的本能：吃喝拉撒睡。而且还是超级加强版：狂吃狂喝狂拉狂撒狂睡。如果一个远行的人父母尚在，朋友渐少，每次回乡就有这种变成巨婴的危险。走得太久了，走得太远了，社会关系稀薄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家庭关系就把我牢牢地锁在空调房的沙发上，动弹不得。脑门上赫然闪烁着“充电中”。无论在外头多坚强，多风光，多倔强，回家后瞬间变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毕竟，我还只是个孩子。

还好，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城里，有几个同学离婚了，有几个朋友嫁不出去，这些人还能约一约。我觉得他们好玩，他们也想从我这里打听一点外面的事情。我不是有什么反社会的人格，在劈柴喂马、周游世界的时候我也关心粮食和蔬菜，不过我觉得家庭美满、工作稳定、儿女双全实在意思不大，那是一种离思考越来越远的幸福。漂淡的。

离开长沙的这些年，我的嘴是越来越淡了，但心里的滋味很丰富。有个朋友说：跟你在一起，喝白开水也有好故事。不过实在找不到什么免费喝白开水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约在咖啡馆。每一个咖啡馆都有一个听我讲异域和近况的朋友。他们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留守，而又忘不了当年想振翅远飞的心思。上个周末我跟人讲了一次“白话文运动一百年和重写现代文学史”，前两天我跟人讲了在美国怎么给自己理发和怎么给汽车换机油，当然，都是胡说。有的没的，大家高高兴兴，听完上个厕所，然后回家睡觉。毕竟他们还要工作，还要供房，还要在 40 岁以前把自己嫁出去，也没有谁会把我的话当真的。

没有他们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去他们推荐的那些咖啡馆。戴着耳机，把手机 APP 上的英文听力文摘一篇篇听写出来。这件事乐趣极大，把一个热闹非凡、声色犬马的国际化大都市变成一个人的自习室，这应该能算行为艺术了吧。

作家最常用的那些词

文 贝小戎
图 谢驭飞

上初中的时候，自习课上我会跟我的同桌玩这样一个游戏：轮流让对方在地理课本里的地图中找一个地名，或者在语文课本的某一篇文章中找一个词。我记得有一次他让我在一篇文章中找“活该”二字，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完全没想到这两个字在《论雷峰塔的倒掉》的结尾，独立成段。

有了 Word 文档和电子书之后，搜索文本中某个词的位置就非常容易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本·布拉特分析了各种文学经典和畅销书之后，他说 J.K. 罗琳最常用的是“魔杖”“巫师”“魔药”，这显而易见。比较新鲜的是，简·奥斯丁最常用的词是“礼貌”“幻想”和“轻率”，海明威最常用的词是“门房”“船尾”“干邑”，谭恩美最常用的是“葫芦”“花生”“面条”，“007 系列”小说中最常出现的是“洗手间”“裤子”和“闪耀”。纳博科夫最喜欢用的词是 mauve（紫色），其实他喜欢各种表示颜色的词，因为他是一个联觉者，他说他听到声音的同时还能看到其颜色：g 和 r 是黑色的，蓝色组有钢铁般的 x、雷雨云 z 和蓝莓 k，绿色组有桤木叶 f、生苹果 p 和阿月浑子 t……

布拉特大胆断言，对作品用词的统计能辨别出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些词的性别特征很明显，如“刮胡子”和“购物”，有些不那么明显，如“确实”和“有些”。他说，男性角色更有可能咕哝、咧嘴笑、轻声笑、喊叫和杀人，女性角色注定要颤抖、哭泣、低语、尖叫和嫁人。根据他的统计和分析，托尔金的《霍比特人》的男性特质占 99.9%，《麦田里的守望者》则是经典男性小说中女性特质最强的。

他还分析了作家使用标点符号的情况。美国犯罪小说家埃尔莫·伦纳德在《写作的 10 条守则》中说，每 10 万字使用的感叹号不得超过 2 到 3 个，而他自己并没有遵守这一守则：他写了 40 多部小说，总字数有 340 万，按照他提出的写作建议，他在整个写作生涯中使用的惊叹号应该只有 102 个。实际上，他用了 1651 个，是他建议的数量的 16 倍，每 10 万字用了 49 个。不过，相对来说，他使用的惊叹号确实是最少的，用得最多的是乔伊斯，每 10 万字 1105 个，狄更斯也是一个很吵的作家（713 个），最安静的作家除了埃尔莫·伦纳德，还有海明威（59 个）、厄普代克（88 个）、福克纳（108 个）。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文体分析还能用来看病和破案。有人发现，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他的演讲中有明显的认知能力损伤的迹象，后来他主动辞职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雇用了许多电脑高手帮他们做文本分析，但帮助他们找到大学炸弹客的是莎士比亚专家唐·福斯特。近来有人说，艾丽丝·默多克去世后出版的小说中能看出她的心智退化的表现，她的文字中有些句子不够连贯，用词也不够特别。所以为了证明你自己的心智正常，也要挖空心思地推敲用词。

生活中的头号难题

文 夏兰
图 谢驭飞

马桶是一个伟大的、巧妙的发明，巧妙到它一坏了我们普通人就一筹莫展。住进新家之后，我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马桶漏水，因为漏得很小、很慢，所以白天没发现，到夜深人静时才听到它隔一阵子就自己冲水再注水，那时已经没法找物业的师傅，我自己上网搜索了一下“马桶漏水怎么办”，许多人说得很轻巧，但我看得一头雾水。第二天师傅上门之后很快就搞定了。

如果一个男人不会修马桶、不会开热水器，会不会被媳妇视为缺乏生活常识和基本的动手能力？那么她应该知道，这种人非常多。9 月 1 日，谷歌在其官方博客上公布了《如何修理马桶（以及其他不搜索你就不会做的事情）》。文章说，一般人们使用谷歌浏览器搜索的是突发新闻、最新的比赛结果，或者本地电影院在放映什么。近来，搜索“如何修理东西”的活动增加了 140%。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如何系领带、如何接吻、如何怀孕、如何减肥、如何画画、如何挣钱、如何制作杯子蛋糕、如何写求职信、如何制作法式吐司、如何瘦肚子。这么多人不会系领带，不知是谁的失职？西装还卖得出去吗？

关于修东西的热搜还有地区性差异。在美国，人们最需要知道如何修理门、窗户、马桶、洗衣机和电冰箱，而在日本，这一顺序是：窗户、门、洗衣机和马桶。此外，人们还搜索如何弹吉他、如何学英语、如何量胸罩的尺寸、如何灭蚂蚁、如何写一本书、如何跳车……

我觉得谷歌公布这一数据是非常慷慨的做法，一方面它让人们知道，自己遇到的问题并非孤例，许多人家里的门窗、洗衣机都会坏，而且他们都不会修。倒不是说这些东西特别容易坏，而是坏了之后需要尽快解决，而且觉得自己搜一下就能解决。另外，它还告诉了人们商机在何处，比如跟健康相关的搜索中，如何减肥的搜索指数是 32，如何减肚子的搜索指数是 13，但不要忘记，如何增重的搜索指数也有 11，此外还有如何冥想、如何练出六块腹肌、如何不打呼噜、如何快速入睡、如何戒烟。系领带这种事情一下就能学会，你没法开个培训班，但绘画培训的市场很大，许多人搜索如何画玫瑰、如何画狗、如何画漫画。如何做纸飞机的搜索指数是 6，比如何学英语和如何制作弓要高一点。

《石英》记者安娜丽莎说，乍看上去这些搜索是人们在向谷歌寻求帮助解决具体的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关乎的是其他重大的问题，翻译一下就是：如何系领带等于问“如何长大”，如何减肥等于问“我可爱吗？”，如何挣钱等于问“我能找到成功吗？”，如何减肚子等于问“我能永远年轻吗？”。

本栏目投稿信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Air Amplifier 气流倍增技术

戴森 Supersonic 吹风机由第九代戴森数码马达驱动，以接近每分钟 11 万转的转速，每秒钟将 13 升空气推到放大器中。其 Air Amplifier 气流倍增技术将喷出的空气总量放大了 3 倍，从而产生高压高速的喷射气流。每秒 20 次测温能保证温度被持续有效地控制。

迷你甜甜圈制作机

Mini Donut Factory 是一款迷你甜甜圈制作机，只需要将调好的面粉倒入槽内并加入奶油，就可以制作出味道个性化的迷你甜甜圈。它一次性最多可以做 30 个甜甜圈，并且是全自动生产模式，每个甜甜圈从开始到结束只需 90 秒。

运动摄像机

这款运动摄像机将普遍应用于无人机和专业摄影器材的高精度无刷云台驱动系统融合到相机系统当中，解决了困扰运动相机界多年的图像稳定难题。这款摄像机小巧便携，并拥有高清的图像处理芯片，并将时下流行的直播功能加入其中。

菲涅尔超薄透镜

小米这款造型简约的感应灯采用菲涅尔超薄透镜，提升传感器性能。鱼鳞全反射结构，将光高效反射至漫反射片，并均匀打在扩散罩上，在朦胧的夜晚，带来更好的视觉感受。其选用环保 ABS 材质及高密度聚乙烯制造，小身板更稳定，兼顾灯体柔韧性。

带锁文件包

Dunhill Duke 带锁文件包的小牛皮材质，是通过植鞣法和铬鞣法来呈现颜色深浅，并提供一层防护光泽。标志性金属配件上镀有一层金和黑色钌合金，设计灵感源自一款典藏古董怀表。其内衬均采用复古纯棉材质。

智能灭火器

国内新锐设计师熊涛带来了一款现代化智能灭火器 Ramifire，通过扫描 Ramifire 上面的二维码可以掌控灭火器的过期时间，一旦过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联系厂家回收并派送新的 Ramifire。内置的火灾探测器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家里的火警情况，并通过手机微信通知用户。

万年历“闪历”

亨利慕时开拓者万年历腕表采用午夜蓝 fumé 烟熏表盘，3 点钟位置是大日历日期，中央指针显示月份，9 点钟位置是动力存储显示，机芯侧面有闰年周期。透过曲面蓝宝石水晶玻璃表后盖可见具有“闪历”功能的机芯 HMC800，能在无损机芯的前提下向前或向后调节腕表。

玻璃小鱼

以清面配以缎面仿水晶的玻璃小鱼是法国 Lalique 品牌海洋系列的代表产品之一，总共 29 种丰富色彩的小鱼可以互相搭配，展示在特别设计的透明水族箱中。

杂志惠
zazhihui.net

伊甸园地毯

Moooi 品牌的“伊甸园”地毯以色彩柔和、形态各异的花卉为主体图案，这种准确的色彩是混合了 16 种基本色调，并用每平方毫米 9 点的精度印制出来的。

蓝色扶手椅

Poltrona Frau 品牌的 Mamy Blue 扶手椅以独特的蓝色 Pelle Frau 真皮搭配棕色后背，聚氨酯泡沫填充的靠背结构以及由双锥弹簧组成的榉木座面提供了宽大舒适的轮廓。

开心果蛋糕

宝格丽 Festa 欢筵享宴高级珠宝系列中的“开心果蛋糕”戒指，绿色玉髓和玛瑙中插入了开心果形状的祖母绿戒面，镶嵌在玫瑰金底座上的钻石像奶油般流淌下来。

茶花女吊灯

罗伯特·威尔逊与意大利照明公司 Slamp 合作的“茶花女”吊灯呈现了诗意的形象，吊灯用一种名为 Lentiflex 的聚合物制作，看起来像是由许多小的棱镜组成。

水晶棱镜

托马斯·阿隆索（Tomas Alonso）设计的“棱镜”托盘，传统的圆形大理石托盘上被添加了一道偏心的彩色刻面水晶棱镜，赋予简单的圆形一种新的现代感。

世界时间

路易威登 Escale Worldtime 腕表结合三问报时与世界时功能，表盘外侧的两个圆环上描绘了全球 24 个城市的首字母，对应着这个城市所代表时区的准确小时数。

沉默不会使儿童性侵减少或消失，反而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放大伤害

打破沉默，正视真相

向儿童性侵说“不”

主笔 徐菁菁 记者 王海燕

8 月 12 日晚上，作家陈岚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则网友举报。该网友在南京南站候车室看到一名年轻男子当众猥亵一名女童，旁边两个疑似其父母的中年男女并未有任何干预行为。这一消息引燃了网络。后经警方证实，两名中年男女是女孩的养父母，猥亵者是其哥哥。8 月 28 日，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犯罪嫌疑人 18 岁的段某某批准逮捕，而 8 岁的女孩至今仍与养父母一起生活。就在南京南站猥亵事件爆发后的两天，8 月 16 日，网络再次曝光重庆一医院一男子当众猥亵女童。该男子被证实为女童姑父。

两起案件再次掀起了讨论儿童性侵问题的舆论高潮。事实上，在过去的 5 年中——华东师大二附中物理老师张大同性侵多名男学生案件、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案”、宁夏灵武市一幼儿园教师黄某某性侵 12 名幼女等等——每一起惊人案件的曝光总是能在短期内吸引公众的高度关注，而在喧嚣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南京、重庆两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公共场合的“无知无畏”网络举报的偶然性恰好说明，在与儿童性侵斗争的道路上，中国依然在一片闪有微光的黑暗中摸索前行。

而在黑暗中隐没的，极可能是一个被遗忘的庞大受害者群体。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针对儿童性侵的全面数据调查。在 2017 年 4 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家庭与儿童研究中心出版的《儿童保护制度建设研究：目标、策略与路径》一书中，研究者根据中国数次局部调查的综合分析，认为中国受到多种形式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在 10% 以上，其中插入式性侵犯约 1%，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这意味着中国每 10 个未成年人中就至少有一人受到过性侵犯。

南京南站猥亵事件发生后，当我们试图深入讨论儿童性侵议题时，首先发现的一个巨大难题是：当我们在讨论儿童性侵时，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事实上，在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里，并没有针对儿童性侵的专门罪名。在司法领域，性侵儿童涉及的罪名分为“猥亵儿童”和“强奸”两种。普遍存在的批评是：这种划分方式并不能全面覆盖儿童可能遭遇的性侵害。例如，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仅为女性，并不包括在儿童性侵行为中也会受到伤害的男性儿童。

而在公众讨论中，儿童性侵的概念则更为模糊。南京南站事件展现了一幅图景:在儿童性侵的议题上，从司法到公众，我们全方位地缺乏基本共识。于是，在儿童性安全遭受威胁时，不能容忍与习以为常，皆以成人个人的道德、知识为尺度，并未将儿童利益放于中心位置。

进一步的，我们为何缺乏共识？其根本原因或在于：我们尚未能够直面儿童性侵的事实真相。

1977 年，美国儿科权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一次演讲中呼吁儿科医生们在知识和情感上，向儿童性虐待这一“最后的禁忌”发起挑战。“禁忌”的存在不仅因为性与家庭生活的私密，更是因为无知：40 年前，即使在专业领域，人们仍相信，儿童性侵的发生率为不足百万分之一，儿童不会在性行为中受到多大伤害，性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他们乐于接受。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的 10 年，在儿童性侵问题上，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意识转变：重量级的研究报告揭露了儿童性侵现象的普遍性和它们对儿童产生的身心伤害。医学和心理方面的专业研究，为何种行为构成侵犯提供了界定的科学依据。包括娱乐明星、政治家在内的大量成年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以个人经历教育公众认识性侵真相。真相中诞生的社会共识成为推动美国采取行动，建立儿童与社区教育项目、改进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最大推动力。其结果是：从 1990 年到 2013 年，美国儿童性侵案件的发生率下降了 64%。

美国儿童虐待问题研究专家、新罕布什尔大学社会学戴维·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认为，一个地区对性虐待问题的回应从落后到先进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关注不够，存在着忽略和某种程度的否定。第二阶段，即认识阶段，人们高度警觉。拥护团体倾向于强调这个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后果，研究倾向于关注发生率和影响，通过运用常规模式和生动案例教育人们。第三阶段，人们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今天的中国或还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之时。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指出，普通民众对强奸和猥亵的认知往往还是一个陌生壮汉在夜黑风高里扑倒受害人，但儿童性侵的施害者多为家庭成员、老师或者熟悉的人，受害人一般年龄较小，多是在没有受到暴力和胁迫的情况下被侵害的。心理创伤援助公益平台春风网创始人隋双戈遇到很多家长，即使收到了孩子的求助，依然选择了忽略或拒绝相信。还有高档社区的居民告诉他，“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存在”。但实际情况是，儿童性侵的发生会出现在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种家庭背景之下。

从真相走向共识，这便是我们谈论儿童性侵的出发点：在向魔鬼全面宣战之前，我们先来打破沉默，看清它的面目。

儿童性侵，海面下的冰山

记者 王海燕

当家长认为性教育太早时，坏人却不会嫌孩子太小

对公众来说，“儿童遭受性侵”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个案但又转瞬即逝的热点社会新闻。但对于投身儿童性侵领域的人们来说，更加令人忧心的是极端案例之下更加普遍的社会暗流。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没有针对儿童性侵的全面数据调查，但那些提供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公益组织、维权律师、后期援助的心理咨询师、专业社工们都发现，在中国，儿童性侵的现实已经一再揭示出，貌似平静的海面之下，其实潜伏着巨大而沉默的冰山。

如何界定性侵儿童的边界

自去年以来，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律师一直在代理满洲里市人大代表性侵女童案，在案件中，她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这起案件是2015年5月随着一名13岁初一女孩企图自杀浮出水面的。当时，这名女孩买了安眠药企图自杀被救下，老师和家人随后在女孩的书包中发现一封遗书，女孩在遗书里说自己被一名女生朋友胁迫带到了一家酒店。

后经警方调查，原来这名女孩和另外3名女孩都遭到5名女生多次胁迫（包括未成年人），为满洲里市人大代表、企业老板石学和等提供性服务，其间伴随暴力行为。这起案件曝光后，长期为家暴和儿童性侵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李莹找到记者，联系到受害儿童，成为她们的代理律师。但后来经过法院对案发时间的认定，李莹发现了一个令她倍感无奈的细节——案发时，已经有女孩年满14周岁，因为强奸过程中涉及强迫性交易行为，根据现行《刑法》规定，14周岁这个门槛可能直接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李莹对此非常困惑：“同一起案件里，为什么受害人年纪相差几个月性质就不一样呢？”

这也同样是我们在做这篇稿件时想要探究的，

（蔡小川 摄）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律师

即从法律、日常讨论和儿童教育的层面上来说，当我们在讨论儿童性侵时，我们到底要讨论什么？李莹对本刊解释说，在司法领域，性侵儿童的罪名包括“猥亵儿童”和“强奸”两种罪名。其中强奸罪为刑事罪名，犯罪对象为女性，自 2015 年“嫖宿幼女罪”被废除后，“与 14 周岁以下幼女发生性行为”的均以强奸罪论处。而在实践中，针对 12 岁以下女童，性接触同样被认定为强奸罪，即使没有插入性行为，但只要有性器官碰触，即可认定强奸。而猥亵，则根据程度可进行行政和刑事处罚，犯罪对象包括男性。

而在司法领域之外，媒体上讨论性侵儿童时，通常指的是猥亵和强奸儿童两种行为，但如何认定猥亵儿童及其程度同样非常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年龄问题。在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里，并没有针对儿童性侵的专门罪名，因此大众在讨论儿童性侵时，尚没有统一的年龄界定。在国际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还是联合国，提到儿童性侵犯时，年龄界定都在 18 周岁。曾呼吁对儿童性侵专门立法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告诉本刊，她认为如果中国专门设立“性侵儿童”罪名，犯罪对象年龄也应该提高到 18 周岁。但现实是，目前各领域讨论儿童性侵时，其中对强奸罪的年龄依据主要参考强奸罪中对 14 岁以下幼女年龄的规定，但对 14 岁到 16 岁的青少年阶段受到侵害如何处理，并没有更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涉及猥亵行为的，14 岁到 16 岁之间的青少年往往也按照儿童处理，性侵 18 周岁以前未成年人从重处罚。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界定对儿童的猥亵行为。在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中，“儿童性侵犯”包括非身体接触，比如利用儿童进行色情表演或观看色情材料。但在中国，很多普通民众对猥亵儿童完全没有清晰的认知边界。南京南站猥亵儿童一案发生后，有媒体采访涉案嫌疑人的邻居，对方认为“他们家就是那样，平时也没太注意，我偶尔去他家串门，那小姑娘洗完澡都是光着屁股在家里跑的，再加上兄妹俩平时亲得很，这才出了这个事”。这位邻居的言论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人对正常接触儿童和猥亵区别在哪里的困惑。李莹看到这一言论觉得非常荒唐，在她看来，判定段某某行为是否猥亵，只需要参考一个依据，那就是他的动作是否带有刺激性快感的意味，“不然为什么他要摸胸部，不摸其他地方呢？”。

模糊的认知

而在童小军看来，“儿童性侵是一个谱系，从没有身体接触到有身体接触，综合考虑，只要实施的行为对孩子造成了身心伤害，都属于性侵”。但何为造成伤害，依然没有明晰的界定标准。同样以南京南站一案为例，包括嫌疑人一家所在的河南滑县当地政府部门都认为，反而是媒体曝光对小女孩造成了伤害，养父母和哥哥对她很好。

心理创伤援助公益平台春风网（原名中国性侵害预防网）的创始人、应激干预方向医学博士隋双戈告诉本刊，实际上，和其他伤害不同，性侵的伤害非常特殊，分为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和大众认知不一样的是，生理层面不只包括身体外部表征伤

害，还包括引起的内分泌变化，即儿童在遭遇多次性侵后，是可能出现神经性内分泌变化的，进而造成身体与心理成熟错位。而心理层面的伤害则更是多层次的，除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即使一般在短期内看不出显性伤害的儿童也可能出现较严重的后遗症。

隋双戈甚至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女孩从小被自己的亲哥哥性侵，还告诉她，所有人家里都是这样，全天下的女孩都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小的时候这个女孩虽然有时也觉得奇怪，不喜欢自己的哥哥总是烦她，但也由着他去了，甚至有的时候还挺“喜欢这个游戏”。直到长大后，和朋友交流，她才发现事情的真相，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并开始出现严重的心理创伤症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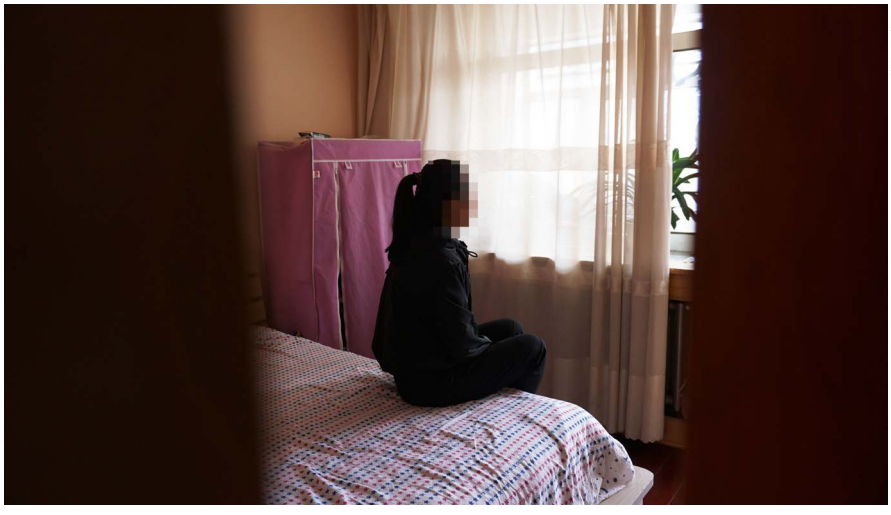
在接受本刊采访的当天，隋双戈还去见了 3 个被性侵的小女孩，3 个女孩的年龄分别是 7 岁、9 岁和 12 岁，是被自己的长辈性侵的。12 岁的女孩已经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了，但 7 岁小女孩的情况让隋双戈很吃惊。第一次见到隋双戈时，这个女孩子就直接坐在他的腿上，还左右摇摆，到处找好吃的好玩的。甚至当隋双戈询问时，她也会满不在乎地直接自己用手在同伴的两腿之间模拟性侵者对她做的事情。隋双戈当时非常吃惊：“一定是平时经常有人跟她这么玩。”让隋双戈忧虑的是，这种人与人之间身体界限和行为边界的模糊会影响小女孩与人交往，更加容易受到侵害。因为在没有边界感的时候，她难以把握自己与他人交往的界限；在“听话”“乖”这样受鼓励的环境中，没有人教她如何保护自己，更难以对侵害说不或者喊停。此外，性侵遭遇的恶逆变也是常见现象，即被害人受到侵犯以后，在各种因素推动下导致的逆向变化，从被害者向害人者方向的转化，隋双戈认为现在有些中学生年纪还很小就主动卷入了性交易，可能就有以上这些方面的原因。

隋双戈干预的是比较特殊的案例，而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针对普通中学生的调查则发现，遭遇性侵始终没有被发现的一些孩子，即使案发前后没有明显症状，随着成长也会不断感受到伤害的加深和放大，其中甚至有“越长大，越优秀，越拥有尊严，越陷入爱情，爱情越美满，受到的伤害也越大”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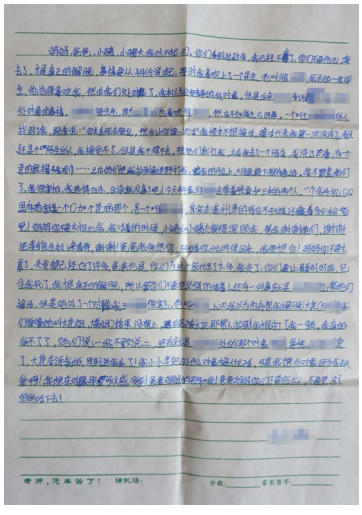
“女童保护”是目前在中国与包括政府部门和学校等合作开展防性侵教育最多的公益组织，为了让孩子更加清晰地认知性侵，“女童保护”在不断修改教案后，主要从三个方面教育儿童如何分辨性侵：1. 他人在不必要却有意识的情况下触碰儿童隐私部位；2. 他人指使儿童触碰他人隐私部位；3. 他人让儿童观看裸体照片、视频，甚至拍摄儿童裸体。但中国现行《刑法》和《行政处罚法》中，只有对猥亵罪和猥亵行为的处理规定，对何为猥亵并没有明确界定标准。其中构成猥亵刑事罪名的要件包括“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公共场所当众犯罪加重处罚，行政处罚法则完全没有提到何种行为构成猥亵。

左图：2016 年 6 月 27 日，内蒙古满洲里市受害女孩李莉（化名）两次遭性侵

右图：内蒙古满洲里市一名被性侵女孩的遗书



（视觉中国 供图）



（视觉中国 供图）

李莹则向本刊解释说，目前在法律上，一般认为猥亵是比性骚扰更严重的体现。其中性骚扰的基本定义是违背对方意志做出带有性意味的行为，属于民事纠纷范畴，但儿童本就没有性自主能力，应该得到绝对保护，因此只要对儿童做出带有性意味的行为就属于猥亵。在实际案例中，认定猥亵一般指的是不直接发生性器官的插入和接触，进行搂抱、亲吻、非生殖器等身体触摸。因此李莹认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没有明显性意味的非身体接触也难以纳入到儿童性侵的认定范围。也因此，在后文中，我们讨论中国儿童性侵现象时，指的均是已经发生的有身体接触的猥亵和强奸行为。

中国的儿童性侵到底有多严重

南京南站一案曝光后，很多人的一大困惑是，为什么最近性侵儿童的事件变得如此频繁。在“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发起人之一的“凤凰公益”主编孙雪梅看来，这其实完全是来自于媒体热点的错误印象，因为即使以媒体曝光为标准，儿童性侵的案例这些年来一直都非常频繁。

孙雪梅和一批记者成立“女童保护”的初衷来自 2013 年 5 月的“校长带女生开房案”。当时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 6 名六年级女生集体失踪，后经调查发现，这 6 名女生是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及万宁市一政府单位职员冯小松带走开房了。孙雪梅清楚地记得，在这起案件曝光后的 20 天里，媒体又曝光了另外 7 起校园性侵案件，涉及省份包括安徽、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其中甚至有幼儿园保安猥亵幼儿园儿童。

当时孙雪梅和一些记者在群里讨论，最大的感受是愤怒、悲哀又无能为力，最终大家决定做点什么，于是联合了百名女记者，发起了“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和国外对儿童性侵的社会认知历程一样，在中国，记者同样是最早敏锐发现儿童性侵普遍和严重程度的主要群体。

但除了因为身处媒体，对性侵儿童案件有更多的关注，孙雪梅实际上还有切身的经验。原来她在上小学时，曾亲眼看到有 10 多岁的小男生哄骗更小的女孩实施性侵。她那时候已经开始隐隐感觉到这种行为有哪里不对，但因为缺乏相关教育，她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或者阻止发生在眼前的事情。

正是来自切身的经验和对当前儿童性侵现状的考量，在“女童保护”成立后，他们将防性侵教育作为重点推广的理念和活动。但与此同时，她们发现国内并没有较权威的儿童性侵数据统计，因此，“女童保护”也开始收集包括媒体曝光、法院和检察院公布的儿童性侵案等案例，并从 2014 年开始发布年度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也是目前媒体引用最多，公众认知最熟悉的儿童现状报告。

根据“女童保护”的统计数据，从 2013 年至 2016 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 岁以下）案件就有 1401 起，平均每 1.04 天就曝光一起案件，受害人数超过 2568 人。受害人数并非确数，在“女童保护”的统计数据中，性侵多人的均按 3 人计算，但实际上，光 2015 年一人性侵 10 名以上儿童的案例就有 14 起。

但和“女童保护”由媒体人发起，且一开始就直接关注儿童性侵领域不同，在我们采访的其他相关机构里，无论是做法律援助的，还是后期做深度救助和心理干预的，都是因为偶然契机切入到儿童性侵领域后，才发现儿童性侵的严重性。这也和公众对儿童性侵的认知完全一致，即只要关注到这一领域，就会发现，海面之下有着巨大的冰山。

做法律援助的李莹告诉本刊，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最早主要是关注妇女儿童暴力，但李莹很快发现，儿童性侵的现象非常普遍且情节严重。迄今为止，源众已经介入了 7 起儿童性侵案件，包括湖南益阳市赫山区八字哨镇学校科学课老师性侵 19 名女童、广西百色助学达人王杰多年性侵多名女童。这些案件虽然几乎都曾引起一时的巨大轰动，但又很快被忘记了。而在介入过程中，李莹还发现，几乎所有的案件取证都非常困难，其中广西百色助学达人王杰性侵儿童一案的重要证据，甚至来自王杰本人录制的视频，这让她意识到，儿童性侵在中国可能非常普遍且隐秘。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的真爱儿童社工服务项目是目前国内少数做儿童性侵后期救援的公益组织，项目负责人李梓琨告诉本刊，她的经验同样如此。2012 年儿童希望基金会成立这一项目时，主要目的是做受虐儿童专业救助，但成立后接到的案例几乎都是儿童性侵，于是儿童性侵自然而然成为项目的主要关注领域。因为需要对案例进行深度介入，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极其巨大，真爱项目甚至不敢大规模接受求助，因为在接触这一领域后，李梓琨发现，案子实在太多了，几乎遍地都是。

2013 年 9 月 4 日，“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发起人孙雪梅在云南大理漾濞县给孩子们上“防性侵”课

隋双戈同样是做儿童性侵后续干预的。2005 年他发起“春风计划”，关注的是强奸受害者心理干预，希望为强奸受害者提供帮助，虽然他一开始就关注到中国妇女被强奸后报案率很低，但他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儿童性侵的问题。直到 2008 年，他收到了一个求助，一名四川的留守儿童遭到了老师性侵，持续时间还很长，被一个亲戚在日记中发现后报警。但在第一次公诉后，这名老师却被无罪释放了。受害儿童的父母非常不满，找到春风网求助，春风网的律师随后介入，并同时在网上发帖曝光，引起当地司法部门重视。最终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后，那名教师被判处强奸罪。但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隋双戈发现，那名老师性侵的并不止报警的这名小女孩，但最终却没有更多小孩站出来指认老师的罪行。那时，他才注意到，原来国内的儿童性侵如此严重，并且具有巨大的隐蔽性。

因此，几乎各个机构都能说明，虽然“女童保护”的数据是目前被引用最多的报告，但因为儿童性侵本身的隐蔽性和媒体报道的选择性，其代表的情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女童保护儿童性侵数据整理和收集负责人之一徐豪告诉本刊，他们曾在 2015 年向媒体提供过一些案例，多为猥亵，但因为证据或者案情本身的种种原因，基本无法曝光。

更准确一些的数据来自公检法部门。迄今为止，公检法部门两次公布过全国的儿童性侵案件数据，其中之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2014 年儿童节公布的数字：2010 ～ 2013 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猥亵儿童罪 7963 件 8069 人，起诉嫖宿幼女罪 150 件 255 人，起诉引诱幼女卖淫罪 68 件 121 人（如果在 2015 年 11 月后，这两项罪名均会变更为强奸罪）。这也是我国公检法机关首次公布有关儿童性侵案件的数据。

三年后的 2017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最高法院公布数据，称 2013 年至 2016 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 3713 件，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 1.0782 万件。但这里的性侵儿童数据并不包括强奸这一更加严重的犯罪手段，因为迄今为止，

每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强奸儿童依然是和强奸妇女、拐卖妇女儿童的数据合并统计的。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儿童性侵案件是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近 3 倍，且光结案量就比 2013 年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还多。

但因为中国谈性色变的文化土壤和尚称不上完善的法律体系，进入公诉阶段的案件同样占比微小。广泛被引用的中国儿童性侵隐案率为 1 ∶ 7，媒体据此称中国每一次曝光的儿童性侵背后，起码还有 7 起未得到曝光的案件，这个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王大伟。但王大伟告诉本刊，隐案率是一个犯罪学概念，可以通俗理解为已经曝光的案件和隐而不报的案件之间的比例。儿童性侵隐案率为 1 ∶ 7，这个数据是多年前英国的警察系统根据英国的情况得出的结论，对中国有借鉴意义，但在性观念文化背景、司法体系和救助体系不同的情况下，完全不可类比到中国。这意味着，直到目前，依然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较为准确地量化中国儿童性侵的现状。

而“女童保护”在各地做防性侵教育时，发现情况时，很多儿童甚至家长根本不能分辨自己是否受到了性侵犯。孙雪梅记得，“女童保护”某次在大连上课时，有学生下课后跟讲师反映自己受到了非常直接的性侵，而之前这名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遭遇的是什么事情。另外一次则是在东北的防性侵教育课堂上，有学生向讲师反映学校的微机课老师会趁上课时，不怀好意地摸学生，让学生感觉非常不舒服，听完课后她们才知道自己受到了性侵。最后，“女童保护”方面跟学校沟通后，这名老师才被调离到不能直接接触学生的岗位。

“女童保护”的另一名负责人徐豪则告诉本刊：“很多孩子虽然受到了侵害，内心感到奇怪，但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受到的是何种伤害，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除了孩子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外，主动沉默同样是造成儿童性侵异常隐蔽的主要原因。“女童保护”的一位讲师曾在讲课后收到过一条短信，发信人称自己童年与人发生过关系，但讲师打过去，电话接不通。过一段时间，这个号码再次发来信息，发信人说自己从来没有跟其他人讲过，但讲师再拨过去，电话依然接不通。直到现在，这名讲师也不知道发信息的女孩到底是谁，她怎么样了。

李梓琨则接触过一个现实版《熔炉》的案例，时间大约在 2014 年左右。当时一名上海志愿者在云南某山区小学支教，在和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后，这名志愿者通过一名小女孩的描述发现，校长和几名男老师长期在性侵这个女孩和班上另外十来个女孩。这个志愿者当时就报了警，但事情却并没有得到公开的审理或解决，而是不了了之了。这名志愿者回到上海后，找到一个国外的机构，又辗转联系到李梓琨，希望寻求帮助，但除了询问是否报警，作为一个规模很小的公益组织，李梓琨给不出什么救助方案，甚至因为志愿者已经离开当地，她也不知道那些女孩现在怎么样了，那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是否还在残害儿童。

走向无声的隐没，无法被纳入到有效的统计中，也正是目前大多数或轻或重的儿童性侵案件的现状。虽然本刊采访的所有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律师和公益组织都希望包括公检法在内的政府部门，能够尽早调查和公开中国儿童性侵现状，以制定更好的儿童性侵政策体系，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没有全局性的切实的儿童性侵犯数据。

我们能够得到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是，2013 年 9 月，依托中国妇联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发布过的一份《女童保护研究报告》，研究团队在北京、兰州 9 所高中开展调查，最终结果性侵事件发生率在 6.7% ～ 21.8% 之间。2017 年 4 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家庭与儿童研究中心出版《儿童保护制度建设研究：目标、策略与路径》一书，书中根据中国数次局部综合分析，认为中国受到多种形式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在 10% 以上，其中插入式性侵犯约为 1%，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

可怕的熟人

但对孙雪梅来说，并不一定需要全局性数据才能说明问题，她更关注个案背后深层土壤和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早在上大学时，她就被一起轰动全国的性侵幼女案件深深震惊，震惊的原因不只是这起案件的恶劣程度，还因为她后来发现，案件中性侵幼女的老师就是她自己堂弟的老师，她说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之前也没觉得坏人有多远，但没想到离我的亲人这么近，而且还是熟人”。

熟人作案，这也正是儿童性侵中最典型的特征。

过去几年，广东、浙江、福建、北京等多个省市的地方检察院都曾多次发布数据，显示儿童性侵中熟人作案的比例大多超过 80% 甚至 90%。这和“女童保护”的统计数据一致。事实上，在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犯罪的比例分别高达 87.87%、70.59% 和 69.28%，这些熟人包括教师、邻居、亲戚、同村人。2016 年，“女童保护”对媒体公开报道的熟人性侵儿童案件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其中作案人身份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老师（含辅导班等）27.33%、邻里 24.33%、亲戚（含父母朋友）12%、家庭成员 10%。

这组数据也验证了我们的采访体验，在采访中，我们听到的案例，无论已经曝光过的极端案例还是未得到曝光的普通案例，作案人几乎都是熟人。并且，如果没有外人主动介入，这些受害者的处境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任何办法被知晓，或者得到改善。

去年冬天李梓琨曾到云南山区支教，为当地小学生教授防性侵知识，上课的是一个约 40 人左右的小学五年级班级。课程结束后，李梓琨告诉孩子们，如果有人受到类似伤害想要倾诉的，可以到办公室找她。最后，那一个班里共有 4 个小女孩找到她，其中一个女孩是被网友猥亵，另外两个女孩则告诉她，自己遭到了身边熟人的较严重猥亵。受到侵害最严重的一个女孩告诉李梓琨，她家里有三姐妹，都被 30 多岁的大伯同时在田里性侵过。但听完这些案例后，李梓琨告诉孩子们，以后要学会保护好自己，无法再做更多的事情。“你去了那个环境就知道了，他们的父母关心的都是孩子的吃穿，其他的都不太在意。”

但有些对性侵儿童比较关注的父母同样无能为力。她遇到的另外一起城市案例则来自一位律师求助，当时这位律师在代理一起二年级小学生被老师性侵的案件，根据律师的说法，这名老师当时性侵了班上的多名同学，代理律师的当事人是为了解救其他同学被侵犯的。但因为几名学生对案发地点的一个细节描述差异和其他种种原因，案件最后并没有进入公诉阶段，也没有得到曝光。孩子的母亲非常希望给孩子讨回公道，后来因为情绪崩溃，甚至有了被害妄想症的迹象，但孩子的父亲却坚持认为孩子没事，也不想再提起公诉，最后，李梓琨也只能对这个案例进行结案处理，无法继续跟踪下去。

熟人作案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与中国家长和儿童的防性侵教育缺失有关。根据“女童保护”的问卷调查结果，56.66% 的家长对孩子身边的成年角色不太了解，只有 46% 的家长绝对不会将孩子托付给异性成年熟人。而对孩子们来说，如果被熟人触碰感觉到不舒服或不愿意，19.87% 的孩子认为忍忍就好了，而对陌生人，这一数据是 2.78%。

熟人多次作案则与家长对孩子的不信任有关，无论律师、心理咨询师还是社工，在介入儿童性侵案件时，都发现成年人对孩子的不信任大量普遍存在。自称性侵并自杀的台湾作家林奕含曾在小说里描绘过这种状态，小说的主人公在遭到了自己的老师性侵后，曾经两次发出过求助信息。第一次主人公在饭桌上，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第二次，主人公在家一面整理行李，一面用一种天真的口吻对妈妈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妈妈回：“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从那以后，主人公再也没有向父母透露蛛丝马迹，也使得侵害一直发生下去。

隋双戈在现实中同样遇到很多家长都会在案发后哭诉，孩子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他心想：“肯定早就告诉过你们，只是你们没在意。”不但不在意，甚至可能阻止孩子继续说下去，比如告诫和恐吓孩子：“别瞎说，人家不会那样的。”“人家不就是喜欢你才抱你的吗？”隋双戈曾处理过湖南的一个案子，那个学校老师连续几年侵害了几十个学生，在调查的时候隋双戈发现，很多家长直接忽略了小孩的求救，有一个受害的小女孩说她告诉家长后，家长却认为是她思想太肮脏。也有家长会责骂孩子，并告诫孩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而除了一般的熟人，徐豪还注意到，随着公众对儿童性侵的意识提高，儿童受到家庭成员性侵的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在 2016 年媒体曝光的 433 起案件中，家庭成员，如父亲、哥哥、继父

隋双戈在现实中同样遇到很多家长都会在案发后哭诉，孩子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他心想:“肯定早就告诉过你们，只是你们没在意。”

等性侵达到 30 起，占比达到 6.93%，这类案件不仅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长期性，并且在司法程序和孩子的身心健康恢复上，也面临更多的困难。

真爱儿童社工服务项目曾经接到过一个女孩的求助，这名女孩从十五六岁开始，就遭到生父的性侵，被朋友发现后才带她外出求助。李梓琨赶紧帮这个女孩找了一个寄养家庭，将她和自己的父亲从物理上隔离开。当时从旁观者的角度，李梓琨第一反应是，“太禽兽了，赶紧报警，赶紧找律师取证”。但当她深入调查后发现，对这个孩子来说，报警就意味着整个家全毁了，会带给她巨大的负罪感。最终，李梓琨只能帮这个女孩找工作，让她有机会更早更快地独立。儿童希望基金会创始人张雯则清楚地记得，“这孩子当时带着大墨镜，围着大围巾，来到我们这里一点点一点点地说出来，说出来本身对她来说已经是天大的事情了”。

更糟糕的是，无论普通熟人和家庭核心成员作案，往往带来的是一人性侵多名儿童，和同一名儿童遭多次性侵的恶性案件。根据“女童保护”的统计数据，在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案件中，一人性侵多名儿童的案例分别达到 15.51%、28% 和 14.09%，2015 年里甚至有 14 起案例中，1 人性侵了 10 名以上儿童。一人多次性侵儿童在所有案件里占比更加惊人，2016 年公开曝光的案件里有 269 起性侵案件的作案者是多次实施性侵，占比高达 62.12%。

而统计中无法体现的是，绝大多数案件即使进入公诉阶段，也只有极少数当事人愿意站出来指控嫌疑人。李莹曾代理过 2015 年曝光的广西百色助学达人性侵多名女童案件，在那起案件中，通过接近作案人王杰曝光案件的志愿者找到十多名受害人，但最终站出来指控王杰的只有三名受害者。其中一名受害者愿意站出来指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本学习不错的她曾经因为怀孕早早辍学打工，但王杰在数年后还想把手伸向她的妹妹，让这名曾经的受害者忍无可忍了。

新旧暗流：男童、网络、未成年人犯罪

虽然目前在媒体上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件中，受到性侵的多为女童，但这并不意味着男童是安全的。徐豪是“女童保护”里为数不多的男性核心工作成员，负责的内容包括日常案例整理和年度报告撰写，从 2013 年加入“女童保护”没多久，他就开始深度参与这项工作了，用他的话说，“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各种各样性质恶劣的案例”。但他印象中最震惊的一个案例是，2014 年 7 月，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第一中学的男老师猥亵男童被曝光。

在这起案件中，学校政教处老师李剑在 2011 年的新生入学军训时物色了多名男童，并以违纪为理由将男童带回家中猥亵，过程中还伴随整晚用手铐拷住孩子，猥亵恐吓，录制视频上传网站等行为。其中一名男生以每周两三次的频率遭到了长达 3 年的猥亵，后来被诊断为“应激性精神障碍——抑郁状态”，也正是孩子的极端反常情况才最终让家长发现端倪，使得事情曝光。

让徐豪印象深刻的是在这起案件中，家长甚至无法维权。2015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以前，猥亵他人罪，不包括男性，而猥亵儿童罪只包含 14 岁以下男童。所以，此前针对 14 岁以上男童的猥亵，几乎无法维权。当受害男童家长向警方报案，警方也只能以非法拘禁罪而非猥亵罪拘留这名老师。并且当时的媒体报道甚至曝光过一个细节，当受害男童报案时，派出所领导脱口而出说了句“又是这小子”。

如今，虽然刑法中的猥亵罪名犯罪对象已经包括男性，即 14 岁以上的青少年男童被侵犯也能被认定为猥亵，但男童遭到性侵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足够认识。根据“女童保护”的统计数据，2014 年和 2016 年媒体上曝光的男童性侵受害人分别为 17 人和 59 人，2015 年则公开曝光了 21 起男童性侵事件。在本刊采访的所有关注儿童性侵领域的专业人士都认为，虽然带有很大的隐蔽性，但是男童性侵的案例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在本刊采访的当事人中，也有人称自己的男性朋友在初中时被亲姐姐趁午睡时多次猥亵，但他几乎没有告诉过身边的其他任何人。

另外，在撰写 2016 年儿童性侵年度报告时，徐豪还注意到，2016 年里，媒体曝光的案件中，还有两种类型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是网友作案的数字在 2015 年是 7 起，到 2016 年则大幅增长到 31 起。甚至有媒体公开报道过，有团伙利用互联网以“招募童星”等名义性侵幼童，涉及人数庞大，呈现出团伙作案、跨区域作案的特点。李梓琨则在去年冬天的那次下乡支教中发现，有山区女童在 QQ 上与陌生人聊天，对方向她裸露了隐私部位，并邀请女孩

见面，女孩也差点答应见面，直到听了防性侵教育的课程，才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除此之外，网络也频频有各类游戏平台上出现性侵儿童的讨伐曝光，但因为事件同样隐秘，迄今为止，依然很难确切地知道，网络性侵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

另外，在 2016 年中，媒体曝光的未成年人作案也有 19 起，占比 4.39%，曝光的案件细节显示，未成年人往往因看色情影片等原因而作案。隋双戈也在这几年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他是从专业角度解读这一现象的，他说现在的生活环境中，从影视作品到网站广告，带有性暗示的图文几乎无处不在，再加上工业食品中含有的激素，都可能催化青少年身体早熟，但大脑中负责控制前额叶的发育未能跟上，导致青少年的情绪、欲望冲动和理性控制发育不协调，在各种刺激下非常容易造成恶性事件，比如性侵比自己小的孩子。一般是大孩子欺负小孩子，小孩子长大了又会去欺负更小的孩子，在性教育缺位的情况下更是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通过介入儿童性侵维权的实际案例，李莹发现，未成年人以施害人角色卷入儿童性侵案件的情况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比如校园霸凌中也开始出现儿童性侵。李莹目前正在介入的满洲里市人大代表强奸初中女生案件，胁迫初中女生提供性交易的施害女生中，年龄最小的案发时还未成年，却已经把性侵的手伸到了更小的儿童身上。李莹说："大家现在对校园霸凌的认识还停留在一群人围殴一个孩子，但实际上情况严重得多，已经发展到强迫性交易了。"在法庭上和部分参与胁迫的加害者接触过程中，她发现，在胁迫儿童女孩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状态。

今年 4 月曾曝光过的河南尉氏县人大代表和企业家强奸女学生案与上述案件类似。在这起案件中，一名当地企业老板以一名 20 多岁的年轻女子为中介，性侵了 30 多名未成年在校学生。一名案发时才 13 岁的当事人告诉媒体，一些被害人受到侵害后反过来也成了加害人，持续为嫌疑人在学校物色新的女孩，并胁迫这些女孩为嫌疑人提供性服务。

让李莹感慨的则是："这些施害的孩子，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但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她们到底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她们只是觉得自己倒霉了而已，她们对犯罪没有知觉，从这个层面上，政府、学校、父母，每一环都是缺失的，整个社会都难辞其咎。"

哪些是符合各年龄阶段的性行为？

在学习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性征的过程中，孩子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做出和他们年龄或者发展阶段不同步的行为。了解在不同年龄或发展阶段，孩子的哪些性行为是正常的，有助于家长对儿童进行性安全教育，并监控儿童是否有可能受到侵害等不良行为的影响。在防范儿童性侵的家庭和社区教育方面，非营利组织"现在就停止！"（Stop it now！）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长期合作。这是该组织为美国家长提供的一份指导。

学前阶段	0 ~ 5 岁

正常行为：与身体部位区别相关的、浴室谈话相关的、怀孕和出生等相关的性别语言，在家和公众场合的生殖器刺激，展示和观看隐私身体部位。

不正常行为：讨论具体的性行为和一些详述的性语言。和其他孩子成人化的性别接触。

学龄阶段	6 ~ 12 岁

包括发育期前的孩子和已经进入发育期的孩子，这时性征改变已经触发他们性别意识和兴趣的增强。

发育期前

正常行为：关于恋爱关系、性行为、月经和怀孕的提问，通常在游戏过程中和同年龄的孩子进行试验：亲吻、抚摸、暴露和角色扮演。私下的生殖器刺激。

不正常行为：成人式性互动，讨论具体的性行为，公开场所的生殖器刺激。

发育期开始后

正常行为：对于色情内容和性知识好奇心增加，关于恋爱关系和性行为的提问，使用与性有关的词汇，讨论性行为（尤其是和同龄人一起），包括舌吻、身体摩擦、爱抚等在内的实验性行为，私下自慰。

不正常行为：持续的成人式性行为，包括口部 / 生殖器接触或者性交。公众场所自慰。

青春期	13 ~ 16 岁

正常行为：关于决策制定、社会关系和性传统的提问，私下自慰。同龄青少年间的试验，包括舌吻、爱抚和身体摩擦，口部 / 生殖器接触。同时，窥阴癖的行为是正常的。性交行为在这个年龄层三分之一的孩子身上发生。

不正常行为：公众场合自慰，对比自己小很多的孩子表示出性兴趣（比如非同龄人）。

（整理：吴扬）

家庭规则和参考指导

美国心理治疗师梅尔·朗斯顿（Mel Langston）在针对性侵受害儿童的心理治疗领域工作了 22 年。她提出，为帮助性侵受害儿童重建安全感，家庭应该制订家庭安全计划（Family Safety Plan），在家庭中确立边界。这一计划对普通家庭已有参考价值。

客厅活动规则

❶ 衣服。所有家庭成员在家里的公共区域，包括客厅和厨房，都要穿戴整齐。在公共区域，内衣和睡衣外面都必须穿上长袍。
❷ 挠痒或扭打。不允许对孩子挠痒或扭打，因为性侵有时是在这些活动的伪装下发生的。孩子们常常在被压住时感到害怕和惊吓，没有控制能力。
❸ 尊重所有家庭成员。对威胁（threat）和恐吓（intimidation）零容忍是一条明确规定。
❹ 友好。把友好也作为所有家庭成员的一条规则。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描述这个概念的有效方法。
❺ 色情作品。在家里任何形式的色情作品都不允许出现。

卧室活动规则

❶ 共享卧室。有施虐者倾向的兄弟姐妹不能和其他小孩共用一个卧室。
❷ 如果有施虐者倾向的兄弟姐妹住在家里，晚上房门应该开启警报。
❸ 独立的床。每个人应该有独立的床供自己睡觉。
❹ 年幼孩子的卧室。它们应该离母亲或者父母的卧室更近。
❺ 晚上开灯。这对所有孩子来说都会增加他们的安全感。
❻ 关闭房门。当家庭成员换衣服的时候，必须关闭房门。当孩子在他们卧室玩耍时，房门必须打开。

卫生间活动规则

❶ 一次仅限一人使用。当有人在卫生间时，其他人不允许进去同时使用。
❷ 洗澡和淋浴。家庭成员不应该一起同时洗澡或淋浴。
❸ 如厕。当有人如厕时，其他家庭成员不能在场。

娱乐活动规则

❶ 电脑。确保孩子使用电脑时受到指导，上网活动受到监督。
❷ 互联网。给孩子提供关于安全上网的相关指导。如果年纪稍大的孩子能够允许使用我的空间或者其他共享空间，确保他们知晓不能泄露私人信息。要求孩子随时向家长汇报任何和个人信息相关的网络请求。确保限定了孩子访问已获允许的网络站点，并限制孩子访问所有可疑网址。
❸ 电视。在孩子看电影的时间里，有相当多性暗示和性挑逗节目他们能够看到。家庭成员讨论这些节目并制定一个家庭“已获许可节目”列表将很有帮助，这样孩子在看电视时就有非常清楚的界限。当孩子要求看电视时，确保你自己同时在场，以便能够准确控制电视内容是否合适，或者色情内容是否出现。
❹ 电影。很多家庭使用会提供成人娱乐（色情内容）和电影的有线电视。孩子也会和朋友以及家庭成员一起看电影。家长应该确保已经制定了观看电影的相关规定。一些电影包含了性侵害和乱伦的相关内容，如果青少年观看这些电影，确保家长一同观看，这样能和孩子一起讨论令人不安的场景或者内容，孩子也能讨论他们对电影的态度。
❺ 电子游戏。制定使用电影游戏的规则，确保家长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一些包含过度暴力和色情内容的游戏应该受到限制。

身体接触规则

❶ 禁止扭打。
❷ 禁止挠痒。
❸ 禁止角色扮演。
❹ 除非首先获得许可，否则不能拥抱。
❺ 除非孩子发起，否则不能亲吻。不要要求让孩子亲吻任何人。
❻ 禁止触碰孩子的任何隐私部位。确保你的孩子时常被告知哪些是自己身体前后的隐私部位以及为什么它们是隐私部位。

父母卧室活动规则

母亲或者父母的卧室孩子不允许进入。除非孩子被邀请进入卧室，否则他们不能进去。

秘密

在家庭中最重要的改变是消除所有的“保持秘密”。保密是性侵害的一个阶段，也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

儿童托管和他们独自在家的相关规则

❶ 犯罪者永远不能照看婴孩儿童。
❷ 永远不能让犯罪者和小孩子单独在一起，或者让他们慢慢发展变成家庭成员。
❸ 犯罪者永远不能给孩子换尿布或者穿换衣服。
❹ 小孩洗澡的时候，犯罪者不能协助也不能在场。

（整理：吴扬）

Sotheby's | 蘇富比 EST. 1744

拓視野 薈珍藏

朱沅芷
《工业之轮在纽约》1932年作
估价HK$80,000,000–120,000,000

现代亚洲艺术
香港拍卖
2017年9月30日至10月1日

台北展览9月16日至17日
华南银行国际会议中心

香港展览9月28日至10月1日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查询 香港+852 2822 9008 上海+86 21 6288 7500 北京+86 10 6408 8890
SOTHEBYS.COM/HK

下载蘇富比APP
关注蘇富比

S EST. 1744

受伤害者的隐秘联盟

口述 叶梓 记者 王海燕

（插画：范薇）

从我开始意识到我不可能是唯一受过性侵的人之后，我仿佛拥有了某种特殊视角，渐渐发现光我的身边，就有 5 个被严重性侵过的孩子，几乎可以构成一个样本齐全的受害者生态群了。那些我以为跟我一样毫无异状的朋友中，在童年时代受过伤害的比比皆是。他们只是和我一样，永不忘记却又永远沉默而已。

性侵的发生和终结

我被雷劈了，读初中以前，我一直都是这么看待这件事的，我指的是性侵，但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词。我大概知道强奸的含义，但即使在心里面对自己，我也无法使用这么尖锐的词语。“被雷劈了”是我认知里为数不多的词，可以用来指代这件事，两者的相同点很多，比如同样置人死地，同样概率微小，同样带着某种重大的道德指示。

其实我的记忆比较温吞和模糊，只记得大概是 7 岁的时候，小学二年级，季节已经比较模糊了，也许是夏天，似乎持续到秋天，但到底持续多长，其实真的不记得了，记忆不是以逻辑形式留下的，而是清晰的场景画面。

其中一个人是我表哥。我成长在重庆东北部的农村，爸爸的兄弟姊妹总共 6 个人，成家后最远的两家人距离也不超过 1 公里，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农村大家庭，我是大家庭里唯一的小女孩，有一大串堂表兄，他们总是争着领我出去玩。

其中一个比我大 4 岁左右的表哥对我尤其好，我妈在我长大后跟我形容，是“家里有好吃的，就会过来把我扛去他家”的那种好法。但她这辈子应该都不会知道，后来这个表哥把我扛到了他家二楼的床上。他当时已经上初中了，在镇上寄读，周末才回家，而我还是个懵懂的白痴，谨遵大人的教诲，要听哥哥的话。

并不止一次，我后来回想，这件事应该可以随时停止的，如果我喊停的话。但真实情况是，我还蛮听话地遵照他指示，裤子是我自己脱掉的，这件事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很诡异了，但我的身体的确没有受到伤害。

我醒悟得有些迟，事实上，同样在

那段时间，我家的邻居，一个 20 多岁的待业男青年，频频用“巨款”也把我带上了床，“巨款”大概就是 5 角、1 元。那时候我并不缺零花钱，我妈是那种怀孕时去县城上过胎教课，别具一格的农村妈妈，即使她后来出门打工了，在寄回的钱里，也有专门给我的零花钱，完全够我在同龄小朋友里摆谱了，她一直警惕我和弟弟“见小钱眼开”。

但那个邻居的邀请里带有一种微妙的激赏。比如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他家里，那个小女孩也希望得到一个“机会”，他几乎用一种鄙夷的态度说：“你？”然后就把那个小女孩轰走了。那个小女孩的花裙子不如我的漂亮，平时总是拖着鼻涕，邋里邋遢的，即使在小朋友当中，也是不受待见的，看着她“悻悻地”走了，我感到某种似乎进入成人世界的虚荣。

事情很快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有的时候，他家里还有其他人，他也带我过去，去他家满是柴草、破棉絮和蜘蛛网的半地下室里。那间地下室一边靠公路，一边靠着田地，平时住着一个会到处晃荡的精神病人。从这间地下室开始，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但我似乎依然没有尝试过喊停止。我大概一直都知道这件事不好，但还是任由它发展了。也许那时候我会害怕他生气吧，我从小就被夸奖成是乖巧听话的模范孩子。

事情后来停止得比较偶然。那一次，是因为我姑姑就在地下室外锄地，我听见她高兴地和人打招呼，她的锄头扣进干燥的泥土里，发出有节奏的“擦擦”声。那个声音我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清楚，仿佛就在我耳朵边上。这让我突然非常不舒服且恐慌，我第一次激烈地反抗了，当然被揍了一顿，没有揍脸，揍了肚子和胳膊，还被掐了脖子，我怕姑姑听到，疼得牙齿都快咬掉了也没有吱一声。一场嘴巴被封住的对抗。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了比较剧烈的身体伤害，但真正要命的是，我还得在那个猪窝不如的地方整理衣服和头发，然后笑着走出去。我从小就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小孩，这种屈辱完全突破了我的底线，让我几乎在突然之间天灵开了窍，顿悟般地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件极其重大的坏事，比我曾经掉进粪坑差点淹死、考试拿不到第一名、跟我妈赌气假装喝农药，远更重大得多。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次从地下室出来回家时，我奶奶在门口洗衣服，比我小两岁的弟弟看到我后立刻告状，“姐姐最近总是跟那个 ×× 一起玩，不带我”。我带着巨大的惊吓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被我奶奶以同样的眼神瞪了一眼。我不知道奶奶是看出了什么端倪，还是只是稀疏平常地警告我一下，我没法向她确认，她也什么都没问。那个眼神成了一个意义辽阔而无声的终结。

我再也没跟那个人和我表哥说过一句话，直到现在。

漫长的沉默

和大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孩一样，读初中以前，我一直笃定地认为，只有我遇到过这么糟糕的事情。真的太糟糕了，不是吗？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大概有一两次，我听见奶奶和邻居谈起一些奇闻怪事，比如某个女孩子在油菜田里被糟蹋了，她们用的就是“糟蹋”这样的词语，就像庄稼苗子被野兽啃掉了，只能重新种一茬那样的糟蹋。她们当然认为野兽坏，庄稼苗子没什么错，但总归，这样的庄稼苗子废掉了。真是遗憾。

她们都是那种善良淳朴、廉耻分明的农村妇女，所以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窸窸窣窣的偷摸感，然后在我靠近的时候戛然而止，生硬地扯点“今天早上吃的啥啊”之类的话题敷衍了事。但其实她们一点都不会撒谎，她们不知道，和所有的小孩一样，我完全能够领会她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即使她们绝少谈起，即使她们欲言又止，我也看得懂她们脸上转瞬即逝的表情，我沿着她们表情的纹路，清晰地看到三个字——“天塌了”。

所以刚上初中，一些小男生给我写情书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是少女的虚荣和羞怯，而是巨大的绝望，感觉自己配不上他们任何一个人。其实那时候我还没长残（开玩笑的啦），人缘不错，成绩几乎永远第一名，但我就是觉得那个巨大的秘密正在腐蚀我，我已经烂掉了。我听到“贱”这个字会默默地呆坐在椅子上。

然后到了初中三年级，有一天，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突然从自习室里把我拖出去，抱着我痛哭起来。那时候我们班上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但这个朋友不是，她爸爸是乡镇干部，她住在家里，如果晚自习放学太晚，她就不回家，而是去她家旁边她爸爸办公楼的宿舍里睡觉，她的一些男生朋友也经常在那栋楼里出没。她告诉我：“本来挺好的一个哥们，平时也一起玩，那天玩得太晚了，结果他把灯一拉，就出事了。”

我当时非常惊愕，她是那种很凶的女孩，穿很酷的运动套装，头发和男生们一样长，也和男生们一起玩，随时都敢扇人巴掌，简直有种中华田园少年黑帮老大的气质，因为看起来不服管教，家长和老师们都对她头疼不已。从表面上看，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女生，但她居然被强奸了，并且同样不知所措，同样崩溃到痛哭流涕，同样觉得自己完蛋了。我突然意识到，她根本不是什么少年黑帮老大，她依然只是个小女孩。

并且当时她还有非常切近的忧虑，她害怕自己怀孕了。我们都没有怀孕的系统知识，只模糊地知道怀孕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们俩当然都吓坏了，除了在惊恐中痛哭和等待，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任何解决办法，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但我们互相都心照不宣地知道，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以寻求帮助。幸运的是，她没有怀孕，秘密没有被暴露。我们俩依然是好朋友，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

但秘密被隐藏并不等于消失。读高中后，这个秘密在我心里不断发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同桌给我听了一首吴虹飞的非主流歌曲，描述了一个女孩子被强奸后自杀的故事，我听完立刻崩溃了。症状就是不说话，连续几天里一句话都不说。

我当时是科代表，去教室办公室领作业本的时候都不喊“报告”，但老师们并没有发现异常，只有我的同学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我怎么了，拼命逗我说话。其实我平时是一个非常闹腾的女生，被形容为“笑起来楼都要塌了”，但那几天我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好像一开口，秘密就会自动喷口而出，我要像缠上胶带那样封上嘴巴。

后来我看挪威作家尼尔斯·弗雷德里克·达尔写的一本小说《去朋友家的路上》，描述了一个小男孩被性侵后，形容自己的嘴巴如同被封住了。于是我发现，原来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都懂得要绝对沉默这个真理。

但独自承担一个还在不断发酵的秘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我把这个秘密写进了日记，结果还是惹来了麻烦。当时我有一个从小学就非常好的朋友，在县城另外一所高中上学，周末来看我，我不在宿舍，她就在我的座位上顺手翻出我的日记本，然后顺手打开看了看，等我回到宿舍之后，她已经离开了。

我看着被动过的日记本，立刻疯了，逃课在宿舍里痛哭流涕，逼着另外一个好朋友半夜把当事人拎到我面前，跟我道歉，发誓她什么也没看到。其实我后来发现，即使她看到了那则日记，除了知道我遇到了某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以外，连 5 个 W 这样的基本信息都得不到。因为觉得实在太羞耻了，我根本没法使用正常的词汇把这件事情描述清楚，只是一堆啰里啰唆的抒情而已。所以我怀疑她其实到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我又不可能去跟她确认和解释，对吧？

这一次因为情绪过于反常，也惊动了我常年不在身边的父母，他们似乎隐隐觉察到了什么，在电话里拼命逼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被谁欺负了，我当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界，但最后还是守住了防线，什么也没说。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这是一场战争，守住秘密，自损八百，守不住，双方各损八千。

但从那过后，我的确意识到，我需要倾诉，秘密本身也是灼烧人心的一部分。

人群里的相似者

那时候我也偶尔上网，但并没有想到过在网上倾诉，我不相信陌生人能够带来安慰，更不信任网络的隐秘性。直到那时，我依然认为童年被性侵是一件发生概率极其微小的事情，所有人看上去都非常正常。

那次情绪崩溃没过两天，我就告诉我最好的两位朋友了，我绝对信任她们，我第一次尝试完整地向别人描述我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但就像日记所体现的，新的问题来了，虽然当时我已经高三，语文考试常常全班第一，却根本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描述一场性质恶劣的性侵。除了色情意味浓重的粗俗俚语以外，我没有任何有关私密部位和“性”相关的词汇量，只记得托尔斯泰的《复活》里用过“诱奸”这个词，似乎比较恰当，但我总不能真的这么说吧。

后来，她们告诉我，我当时说得断断续续、七弯八拐，简直像在说梦话。所以实际情况是，我以为说清楚了，她们同样连时间、地点、人物这样的基本信息都没搞清楚，只是连蒙带猜地知道我可能遭遇了什么事。但我非常感谢她们，她们听得云里雾里，却一个字也没有逼问我，她们只是一个人沉默地抱着我哭，另外一个则告诉我，她读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子被高年级的男生欺负了，全班都知道了，从此活在所有人异样的眼光里。我想：“天哪，所有人，如果是我，我大概会去自杀。”但她说那个女孩子没有，我觉得好多了。

这件事还给了我一个重大的启示，那就是，我

并不是被雷劈了，雷劈的命中率不会这么高，我的身边一定还有其他人遇到过这种事情，她们只是像我一样从来不说。后来经过谨慎地试探，我在身边的朋友中又发现两个女生。

她们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那种朴素的高中女生，微胖，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沉默寡言，性格孤僻，有一种纤细的文人式敏感。她告诉我，她小时候被自己的表哥猥亵过。她是在上大学后某一次QQ聊天时告诉我的，当时我们好像是在讨论一本小说，我先说，她后说。

另外一个则相反，是个非常活泼的姑娘，漂亮，高中就会去烫头发了，学习一度也很好，非常热情，是班上民主选举出来的团委书记。但也许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她小的时候被亲戚猥亵过，高中后又被同年级的女生带出去，当着那个女生的面，遭到社会青年的轮奸。我们是在某次喝醉后互相坦白的，还是我先说，她后说。但这一次我被震惊得更多，因为她遇到的事情实在太糟糕了，而我们学校还是全县最好的高中。

我不知道她们分别都是怎么度过自己漫长的独守秘密的生涯的，但我可以确定，除了我们互相简略的倾吐以外，她们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时候我还默认，一个秘密一定能够交换到另一个秘密，如果对方也有的话。但过了很久，久到我们可以以一种学术的口吻谈论儿童性侵话题时，那个曾经一言不发抱着我哭的朋友告诉我，她被自己的亲哥哥性侵数年。结束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被她表弟撞见了，在亲戚聚会时懵懂地嚷了出来，嚷了一半就被喝止了。后来，这件事再也没有发生过。她不知道她的父母后来是否制止过她哥哥，但全家人都没有再谈起过这件事。我则终于明白了她对她哥哥奇怪态度的根源。她比我的嘴更紧，也许是她的痛苦更剧烈，就像我没有向那个有类似经历的初中朋友倾诉一样，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等级序列。

倒是后来，上大学后，我和那个漂亮的高中女同学，还有一帮同班男同学喝酒，我已经倒下了，看起来大概是人事不省的样子，但其实我的意识还挺清楚。我听见她对一个喜欢了我很久的男同学说："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姑娘，真的。"然后又强调了很多遍。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语气让我一个激灵地醒悟到，她说的"很好"，完整的意思是，"她真的依然是一个清白的姑娘"。

哦，清白，这是悬在每一个幼年被性侵过的孩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被猥亵的男朋友

后来从我交男朋友开始，出于一种奇怪的洁癖心理，我都会在关系开始不久后就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的反应非常有趣。

其中一个男朋友是高中同学，也是一个小混混，我告诉他后，他也许是觉得必须要表明一下态度吧，所以他挺认真地问我，要喊兄弟一起去把那个人揍一顿吗？我犹豫了一下说，再说吧。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干脆砍死算了。当然，这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因为我们非常快就分手了。

不过砍死的想法是真的，大概是上大学前后的一段时间，我非常认真地设想如果弄死那两个人怎么样，为此还重读了一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复仇其实只是比较微小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想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极其信任的朋友以外，还有两个烂

沉默是许多孩子唯一懂得的"性教育"，却无法让他们避免再被伤害

人也知道这件事，我简直如坐针毡。

上大学后有几次我回到老家，还碰到过那个邻居，我们当然没说话，我看到他一如既往地立刻避开了，有时候我都怀疑他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但我总感觉能从他的眼光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猎取感，我觉得屈辱、恶心和恐惧。

我还有一个男朋友试图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但后来我们也很快分手了，所以再次不了了之。但最令我意外的情况是在北京交往过的一个男朋友，和这个男生交往得也很短暂，他是个程序员，爱好摄影和马拉松，经常做义工，性格也很开朗，读大学的时候搭车旅行还被采访过，总之，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积极、工作优秀的社会主义新青年。

因为这件事确实给我造成了一些处理亲密关系上的困扰，所以秉承我一贯的原则，觉得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说清楚吧，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听完我简短的说明后，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既然你这么信任我，我也坦白吧。

接着他告诉我他读初中的时候被自己的亲姐姐多次猥亵，多次趁他睡觉时拉开过他的裤子拉链，用手玩弄他的生殖器。每一次他都假装睡着，但其实他每一次都清清楚楚，他躺在那里，恶心得想吐，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这件事。

我不知道这是否给他造成了什么影响，但他的确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震惊不亚于初中时，好朋友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因为他是男生，并且来自另外一个相对发达的北方省份，而不是我那民风清奇的西南老家。

于是，我哭笑不得地发现，光我身边就可以形成一个样本丰富的受害者生态群了。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认真地审视，在我和我周围这些沉默的朋友里，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共同点，我们曾经有的是留守儿童，有的是父母亲自教养；有的在偏僻农村长大，也有的一直身处大城市；父母有农民和打工者，还有公务员和成功商人；有的家里鸡飞狗跳，但也有的家里幸福和睦；有的人调皮捣蛋，但也有的听话温顺；有美得闪闪发光的，但也有相貌平平的。

如果一定要说大家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我们身边都有荷尔蒙旺盛蠢蠢欲动的青春期少男少女，都有癖好奇特的成年人，他们的手伸向我们时，我们要么懵懂无知，要么无力反抗。我们的父母师长虽然营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暗示我们，如果被伤害，我们就成了被丢弃的破布娃娃，但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们，要小心什么人，要小心哪些行为，要如何喊停。我们被伤害完全不是被雷劈中了，而是带着巨大的必然性。

我今年 26 岁了，在外人眼里非常顺风顺水，一路都是好学生，一路顺利升学，一路顺利地从重庆老家来到北京，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如果从表象上看，我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受害特征的女生，甚至还谈过几次正常的恋爱。我的那些朋友们也是，有当老师的，有在电视台做编导的，有做翻译的，有做普通白领的。

我已经足够幸运，知道自己不孤单，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盟，总不能定期开个互助会讨论会什么的吧。我真正获得谈论性侵这件事的能力，几乎是在工作好几年后才具有的。我在大学时就从理论上毫不动摇地确证了，在对等的爱的前提下，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性侵儿童是一种确凿无疑的违法行为甚至刑事犯罪，受害者无辜，污名化者可鄙，身体贞操观不值一驳。

但现实远更复杂，真正的自我意识重建是远更艰难和漫长的事情。我们无法真的像谈论被狗咬了一样谈论被性侵。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条给被性侵者的建议，建议者告诫被性侵者，永远不要对任何人，尤其是熟人说起这件事。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但如果幕布不被撕开，这种保护注定也是脆弱的。

有时候我想，如果对性侵的谈论禁忌是一场社会学实验，那真是太成功了。围观者扭曲的性道德和沉默完美地耦合，筑起了一道困住受害者的围墙。假如人群中有一半孩子曾被性侵过，那另外一半人一定以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而那些被伤害过的一半人中的每一个，则会以为，只有自己是唯一被困住的。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有机会看到，浓雾之中，咫尺之内，遍地都有小孩被困在围墙里了。

有一件事，我倒觉得可以提一下，那就是在我能够正常谈论性侵这件事以后，我从内心里真正原谅我的表哥了，他曾经也只是不谙世事的青春期男生，没有人教导他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更加年幼的我，他不一定真的想过要伤害我。我不会接受他的道歉，但我的确原谅他了，我希望他早就忘了这件事。至于那个邻居，在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是挺想砍死他的。

体育的精神 金融的力量

北五环咖啡
THE BEIJING RINGS COFFEE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11号国家游泳中心3号门2层
+86 010-84153031 www.bjrings.com

（视觉中国 供图）

儿童性侵：从忽视到保护

记者 王珊

从羞愧、否定到觉醒、关注，儿童性侵在中国已经不是隐晦的词汇，这四个字频繁地出现在互联网、电视、报纸，甚至是公益广告中。然而，关注只能使得隐匿于冰山下的罪恶浮出水面。应对儿童性侵，根本还是要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出发，建立完善的儿童保护制度，从家庭、社会、学校的角度全方位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这包括社区报告制度、照顾养护体系等的建立，以及恰当而及时的儿童性教育。

中国有儿童性侵吗？

时隔多年，解星（化名）还是经常会从噩梦中哭醒。梦里，她会回到小学四年级，一遍遍经历着当年的情境。那时，同桌将一只用过的避孕套放在她粉色的水杯里，旁边一群人围着她哄笑：“他说，那是他父母用过的，他从垃圾筐里捡的。”

类似的梦境不过是解星童年经历的一次次再现。在解星身边的人看来，她是一个很难相处的怪人。冷漠、多疑、不相信朋友、拒绝与男生有任何

（京华时报－东方 IC 供图）

左图：2014 年 5 月 13 日，河南平顶山一位单亲妈妈微博发帖称，女儿“小草莓”从 2 岁 4 个月起，被幼儿园园长的丈夫性侵 1 年之久，其间还被强奸，但警方仅以猥亵儿童罪立案，法院只判处被告 4 年 6 个月徒刑

右图：2015 年 3 月 2 日，北京某书店举办女童保护专家座谈会。公益组织“女童保护”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肢体上的接触，哪怕是不小心碰到一下也会一惊一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都源于她童年一段隐匿的经历。

回到真实的童年生活，那时候，解星哭着去找班主任告状。第一次，老师将她换了座位。然而，这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用。一切变本加厉。更多的男生参与进来。他们会将一些与性相关的侮辱字眼与她关联起来，她成了他们笔下色情漫画的女主角，这样的漫画，塞满了她的抽屉。后来更甚，一群男生将她堵在教室的角落里或者操场，有人按着她的胳膊，一个人拽着她的头发，剩下的人将她的内裤脱了，摸她的下体。最终，全班的男生都加入了这场与性相关的欺凌中来。“所有人都可以任意触碰我的身体。”

由于经常告状，几乎整个办公室的老师都认识了她。班主任开始对她不耐烦起来，甚至对她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父母在闹离婚，根本没有时间管她，她去找姨妈求助，曾经受过性侵害的姨妈带她去买了些妇炎洁之类的用品，递给她时说：“这全是你的问题，你会遭天谴的。”

无奈之下，解星只得选择忍耐。现在，每次想到这些经历，她都控制不住身体的抖动，甚至路过小学附近、听到小学同学的名字，背后都会爬满冷汗。童年的经历给解星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她没有办法去和男生开展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当一个跟她关系很好的男生向她表白之后，“我吐了，然后拉黑了他，一点都不夸张”。

成年之后，解星将童年的经历写在了社交网站上，很多同情她的人跑过来安慰她，说一切都过去了；还有一批人在评论区质疑她，说她“编故事”，“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遥远的事情，可我却遭受了 10 年的折磨。”解星告诉本刊记者。

即使到现在，依然有不少人觉得“性侵”是离儿童很远的事情。2016 年，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在对全国 31 个省份的 9151 位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21.44% 的家长认为性侵害离孩子很遥远，30.32% 的家长不确定儿童性侵害是否会发生在身边。

“中国一定有儿童性侵犯，而且不会比国外少。”早在 10 多年前，中科院心理所教授龙迪就做出过这样的结论。当时，业界最常引用的关于儿童性侵发

生率的数据，来自美国儿童青少年侵害研究专家戴维·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在1984年基于研究给出的一项结论：人口中1/4的女性和1/10的男性在18岁之前经历过某种非意愿的性活动。

龙迪的判断则依赖于自己的工作经验。1994年到2000年期间，龙迪在《中国青年报》旗下做青春热线督导，并为青年杂志撰写青春期性教育专栏。众多的热线电话和读者来信中，有相当比例的求助是这样的："我被老师（家人或者陌生人）糟蹋了，有人在跟我做那样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在电话的另一头，求助者小心翼翼地吐出每一个字，接电话的热线咨询员能够觉察到电话线那头的胆怯和勇气，但没有一个人提到"性侵犯"三个字。

这是可以理解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成年人对性是讳莫如深的。当时，性医学门诊刚建立起来时，曾有人想在刚建立起来的性医学门诊前拍个影像纪录，本来满满的等待就诊的人一下子全跑光了。1993年，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在北京开业时，据说最初来买东西的人大多都是立领、口罩、大墨镜的打扮，而开店人也不得不承受类似"淫店""流氓"的责骂。成人尚且"谈性色变"，更何况是儿童。

与"糟蹋"相关的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应该如何结束这样的事情，一类则是诉说自己的困扰。"我以后怎么过？我还会嫁人吗？还有男生会喜欢我吗？我觉得自己很脏。"不止一个人跟龙迪这么说。

龙迪和热线咨询员想去帮助她们，却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她们伤到哪儿了，但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有强烈的羞耻感，所以会去宽慰她们。"龙迪尽量去理解她们的痛苦。她组织青春热线的咨询人员一起来讨论，试图提供更多的帮助。龙迪发现，有的咨询人员在谈论到某些细节问题时会突然情绪激烈或者"突然就不说话了"，龙迪隐约觉得有些不对。果然，在讨论过后，这名咨询人员找她袒露了沉寂多年的童年被性侵的经历。

2001年，龙迪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攻读博士学位。她选取的课题研究方向即为儿童性侵害。这源于导师正在处理的一个厌食症女生的案例。龙迪观摩了这次治疗。她依然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片段。治疗师逐一询问全家，女儿是怎么变成厌食的。当女儿说到，自己的情绪低落和厌食是从父亲走出她的房间那一天开始的，女儿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她身旁的父亲也低下了头。母亲似乎意识到什么，大声鼓励女儿"说出来"。可女儿却死死地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后来，女儿和母亲单独来见治疗师，母亲不断地向女儿保证"我会给你做主""教授在这里"，女儿才艰难地说出曾遭受父亲性侵犯的经历。

这次观摩后，导师建议她将论文的方向定为中国的儿童性侵。龙迪也想挑战一下。在中国，香港是最早将"儿童性侵犯"作为社会问题予以关注的地区。1981年，香港社会福利署颁布了"虐待儿童个案处理程序"，正式将"儿童性侵犯"纳入"虐待儿童"的范畴。1996年，香港虐待儿童工作组专门颁布了《处理儿童性侵犯个案程序指引》，具体部署了跨部门合作的工作模式，而且将其编入香港有关法律条例，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儿童的权益。那么，在内地，隐没在"沉默文化"下的处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龙迪希望从受害儿童及其家人的角度，探索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需要。

题目定下来后，每当有人知道她的研究方向后，抛来的质疑几乎一致："中国有儿童性侵吗？如果有性侵犯的话，这些孩子会跟你说吗？"在他们看来，儿童性侵犯出现在"谈性色变"的当代中国是不可思议的。的确，找到愿意参加研究的受害儿童及其家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羞愧与否定

来自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戴维·芬克尔霍认为，一个先进的国家或者地区在儿童性侵处理上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和关注度不够，存在着忽略和某些程度的否定。

第二阶段，即认知阶段，人们高度警觉。拥护团体倾向于强调这个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后果，研究倾向于关注发生率和影响，通常用常规模式和生动案例教育人们。在很多国家，媒体属于最早惊觉的一批人之一。

第三阶段，人们开始着手解决问题。参与的人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空想主义被抛弃，比如说不再认为性侵只是女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性变态者的问题，研究着眼于儿童保护规划的制定。

在龙迪着手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时，中国无疑处在戴维·芬克尔霍描述的第一阶段。这也使得龙迪的研究比想象中困难。为了寻找研究对象，她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人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她联系了包括记者、心理咨询员、反对家庭暴力专家、全

国妇联，乃至与儿童妇女相关的国际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公安部和地方刑警等她能想到的所有人士，但是结果都是失望的——没有受害者愿意参加她的研究，甚至有的连受害者都很难联系到。

更令她伤心的是，有位与她保持联系长达一年之久的受害女孩母亲也突然拒绝参加研究，只因她在过去一年的抗诉过程中屡遭伤害和失败，因而怀疑龙迪也会别有用心。此时，龙迪发现，关于儿童性侵犯的新闻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现，新浪网几乎每天至少有一则相关的报道。

后来，龙迪终于找到了一个样本：几个来自北方农村家庭的女孩在小学两年内受到同一位教师不同程度的性侵犯。接触之后，龙迪才发现，受访者之所以接受介入她的研究，是因为她们正在打官司，而“龙迪作为北京来的大人物，有可能帮上忙”。

几位采访者位于北方的一个村庄，龙迪将其称为“柴胡营”村。在这个村子里，性是未婚女孩不能触碰的禁忌话题。“未婚女孩无论何故，只要违背普遍观念中的行为规范，就将受到乡村舆论的围攻，‘坏名声’不仅负面影响受害女孩的未来婚姻生活，也损害家长的‘脸面’。”龙迪在与家长讨论性观念的时候，家长始终用模糊的词语代指自家女孩遭受性侵犯的经历，比如“这事儿”“那事儿”“老师对他们怎么怎么的”。他们对孩子遭受性侵犯表现出了羞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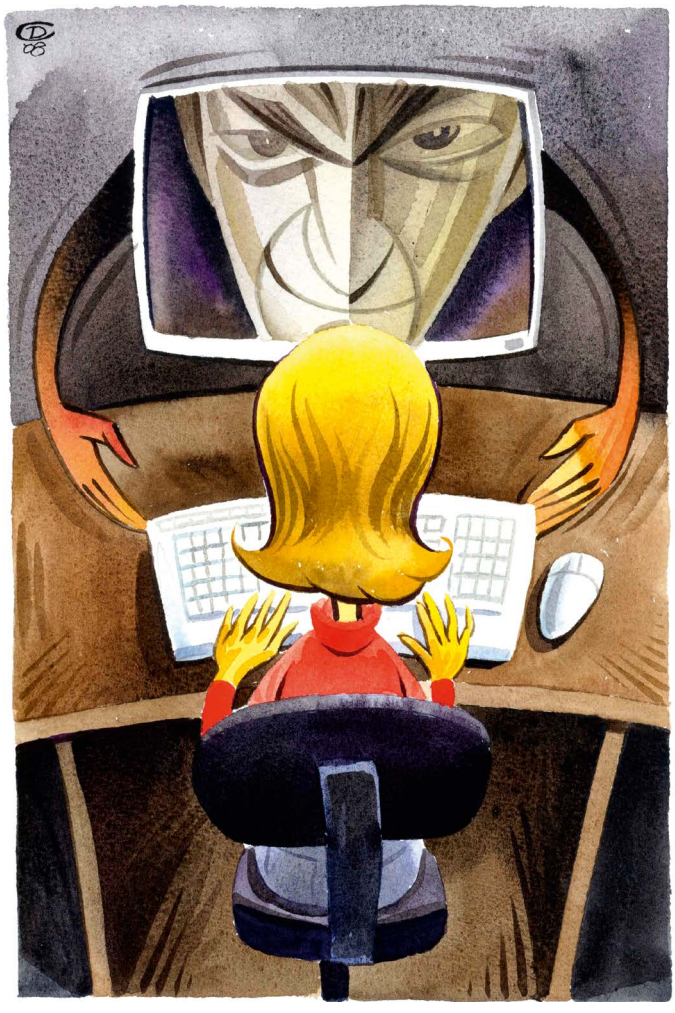
对性的忌讳或者是忽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当一个女孩对家长说出老师的举动的时候，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孩子“胡说”，并警告其不能说谎。第二天，女孩的家长到女孩所说的有同样经历的其他几家去核实，孩子们在惊恐中被迫说出事实。即使如此，家长们还是聚在一起，反复讨论了三天才确认事实。也就是这时，他们才觉察到，其实孩子之前已经或多或少透露出一些信息，只是他们没有当回事。

比如说，有孩子曾经对家长说，“老师说我今天没穿短裤”，也有家长发现孩子的内裤像“结了婚的妇女一样（脏）”。这些他们都一笑了之或者没有放在心上。

受到伤害的家长不仅没有受到同情，还成了村子里的笑柄或者谈资。在报案第一天，“几个女孩让老师强奸了”的话题就在柴胡营传开了。后来，家长们开始打官司，村里又说他们贪财，说他们“没人理”“白蹦跶”，甚至还有人责备受害家庭导致侵犯者被判了死刑；还有人要求自家女孩不要与受害女孩交往，以防“学坏了”。“家长普遍认为，性侵害所造成的伤害来自于周围人知道后造成的舆论。”这些可以从家长跟龙迪的倾诉时使用的词语中窥探一二，“窝囊”“受不了”“活不起”“直不起腰”。

其中一个家庭给龙迪的印象很深。在几个孩子中，她家的女儿遭受的性侵害程度相对严重，但是其母亲坚信女儿“比其他人次数少”“比他们轻”，她的一个依据则是“公安局记录都是那么写的”，而对女儿的经历，她觉得“家里出这样的事儿就像丑闻似的，不好听”。在访谈中，这家人经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是：“别提，慢慢就会淡忘了。”

如果不是要打官司，可能所有的家庭都会选择慢慢遗忘。后来，在论文做完后，龙迪又去了一趟柴胡营。这次，她联系到了一家基金会，愿意以项



（视觉中国 供图）

（蔡小川 摄）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

目资助的方式培训当地专业人员，免费给受伤的儿童和家人做心理治疗，但这个提议都被家长们拒绝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说，最好就别提了。只要没人再提这件事，孩子就会淡忘。其实就连他们打官司，很多时候也是迫于无奈，为了争一口气，不让邻居看笑话。”龙迪口气中也有些无奈。这大概就是中国在21世纪初对儿童性侵认知的一个缩影。“即使到现在，在儿童，尤其是农村儿童遭受性侵后所面临的困境，这个案例都具有代表意义。”

从忽视到关注

对儿童性侵的关注变得越来越多。可追溯到的较早的数据是全国妇联发布的来信来访统计：全国各地投诉“强奸幼女”的个案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1998年上升到了2948件，1999年则为3619件，2000年也有3000多件，相当于1997年的20多倍。

也有一些小规模的统计数据。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所在的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统计，2001年到2003年6月，接到了39起儿童受到性侵害的咨询和投诉。

“大部分的未成年人受到性侵的案件并没有进入司法机关的视野。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儿童性侵的案件是没有被报告的最多的一类性质的犯罪。”佟丽华告诉本刊记者，他所在的援助中心，每年受理的儿童性侵咨询大概在100例左右，但真正办理的案件也就几件。

在这次统计中，佟丽华等人就已经基本总结出了儿童性侵的几大特征，包括施害者多是家庭成员、老师或者熟悉的人；受害人一般年龄较小，缺乏分辨力、警惕性以及自我保护意识，在没有受到暴力和胁迫的情况下，只是看重施害人给予的好处。

不过，在当时，这些数据并没有引起公众以及社会各界的警觉。那时候，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聚焦在儿童的智商水平研究。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白驹将“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带到全国政协会议。

1997年修订了《刑法》，将嫖宿幼女设为单独罪名，设在《刑法》第360条第2款规定：“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学者分析，这是当年出于减少死刑的考虑。

最初促使刘白驹提出废除这一条款的是2005年发生的一个案件：一位传染病医院院长嫖宿幼女一案经过审理后，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嫖宿介绍人则以介绍、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两个未成年女孩，其中一个女孩不满14岁，被同学骗去“卖处”，一个女孩事后大出血。所获钱财大部分被介绍人拿去，两位受害人获得极少的费用。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其行为构成嫖宿幼女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被告人虽有强行与被害人小雅发生性关系的一些行为，但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实施了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被告人只有嫖宿的目的，没有强行奸淫的目的，缺乏构成强奸罪的主客观要件。

刘白驹则不这么看。他觉得，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对于《刑法》设立嫖宿幼女罪，他认为弊大于利。“嫖宿幼女罪”的规定意味着被嫖客奸淫的幼女是在进行卖淫，这等于在法律上承认幼女具有“卖淫”的行为能力，违背了刑法关于幼女行为能力的基本原则。而刑法为了给予幼女特别保护，推定不满14岁的幼女不具有性理解能力。根据《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幼女对发生性关系的同意，不能成为免除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之人强奸罪刑事责任的根据。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即使有金钱、财物交易，她们没有反对，在刑法上也应视为强奸。

两个定罪的另外一个不同是，如果对嫖宿幼女的行为以强奸论处，幼女的身份是被害人，而把嫖宿幼女从强奸罪中分离出来单独立罪，幼女的主要身份是卖淫女。虽然也可以笼统地把她们称为被害人，但这种被害人不可和强奸罪的被害人同日而语。

“其实她们是一样的，与人发生性关系都不是出于法律认可的自由意志，都不具有可谴责性。让她们戴上‘卖淫’的帽子，无疑会妨碍对她们权益的保护。”刘白驹告诉本刊记者，《刑法》把嫖宿幼女罪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也说明其保护的重点不是幼女的权益。实际上，当时的条文制定并不在意哪个幼女被奸淫，而只是关心谁在进行卖淫嫖娼。

两年后，更为恶劣的贵州习水案发生，贵州中小学的教师强迫、组织10多名中小学女生“卖淫”。施害人不仅在强奸受害人后强迫其卖淫，还让她（王某）去寻找另外的女学生，并且告诉她只要帮忙找到另外一个女学生，王某就不用再做了。

“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要让这个罪名成了部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免死牌。”当时颇为主流的声音认为，嫖宿幼女罪量刑太低。比如说，国内知名论坛天涯社区里，出现了一个热帖：《废除嫖宿幼女罪，凡有女儿的家长都顶进来！》。有网友在跟帖中表示，以后每天都会至少顶一帖，一直顶到嫖宿幼女罪被废除为止。民意汹涌，案件甚至提高了审级，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则临阵脱逃，“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

然而，最后习水案依然以“嫖宿幼女罪”判定。贵州习水案中一位受害者的母亲曾说道：“我的女儿，本来一个快快乐乐的初中生，怎么一下就成了大家眼中的‘小姐’？法院定的是嫖宿幼女罪，是不是连法律都认定我女儿是个卖淫女？！”

2009年佟丽华的援助中心发布的《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统计分析报告》将这一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们通过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340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卖淫类犯罪总共有37件，占到了案件总数的10.9%，未成年人被强迫提供色情服务的案件中，强迫卖淫类案件最多，占到了该类案件的81.1%。

在报告中，佟丽华等人特别指出了一点，在30件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案件中，有将近30%的案件都是侵害人在强奸未成年人后强迫其卖淫的，即第一次都是行为人采取强迫、暴力等威胁手段实施的强奸行为。

社会意识的觉醒

从2008年到2015年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讨论从未停止。与以往不同，这已经不是局限于某个领域内的讨论，各知名人物乃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声援，妇女和儿童保护团体冲在最前面。

事后，回顾这场讨论，一位当时的参与者认为，“罪名的废除象征着社会声音的崛起，而这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他犹有印象，一些网站制作的专题标题，不约而同地发出质问：谁把受害幼女变成“妓女”？

这位参与者还记得，早在2003年，法律界就曾有过一次讨论，但结果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一则

批复，中心意思是“行为人如果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 14 岁幼女，双方又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不认为是犯罪”。

讨论越来越有针对性。新的讨论中，支持废除者坚定地认为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没有性自主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存在这样一种交易行为，她也是受害者。对立的声音更多地来自刑法界。

刑法界的声音普遍认为，“嫖宿幼女刑罚过轻”是个伪命题，在司法实践中，99% 的嫖宿幼女罪判得比强奸罪重。比如说，虽然刑法规定强奸罪的“顶格刑”是死刑，但一般只适用于 3 次以上并伴随暴力的极恶劣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强奸 1 次、仅涉及 1 名幼女的普通强奸，多数刑期只有 3 ～ 5 年。另外，刑法专家觉得嫖宿中存在交易行为，如果废除，对嫖客可能不公平。

佟丽华不止一次感受过两种声音的对立和冲突。在一次讨论最高法院是否应该撤销这个罪名的时候，佟丽华坚决主张废除这个罪名。但是大多数人依然持否定态度。“这其实是一个是站在儿童视角思考问题，还是从成人视角出发的问题。”佟丽华告诉本刊记者。

支持者更多地会援引国外的例子。在美国，多个州法律规定，只要与 14 岁以下的儿童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一律按强奸罪处理。而对介于幼女与 18 岁之间的少女，国外通常规定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即便未成年人自愿同意也构成犯罪，立法的出发点是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性的处分权还需要法律特殊保护。而我国目前立法对与 14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只要是未成年人自愿的，即不构成犯罪。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 12 条规定，删去“嫖宿幼女罪”对应条款。法律委员会在修法说明中指出，今后相关行为将依据强奸罪的对应条款处理。嫖宿幼女罪取消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曾跟公益组织“女童保护”的负责人孙雪梅聊过。孙雪梅觉得罪名的取消代表着儿童性侵问题的解决，属于巨大的进步。“我说，雪梅咱们还得继续做，要呼吁设置专门的儿童性侵罪。”

“性侵儿童的内容、行为、特点与性侵成人完全不同，它完全扰乱了孩子性观念的形成。应该有独立的性侵儿童罪，而不是和成人一起考量。”童小军说。成年人的性侵判定是从身体接触的角度考虑的，而儿童性侵更应该综合考量没有身体接触到有身体接触以及这个过程中对孩子认知、心理、身体的虐待。

童小军的提议依赖于儿童群体的特殊性。她举了一个例子：“强迫孩子看黄色录像，也在儿童性侵的范围内；或者成年人在性生活中出于刺激的考虑强迫有一个孩子在旁观看，这也属于性侵。这些东西在成年人的强奸罪里都是没有的，儿童的保护要有不同于成人治罪的理念和方式。”

寻求有效儿童保护制度

在龙迪看来，依靠媒体来提升公众意识，动员更多的人参与消除儿童性侵犯现象的社会行动，是非常必要的。让儿童性侵犯从隐秘的私人话题，进入公共视野，成为公众讨论的公共话题，有助于打破长期存在的“沉默文化”。这个时期正如戴维·芬克尔霍在第二阶段所强调的，拥护团体倾向于强调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后果，研究倾向于关注发生率和影响。

例如，由媒体发起的公益组织“女童保护”连续三年发布调研报告，强调儿童性侵的严重性，并统计发生率的变化。佟丽华所在的援助中心在 2013 年又为全国妇联出具了一个统计报告，在报告中梳理的见于媒体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件增加到 700 多件，“作案人和受害者的基本特点都没有发生变化，熟人作案的比例依然在七成左右”。

不过，要想切实保护儿童免受性侵犯的伤害，只是依靠媒体是不够的。龙迪认为，社会的关注应该进入更专业的状态，即着眼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制度的建设。“保护儿童的安全是国家的责任。”

媒体给予的高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其他一些消极影响。一位在中小学推广儿童性教育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家长学校现在都是草木皆兵的样子。前年媒体说学校儿童性侵案的发生率高，家长觉得学校是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学校的老师也很紧张害怕，都不敢跟孩子近距离接触，怕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去年又有媒体指出社会上的儿童性侵案例比较多，家长又觉得社区和上下学的道路存在各种问题。”这位专家说，这直接导致的问题是让孩子觉得生活的环境特别可怕，不敢接触人，不敢离开家，什么都不敢去做，“这就更坏了”。

童小军则有另一番解释，她认为公众，包括家

（蒙钟德 摄影/视觉中国 供图）

2014 年 1 月 25 日，海南琼海的孩子们害羞地倾听志愿者老师讲解防范性侵常识

长和儿童工作者，之所以对媒体报道如此震惊和不知所措，就是因为其对“儿童性侵”这个社会现象以及这个现象的危害性没有认识，“而之所以没有认识，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儿童权利的意识”。

这种缺乏意识即使在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之中开启得也很晚。2007 年，童小军参加一个关于儿童福利立法的讨论，来参加的人包括民政部的官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相关人士以及国内儿童保护机构的负责人和专家，当时聚在一起的 20 多个人谈到如何搭建国内儿童保护的制度框架，对于儿童保护的定义，更多人倾向于广义的保护儿童、幼小等。

童小军提出了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儿童保护的定义，即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忽视、剥削和暴力四大人为伤害，其中，儿童性侵归于虐待的分类中。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针对这些问题设立了儿童福利津贴项目、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当时，就有专家出来打断她，说“这些事情就不要在福利法里出现了，这都是个别案例”。当时的社会，政策制定者更为关注的是儿童拐卖、走失等。“20 多个人大约有一半对儿童保护的概念是不清晰的。”

所幸，目前政府已经开始搭建儿童保护的框架，比如说在社区进行试点建立预防和报告制度。“不过现在人和资金都很缺乏。”童小军说，试点只覆盖部分试点乡镇或街道下面的部分村和社区，所以只有试点地区的人们能够有效使用到，“试点的工作人员多来自于现有的管理架构，如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一方面，对他们在儿童保护方面应该承担的职责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定，他们自己对这项新的岗位职责也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认同感；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开展工作的专业能力。而儿童保护最核心的是围绕那些有被伤害风险的儿童，为儿童本身和与儿童相关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等人员提供专业服务”。

8 月 12 日，南京南火车站候车室发生的猥亵儿童事件，引发了又一轮舆论热潮。童小军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观察。她认为，应该有一套规范来应对这个案件。首先，社区要进行及时报告，起到预防的作用。这个家庭所在的社区应该对它有了解，收养、再婚或单亲等类似结构家庭中的孩子，从儿童保护来说，都是有伤害风险的。因此，需要时时监测和评估。在案件发生后，有媒体去采访女童的邻居，邻居觉得这是兄妹俩亲昵的一种表现。很显然，如

果不是在火车站被发现，这种行为将继续持续。

第二个则是评估。童小军认为，对于施害人罪行的界定以及受害人的保护都要进行评估。这个职责原本由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负责。“不过目前未保中心也是没人没技术。”当观察到没有评估体系介入后，童小军曾给相关重点部门发了一个短信，提供一些操作建议，而其回应是，“干预起来也很困难，因为没有授权，而且公安部门也不会配合”。

在多种因素的累积下，受害女童跟随养父母回到了家中。“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童小军说，火车站的情形表明女孩子的家人对她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因此按照程序来讲，孩子应该与家庭隔离，获得紧急庇护，在确认家庭没有问题后再回家。以目前的状况，孩子可以送到社会福利院里进行照顾和养护。按照程序来讲，这样的孩子应该送到社会福利院里进行照顾和养护。“但现在福利院大量都是重度致残的弃婴，没有能力收养需要照看这样的孩子。”

童小军曾遇到一个案例。一个 12 岁的湖南女孩思思（化名）在遭性侵生下第一个孩子时，社会给予了很多同情和帮助。然而，两年后，女孩再次产下一女，网上却充斥着骂声，很多人认为她自甘堕落，无可救药，不值得帮助。

童小军说，女孩对性方面有认识，就是通过被别人侵害的方式，所以在她的世界中，她不会对性行为有羞耻感，甚至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也是因为家庭缺乏温暖，才导致女孩向外寻求所谓的温暖，第二次生子。

童小军认为，在我国，儿童照料是长期被公共服务体系忽略的问题。孩子都是家庭养，出现问题也主要是靠家庭自己去克服；大家并没有意识到，家庭是儿童照料的第一责任人，国家和社会是儿童照料的重要责任人。当家庭出现问题，无法照顾孩子或者照顾的方式实际上对孩子是伤害时，就需要国家和社会的介入。国家和社会的介入的表现形式就是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她说，“这个事件反映的即是我国在儿童保护制度上的缺失。如果制度存在，如果当地有人、有机制进行及时的干预，能够避免很多问题的再次出现。”童小军曾经接触过 30 个参与援助交际的未成年人，其中有两位不满 14 周岁，她在访谈中发现，这批女孩的家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有的是父母重男轻女，不管女孩，有的则是父母工作忙，对孩子照管不注意。

性教育的矛盾

即使在小学，解星清楚地知道自己遭遇了性骚扰，她的母亲曾告诉她，有些部位不能让别人触碰。

然而，在她所就读的小学、中学并没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意识。解星的家在一个三四线小城镇的乡镇上，在那里人们对于性的界线并不明显。她记得，初中的时候，女生流行穿吊带内衣，班里的男生总会趁机蹿过去，解开内衣的带子，“女生并不会因此懊恼，反而会笑得很开心”。学校的男女厕之间只隔了一道墙，经常有个脑袋冒出来偷窥。女生们会当作恶作剧来讲，并没有觉得是严重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是对自身的侵犯。”解星告诉本刊。

这仿佛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是对性认识的无知，一方面则是不断被报告出来的儿童性侵事件。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向本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性教育的缺乏”。张玫玫将这分为两点，一是施害人本身可能没有接受足够的性教育，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二是儿童没有接受足够的性教育知识，不会自我保护，遭到侵犯后也没有能力去寻求帮助。

不过，在中国做儿童性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8 年 12 月，国家教育部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小学一、二年级应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基本内容，包括生命孕育、成长基本知识。

2009 年起，受北京市教委委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性教育研究会承担了课题“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在实施中，课题组设计了数十个子课题，目前由 100 所左右中小学承担。“我们项目组涉及的学校在讲课后没有一个学生出现儿童性侵的事件。”张玫玫印象中有一所学校设在城乡接合部，有各种拆迁在进行，以前经常有人尾随学生放学，在老师告诉了学生应对方法后，也再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让学生以及父母从禁忌谈性到接受性教育也是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刚开始在学校做的时候，家长们并没有表现出兴趣。学校只好将课程设在每学期开家长会的时候，在正式召开大会之前，张玫玫作为主讲人上去讲。“现在情况已好多了，每次我们都是专门开课，课堂里都是满满的，这可能跟家长年龄层的变化有关系，中小学的家长基本是‘70

后’‘80 后’，他们在性教育上有一定的认知。”

很多家长依然觉得性教育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因为他们接受的就是不能讲的性教育。张玫玫就会告诉家长：你们一定要去讲，你们都不好意思说的话，孩子就会从其他地方获得需要，这些基本是来自网络上甚至是不怀好意的成人。“家长不承担责任，相当于把孩子推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

在张玫玫的团队里，大多是学校的生物老师、心理老师在兼职讲课，刚开始的时候，承担这样的教学任务也很困难，他们需要经过系统培训，并在不断的演练中摸索经验。

接受培训的老师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的很热衷，有的则不太感兴趣。培训三天的课程，有的学校会让老师整个流程学习下来，有的则三天会来三个人，讲课的效果很难如人意。有时候，讲课的老师还会受到其他老师的声讨：“你讲性器官，学生都很兴奋，我们怎么上课？”后来，有些老师就不愿意继续讲下去。更让张玫玫理解不了的是，有些学校则会直接拒绝她在学校开展性教育的请求，“他们好像认为儿童性侵不可能发生在他们学校里”。

张玫玫已经将儿童性教育模式推广到 100 余所学校，她希望将这种模式复制到全国。然而现实却是，在国内，大多数的学校依然没有开展儿童性教育。公益组织“女童保护”于 2014 年对义务教育小学阶段 1346 名男生、2136 名女生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 20.0% 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性教育”，48.3% 的孩子不知道何为性教育，31.7% 的孩子选择“似懂非懂”（知道一点点）。在“女童保护”访问的 394 名教师中，49.7% 从没有对学生开展过性教育，开展过一次的占 12.6%，两次的占 12.6%，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占 25.0%。

张玫玫希望在师范学院里开设儿童性教育相关课程，以弥补没有专业人才的缺憾。她还希望，性教育能够写入教学大纲，有专门的教材，像英语、语文、数学课一样有教学督导。“这样的体制建立起来后，才能够将儿童性教育很快推行起来。我们现在是从下边做起，用成果证明工作的意义，能不能推行还得看一个学校的领导是否重视。”

幼儿时期的性教育同样重要。张玫玫一方面希望幼儿园能够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家长能够承担更多的任务。“现在很多性侵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几岁的孩子，在小学阶段进行性教育已经比较晚了。”

在给家长讲课的时候，张玫玫经常会讲到一个事例，即儿童 1 岁庆生的时候，总会有老人喜欢拿手指去弹孩子的阴茎，以表达对孩子的喜欢。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性侵孩子，“但是这会给孩子造成一个印象，即触摸性器官是表达喜欢的一种方式，所以不会有防备心”。

每次都有家长表示，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家长需要通过游戏或者其他手段养成孩子对性器官的态度。让孩子认识到性器官是穿在小裤衩、小背心里面的，不能够脱掉。”

更多的困扰依然是来自于社会的不理解。

2011 年，张玫玫团队和其负责编写的儿童性教育读物《成长的脚步》被推到了舆论的中心。这部被称为“北京市首部性教材”的书籍这样回答孩子“我从哪里来”的提问：“爸爸阴囊里的睾丸可以产生精子，他们的样子像个小蝌蚪，活动能力特别强……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

这些描述因为与之前家长“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等“经典答案”相比，显得直白得惊世骇俗。甚至有家长斥之为“黄色漫画”。在舆论的中心，张玫玫压力很大，她选择谨慎地应对媒体，“性教育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科学的研究，稳步推进……”

然而，让更多人没想到的是，6 年之后，又有一个团队因为几乎同样的原因被外界所质疑。一位母亲在阅读了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后，觉得书籍里过于直白的词汇以及插图，直接出现男女生殖器的名称，有点接受不了。这再次引发了国内关于儿童性教育的热议，许多声讨的声音相继而来。

后来，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发文回应声称，不断暴露的校园、社会与性有关的问题也是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该教材的动力之一，“基于性别的歧视、青少年不安全性行为、青少年非意愿怀孕和人工流产，让我们感到作为教育工作者责任之重大，频发的儿童性侵害事件更让我们在痛心之余深感相关工作刻不容缓”。

张玫玫理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质疑：“中国的儿童性教育也是在摸索地做。由于认知的问题，家长看了之后觉得接受不了也正常，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事情。但是儿童性教育的推进不能因此而延迟。”

一次救助的复杂结果

口述 李梓琨 记者 吴丽玮

（蔡小川 摄）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真爱儿童社工服务项目负责人李梓琨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是专门从事困境儿童救助的非营利组织，其中“真爱社工反虐待项目”从 2013 年正式成立，目前已救助包括性侵在内的受虐儿童个案 30 个。在这其中，由李梓琨负责救助的“小妈妈”思思是持续时间最久、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也几乎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次深入探索。

寻找一个接纳她的新环境

2013 年，12 岁的思思（化名）被同村 74 岁老头儿性侵产子的消息被媒体曝光之后，我们就接手了这个案子，把思思从湖南接到北京来。

当务之急是找一个能接纳她的学校。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马上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对她的创伤治愈帮助很大。公立学校不接收，而且公立学校的老师对成绩非常看重，思思去了绝对跟不上，后来联系了一所私立学校，虽然也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但是校长很支持，老师也不是只关注成绩，环境比较宽松，相比之下比较适合思思。

思思是 6 月份到北京的，到了秋天，她的父母提出要来北京，一方面在老家流言蜚语太多，另一方面觉得老家生活很艰辛，看思思现在得到了救助，想来跟思思一起生活。私立学校对他们家确实很照顾，给思思的爸爸安排了看门房的工作，思思的妈妈在家做饭和照顾思思的女儿。思思原本是和其他孩子一起住校，父母来了之后租了房子，思思开始走读。

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样的安排很不错，思思当时年龄很小，能够有父母在身边照顾非常合理。在现在这个环境里，老师家长们的素质都比较高，总会在这样或那样的方面对他们家有些善意的提醒和关照。但我们很快发现，思思特别不愿意回家。她的父母天天在家吵架，她妈嫌她爸没能耐，一个大男人要靠挣同情来生活，她爸又觉得她妈不踏实过日子，总想着要离开这个家。两个人天天为思思的事情互相掐，都觉得是对方不会管孩子，相互埋怨。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很少有情感表达，比较冷漠。她妈

妈见到人不会打招呼，而是冷着脸，从上到下打量你；爸爸呢，思思做错了事就是一顿揍，更别说要去理解思思心里的伤痛了。

思思心里的想法有很多，但能跟谁说呢？不能跟同学说，我们的社工又不能长期陪伴她，所以她就学会了上网，跟陌生人聊，在寂寞无聊的时候很容易被对方打动。有些人总想质问她，为什么要跟网友裸聊，但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即使知道面对的是一种虚假的关系，但她体会到了被关心的滋味，自己的内心得到了满足，于是她就愿意去跟人建立这种关系。

2014 年夏天，思思的爸爸被严重烧伤，起因是家里的煤气罐泄漏。这件事情跟思思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思思离家出走，她爸爸发现她跟网友出去开房。报警之后，警察调取了监控录像，看到思思是自己走进宾馆里去的，是思思自愿的，事情不了了之。她爸很生气，回来把思思打了一顿，思思又跑了。在这种情况下，她爸爸精神有些恍惚，没注意到煤气的问题，结果爆炸了。

我们在最初接手思思这个案子时，完全没有经验，直到现在，国内进行类似长期救助的案例也几乎没有。当时我们中心主任张雯联系了美国一个有 20 多年经验的社工给我们提供远程指导，我们向他讲述孩子的情况，他特别具体地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思思的爸爸烧伤之后，我们把详细情况告诉美国社工，他当即就判断说，思思很有可能再怀孕，他让我们警惕在这种家庭环境里思思可能有的潜在的风险。果然，思思后来又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父母与资助人

在最开始的时候，美国的社工就跟我们讲，在美国，像思思这样的情况，孩子就要跟父母隔离，但我们在中国没有权利硬要这样做。思思的父母后来跟着来了北京，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一家人多接触，确实感觉思思出事跟她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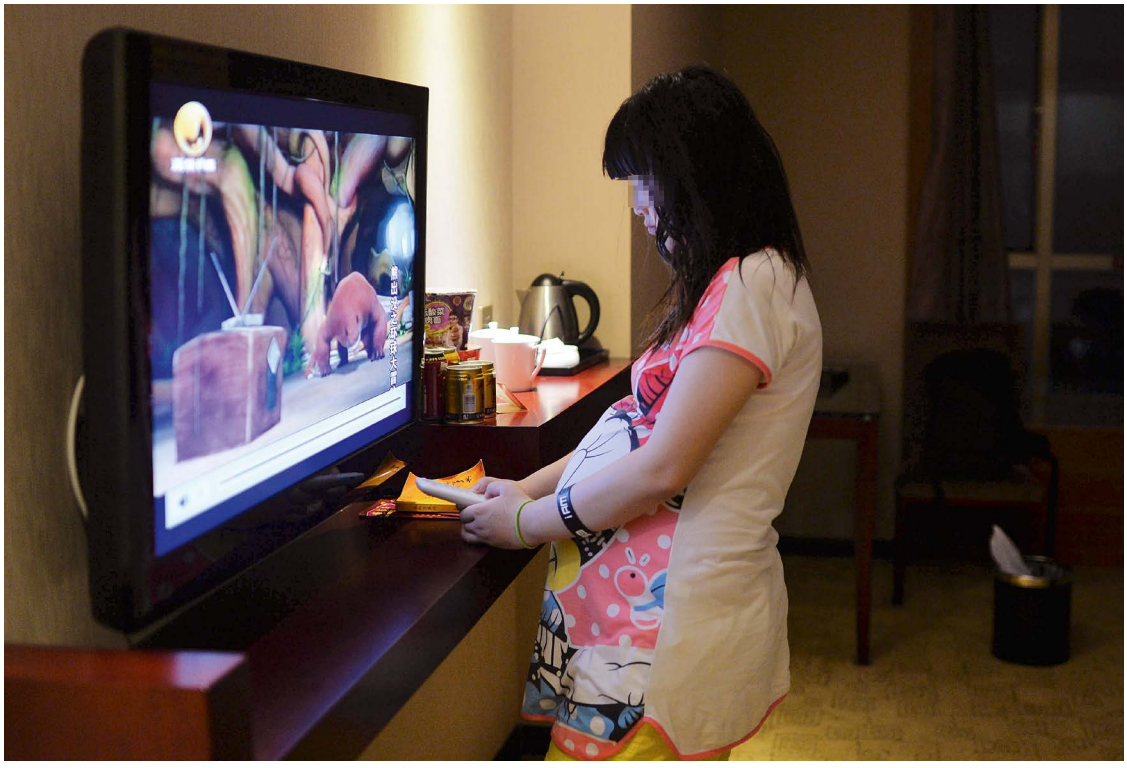
思思的爸爸刚来北京的时候，心情十分焦虑，担心思思的这个孩子养不起，甚至动过把孩子卖掉的念头。思思家在湖南的大山里，非常贫困，渐渐的我发现，闭塞并不是致贫最主要的原因，而是因为她父母的懒惰。

很快，他们就表现出一种态度：“我就是贫和弱，我就是需要你们外界的帮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虽然非常不好，但是很多人开始关注他们。她父亲在学校门房工作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埋怨，对周围的老师们总是有所不满，她父亲时常表现出想靠外界帮助来生活的想法，觉得工作挺累的。而且思思父母对我们的态度也挺让我们寒心的。我们对思思好，他们确实觉得我们是信得过的人，遇到危难，无家可归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我们。但他们始终觉得我们对他们家好是应该的，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感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潜移默化之间，父母对外界的依赖性就影响到了孩子。思思从小也是吃不了什么苦，家里穷，受不了物质上的诱惑，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把她带跑。第一次性侵思思的老头儿就是这样，尽管最开始思思是被迫的，但是老头儿给思思一点好吃的，说一些关心思思的话，思思就觉得很温暖，后面跟这个老头儿保持这种关系就不是完全被迫的了。

当你要长期对他们进行救助的时候，怎么帮他们就要非常慎重。经济上不要给予他们过多的支持，他们家不是穷的问题，而是懒，他们要学会自强自立。思思爸妈在老家的时候，跟我们提出想要一辆三轮车，他们家住在山上，需要送思思妈妈和思思的孩子上下山，他们家养的土鸡也好方便拿到镇上去卖，看起来是一个挺合情合理的要求，我们就帮他们买了。结果思思爸爸用这辆三轮车赚村民的钱，把邻居拉下山以后让对方付车费，这件事在村子里传开，影响不太好。我们在援助思思之后，在思思老家物色了一个志愿者，也是当地人，开了家服装店，还能自己照顾孩子，挺能干利索的一个人，让她帮我们关照思思家，志愿者又跟我们反映了另外的情况。思思在私立学校的同学的家长，对思思家有很多照顾，有一次得知思思家的床板不平，捐了 2000 元，让思思爸爸换一张舒服的床，结果思思爸爸拿钱去买烟抽、买酒喝了。

一般来找我们说想帮助思思家的人，我们都不会让资助人直接跟他们家联系。思思的父母非常崇拜权贵，对有钱有地位的资助人会表现出过分的尊敬，还会向资助人要电话、要 QQ 号。有些资助人被他们家人要求更多的帮助，会因道德捆绑变得进退两难。而且大多数资助人是看结果的，他们希望他们帮助的人生活会变好，不愿意看到他们堕落。但思思家一直问题重重，尤其是思思第一次被媒体曝光之后，那些帮助过思思的人，再过了两年，得知思思又怀孕了，后来又生了孩子，这些资助人会觉



（京华时报－东方 IC 供图）

2015 年 7 月 23 日，深圳一家宾馆内，被“真爱社工反虐待项目”救助过的“小妈妈”思思（化名）站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

得很受伤害。央视有一个记者当初投入了很多精力陪伴思思，但是思思跟她说，她是被学校的三个老师性侵，她觉得说是爷爷很难为情。这个记者直到警方调查出真相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她在情感上就受到了很大伤害，甚至直到现在都不愿意再回忆这件事，再也不想跟思思有任何的联系。所以我们每回遇到特别想投入进去帮忙的资助人，都会先给他们浇一盆冷水，让他们一定要慎重，她很可能会让你失望，而这才是刚刚开始。

我们在面对资助人时，更重要的任务是认清资助者的真实目的。这种孩子容易上当受骗，好多伤害这些孩子的人，打着就是帮助的旗号。思思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深圳的夏某通过地方政府里的熟人联系上了思思家，当时思思已经被我们接到北京了，夏某去找思思的爸妈，跟他们说，想带着思思去深圳，照顾思思，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思思跟了他。夏某 50 多岁，自称是央视中学生频道深圳工作站副站长，在深圳开了家幼儿园，似乎是一种可以获得未成年人信赖的身份。于是思思爸妈来到北京之后，一直跟这个夏某有联系，尤其是思思的妈妈，每次两口子吵架，就给夏某打电话倾诉，觉得夏某非常会安慰人，思思也跟这个人一直在 QQ 上聊天，他们以“老公”和“老婆”互称。2014 年夏天，思思爸爸被烧伤之后，夏某从深圳来了北京，到我们中心来过。那时我还没什么经验，我们主任一下就感觉不对，怀疑这个人动机不纯。但我们毕竟只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只能给他们建议，并不能替他们做主，没过多久，思思的妈妈因为不堪忍受照顾她爸爸的重担，就带着思思和思思的女儿一起去了深圳投奔夏某。

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思思当时已经第二次怀孕了，她去深圳的真实目的是去堕胎。这些情况我们都是在一年多之后才慢慢从思思那里得知的。母女三人后来回到北京，国庆节的时候夏某又带着思思一个人去了南方旅游。夏某将思思的爸妈成功地洗脑了，他吓唬思思的爸妈：这个孩子问题很大，老是喜欢裸聊，还老怀孕，你们报警说是性侵，其实是她主动的，你们一直在北京待着，就会上了警方的黑名单。于是 2015 年 2 月，思思父母决定又要去深圳找夏某。这一次我们看思思爸爸身体痊愈了

不少，就动员他一起去深圳，至少有他在身边，对夏某是个震慑。但这个夏某很狡猾，很快给思思爸爸找了一份饭店里包吃包住的工作，把人一下就支走了。思思母女三人平时就在夏某的幼儿园里生活，有时帮忙照顾一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

那段时间思思跟我们联系很少，她不愿意回来，回来就要受我们的管教，在深圳她想干什么都可以。直到 2015 年 7 月，我们知道了夏某报警的消息。夏某说思思偷东西，这样思思一家人又回到了北京。

当时思思肚子已经很大了。思思跟我们说，夏某之所以报警，是因为思思有了新的男朋友，很年轻，这让夏某很生气。思思说，从肚子开始显怀之后，夏某就让思思出去乞讨，他对思思的态度就像对待一块抹布，用完就扔。思思第一次去深圳打完胎的第二天，夏某就强迫思思跟他发生了关系，思思妈妈也无力阻止。思思后来跟我们讲起这件事请的时候，眼睛里都是悲伤和愤怒。她对夏某是种很复杂的态度。她明明在第一次去深圳时就受到了伤害，但为什么还会一去再去？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写道：“思琪看到了被洗脑的爸妈的反应，告诉自己，既然已经在这样一种关系里，那么就和平共处吧。”思思一家去了深圳之后，我们联系到了深圳的赖伟楠律师，他一直在做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案件。他跟思思一家接触之后，也同样感觉到思思父母对夏某的暧昧态度。思思妈妈非常认可夏某，觉得他是个善人，思思爸爸很讨厌这个人，但曾向律师表示过，如果夏某愿意给他 40 万元，就让他和思思结婚。可以想见，思思看到爸妈对夏某的这种态度，会强迫自己认知，他这么做是对我好。她一直活在这种混乱里。

赖律师在跟思思一家详细沟通之后，报了警，思思跟夏某发生关系时还不满 14 岁。但孩子现在已经出生两年了，案件始终没有进展。按说警方只要进行亲子鉴定就可以了，但是出于各种顾虑，侦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国内儿童性侵案件面临的困境之一。另外，赖律师后来在跟我们沟通时，大家都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救助的是孩子，对这个家庭没有救助的义务。赖律师说，他接手的案子里，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像思思这样的父母，企图以孩子的遭遇来占领更多社会资源，思思的事情被媒体的过度曝光也跟她父母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他们希望以此来获得更多的社会帮助。

如何抚平伤痛

离开深圳之后，思思的爸妈决定带着思思的第一个孩子回老家生活，他们也面对不了这么复杂的局面，顺理成章地，思思和她父母隔离了。第一个性侵思思的老头儿已经被判刑了，当时思思的爸爸执意让思思把孩子生下来，是想找到孩子的父亲，跟对方索赔，但这个老头儿是个五保户。第二个孩子，思思爸爸也是这个目的，思思自己也做过思想斗争，但最后还是想要这个孩子。在美国，这样的孩子一出生就会自然进入送养程序，但在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孩子的母亲是个未成年人，没有做决定的权利，于是这就成了一个死结。思思现在在北京带这个孩子，我们给她请了一个阿姨，她上学的时候，阿姨帮她带孩子。我和其他志愿者会经常去看她，周末的时候我带着她去做心理辅导，再和她一起收拾屋子。如果说带孩子的话，思思现在已经是一把好手了。

思思回北京之后，我们给她换了一所学校。她的私生活对同学和大多数老师都是保密的，我们刚开始没有经验，只是口头嘱咐她不能跟任何人说，但是没想到思思后来告诉了跟她要好的同学，家里的小宝宝不是她的妹妹，而是她的女儿，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思思现在读的是一所高职院校。首先要跟学校毫无隐瞒，对方愿意接收她；其次是看学校有什么课程，这所学校已经办了多久，生源流向怎么样。我们发现挺适合思思的，学校里不太发达地区来的孩子居多，学的东西也很实际，能有一技之长，以后到社会上可以凭本事养活自己。

这一次上学前，我们就要约法三章，签协议。首先你不能跟同学老师讲你自己的经历。如果你跟同学说了这些，你就不能在这个学校待了，你会给学校造成恐慌。不能你觉得满足了自己的一些心理需求就讲出来，别人能不能接受很难说，你得教她学会为别人考虑。还有一点是，你在这个学校上学期间，如果跟别人发生性关系超过三次，你就会被送回老家去。必须规定得很明确，但又不能规定死，她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刚开学的时候，我们让她自己上下学两天，给她戴定位手表，并且跟学校打好招呼，让老师报告她到校和离校的时间。如果时间超过了路程所需，就不对劲儿了。后来发现确实不能让她自己走，她控制不住自己，现在上下学都是阿姨来接送她。现

在当她再有那些不正当想法的时候，她会想到这些协议。第一个后果就是不能上学了，但她特别喜欢跟同龄人在一起，有一种集体归属感。她曾经威胁我们说，如果不让她上学，她做出任何事情的后果都要由我们来负责，可见她离不开现在的同学们。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呢？老师和我们都跟她讲过，“性交是不是会怀孕，是不是可能还会导致流产，得性病，严重的得了艾滋病，那可是要命的事。死了你觉得简单，但是有没有想过死是什么？”。我们必须用这种严重的后果来刺痛她的神经。

千万不要以为思思是一个成熟的孩子，尽管她有了性生活，但她的思想还停留在七八岁孩子的阶段，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不知道去考虑周围的环境和别人的感想。她的是非观念是混淆的，给她吃给她玩就是好的，别人为她着想，去说她，她会找各种理由，认为你是因为看不起她，才会这么说她，她不会把人往正面积极的方向去想。对她进行干预的时候要非常有技巧，首先要站在她的立场上信任她鼓励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用她能理解的方式，类比也好，举例子也好，告诉她这样下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她同学老骂她，她说她冲动到想拿起背后的一把刻刀去捅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要跟学校老师反馈那个孩子不对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要教会思思如果来面对这样的事情。你非常容易发怒，虽然已经比在老家的时候有所控制了，但是你已经动了拿刀割人的念头，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得进医院吧，警察得来找你吧，你还能上学吗？学校都会因为你这件事受牵连，这个学校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挺适合你的，如果学校办不下去了，你上学就更别提了。

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她对自己完全没有自尊感和价值感，不会轻易说什么，但又很敏感，当你一旦伤害到她，她会完全封闭，把自己关起来。恶性循环下去，就是她觉得自己是被看不起的，没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别人爱说啥就说啥吧，我已经无所谓了，反正得到了这种肉体上的满足，又何妨？所以我们既要给她正确的方向，又要让她知道错误的点在哪，跟她解释这么做的后果，那么做的后果，哪个对你是真的好。我们得站在她的角度为她着想。四年了，我们一直在对她说，“你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你是值得尊敬的，你是有价值的”。但前几天她因为一个记者采访，问了些让她不快的问题，她很伤心。她哭着跟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跟同学们玩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事情过去四年了，她还一直这么觉得。在那些见不得人的关系里，她活在羞耻之下，她觉得自己特别可耻和肮脏，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有种深深的负疚感，觉得自己就像物品一样被交换。我们要告诉她的是，你的出生不是为了经历这些事，虽然遭遇到这些很令你伤心，但是你的人生不是在它的压迫之下，你是有价值的。通过每周一次的心理辅导，我们让她往出倒这些事情，每次都要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听了她那番鼓起勇气说出的肺腑之言，不光是情感上的震撼，更多的是理性地去分辨：哪些话是她真的很受伤、很委屈，需要我们去共情，去理解的；哪些是她主观的解读，她用自己过去的经历，解释别人的负面评价和态度，她会依据这些加深第一自我认知；哪些部分是她把这些东西放大之后进行合理化的，“别人就是这么看我的，他们看不起我”，她会把自己做得不对的一些东西当成是合理的，需要你们去同情她，帮她对付那些负面评价；哪些是她有成长的，需要去鼓励的；哪些又是错误的认知，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需要我们去澄清的。

当然，我们在思思身上还是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她现在对未来有规划了，设想着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外表也没那么邋里邋遢了，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这都是目前生活给她带来的积极影响。我自己也经历过思想上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开始我对她充满了同情，非常宠溺她，甚至还想跟那些说她不是的阿姨吵架，后来思思做的一些事确实让我非常气愤，我发现我对她没法真的爱起来，现在我渐渐想明白了，不要有太多期待，你做这份工作并不是因为她有多可爱，也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善良，当把这些放下之后，面对问题会更冷静，工作做起来也会更得心应手。

事情过去四年了，她还一直这么觉得。在那些见不得人的关系里，她活在羞耻之下，她觉得自己特别可耻和肮脏。

北京展览馆剧场 10.14

北京站

十年一鉴青曲社

十周年相声全国巡演

王声

苗阜

大麦 DAMAI.CN 全国统一订票电话：1010-3721

（Jill Knight摄/视觉中国供图）

1

1. 2011 年 11 月 11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们为儿童性侵案的受害者点亮蜡烛守夜

2. 1996 年 5 月 17 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接见莫林·康卡及儿子杰里米。两年前，莫林的女儿梅根的遇害促使美国联邦制定了“梅根法”

3. 1944 年，一名在童年时遭遇父亲性侵的女性（中）在法庭作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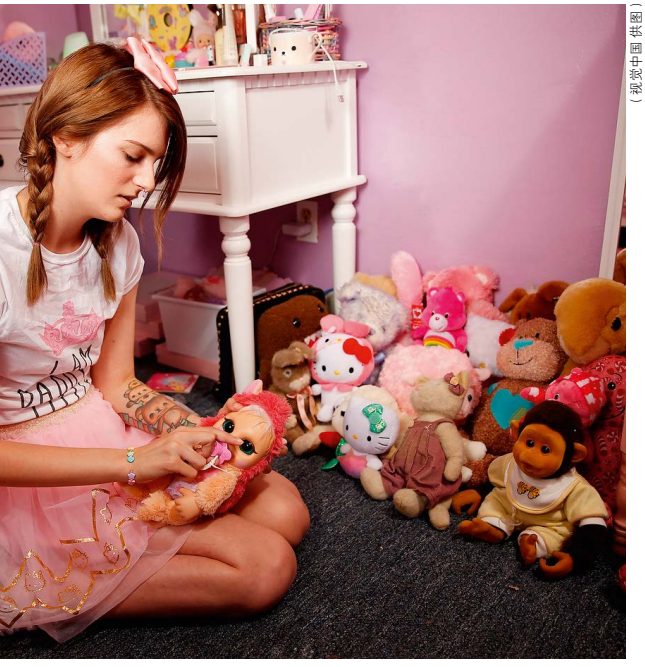
4. 2016 年 7 月 4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莱克兰市，21 岁的杰斯穿尿不湿，吃奶嘴，拥有一大批可爱玩偶。这是杰斯摆脱童年性虐待阴影的方式

（视觉中国 供图）

3

（视觉中国 供图）

2



（视觉中国 供图）

4

“美国模式”：一个国家的动员

主笔 徐菁菁

在过去 40 年里，防止儿童性侵的“美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梦魇仍未彻底远去。

消失的雅各布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约瑟镇上，帕蒂·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门廊上的灯光日夜不停地亮了 28 年。帕蒂·威特琳希望它能够照亮儿子雅各布（Jacob E. Wetterling）的归途。

11 岁的雅各布有一头棕色头发，一双蓝眼睛。他穿着橘色背心，红色曲棍球夹克，蓝色长裤，踩着一双耐克网球鞋。1989 年 10 月 22 日晚上，雅各布和两位小伙伴骑着自行车到便利店里租一盒电影录像带，在回家的路上，一个蒙面男人拦住了三个孩子。他询问他们的年龄，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两个男孩向树林里跑去。他威胁说，他们胆敢回头，就会被子弹打死。

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寻工作。当地企业募集了 2.5 万美元悬赏线索。不知名的明尼阿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 10 万美元作为奖赏。“如果你想要钱，”母亲帕蒂·威特琳通过媒体祈求那个带走儿子的男人，“我们能够弄到钱，不管是多少。”然而，没有电话、没有勒索。警方怀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惯犯带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响了一代家庭，它开启了美国关于儿童性虐待和绑架的新讨论，对性犯罪者实行登记的立法呼声从明尼苏达一直扩散到整个联邦。1994 年，雅各布遭绑架 5 年后，美国颁布了《雅各布·威特琳侵害儿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记法令》（*The Jacob Wetterling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Sexually Violent Offender Registration Act*），这是美国在联邦层面上第一次立法确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记制度。它为各州的性犯罪者登记制度设置了最低标准，被要求登记的罪犯必须在释放后的短时间内亲自到当地警方报到并提供个人资料。曾经犯有针对儿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记时间至少是 10 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则必须终身登记。

1999 年，10 年过去了，警方调查了超过 5 万条线索，依然一无所获。帕蒂·威特琳通过媒体向儿子的绑架者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她问他，雅各布是否还和他在一起？她希望他能给雅各布做些好吃的。她说一家人希望得到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只有他能回答：这

（视觉中国 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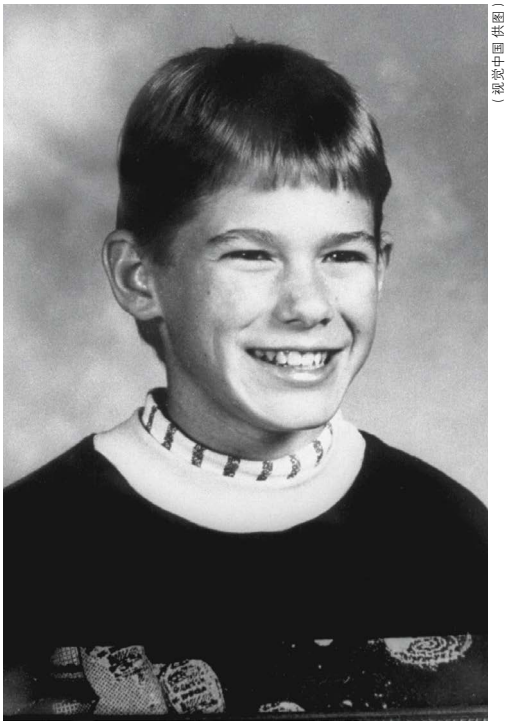
10 年，雅各布到底发生了什么？

帕蒂·威特琳并不只是一名心碎的母亲，她从未坐以待毙。雅各布失踪的 4 个月后，她建立了非营利组织雅各布·威特琳基金会，致力于儿童安全教育。她写信给时任美国司法部部长阿尔伯特·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吁为性犯罪者登记制度立法，要求美国国会和司法部为立法的疏忽负责。2004 年和 2006 年，帕蒂两次参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她从 2013 年起担任美国国家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中心主席，成为美国保护儿童领域的先锋人物。

20 余年，没有忘记雅各布的并不只有帕蒂·威特琳。2010 年，网络自由撰稿人乔伊·贝克（Joy Baker）对雅各布的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贝克的家距离圣约瑟镇不远，她重新访问那些案件的知情人，并大量搜集档案信息。她的调查从圣约瑟镇向更大范围扩展开来。2013 年，乔伊·贝克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个发现：1986 年和 1987 年，佩恩斯维尔市（Paynesville）曾发生过 6 起男童性侵悬案。佩恩斯维尔距离圣约瑟 30 英里，同属于斯特恩斯县（Stearns County）。乔伊·贝克将其中两起案子的警方原始报告放到了帕蒂·威特琳面前。这是帕蒂第一次知道这些案子，她的第一反应是：“啊！”和雅各布一样，佩恩斯维尔市被侵犯的男孩们遭遇不幸的时间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一样是骑着自行车，而犯罪分子同样是戴着面罩，有着低沉、粗哑的嗓音。

很快，乔伊·贝克发现了另一名受害人。贾里德·西契尔居住在距离圣约瑟 10 英里外的冷泉镇。1989 年 1 月，12 岁的西契尔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后，男子命令他逃跑：“别回头，不然我会一枪打死你。”1990 年，一名叫丹尼·海因里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为西契尔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终因为缺乏证据不了了之。“他们（警方）把我带回了被袭击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溃了。他们想要我给出答案，可是我没办法给出。”多年后，已经是中年人的西契尔回忆说，“我的父母做了决定：生活必须向前。”

25 年后，当乔伊·贝克找到贾里德·西契尔时，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1989 年 11 月 4 日，人们以站在一起连接纸链的方式呼吁警方尽快调查雅各布·威特琳一案

右图：年仅 11 岁遭性侵遇害的雅各布·威特琳

他决定不再沉默。西契尔接受媒体的采访，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谈论曾经的悲剧。他和乔伊·贝克一道拜访当年的受害者，说服他们出面要求重启调查。2014 年，警方同意启动“悬案调查”（Cold Case Review）。幸运的是，DNA 检测技术的进步提供了破解疑团的契机，警方重新从西契尔当年的一件运动衫上提取了 DNA 样本，和丹尼·海因里希当年受调查时留下的一根头发比对。答案是：两者相符。

2016 年 8 月，丹尼·海因里希承认，是他在 27 年前劫持、性侵并杀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静默的审判室里回忆，11 岁的男孩当时问他：“我做错了什么吗？”根据海因里希的供述，2016 年 9 月，整整 27 年后，警方在一处农场发现了一具遗骸。和遗骸在一块儿的，是那件红色夹克衫。一件体恤上写着“威特琳”。

丹尼·海因里希最终因持有大量儿童色情照片而获刑 20 年——贾里德的性侵案与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但令人宽慰的是，根据明尼苏达州采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闭”（Civil Sex Offender Commitment），在服刑结束后，丹尼·海因里希会被交予社会机构进行隔离，终生不获自由。

“如果雅各布能够重新站在家门口，我希望我能告诉他，为了找到他，我们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威特琳说。令她欣慰的是，近 30 年来，人们从未忘记雅各布，而她的基金会已经为近 8 万个有类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帮助。

根据美国联邦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的数据，2013 年，每 8 分钟就会有一个美国儿童遭遇性侵。但这个令人心惊的数字亦包含着巨大的希望：雅各布遇难后，从 1990 年到 2013 年，美国儿童性侵案件的数量已经下降了 64%。雅各布·威特琳一案恰如这一过程的缩影：家庭、社会、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场漫长和艰难的较量，迈向正义获胜的终点。

房间里的大象

儿童虐待问题研究专家、新罕布什尔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维·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认为，一个地区对性虐待问题的回应从落后到先进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关注不够，存在着忽略和某种程度的否定。第二阶段，即认识阶段，人们高度警觉。拥护团体倾向于强调这个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后果，研究倾向于关注发生率和影响，通过运用常规模式和生动案例教育人们。第三阶段，人们开始着手解决问题。”而在美国，这一切转变的发生也并不久远。

1977 年，美国儿科权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决定在美国儿科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一篇讲话。1962 年，坎普和布兰特·斯蒂尔（Brandt Steele）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了里程碑性质的研究《受虐儿童综合征》（*The Battered Child Syndrome*），阐述了虐童以致死亡的案例，建立了辨识受虐儿童综合征的医学和心理模型。而在此以前，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在法律上，虐待儿童都不是一个可被定义的“概念”。《受虐儿童综合征》的发表使得虐童正式成为可讨论的社会议题，并最终促成美国国会在 1974 年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The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简称 CAPTA）。

亨利·坎普并不满足于这一成果。英文中有一句谚语——“房间里的大象”，指人们对于某些显而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2017年3月28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召开保护年轻运动员免遭性侵听证会，多名曾遭性侵的运动员出席

右图：2016年5月2日，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橄榄球队前助理教练杰里·桑达斯基准备进入法庭受审。他被指控在1994至2009年性侵至少10名男童

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坎普知道，尽管儿童虐待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房间里依然还有一头“大象”。他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在1977年那次著名的讲话里，坎普指出，儿童性虐待是“儿科领域的隐秘问题和被忽视的领域”，号召儿科医生们在知识和情感上，向这“最后的禁忌”发起挑战。

在儿童保护领域，有多重原因导致性虐待成为“最后的禁忌”。它常常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因被视为家庭丑闻秘而不宣。而对儿童性侵犯的专业研究则一直困于陈旧的观念之中。美国犹他州大学法律教授约翰·梅耶斯（John E.B.Myers）指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涉及儿童性侵犯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都在重复四个主题：第一种观点，儿童本人应当为骚扰行为负责。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1953年，阿尔弗雷德·金赛在他著名的《女性性行为》一书中指出，四分之一的14岁以下的女性遭遇过露阴癖、被抚摸、乱伦等性行为，但他错误地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与亲属发生性行为）是因为儿童对这些性行为产生了兴趣，他们或多或少倾向于重复这些经历。”第二种常见的看法是归罪于母亲。这些母亲被描绘成性冷淡、充满敌意的形象，因此她们的丈夫不得不用其他方式寻求性满足。第三种观点是儿童性虐待很少发生。70年代以前，一个惯常被引用的数字是百万分之一。第四种观念则直接导致了人们的冷漠：许多研究都认为，性侵对儿童并不会产生什么害处。

亨利·坎普对儿童性侵下宣战书时，这些“常识”正在被改变。1969年，美国人道协会（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儿童部门主任文森特·德·弗朗西斯（Vincent De Francis）完成了对儿童性侵的第一份经验调查。在对250个案例进行研究后，他认为，儿童性侵事件的实际发生数量很可能数倍于人们所关心的单纯的身体虐待。而且在他的研究中，三分之二的儿童都在情感上遭遇了巨大的伤害。10年后，戴维·芬克尔霍在1979年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性侵受害儿童》（*Sexually Victimized Children*）一书。在对79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他明确指出，19.2%的女性和8.6%的男性都曾在儿童时期受到过性犯罪的侵害，这些侵害大多数来自家庭成员和熟人，而绝大多数人从未向当局检举过侵害行为。

戴维·芬克尔霍注意到，当专业领域的研究者致力于打破“常识”时，一场社会运动已经在发酵。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他观察到：美国全国的儿童保护工作者都反映，他们被一起又一起儿童性侵报告淹没了。1977年到1978年间，美国全国发行的杂志几乎都出现了儿童性侵事件的报道，而

（东方IC供图）

在10年前，这几乎是不会被人们谈论的话题。

和研究者们一道，另一股力量也已经在唤醒社会的道路上走了10年。

上世纪70年代初，强奸问题成为美国女性主义组织积极关注的议题。志愿者们大量出现在医院、警察局和法庭，帮助强奸案件受害者渡过难关。在她们的推动下，包括精神健康中心、大学在内的机构纷纷建立起强奸危机干预中心。这些遍布全国的干预中心很快就发现，事情超出了她们的预估。

“1972年，我在马里兰大学建立了一个强奸危机干预中心。”女性主义活动家、心理治疗师克里斯蒂·库尔图瓦（Christine Courtois）回忆，“尽管这个中心的初衷是为刚刚遭遇过强奸的女性提供支持，但不久我们就接到另一类电话，这些女性遭遇的强奸都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且她们从未告诉任何人。其中一些人非常确切地指出，她们的侵犯者并非陌生人，而是熟悉的男性甚至是家庭成员……我们不知道如何帮助她们……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应付另一种意义上的强奸，比起我们惯常知道的那些，它更是一种禁忌，也更难以被讨论和被治愈。”

尽管整个社会和专业界都对儿童性侵缺乏认知，这些直面受害者的女性主义组织仍率先迈出了行动的第一步。1976年，“女性对抗强奸”组织（Women Against Rape，简称WAR）获得了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简称NIMH）的经费支持，得以在全国各地建立办公室，设置包括危机干预、社区教育、心理治疗等在内的一系列项目。一天，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WAR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一名教区学校的修女说，在她的学校里，一名二年级女童遭遇了强奸，情绪低迷，老师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询问：WAR是否能够到学校来，对整个班级说些什么？

这个电话促使WAR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儿童侵害防范项目”（Child Assault Prevention Project，简称CAP），率先在学校教育中推行防范儿童性侵的内容。从1976年开始，该组织在哥伦布市的全部小学开设针对家长、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坊。CAP项目的成员走进教室，告诉孩子们如何回应侵犯式的触摸，如何拒绝来自男性长辈、陌生和年龄更大的孩子的不恰当要求。孩子们在角色扮演游戏里练习说“不”，大声呼救，学习将情况告知成年人。

打破沉默

1981年，美国国家虐待和忽视儿童问题研究中心（NCCAN）主任道格拉斯·贝沙洛夫（Douglas Besharov）参加了第三届“国际虐待和忽视儿童大会”。他发现：“如果说有一个话题主宰了会议，那么它一定是儿童性虐待问题。”同一年，戴维·芬克尔霍从NCCAN拿到了一笔研究经费，得以支持他进行持续多年的儿童性侵犯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的相关专业领域，儿童性侵的广泛存在，及其将对儿童造成各种心理和行为障碍的看法已经取代旧有的观念，成为一种新的共识，但这种共识还远未成为一种公众的普遍认知和足以促成整个社会采取行动。WAR的“儿童侵害防范项目”常常在学校中受到抵制，一些家长抱怨，学校应当把这些事情留给家庭自己来解决。另一种情况更让人们感到如履薄冰。在一次学校工作坊的课程结束后，一名小女孩告诉工作人员，爸爸在夜里和她睡在一起。工作人员进一步询问，发现女孩和父亲都会赤裸下身。他们向儿童保护机构提供了这些信息，希望他们发起调查。然而很快，WAR就接到了女孩父亲律师的电话，这让工作人员退却了——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实质的证据。

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社会学教授南希·惠蒂尔（Nancy Whittier）发现，在整个80年

代，美国在儿童性侵领域的最大进步并不发生在法律、儿童福利和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公众共识的逐渐形成。而就像贾里德·西契尔在雅各布·威特琳一案的告破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一样，推动这一社会思想转变的是一群勇敢的人们——那些性侵案件的受害者。

上世纪80年代初，安娜·埃里克森（Anne Marie Eriksson）在纽约市性侵犯顾问工作小组工作。“和那些成人性侵案件的幸存者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是时候了。”埃里克森曾经在儿童时期遭遇性侵，她决定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幸存者运动。埃里克森在工作接触到的医院和社会组织张贴布告，寻找那些愿意抱团取暖的受害者。1983年2月，国际乱伦幸存者资源网（Incest Survivors Resource Network International，简称ISRNI）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令埃里克森惊讶的是，出现在会议上的有她的同事：“我以前认为自己从不认识其他儿童性侵的受害者，我突然发现，我其实认识很多人。”

安娜·埃里克森的惊诧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研究者们纷纷指出，儿童性侵害的受害者为数众多，但在80年代初，对于美国公众而言，这些沉默而隐形的个体几乎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在媒体的报道中，专家、社会活动家和机构是主角。南希·惠蒂尔发现，整个70年代，只有一则媒体报道出现了受害者的叙述。安娜·埃里克森和她的同侪们已经不满足于抱团取暖，她们决定打破沉默。“我们很快就接到了大量媒体的电话，因为我们愿意以幸存者的身份被看到。我们有10个人愿意上电视，做广播节目。当纽约的媒体想知道一些故事时，他们知道应当联系我们。”1984年，电视剧《关于阿米莉娅的一些事》（*Something About Amelia*）在美国播出，由于情节涉及乱伦，在美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ISRNI的成员大量出现在媒体上，以他们的经历告诉公众，乱伦是对儿童的性侵犯行为，是一种犯罪。

ISRNI只是当时出现的众多受害者群体中的一个。1980年，在科罗拉多，黛安娜·卡尔森（Diana Carson）建立了“VOICE”（Victims of Incest Can Emerge）。一些受害者在全美发表巡回演讲，呼吁延长儿童性侵案件的诉讼期限，号召更多的受害者采取行动。

一些人站了出来，就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80年代，美国媒体对儿童性侵的报道充满了令人热泪盈眶的故事，一次又一次震荡公众的内心。1982年，美国60年代最受欢迎的诗人、词作者、在嬉皮士一代中从者云集的罗德·麦昆（Rod Mckuen）在美国国家防范儿童虐待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公开宣布自己是儿童性侵的受害者，并跟随该委员会进行全国巡讲。1984年，在美国国家儿童性犯罪大会上，参议员宝拉·哈金斯（Paula Hawkins）呼吁对儿童性侵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改革，将儿童视为可信的证人，避免儿童受到二次伤害。“直到今天，我从未将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我的丈夫。”哈金斯当众讲述了自己被邻居侵犯，并遭遇了一场痛苦庭审的全部经历。

“你的身上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吗？”她问会场上在座的所有人，“发生在我身上的只是他抱住我，并将他的手放进了我的裤子……一个月后我们就从那里搬走了。然而，我依然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迈过这个坎。法庭审讯时的恐惧感直到今天仍如影随形。每当我身处法庭中，我就会回想起在4岁半时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而法庭上的所有人看上去又是多么庞大。并且，那个男人回到了社区，继续他的生活。”

1986年11月10日，数百万美国人在收看当时全国日间最热门的电视节目——奥普拉·温弗利（Oprah Winfrey）的脱口秀，这期节目的主题是性侵受害者。就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奥普拉·温弗利揭开了自己的伤疤——9岁的时候，她曾被一名亲属强奸。“我曾经为此埋怨自己，”温弗利说，“我身边的一些人，他们肯定意识到了什么，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6年后，1992年9月4日周五夜晚，美国多个电视网联合播出了温弗利主持的电视纪录片《惊恐的沉默：曝光及结束儿童虐待》。纪录片里，大量儿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罪犯出现在数百万美国人面前。节目播出后的4到5天时间里，设在好莱坞的援助机构“儿童救援”（Child

就像贾里德·西契尔在雅各布·威特琳一案的告破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一样，推动这一社会思想转变的是一群勇敢的人们——那些性侵案件的受害者。

Help）接到了超过 20 万个电话。

“到 80 年代末，儿童性侵案件的幸存者已经不再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感到自责……不再有那么多的耻辱或者孤独……”南希·惠蒂尔指出，“在 80 年代初，当一名幸存者出现在电视上时，她的面孔会被遮住，而 10 年之后，人们再也不需要这样做了。”

行动与反思

当防范儿童性侵成为社会共识，公众对儿童性侵犯罪抱以零容忍态度时，制度性建设就变得顺理成章。

雅各布的悲剧发生后，帕蒂·威特琳和她的支持者花费了 5 年的时间，促成美国国会通过《雅各布·威特琳侵害儿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记法令》。而在该法案通过的同一年，1994 年 7 月 29 日，新泽西汉密尔顿的 7 岁女孩梅根·康卡（Megan Kanka）在家门口玩耍时，被邻居杰西·蒂曼德夸斯（Jesse Timmendequas）邀请到家中去看“小狗”。蒂曼德夸斯残忍地性侵并杀害了梅根·康卡。案件很快告破，令公众吃惊的是，蒂曼德夸斯曾两度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和帕蒂·威特琳的选择类似，康卡夫妇和他们的支持者开始呼吁实施更为严格的性犯罪者登记制度。梅根·康卡失踪仅 89 天后，新泽西州长就签署了美国第一个“梅根法”——《犯罪登记与社区公告法》（*The Registration and Communi Notification Laws*，简称 RCNL）。该法案强制居住在新泽西州内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记。对于那些对公众危害不大的罪犯，执法机关将通知学校和各社区组织；而对于那些危害较大的罪犯，执法机关不但要通知学校和社区组织，还要通知街道居民。另外，州政府将建立统一的资料库，将这些罪犯的姓名和住址等资料公之于众，民众可随时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查询。

初战告捷，梅根的父母继续在全国展开演讲和游说活动。这一次，仅仅两年后，1996 年 5 月 17 日，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联邦“梅根法”。很快，美国 50 个州都拥有了自己的“梅根法”。在华盛顿州，如果一名刑满释放的性罪犯乔迁新居，警察则会挨家挨户地打电话通知邻居罪犯的姓名和住址。在最严格的俄勒冈州，搬到俄勒冈州居住的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必须在家里窗户上张贴醒目的记号，以警告

美国《国家性教育标准》K-12 个人安全准则

美国是最早提倡性教育的国家之一，学校性教育的开展有丰富经验。美国性教育起步早、发展快、理论和实践体系不断完善。2012 年 1 月，美国学校卫生协会（American School Health Association）、美国教育协会（American Education Association）联合发布了《国家性教育标准：K-12 核心内容和技能》（*The National Sexuality Education Standards:Core Content and Skills*，K-12，以下简称《国家性教育标准》）。该标准从人体和生理结构、青春期和青少年的发育、自我认知、怀孕和生殖、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健康的人际关系、个人安全七个领域阐释了性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技能。

上述七个性教育主题在《国家性教育标准》中针对每个年龄阶段都提出了层级分明的标准。以下为“个人安全”这一性教育主题下，各个年龄层个人安全准则的相关指导要求。

第一阶段	幼儿园至小学二年级

核心概念
Core Concepts

❶ 能够解释：所有人包括孩子，当他们不想被别人触摸身体时，都有权利告诉对方自己不想被触摸。

❷ 能够解释欺凌（bully）和戏弄（tease）的含义。

❸ 能够解释为什么欺凌和戏弄是错误的。

获取信息
Accessing Information

❶ 如果他们对被触摸感觉不舒服时，确定可以告诉父母和其他信任的大人。

❷ 如果他们被欺凌和戏弄，确定可以告诉父母和其他信任的大人。

人际沟通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❶ 当被别人触摸身体感到不舒服时，懂得如何正确回应。

❷ 当受到欺凌和戏弄时，懂得如何正确回应。

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懂得如何清楚地拒绝，如何逃离令自己不舒服的情境，在被别人触摸之后感到不舒服时如何确定并告诉值得自己信任的大人。

第二阶段	三年级至五年级

核心概念
Core Concepts

❶ 弄清戏弄、骚扰（harassment）和欺凌的含义，并解释为什么它们是错误的。

❷ 弄清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和性侵害（sexual abuse）的含义。

分析影响
Analyzing Influence

解释为什么有人戏弄、骚扰和欺凌他人。

（东方 IC 供图）

4 月 5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一堂儿童性侵防范教育课

邻居自己的身份。

“梅根法”的批评者们指出，这一系列法律的快速出台充满了政治迎合民意的意味。以新泽西州为例，法案的出台没有经过严格的听证程序，也没有坚实的研究证据做支撑，但这些质疑也客观上证明了公众共识的巨大推动作用。

1990 年到 2013 年，美国儿童性侵案件的数量下降了 64%。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一变化？

在过去的近 30 年时间里，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是立法的改变。自联邦“梅根法”出台后，美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立法频率陆续出台了数个与儿童性侵相关的法案，其中包括 1996 年的《帕姆·林彻尔性罪犯踪迹和身份识别法令》（*The Pam Lychner Sex Offender Tracking and Identification Act*），1997 年的《雅各布·威特琳改善法令》（*The Jacob Wetterling Improvements Act*），2006 年的《亚当·沃尔什儿童保护及安全法》（*Adam Walsh Child Protection and Safety Act*）等等。在各州的层面上，各种法律的出台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法案大都遵循一条一以贯之的立法思路：尽可能地减少性罪犯接近儿童、再次犯案的可能。一个例子从侧面说明了法网之紧：由于实行严格的性罪犯登记制度，人们很容易知晓自己的社区内是否居住着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员。自然而然地，出于恐惧，与性罪犯隔离的呼声越来越高。早在 2006 年，美国就有 20 个州和数百个地方制定了自己的居住限制规则（Residency Restrictions），详细规定登记在案的性罪犯必须在距离学校、日托中心、教堂等机构一定距离以外的区域活动。规定如此之苛刻，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迈阿密，登记在案的性罪犯只能在连接海滩和城市的朱丽亚塔特尔堤道（Julia Tuttle Causeway）的下面安家。

大量地抓捕、起诉犯罪者，并对他们采取严格的登记制度很可能具有显著的震慑效果，动摇了其他潜在儿童骚扰者的信心，使他们远离这类犯罪，但研究者们同时认为这些措施可能并没有公众想象中那么有效。

戴维·芬克尔霍指出，包括登记制度在内，司法系统的儿童性犯罪防范政策存在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它们往往建立在对性犯罪者错误的刻板印象之

上。通过广为人知的雅各布·威特琳案和梅根·康卡案，人们往往认为：儿童性侵罪犯是一个具有恋童癖的成年男子；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犯罪冲动，会在公共场合“捕猎”儿童；他们极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犯案。但这并不代表儿童性侵案件的全貌。戴维·芬克尔霍指出，在美国，绝大多数儿童性侵罪犯并不是恋童癖，事实上，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年龄超过 12 岁。多份统计数据显示，儿童性侵罪犯的再犯率低于其他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当人们将眼光聚焦到刚刚搬到社区里来的新邻居身上时，他们往往会忘记身边的危险：根据 2000 年美国司法统计办公室的数据，儿童性侵案件中，58.7% 的罪犯是受害者家庭的熟人，34.2% 的罪犯来自家庭内部，仅有 7% 的罪犯是真正的陌生人。

这为一些研究提供了解释。一项针对美国 10 个州的研究显示，实行登记制度前后，有 6 个州的儿童性侵犯案件发生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3 个州的犯罪率有所下降，而在规定最严格的州之一加利福尼亚，犯罪率反而显著上升。戴维·芬克尔霍指出，登记制度在 90 年代后期才在全美广泛实施，但美国的儿童性侵犯罪率那时已经开始进入下降区间。

全美模型

戴维·芬克尔霍更愿意用三个支柱来描绘减少儿童性侵的“全美模型”：积极的起诉、制止犯罪者犯罪和对犯罪者进行治疗；针对儿童的广泛的一级预防教育；广泛的公众教育和专业教育以促进案件的公开和积极检出。

针对儿童的广泛的一级预防教育始于 80 年代中期。1985 年，美国国家虐待和忽视儿童问题研究中心（NCCAN）在儿童性侵项目上的经费从 1100 万美元猛增到了 2700 万美元，其中的大量资金被用于设置教育项目，这些项目覆盖全年龄段的学生，教育形式包括多媒体、剧场表演、社区展览等，学校、家长－老师组织、医院、社区精神健康中心和独立的非营利组织都被鼓励参与这些教育项目的设计和执行。

在今天的美国，针对儿童的一级预防教育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但其目标主要集中于几点：首先，它们帮助儿童认识和理解触犯边界的行为、不合适的触摸和接触——这些都是性犯罪者在真正实施侵害行为之前所可能采取的行动。同时，儿童还被教

获取信息
Accessing Information

❶ 如果他们被欺凌、骚扰和戏弄，确定可以告诉父母和其他信任的大人。
❷ 如果他们被性骚扰或者性侵害，确定可以告诉父母和其他信任的大人。

人际沟通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❶ 懂得如何跟人交流别人是怎样被对待的。
❷ 掌握拒绝的技能（比如申明“不”的状态，走开，重复拒绝）。

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当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被戏弄、骚扰、欺凌时，讨论有效应对的方法。

宣传倡导
Advocacy

当有人被戏弄、骚扰、欺凌时，说服其他人采取行动。

第三阶段	六年级至八年级

核心概念
Core Concepts

❶ 描述构成欺凌、性骚扰、性侵害、性侵犯（sexual assault）、乱伦（incest）、强奸（rape）和约会暴力（dating violence）的情形和行为。
❷ 讨论欺凌、性骚扰、性侵害、性侵犯、乱伦、强奸和约会暴力的影响，并解释为什么它们是错误的。
❸ 解释没有人有权利使用性的方式去触摸别人，如果他们不想被触碰。
❹ 解释为什么被强奸或者性侵犯的人本身并没有错。

获取信息
Accessing Information

如果他们或者他们知道的其他人被欺凌、骚扰、虐待或者侵犯时，确定他们能够向父母和其他值得信任的大人寻求资源和帮助。

人际沟通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懂得和信任的大人沟通有关欺凌、骚扰、虐待或侵犯等方面的问题。

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❶ 描述有尊严地对待他人和尊重他人的方法。
❷ 当其他人被欺凌或者骚扰时，懂得如何回应。

宣传倡导
Advocacy

倡导建立能够鼓励大家尊重所有人的安全环境。

第四阶段	九年级至十二年级

核心概念
Core Concepts

❶ 区分和对比构成欺凌、性骚扰、性侵害、性侵犯、乱伦、强奸和约会暴力的情形和行为。

育如何去拒绝这些危险的接近和邀请，终止交流并召唤帮助。以一项被广泛采用的“谈谈抚摸项目”（Talking About Touching Programe）为例，教师要让孩子们明白什么样的抚摸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抚摸应该被拒绝，成人不能触摸身体的哪些隐私部位，一旦遭遇非法抚摸后，又应该如何去做？所有知识要通过情景还原、角色扮演等形式确保儿童理解并正确使用。一条具有代表性的情景模拟题目是：凯瑞上星期在她的朋友家住宿，朋友的哥哥走进卧室，把手伸到凯瑞的被子里，想抚摸凯瑞的私处，凯瑞大声说“不可以这样做”。朋友的哥哥停下了，但他告诉凯瑞，让凯瑞保守秘密，你认为凯瑞应该怎样做？

对于儿童预防教育的一些常见争论是，儿童自身有能力阻止性侵行为的发生吗？戴维·芬克尔霍认为，在儿童性侵案件中，部分罪犯具有高度的侵犯动机，他们会采用强制手段或者复杂的策略，很难被孩子们制止。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儿童性侵犯罪者，特别是年轻的性侵者、保姆等特殊身份的性侵者，他们很可能是一时起意，并且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焦虑，儿童还可能在公共场合，比如公交车上遭遇蓄意性侵的人员，在这两种情况下，儿童自身的警惕就变得极有价值，他们很可能通过坚决的拒绝和呼救使自己免受侵害。

儿童的一级预防教育还有另外两层重要意义：接受过合适教育的儿童一旦遭遇侵害，能够及时向成人报告这一情况，避免持续侵害的产生；而由于他们对性侵行为有一定认识，并不会将这一遭遇视为自己的错误，也有利于减少他们所遭受的心理伤害。芬克尔霍在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992年，在已知的儿童性侵案中，25%的案件是由儿童自身汇报的，而在2008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50%。

美国防止儿童性侵犯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教育儿童固然重要，但真正能为儿童织起安全大网的是成人。从70年代女性主义组织的尝试开始，针对儿童性侵犯的教育从最初就面向家长和社区。芬克尔霍指出：“今天的美国是这样一个社会，更多的人必须经过筛选和背景检查才能成为对儿童负有责任的人。各团体和领域里的很多人，在性虐待问题方面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这些人在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在什么样的场合和他们的孩子接触时可能更小心谨慎。现在甚至连带有小孩的女性在寻找新配偶或男朋友或决定组织家庭时都可能会受到干预……所有这些措施可能已经减少了潜在儿童骚扰者与儿童接触的机会，所以，即使有骚扰儿童倾向的人的数量并未减少，但他们实施犯罪的机会大大减少。”

1962年，亨利·坎普发表《受虐儿童综合征》之后，美国政府开始考虑采用何种办法促使隐蔽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件曝光。1963年，联邦出台了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一切与未成年人接触的人员，在发现儿童有被虐待或忽视行为时，有向专门机构报告的义务。早期，各州通常仅规定医务人员为报告主体，但随着儿童保护法律的完善，报告主体的范围大大增加，目前大多数州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人员都包括：社会工作者；教师、校长和其他的学校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医师或其他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儿童照料人士；法医或验尸官；法律执行机构人士。甚至，美国有18个州规定，任何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怀疑存在包括性侵在内的儿童虐待或忽视情形，都有报告的责任。在所有的州，发现了虐待行为却不报告的，会受到罚金或短期监禁的处罚。有报告义务却不报告的人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同时，为保障报告人的权利，鼓励人们积极举报侵害儿童的行为，美国所有州的强制报告立法中均有免责规定。如果报告主体是“善意和真诚”的，依其所知“怀疑或有理由认为”儿童造到虐待和忽视，即使报告最终未获证实，报告人也不必承担责任。

当一个报告者怀疑儿童性侵行为发生，他可以直接联系法律执行机构，也可以拨通当地儿童保护机构（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简称CPS）的24小时热线。CPS主要负责处理家庭内部成员的侵害行为。CPS规定，热线接收的所有报告都会进入立案调查。个案按照情况紧急度分为P1～P4四个等级，由CPS接入组（Intake Unit）的调查员（Investigator）接手。P1是最紧急的案件，调查

儿童自身有能力阻止性侵行为的发生吗？在儿童性侵案件中，部分罪犯具有高度的侵犯动机，他们会采用强制手段或者复杂的策略，很难被孩子们制止。

员必须在收到报案两小时内做出回应。针对儿童性侵报告的调查通常会有一个调查组负责，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一名专业的CPS工作人员、一名医生、一名心理咨询师、一名社工和一名执法机构人员。一旦性侵行为被初步认定，CPS将确保受害儿童的安全，而警方则将启动刑事调查。

从1977年亨利·坎普的宣战讲演到今天，40年的努力远非终点。2016年3月，《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史蒂夫·波特接到线报，爆料人称，在佐治亚州的一起性侵案中，一位教练性侵一名未成年女运动员长达7年，在被警方调查前，美国体操协会竟忽视了针对这名教练的4次举报。《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组织了一支调查队伍，在超过9个月的调查过程中，采访了包括受害者、体操场老板、运动员、教练、警察、检察官和未成年人监护人在内的近100人，其中超过80人不愿意对外公布姓名。调查发现，从缅因到加利福尼亚，从华盛顿到佛罗里达，约有115名从事教练或队医等职业的成年人不同程度参与了对青少年体操运动员的性侵。

《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报道在美国激起了一系列刑事调查，落网的嫌犯包括美国体操国家队前队医拉里·纳塞尔，美国联邦法院及密歇根州地方法院指控他犯下28项重罪，其中包括3宗一级性暴力犯罪。现年53岁的拉里·纳塞尔从1996年到2015年在美国女子体操队工作，包括悉尼奥运会美国女子体操队铜牌得主杰米·丹泽彻尔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奥运会女子体操金牌获得者在内的81名美国体操女将起诉他性侵。据《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报道，受害者对纳塞尔的性侵指控横跨18年，从1996年持续到2014年，其中大多数都是美国体操国家队队员，年龄从13岁到20岁。“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床上，在我参加悉尼奥运会时住的酒店里，他都侵犯过我。”今年3月28日，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杰米·丹泽彻尔回忆20年前的遭遇时泣不成声，“当时我以为被他那样对待的只有我一个人”。

这起巨大的性侵丑闻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多年来，美国体操协会并非对此一无所知。有记录显示，协会编制的投诉档案涉及50余名教练，这些档案被保存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办公室的抽屉里。美国体操协会只是教育其成员停止性侵犯，并没有制定严格的制度并加以实施，更没有遵照强制报告制度向相关机构进行报告。有些被指控的教练多次被体操馆开除，却仍保留美国体操协会会员资格。部分受害者称曾收到来自协会主席斯蒂夫·佩尼的施压，被告知不能起诉著名教练。更加令人扼腕的是，美国前体操队员珍妮特·安托林也是纳塞尔性侵的受害者之一，她曾经把这件情告诉家人，后者的反应是：“别胡说了，纳塞尔是个多么好的人。”而在近20年后，在涉嫌性侵的行为曝光之后，仍有一些体操运动员的家长给法官和美国体操协会写信为性侵嫌疑人辩护。无论在40年前还是今天，在与儿童性侵犯罪的战斗里，任何轻率的成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和息事宁人的包庇者依然是罪恶最大的帮凶。

（参考资料：*The Politics of Child Sexual Abuse*，Nancy Whitti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Child Protection in America*，Past，Present，and Future，John E.B.My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The Prevention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The Future of Children，David Finkelhor，Vol.19/No.2/Fall2009；《美国儿童性虐待的减少：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戴维·芬克尔霍著，石泽锋、陈晶琦译）

❷ 分析与欺凌、性骚扰、性侵害、性侵犯、乱伦、强奸和约会暴力相关的法律。

❸ 解释为什么在人际关系中使用诡计（trick）、威胁（threat）或者强迫（coercion）是错误的。

❹ 解释为什么被强奸或者性侵犯的人本身并没有错。

分析影响
Analyzing Influence

❶ 描述在性关系中权力差异（比如地位和职位）的潜在影响。

❷ 分析影响人们对欺凌、性骚扰、性侵害、性侵犯、乱伦、强奸和约会暴力的态度的外部因素和社会信息。

获取信息
Accessing Information

❶ 如果他们自己或认识的人被欺凌、骚扰、性虐待或者性侵犯时，找到获取帮助的有效资源。

❷ 懂得如何找到准确信息和资源，为性虐待、乱伦、强奸、性骚扰、性侵犯和约会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人际沟通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❶ 懂得和信任的大人沟通有关欺凌、骚扰、虐待或侵犯等方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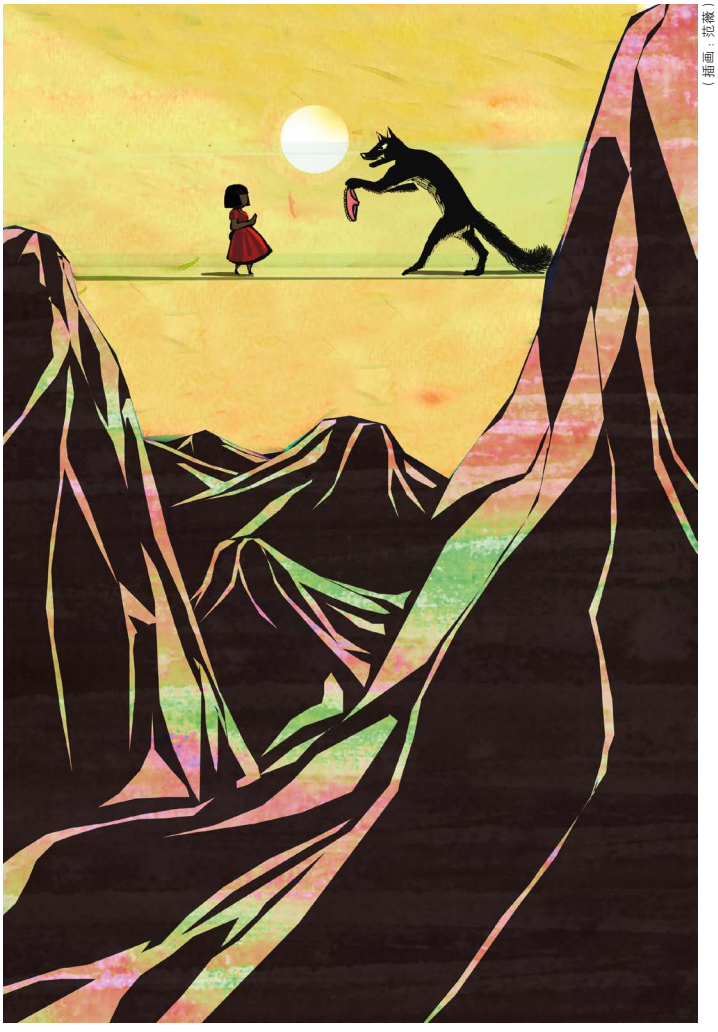
❷ 当其他人被欺凌或者骚扰后，确定自己知道如何回应。

宣传倡导
Advocacy

倡导建立能够鼓励大家尊重所有人的安全环境。（整理：吴扬）

当我们谈论儿童与性时，我们在谈什么

主笔 蒲实



（插画：范薇）

从 2013 年以来，在公众话语空间中越来越引起关注的儿童性侵事件，本质上是我们围绕儿童身体所进行的“文明化”过程。一方面,我们不再视与儿童谈论性（sex）为禁区，另一方面，对于以儿童身体为对象的性化（sexualize）行为则有了越来越多的规则和禁忌。今天我们视“儿童”为理所当然的概念，但这个概念 17 世纪才从成人世界分离出来，此后，“童年”才开始成为现代世界的价值观。对儿童身体的讨论，是一个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建构过程。

界限：“纯真”与“性化”

半年前，6 岁的小儿子问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抱他的时候，他看着我的胸部，好像回忆起了婴儿期的往事，就问：“这是我小时候喝奶的地方吗？”我回答他：“是的。”他继续问：“为什么喝奶的地方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呢？”我懵了。从哺乳功能上似乎很难给出解释，若要说“对称”这样的视觉概念，又直觉地感到不适合，好像将一种单纯的哺乳器官变成了一种“审美”对象，隐藏着含混不清的情欲；但这种界限何以存在、为什么这样划分，我那时也没有清晰的认识论。还有一次在书店买书，儿子被一本叫《屁股》的绘本吸引住了。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摆脱对“屎尿屁”的兴趣，对这些人体部位充满天生的好奇。绘本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有趣诙谐，但有一页却画着一位穿紧身短裙的女性丰满的屁股，写着“有些屁股走起来摇摇摆摆，是为了吸引人的目光”，旁边画着几个回头看的男性。这一页内容让我很尴尬，含混给他讲了两句便快速糊弄过去。有什么关于屁股的内容显然越过了某种界限，与孩子的纯真格格不入。但这条界限究竟是什么？

关于“喝奶”的问题，还让我想到大约 20 年前的中国城市，那时当众哺乳还并不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场景。不仅在中国农村稀松平常，在城市也并不觉得突兀，观者的印象仅是觉得“一个母亲在给一个嗷嗷待哺的婴童喂食”。而如今，城市街头诸如“女性边骑三轮车边喂奶”的图片都会在网上被热炒，引来热烈围观和评论，让人感到人们的性观念——在这个例子中是审视裸露乳房的观念，已发生了剧变。这种剧变，仅仅用诺贝特·埃利亚斯在那本著名的《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所提出的“文明化”趋势来解释，似乎也缺乏解释力。他提出，越“文明”，与

身体功能有关的人类行为就越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管束，且内在化为各种情感机制（特别是尴尬和羞耻）的自我约束——过去三四岁的男孩穿开裆裤是多年传统，现在在公众场合穿却令人感到羞耻。但它的解释力对我来讲仍是有限的。看一看性教育水平最高的北欧，“文明”的进程似乎又不是仅仅在往身体的羞耻和尴尬这个方向走：十几年前，我曾在哥本哈根的一所教堂里，目睹一位年轻的母亲一边哺乳，一边参加教会小组的分享，那个壮硕男婴吮吸乳汁的洪亮咂巴声和满足的呻吟声贯穿整个冗长的讨论，但没有人感到尴尬或不适。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模棱两可的场景：它充满母性的光辉，却又不能说它没有任何情欲的色彩，只是性的成分恰好没有越过约定俗成的心理界限——这个界在哪里呢？这对我来说是个无法表述的谜题。

当我问从事儿童性心理发展与性教育研究的胡萍，儿童是否有性的认识、这种性的意识与童真是否冲突时，她告诉我，“从孩子一出生，他（她）就开始认识‘性’（sex），不断比较自己和父母身体的差异。大概在两岁半到三岁左右，完成对自身性别的确认和理解，包括对男人和女人性器官的认识”。与之相关但并不相同的另一个概念，则是成人世界的“性”概念（sexuality），它有一个对应的动词，“性化”（sexualize），这个词才更多具有文化上的性意味。在胡萍编写的性教育教材《成长与性》里，她向儿童解释了“我为什么是女孩或男孩”的问题，也详细介绍了男孩与女孩、男人与女人身体构造的不同，比如男孩有阴茎、女孩有阴道、女人的乳房和骨盆和男人都很不相同；进而，她讲解了“我是如何来到这世界上的”这个过去比较隐晦的问题。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生命过程，只要孩子提问，任何时候回答他关于身体的问题都是合适的，介绍生殖器也应该像介绍眼睛、鼻子、耳朵一样自然。同时，也要告诉他们这些部位的私密性和重要性，要像指导他如何吃饭睡觉一样平常”。这本书这种明确将性器官作为和其他身体器官无差别的功能器官来介绍的清晰性，不带任何污秽感和文化想象的色彩。

这让我想起另一本 1968 年美国出版的《宝宝是如何诞生的》（*How Babies Are Made*）的儿童性教育读本。它开篇展示了植物的繁殖和动物的繁殖，然后进入到人类的繁殖原理。它如此描绘：“爸爸的睾丸会产生精子，然后爸爸用阴茎把精子送进妈妈的身体。为了完成这个过程，爸爸和妈妈要面对面躺着，爸爸要把阴茎放进妈妈的阴道。不过，跟动植物不同的是，人类的爸爸和妈妈在创造一个小宝宝时是带有一种很私人的特殊感情的。”谈论性（sex）的忌讳正变得越来越小。美国医学博士大卫·鲁本在他的著作《性知识大全》的序言中曾写道：“身为一个精神病医生，我经常遇到一个异常矛盾的问题。在我所看的病人中，几乎每一个都是生活在太空时代而把他（她）们的性器官遗留在石器时代里，几千年来文明教化累积的结果并没有改进我们对于性器官的认识。目前街上满是黄色书刊，戏院也经常放映成人电影，互联网上色情网站多不胜数，大多数人的性知识可以说仍是差得很。一个喷射机驾驶员以每小时 300 公里的速度开着他的飞机在空中冲刺，他却不知道如何把他的阴茎往阴道推进七寸；一个女物理学家在白天探究着核基子的奥秘，她到了晚上只得孤独一人默想着同性恋的究竟。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处境：我们对于 23 万 8000 里远的月球表面的了解，比对于我们自己脐下六寸的了解要来得多。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从阴茎到阴道的七寸旅程，也都曾在母亲的子宫里待过 280 天，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为自己曾经生活和旅行过的地方而感到烦恼。”性教育始于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的西方；欧洲中世纪，对“性”的禁忌也达到了顶峰，对性的开放包容态度，将其视为一个自然的生命历程，也不过是近一个世纪的事。

然而，“性教育”还是没能回答我心中那个关于“界限”的疑问。玛丽斯普特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教育项目主管王龙玺告诉我，“性侵”这个概念，更多包含在具有社会文化含义的“性化”（sexuality）这个概念里，而不是纯生理意义上的“性”（sex）这个概念。他给我讲了一个引发成人争议的案例：一位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幼儿园里出于对女孩子隐私部位的好奇，把手伸进一位同班小女孩的裤子里，触摸到了她的生殖器部位；小女孩回家后告诉了妈妈，这位妈妈到幼儿园声讨这个小男孩“性侵”，

当我问儿童是否有性的认识、这种性的意识与童真是否冲突时，她告诉我，“从孩子一出生，他（她）就开始认识‘性’，不断比较自己和父母身体的差异”。

并认为他“毁掉了自己女儿的一辈子”。“这是一种对于性的过于恐惧。”王龙玺说，“男孩的动机是纯粹的好奇，不带有任何性欲的表达，解决的最佳方案是教育他要懂礼貌，不能触摸别人的隐私部位。而对女孩来讲，更没有必要说‘一辈子就毁了’。所谓‘侵犯’，具有很强的文化意味：在城市里，你已经无法想象大人去触碰小孩的生殖器，但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男孩子光着身子在田埂上飞奔的景象依然存在，有些大人仍然用狗尾巴草之类的东西去拨弄他们的阴茎，逗他们玩儿。这是一种‘性侵’吗？这其实是不带有任何性欲表达的乡土文化。没有一种科学的标准可以去定义一种行为一定是性侵，一种一定不是，因为情欲的表达，或者说‘性化’，是一个文化建构和随社会文化而变动的概念。”

另一个例子是近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南京火车站“性侵”女童事件。北京理工大学性学研究者王文卿注意到，这起将手放在幼女胸部的“性侵女童”事件，与夏天偶尔裸露上半身以求凉快的“幼女裸胸现象”，围绕着“女童的胸部”这个焦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背后隐含的则是未经检视的“界限意识”——这是这种“界限意识”，“决定了女童的胸部何时可以裸露和触摸，何时又通过各种禁忌被构造为一种‘禁地’”。在他看来，在南京“性侵女童”的事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是胸部的“性化”（sexualize），“正是因为身为哥哥的男子所触摸的身体部位被认定为具有‘性’的含义，所以这个事件才被界定为‘性侵’”。而那些袒胸的幼女，则被认为是“天真无邪”的，完全与“性”无关，也不是性行为的对象。接下来的问题是，“无性的幼女”与“有性的女童”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根据什么来确定界限？网络流传的照片无法判断女童乳房的发育状况，一些信息透露她大概 10 岁，尚未进入青春期。是什么力量左右着这场“性”与“非性”的界限划定呢？他最后仍然回到了“文明的进程”上：越早开始现代化进程，越接近“现代文明”的人越“文明”；在文明等级和阶序观念的指引下，农村人向城里人看齐，城里人向西方人看齐，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儿童的身体被越来越早、越来越严密地包裹起来，而被包裹起来的身体则伴随着‘性化’和‘羞耻化’”。“文明化”让原本不被注意的行为成为“不文明行为”，降低了“暴力”和“侵犯”的门槛。但这个逻辑的问题也许是，那名男子的动机是被忽略的，他是否具有性的欲望和企图？而那个女孩的感受与反应也是未知的，她是否自愿，或是否感到不适？从 2013 年以来，在公众话语空间中越来越引起关注的儿童性侵，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开始将儿童的身体与成人的身体分离开来看待，并围绕儿童建立起性禁忌的“文明化”过程；一方面，我们不再视与儿童谈论性（sex）为禁区，另一方面，对于性化（sexuality）的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禁忌。今天我们视“儿童”为理所当然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是 17 世纪才开始出现的。此后，“童年”才开始成为现代世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观看的历史：儿童身体的想象与禁忌

哺乳女性的乳房，为什么在一个更“文明化”的社会里不应袒露于人？为什么女童尚不清楚发育状况的胸部成为性禁忌的区域？对《屁股》绘本里某一页突兀的不适之感从何而来？ 这一切都始于对身体的观看，以及如何观看——我们生活在视觉文化中，现代性的知识系统在“看”的统治下，到了“无图无真相”的地步；身处这个视觉幻象的文化中，“性化”（sexualize）对感官的情欲或性欲刺激，最重要的是通过“看”来完成的。

在人类历史上，成年人对儿童的色情利用很普遍。在古希腊，男人和未成年男孩之间有一种学徒和情人、灵肉一体的特殊关系，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述，这种男人男孩的组合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的爱，带有“爱智慧”的教育目的。这种男人对男孩的迷恋，后来又出现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 1911 年创作的小说《死于威尼斯》里。小说里，男孩是美的化身，中年的男主人公因而陷入一种反常的情爱里不能自拔，最后为追随男孩而死。在中国历史上，对儿童的性剥削也曾是风气，甚至是文人风雅，雏妓就是一例；19 世纪的欧洲也有儿童娼妓的大量记载。随着儿童权利概念和保护意识的上升，“恋童癖”这个词语才在现代被构建出来，儿童不再是成人的合法性对象。

儿童的身体过去并不存在。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里追溯，12 世纪前后，中世纪的艺术还未涉及儿童。一幅 11 世纪奥托风格的宗教细密画如此曲解儿童的身体：耶稣要求人们允许小孩到他身边去，然而，细密画家却在耶稣周围画了八个真正的成年人，肌肉发达，只在个子上画小了一点。一直到 13 世纪末，儿童没有自身的特

点，只是身材缩小的成人。我们现代人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中，成年人在孩子面前会避谈有关性的话题，不能有任何性暗示，但古代社会对此观念则完全陌生。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初，亨利四世的御医艾罗阿尔在记载小路易十三生活点滴的日记里，多次记录宫廷里的人对儿童所开的放肆、粗俗的性玩笑，侯爵夫人、保姆都经常把手伸进他的衣服里，拨弄他的阴茎，大家都鼓励他不断向人展示自己的阴茎，而且对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下流举止不以为耻，反而习以为常。这样的性器官玩笑，直到他 7 岁时才消失，这也是 17 世纪宗教和道德更新的信号。而一旦到了 7 岁，儿童就与成人混杂在一起了，每天和成人一起工作和玩耍；所有年龄和阶层的人都被卷入相同的生活激流中，没有给任何人留下独处和私密的时间。在 17 世纪，男青年在 14 岁结婚开始变得少见，但姑娘 13 岁结婚却仍然十分流行。阿利埃斯对 17 世纪之前的人们让孩子观摩男性性器官的手术或毫无恶感的在公开场合允许儿童做一些诸如允许他们触摸性器官的动作，是这样看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人们相信未发育的儿童对性行为浑然不知、漠不关心，因此，那些动作和这方面的暗示对他们不会产生后果，这些动作是无意识的，失去了性方面的特殊意义，它们是中性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观念，即与性行为有关的事物会毒害儿童无辜的心灵，即使将这些事物的晦涩含义除去，也不会。而事实上，或在公众的舆论中，人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儿童纯真心灵的真正存在。”直到 18 世纪，随着学校教育体系完善和道德改革，才让儿童在进入成人世界之前，受到一种特殊的对待和保护性的隔离，其中包括对儿童天性的研究和身体的独立对待，“童年”在现代社会的早期被发明了出来。

在《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一书里，理查德·莱伯特讨论了绘画中的女孩形象与现代性的文化想象。他追溯了西方将儿童的性作为一种视觉符号，几百年来观看方式的演变。始于 17 世纪的现代性的历史，正越来越多地被构建成一种“看”的文化，而儿童的身体——以及他们身体的性，一直是人们与现代世界达成妥协的主要场所。莱伯特写道：“现代性对儿童和童年时代表现出的关注程度在西方早期历史上是空前的，教育、宗教、德育、医学、精神病学家、社会治安和法律等话语场所都对此有所反映。儿童的问题首先在 18 世纪开始变成热点话题，19 世纪人们的关注几乎发展到痴迷的程度，到了 20 世纪也未见衰退，尽管争议的焦点这时已经有所改变。总体说来，18 世纪极端重视上流社

《读书》2017 年第九期目录

蒋原伦　虚构的空间
张振涛　追寻民间抄本无双谱
汪毅霖　创新的经济学逻辑
郝延伟　“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

短长书
孙悟空形象中的大历史（陈晓明）·斩头相谢与披沙拣金（梁培恕）·《教育敕语》死灰复燃的历史地层（周晓霞）

杨凤岗　多元时代的宗教和世俗主义
邢承吉　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人
张伟劼　拉丁美洲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孙红卫　不关风月：爱尔兰人韩尔礼与中国花草
王　炎　文明比较，还是文化偏见?
李丹婕　后上官婉儿时代与冯道的历史世界

谢一峰　南宋史学的三重阴影
何江穗 方慧容　萧公权《中国乡村》刍议

品书录
大自然的忧伤侦探（刘文飞）· 未完成的“断裂”（黄发有）· 讲好书法故事（司新丽）

孔　元　重新发现博丹
高　臻　你不可能是个例外
李庆西　汉沮迷津　老读三国
郑国庆　猫与人：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与动物伦理学
孙　歌　吃货与乡情

读书短札
定武本兰亭　北窗读记（刘涛）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会儿童的成年责任教育问题，具体到实践和道德教育两个层面，主要涉及家庭名誉和经济地位两个方面。相比之下，19 世纪，焦点转向了儿童的性问题，话语集中到了自慰问题上。在我们这个世纪，至少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成人对儿童自慰问题的兴趣大幅度下降，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犯罪和儿童暴力问题——成人对儿童的恐惧日益增加。这个焦点重新引发了现代性对儿童天性问题的追问。”

在 19 世纪的画家雷诺阿那里，女孩和花朵的传统意向相关联，表达了“纯真”的主题。当他描绘孩子时，他弯下腰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观看世界，这使得他的儿童肖像画在漫长的绘画史中与众不同，他与孩子之间有明显共鸣。但他也必然避开了童年时代其实并不完全纯真的事实。他的纯真女孩因而成为 19 世纪儿童形象的独特性，这种纯真的独特形象，是医治 19 世纪欧洲社会快速变化和严酷现实的良药。而 19 世纪的法国画家格勒兹则不同，他笔下有着娇嫩小脸和裸露的、发育中的胸脯的少女，以及她湿润丰满的下唇和精心修饰仍有些凌乱的头发，表达的都不是少女的纯真，而是卖弄风情的女孩流露的性吸引力。到了 20 世纪，法国画家巴尔蒂斯挑战了最后的禁忌，不仅以油画《吉他课》表现同性恋女教师对女学生的性侮辱，而且又以一幅《街道》，表现了成年男性对青春期的少女爱抚的愕然场景。

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看”的方式的也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电视、报纸、杂志的兴起，让“看”变得更加无处不在。已故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曾是 20 世纪 30 年代童真形象的代表。她具有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所定义的“婴儿模式”的一切特征，大脑袋、圆脸、大眼睛、酒窝、爱玩儿、好奇、天真无邪，让人产生“养育本能”而非“性欲望”。在秀兰·邓波儿的好莱坞“纯真时代”，天真无邪是不可侵犯的。虽然她也曾搔首弄姿吸引有恋童癖的成年男人观众，制片人也让成人演员搭档把她时不时举起来露出内裤制造错觉，但恋童和儿童的性意识还不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这样的儿童形象自邓波儿发育为少女之后就不再有了，虽然她胸部高挺，脸庞更狭窄清秀，也有了少女的羞涩，但观众们眷恋和幻想的只是她的童真。20 世纪 50 年代，自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争议中流行起来，后来又被拍成数个版本的电影，女孩的形象就常常带有洛丽塔的影子了——早熟、世故、天真与风情混合并存，具有强烈的性吸引力和诱惑力。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对儿童身体的保护和恋童的讨论逐渐进入公共话语空间。

也是在 20 世纪，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预言了“童年的消失”。如果说印刷术发明了童年（儿童必须识字、接受教育，才能成长为成年人），那么电子媒介则消解着童年：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图片、电视屏幕上，儿童过早接触到成人的社会，见识到的东西多了，辨别能力却跟不上，更不知道如何拒绝成人世界中某些观念和言行；信息的壁垒消失了，变得无法控制。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事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在身体上，都越来越难以分辨。作为一个人造发明物的“童年”，现在又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开始消逝；电视把成人的性秘密和世间暴力转变为娱乐，并把新闻、广告信息的接受维持在 10 岁左右孩子的智力水准上。当《童年的消逝》出版时，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如今的网络世界似乎进一步应验了他的预言。在互联网上，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恋童癖和色情摄影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流行时尚与童装的成人化、性感化也越来越关联。十几年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围绕色情艺术表现性欲的界限模糊的问题一直在展开激烈的争论，在这个界限的确定问题上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追随西方“文明化”进程的中国，如今也遭遇了界限的困境，儿童形象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迫切地呼唤这个界限的确立。这也是性侵犯屡屡进入公众话语空间受到关注的背景：人们渴望保护近乎乡愁的童真，对失去它备感焦虑；但那条分割儿童身体与“性”(sexuality)的明确界限，还在建构之中，充满不确定性。王龙玺告诉我，甚至某种意义上，将“纯真”和“性化”对立起来，可能也是一种过时的理念，“看看现代社会铺天盖地充满色情意味的广告和图像吧，与儿童谈论性，一定比公共空间的性纯真”。

在互联网上，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恋童癖和色情摄影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流行时尚与童装的成人化、性感化也越来越关联。

绘画：阿梗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三联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集体土地试建租赁住房

主笔 谢九

近期火热的住房租赁市场又放大招，农村集体土地将可以用来建设租赁住房。此举无论对于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还是拓展农村的集体土地用途，都将带来不小的影响。

8 月 28 日，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确定第一批在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杭州、合肥、厦门、郑州、武汉、广州、佛山、肇庆、成都这 13 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最近一段时间，住房租赁市场逐渐升温，成为我国房地产调控重要的长效机制。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持续上涨，土地供应不足是推升房价的重要因素，大力发展住房租赁虽然可以缓解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但是从土地供应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土地稀缺的一线城市，如果大量土地被用来建设“只租不售”的租赁住房，可能会挤占普通商品房的土地供应，反而会加剧房价上涨的压力。此次国土部和住建部宣布放开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和普通商品房抢占土地资源的矛盾。

我国的土地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城市土地为国有，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村土地又主要分为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后者主要包括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等。此次两部委宣布放开的是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而非农用耕地，这也意味着，农村集体土地在放开的同时，18 亿亩耕地的红线并未松动。

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的模式将会如何操作，从北京过去几年的试点可以窥见一二，此次两部委宣布在 13 个城市试点，也是建立在北京和上海试点的基础之上，因此，北京的模式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复制的样本。

2011 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在朝阳区平房乡、海淀区唐家岭、温泉镇 351、昌平区北七家镇等 5 个集体土地地块开展租赁住房项目试点，一共建设租赁住房 1.28 万套。今年 5 月份，唐家岭集体建设用地的首批 927 套租赁住房正式建成，开展现场选房、签约入住。这批租赁住房的操作模式是，由海淀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按照市场价格向农民整体趸租，租期 10 年，统一进行出租、运营和管理，然后面向保障房家庭以公租房价格出租，差价由政府补贴。

除了唐家岭项目之外，朝阳区平房乡、温泉镇 351、昌平区北七家镇等其他几个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租赁住房也会陆续投入使用，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产业园区附近，承租对象除了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之外，还会面向周边产业园区的职工，以及外来务工人员。按照北京市的计划，今后 5 年，北京将建设租赁住房 50 万套，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排。以北京市的这种模式来看，对于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租房需求还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在地块大部分处在相对偏远的区域，对于在市区就业的人群可能难以惠及。和普通的商品房相比，这类集体租赁住房在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便利程度可能也会有所不足，从悲观的角度来看，如果建成之后出租率不高，可能会对政府财政形成长期黑洞，假如政府在首期租约到期后没有续约，闲置的房屋将会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是否要参与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首先要考虑的是投资回报的问题，由于房屋只租不售，农民的收益将完全来自于租金，而目前国内住房市场的租金回报率普遍不高，如果仅以普通商品房来看，完全依靠租金来回收成本并不现实。不过，和普通商品房不同的是，农民集体土地建设的房屋没有土地成本，这将节省出一大块开支，使得农民建房出租相对有利可图。

除了要考虑租金回报之外，农民建房出租的另外一大挑战在于资金。农民集体土地建房的模式和开发商建房具有极大的不同，前期的开发建设主要由村集体承担，所需资金对于农民而言将是天文数字，加之住房只租不售，无法像普通开发商那样正常融资，而后期所得收益主要是租金，回收成本的周期也比较漫长，所以，以农村集体组织来承建大规模的租赁住房，如何获得金融资本扶持也将是一

大关键。按照两部委发布的试点方案：“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如果回报率可观，预计社会资本也会参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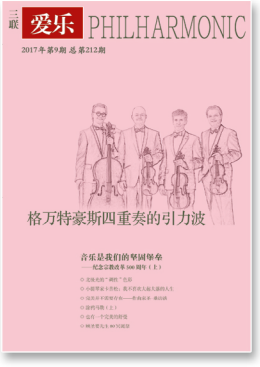
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面临的另外一大风险在于小产权房卷土重来，农民将房屋建成之后，以几十年长租的形式出租给客户，一定程度上其实相当于小产权房上市交易，而且可能还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两部委的试点方案对此也有所约束：“集体租赁住房出租，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租赁合同约定，不得以租代售。承租的集体租赁住房，不得转租。”不过，随着未来此类租赁住房规模越来越大，估计也很难全部纳入监控之内。

虽然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风险，但如果设计合理，还是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这也是首批选择 13 个城市进行试点的意义所在。在总结了试点期间的经验教训之后，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预计将会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按照试点方案所披露：通过改革试点，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2020 年年底前，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总结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报国土资源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除了解决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之外，对于探索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也是有益的尝试。过去很多年来，我国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呼声一直很高，比如学界很多人士呼吁打破城乡二元土地结构，让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进而收缩政府征地范围等，但是考虑到土地改革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性，最近几年土地改革的实际进展并不大，此次通过住房租赁尝试土地改革破冰，或许也能为未来更大力度的农村土地改革积累更多的经验。

最近几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鼓励农民进城，但是农民进城之后需要巨大的社会保障成本，成为新型城镇化推进的一大障碍。对于农民而言，尤其是一些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宅基地和房屋是最大的潜在财富，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无法自由流转，农民的潜在财富并没有变现的途径。此次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建设出租房，虽然土地所有权并未发生流转，但是农民可以通过出租的形式来获得回报，相当于在不触动现有土地二元模式下所做的一次小型土改。从短期来看，这种尝试可以为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农民进城之后，留在农村的土地资产可以重新盘活，为农民在城市的生活提供持续的现金流支持，提升农民在城市的生存能力，继而推进城镇化更快发展。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传真）
E-mail: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7 年第九期要目

封面话题

格万特豪斯四重奏的引力波

热点·观察　北极光的“调性”色彩
斑狐说乐　音乐是我们的坚固堡垒
专访　法国小提琴家卡普松：我不喜欢大起大落的人生
话题　听“马勒七”——坐不住的观众依然勇气可嘉
神的恩典——现代文明的疑惑和希望
小谈阿巴多《献给塔可夫斯基》唱片
爱乐笔记　法国作曲家圣-桑访谈
涂鸦马勒——一张消失了的照片
始于“伴奏王子”——哈蒂其人
早期音乐　珀塞尔家族中的音乐家（三）
20/21 世纪音乐　声音的魔法师
乐史空间　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自序
译文选萃　真实的老柴第一钢琴协奏曲
浮生碎乐　顾圣婴先生80冥诞祭
蔵蕤爱乐　晚安，革命练习曲
作曲家与作品　对舒曼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和《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的解读
人物　波兰指挥家斯克洛瓦切夫斯基访谈录（上）
唱片说明书　希夫的1974年第五届柴科夫斯基比赛录音
资料库　第二十七辑 舒伯特与施莱格尔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
听购收　英式巴洛克和古典主义音乐（中篇）
专题　真实的托斯卡尼尼（七）
爱乐往事　北大爱乐故事（五）

《爱乐》2017 年订阅须知

2017 年《爱乐》月刊，每期 160 页，全年 12 期，零售单价：20 元，全年定价：240 元。

2017 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店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视觉中国供图）

2015 年 7 月 16 日，在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圣克鲁斯岛上，科学家们在为海洋鬣蜥做监测

加拉帕戈斯群岛被扣的中国渔船

主笔 ✎ 杨璐

“鱼翅逻辑”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事件吸引眼球的外壳，真问题则是随着中国远洋渔业发展而生出的摩擦。

渔船上的鲨鱼尸体

当地时间 8 月 13 日早上 6 点左右，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的巡逻船在雷达上发现了某船侦测点，因为这片水域必须获得许可才能行驶，巡逻船通过无线电对发现的船只进行询问。船只并没有进行回复，巡逻船上的达尔文基金会佩拉约·萨利纳斯博士同其他 3 名船员跳入充气橡皮艇追赶，他们发现这是一艘中国渔船，并且怀疑它可能与非法捕捞有关。

充气船并不适用于高速追捕，总部又派出了一架海军直升机和一艘海岸警卫艇，最终拦扣了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福远渔冷 999”。萨利纳斯博士事后对外描述，这艘渔船是冷冻运输船，有 90 多米长，6 个货舱，其中大部分已经装满。从现场拍摄的货舱照片里，他认出货舱中除了金枪鱼，还有双髻鲨。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从 2014 年 9 月 14 日起，长鳍真鲨、路氏双髻鲨、无沟双髻鲨、锤头双髻鲨、鼠鲨五种鲨鱼和前口蝠鲼属所有种类被列入公约附录Ⅱ，接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1

（视觉中国供图）

2

（视觉中国供图）

3

易公约保护。

厄瓜多尔海军在第二天就把抓捕现场的照片发到了推特上，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的相关人员也把事情经过发在了网络上，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事发地加拉帕戈斯群岛无论对于厄瓜多尔人还是全人类的动植物研究都太敏感。上海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鑫事发当时正在加拉帕戈斯考察，他告诉本刊，这个群岛是火山形成的，历史很短，上面的物种是从美洲迁移过去，又因为它距离海岸线接近 1000 公里，一直没有现代人类居住，直到 1535 年才有人登岛，所以，人类活动对它的惊扰很小。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上面的物种又珍稀又特别。1835 年，达尔文登岛考察，收集了很多标本，对他写出《物种起源》有深刻的影响。

除了是给达尔文《物种起源》以灵感的地方，加拉帕戈斯群岛还是世界上很出名的观看鲨鱼的区域。它周围海域有富饶的生态系统，根据萨利纳斯博士的研究，这里的鱼类生物量为平均每公顷 17.5 吨，是生物量丰富程度排名第二的科科岛的两倍。它也拥有种类丰富的鲨鱼，何鑫说，跟其他水域相比，保护区更安全，并且水域比较浅，会有很多野生动物到这里来产卵。一些鲨鱼会在这里度过最年轻的时期，再到比较深的水域里去。

这个被称作达尔文和上帝分手的地方，在上世纪 50 年代被划为厄瓜多尔的国家级保护区。虽然是厄瓜多尔的一张名片和旅游胜地，但是登岛必须要经过申请。“不能携带任何植物种子或者有生命的东西到岛上去，出岛的时候，也不能携带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回来，包括在当地纪念品商店买的标本，出海关的时候被查到也要没收。登岛有时间限制，也划定了游览路线。遇到野生动物，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便它走到你的游览路线上了，也要保持距离。它上面的野生动物完全不怕人，但是绝对不允许抚

1. 巴托洛梅岛位于圣地亚哥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一部分

2. 2017 年 8 月 25 日，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内停泊的被扣押的渔船“福远渔冷 999 号”

3. 2015 年 5 月 28 日，厄瓜多尔内政部展示警方没收的鱼翅

摸着合影。”何鑫说。在群岛的海洋保护区范围内，不允许工业化捕鱼、采矿和石油钻探，因为保持原始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可贵的科研价值，为厄瓜多尔带来世界性声誉，也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根据国家地理学会的“原始海洋”项目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研究，加拉帕戈斯地区的每一条鲨鱼因为潜水和旅游业，在有生之年价值540万美元，一条死鲨鱼只值200美元。

虽然“福远渔冷999”只是冷库运输船，并不用来捕鱼，可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驶入这样有利害关系的水域，冷库里躺着6000多只割掉鱼鳍的鲨鱼尸体。这个场面自然让人联想到，鱼从哪里来，鱼翅又去了哪里。

标签化的鱼翅贸易

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非法渔船事件的网络内容里，很容易就能看到人们穿着“Save a shark，eat a Chinese”T恤的图片，这种极端情绪发源自中国人与鲨鱼最出名的联系，把鲨鱼鳍加工成鱼翅，就成了中华料理中的高级食材。早在明代中期以后的文献里，就有了对鱼翅的明确记载，《本草纲目》评价它“味并肥美，南人珍之”。到了清朝更成为宫廷和上流社会的美食，咸丰十一年（1861）除夕，即位不久的同治皇帝的晚膳菜单上有攒丝翅子，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孔府进献的两桌寿宴中有鸡丝翅子，桂花翅子和葫芦大吉翅子。鱼翅贸易业从清朝开始兴盛起来，从阿拉伯湾到马来群岛的每一个海岸国家都向中国出口鱼翅，而现在的新加坡当时是鱼翅转口贸易的一个中心。

这种被打上昂贵的、奢侈的标签，并且“另类”的饮食习惯，很容易具有国际传播性，但它的逻辑又与象牙或者虎皮不同。并不是所有鲨鱼都列入了濒危野生动物的名单，国际上对鲨鱼的态度是可以利用、消费，但必须是可持续性的。香港护鲨会总干事周婉苹说，对渔民来说，鲨鱼的经济价值不如金枪鱼，即便是针对鱼翅专门去捕杀鲨鱼，成本和收益都不划算，更多的情况其实是作为兼捕的鱼获。远洋渔业中有两种渔法，一种是延绳钓，一种是围网。延绳钓是在船上装有巨大的尼龙线卷轴，尼龙线上是成百上千的带诱饵的鱼钩，这种渔法捕捞的目标是经济价值高的金枪鱼等品种，但这些上钩的金枪鱼又会吸引来大量的鲨鱼。围网法的原理是用比较大的网把整个鱼群围起来，在用这个渔法的时候，会用一些人工手段把鱼群聚集起来，鲨鱼或者其他的鱼种也可能被吸引进网。

> 对于每只渔船来讲，存储空间有限，运输成本高，可是鲨鱼的经济价值低，理论上，这些要求整只带回的规定其实促使人们减少兼捕。但实际情况是，管理非常难达到要求。

一旦兼捕到鲨鱼，放生的存活率不高，所以如何处置兼捕的鲨鱼和减少兼捕发生，是保育鲨鱼的关键。现在国际性管理组织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都出台了很多计划和规定来保育鲨鱼，最常用的方式报告所有鲨鱼鱼获数据，除了头、内脏和皮以外，鲨鱼所有部分必须保留到首次上岸地点，首次上岸时鱼鳍重量不能超过船上鲨鱼重量的5%，禁止违反规定保留、转运和运输鱼鳍，鼓励释放误捕活鲨鱼，特别是幼鱼，鼓励研究选择性渔具，确定鲨鱼育幼区等。周婉苹说，对于每只渔船来讲，存储空间有限，运输成本高，可是鲨鱼的经济价值低，理论上，这些要求整只带回的规定其实促使人们减少兼捕。但实际情况是，管理非常难达到要求，因为公海上控制渔民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并且鱼获可以在海上转运，根本无须到当地港口上岸。“国际上针对其他鱼类的保育推行起来都效果有限，保育鲨鱼更是困难重重。”周婉苹说。

在这种背景下，鱼翅贸易就存在了争议。持有“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观点的人认为，鱼鳍晒干加工成鱼翅所获得的经济价值，使得渔民不会砍断鱼线，放生鲨鱼，而是割下鱼鳍，把鲨鱼抛回大海。绿色和平组织的潘文婧曾经参与过西非渔业巡逻，她告诉本刊，渔民把鱼鳍割下来，就会直接放在自己船上晒干，晒干的鱼鳍很小，不占地方。执法人员上船检查的时候，藏在箱子里、麻袋里都很方便，不容易被找到。鲨鱼的信息本来就不透明，执法力度也不够，周婉苹说，香港是鱼翅贸易的中心，她所在的组织并不反对鱼翅贸易，但这种不规范的现实中，如果能减少鱼翅消费，就能让渔民减少了兼捕的动力。

中国内地的鲨鱼专家们持有另外的观点，既然鲨鱼是可以利用，并作为兼捕的副产品，那么吃鱼

翅就是节约资源。“全球鲨鱼产量基本上稳定在每年70万到80万吨，跟中国人吃不吃鱼翅没有关系。吃鱼翅导致鲨鱼濒危是个伪命题。”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戴小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2009年发布的《中国鲨鱼产业报告》中，鲨鱼捕捞排在前列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西班牙、阿根廷、美国、日本等，前15位的国家和地区捕鲨量占全球的70%多，中国内地排在15名之外。鲨鱼肉在欧洲、美国、中东等地被用来食用，鲨鱼皮可以做皮革制品，鲨鱼肝油用在保健品或者化妆品原料，它们跟鱼翅同样都是捕杀鲨鱼之后的利用。根据中国两份鲨鱼行业报告，2011～2013年，鱼翅销售量逐年下降，批发价也从顶峰时期跌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可全球的鲨鱼捕捞量还是稳定的，没有减少。

远洋渔业发展中的摩擦

“鱼翅逻辑”是这件事吸引眼球的外壳，真问题是随着中国远洋渔业发展而生出的摩擦。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张显良对媒体表示，根据中方掌握的信息以及厄方提供的信息，船上的300吨渔货是从距离厄瓜多尔专属经济区1200海里公海上的台湾渔船“HAI FANG301”“HAI FANG 302”转载来的。“福远渔冷999”是因避风而进入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没有证据表明该船在厄瓜多尔海域有捕捞和转载行为。

根据非营利组织SkyTruth对“福远渔冷999”的AIS数据分析，这艘船在7月7日从福州起航，直接穿越太平洋，全速驶向厄瓜多尔。8月5日，在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以西1700英里（约等于2736公里）的东太平洋，“福远渔冷999”的速度降了下来，并在这之后的三天里只是缓慢移动。同时，有“福远渔7866”“福远渔7861”“福远渔7865”“福远渔7862”与它相随，最近的距离只有30米，每艘船接近的时间要花上12个小时。SkyTruth没有找到两艘台湾渔船“HAI FANG301”“HAI FANG 302”的数据。它分析“福远渔冷999”同这四艘船的航迹，说明这种长时间的海上汇合可能是有大量的货物在转移。潘文婧查阅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的数据，这四艘船都在这个区域组织中有登记，在它的海域范围内捕捞金枪鱼。

远洋渔业里这种转运很常见。渔船经常是一周7天，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下网捕鱼，它们无须靠岸，利用“福远渔冷999”这样的冷藏运输船，就可以把鱼获带走，捕鱼船则在海上停留几个月，节约时间和燃料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不过，远洋渔业的研究者们也认为，转运会使得合法捕捞和非法捕捞混合，增加监管的难度。

“福远渔冷999”在8月12日到达了加拉帕戈斯的边缘，因为避风进入海洋保护区，在8月13日早上被厄瓜多尔巡逻船发现并拦截。对于关注到这条新闻的普通人来讲，中国渔船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捕鱼好像很惊人，可实际上中国已成为全球海洋渔业第一大国，远洋渔业作业海域分布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和南极海域。潘文婧一直关注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她告诉我说，中国近海渔业资源越来越少，可人口基数大、对海鲜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只能到远洋去补充国内的水产需求。

除了需求驱动，政府的走出去战略和海权意识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潘文婧说，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会给远洋渔业各种形式的补贴，力度不小。跟“福远渔冷999”所属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上市公司平潭海洋CFO曾经在答复投资者时解释，如果是捕捞船更新改造，国家给予造船价30%的无偿补贴，地方政府给予30%的无偿补贴，国开行还会给40%的低息长期贷款。船出海后每年还有经营性的补贴，从前以油补的形式，现在改叫国际渔业资源补助，每艘船每年能得到700万到1000万元。

因素叠加起来让中国远洋渔业崛起很快，周婉苹说，因为渔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传统的远洋渔业大国有萎缩的趋势，中国远洋船队则越来越大，是这个行业里新来的大户。此消彼长之间，本来这个行业的透明度和国际执法力度就弱，违法成本低，被抓住的概率也低，新的渔业大国对需要掌握的法律规范也不熟悉，主观客观的违规、钻空子就频繁发生。“福远渔冷999”并不是唯一一例，中国渔船和管辖国的冲突层出不穷。潘文婧说，参与西非巡航时遇到很多船员，都不是渔民出身。有很多内陆人考个证件就上了船，对他们来讲就是打一天工赚一天钱，环保意识、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意识并不强，甚至对管辖国或者区域的法律都不清楚。虽然有派当地人作为观察员登船监督，但因为语言、文化不通，观察员所起到的监督作用很有限。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更加严格地监管远洋渔船，对国际形象影响很大。

人脸识别与主流应用，准备好了吗？

记者 王梓辉

虽然要等到美国当地时间 9 月 12 日上午 10 点（北京时间 9 月 13 日凌晨 1 点）才会正式揭晓，但 iPhone 8（暂定名）将会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取代指纹识别已经在科技圈内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尽管此前，我们已经能在支付宝登录及各种美颜相机中体验到人脸识别的功能，但苹果的认可也许意味着这项技术真正开始进入主流的应用体系。

人工智能行业的“急行军”

“iPhone 8 的发布会将人脸的应用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国内专注于计算机视觉领域相关研究的创业公司旷视科技（Face++）对本刊说道：“基于 iPhone 8 的摄像头，人脸的安全程度会超越解锁，接近于支付级别。因此，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人脸终会代替指纹，成为手机通用的生物认证方案。”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个看法，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随着 iPhone 8 的发布，人脸识别技术正在成为未来短时间内最炙手可热的技术之一。

简单来说，人脸识别技术指的是通过比较人脸的视觉特征信息从而进行身份鉴别的技术，既属于图像识别，也属于生物特征识别，是人工智能领域一项典型的细分技术应用。

如果你喜欢自拍，那你一定用过一款名为“Faceu”（激萌）的手机 APP，根据第三方机构易观千帆的数据，其月活跃用户数已经达到了 4100 万，而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实现的“动态贴纸”功能是其最大的亮点。为 Faceu 提供相应技术支持的是国内从事计算机视觉相关研究的创业公司商汤科技，两个月以前，他们刚刚宣布获得了 4.1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这是截至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市场单轮最高融资，而人脸识别技术则是其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而在去年年底，旷视科技则已经获得了 1 亿美元的融资，主要投资者包括富士康和建银国际。而他们也通过为支付宝等阿里系产品提供面部识别系统为市场所熟知。除此之外，云从科技、依图科技、深醒科技等人脸识别玩家在近期均获得了千万美元级融资，连国内最积极的人工智能旗手李开复也惊叹这个细分产业“竟然能养活四只独角兽”（“独角兽”表示估值达到 10 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李开复所指的“四只独角兽”分别是旷视科技、商汤科技、云从科技和依图科技）。即使是在这两年风头最劲的人工智能行业，这也足够令人咋舌。

“目前这个领域的投资热度不减，但还是趋于冷静的。”市场研究机构 IDC 人工智能领域分析师刘艳霞这样对本刊评价人脸识别领域目前的市场投资情况，在他们看来，“热度不减”是因为在目前市场应用还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新的应用场景亟待开发，里面有大量的机会存在。“趋于冷静”则是因为在已有的赛道内已经聚集了不少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这个时间点，后面加入的一些公司相对来讲就处于一个比较劣势的地位，可能你很难再有机会能够追赶上来。”邓亚峰对本刊如此说道，他来自国内另一家计算机视觉领域创业公司格灵深瞳。

根据国海证券研究所行业报告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人脸识别主要应用领域市场规模，公安领域 16 亿以上、交通领域 50 亿以上，金融领域百亿级别、教育领域百亿级别，在不考虑大安防硬件存量市场的前提下，整体市场规模就达到数百亿。

而安防市场的广阔前景则是人脸识别技术目前的最大战场。根据中安网数据，中国安防行业市场规模从 2012 年的 3240 亿元增长到了 2016 年的 54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惊人的 15%，而其中 2016 年视频监控产品的产值就达到了 962 亿元。而这也是云从科技创始人周曦的信心来源，去年他就曾经公开预测“未来 5 年之内，国内人脸识别的市场规模要达到 1000 亿元”。

来自第三方研究机构的刘艳霞没有周曦那么充足的自信，她认为单纯的“人脸识别”可能达不到 1000 亿的规模，但如果把所有上下游的硬件摄像头与软件服务都算上，那就没问题。“在安防领域，如果算上软件及人工服务，一个摄像头的投入可能会达到 10 万元，那 100 万个摄像头就有 1000 亿元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首席项目开发经理陈刚

而 100 万个摄像头也就是一、二线城市普通摄像头投入的规模，所以这样算的话，一个城市可能就有 1000 亿了。”而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来看，“1000 亿”显然是一个有些夸大的数字。

格灵深瞳 CTO 邓亚峰也对本刊表示：“如果提供的只是核心算法或者提供一些核心的人脸识别设备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没有到千亿这个规模，但它可能带动的市场也许真的能有这么大。”

政府的支持则是另一股助推剂。2015 年以来，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为人脸识别在安防、金融等领域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扫清了政策障碍。比如 2015 年 4 月，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其中提到“未来网络化精细管理是平安城市和智能交通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人脸识别技术则是这一切实施的重要技术基础。

同时，政府采买本身也是这个领域目前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中公安系统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头，你几乎可以从每一家相关创业公司的官网上看到他们和不同地区公安部门的合作协议。IDC 中国人工智能研究总监张卓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为国家安全提供智能监控系统给了这些人脸识别领域的初创企业在起步时的巨大助力。他同时表示，中国每年公共安全预算充裕，这使得这一领域的公司创收也较为容易。

“3·15”的打击证明它还没有完全成熟

事实上，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个分支，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可能至少有 50 年的历史，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最早一篇论文发表于 1967 年。但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相关的研究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太大的进展。“1998 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建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成立的组就是视觉计算组，那时候计算机视觉应用非常少，很冷门。”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百宁博士此前就对本刊记者这样说道。但到了 2012 年，深度学习技术的出现才真正让整个人工智能领域看见了可用的曙光，识别率逐年上升。目前，顶尖的人脸识别算法在“一对一”人脸验证的场景下准确率已经超过了人类的平均水平。

LFW（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 Home）是

国际权威的人脸识别数据库，它是为了研究非限制环境下的人脸识别问题而建立，里面包含超过 1.3 万张人脸图像。目前，在这个数据库的测试结果中，几乎全球顶尖团队的准确率都超过了 99%。“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上的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了 99.7% 以上，这个准确率已经比绝大多数人类的识别率要高了。”陈刚对本刊说道，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首席项目开发经理，目前主要负责人脸识别技术的工程开发工作。

当然，在测试环境下得到的数据并不意味着人脸识别在技术上已经完全成熟。“要看测试数据集的表达能力是否与目标场景的数据情况和使用要求相匹配”，陈刚解释道，由于 LFW 这样的数据库中的测试内容是固定的，所以很容易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如果现在去做视频安防类的测试，它的那个数据集就和这个数据是不一样”。而根据邓亚峰提供的数据，在更加靠近现实的视频动态人脸识别场景中，现有的人脸识别也只能在理想场景中达到 60% ～ 70% 的水平。

作为应用在登录、安防等领域的技术，是否可靠其实是普通用户最关心的事，但在年初的央视“3•15”晚会上，人脸识别的相关技术漏洞却被当众曝光。在演示过程中，一张他人的静态自拍照，通过技术处理，可以变成能眨眼睛、能微笑的“伪活人”；而借助 3D 建模技术，这张自拍照还能让自己“变脸”成另一个人，轻易骗过登录系统。一时间，关于人脸识别是否足够安全的话题也让很多用户担心。

但在这个行业内的专业人士看来，“3 • 15”晚会所曝光的问题既反映了人脸识别技术上的不够成熟，也反映了很多应用厂商在技术使用上的不负责任。

从技术上看，目前人脸识别技术主要分为 2D 人脸识别（包括彩色图像，红外图像）和 3D 人脸识别。2D 人脸识别是在彩色图像上的识别方法，主要优势在于检测数据获取方式便捷，同时目前算法相对成熟，是目前主流的技术应用方向。但“3 • 15”晚会上的案例已经暴露了在安全性要求高的场景下，靠单一人脸识别算法来身份验证的使用方式是不够安全的。由于人脸在 2D 维度的投影会使得部分有效信息缺失，所以容易被犯罪分子攻击。

而 3D 人脸识别方法是基于人脸 3D 立体模型进行识别，充分利用立体空间信息，能有效解决 2D 识别的遮挡以及角度旋转等识别难点，识别精度较高。传言 iPhone 8 将使用的“3D 结构光”技术就属于这一类别。旷视科技工作人员对我们说道：“如果结构光属实，那这项技术将可以抵御所有的翻拍攻击手段（例如屏幕翻拍照片、翻拍视频、纸张打印、相片打印等），因为翻拍攻击的都是 2D 人脸画面，而结构光能有效分辨出 2D 人脸和 3D 人脸。”目前 3D 人脸识别的问题主要在于数据采集相对困难，采集数据量十分巨大，对计算机的计算存储能力要求较高，在商业化上仍然不够成熟，但也许会是未来的主要方向。

但更严重的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如何使用技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没有解决好某一些相关的技术，比如活体检测的相关技术，那可能它就不适合在这样的场景下去应用，但是有些人可能就要这样用它，这就会造成一些潜在的风险。”邓亚峰说道。同时，他也强调人脸识别还不是一项完全成熟的技术，不应该被使用在任何场景下。

而陈刚则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安防场景其实有不同的要求，就需要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所有安防环节都要依赖于场景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设计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是一个思路。“我们人脸这个圈子基本有一个共识，就是作为‘人脸’这种生物识别的话，作为单一技术去做高层级安全水平的安防，其实是有挑战的，提高安全等级的通常做法是结合其他验证手段、信息一起验证。”

为支付宝等金融产品提供身份认证服务的旷视科技也持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单摄解锁的场景下，他们的技术“已经可以应对大部分的攻击场景”了，因此用于解锁是够用的。然而，“到了支付级的安全程度，则需要依赖硬件（摄像头）的加持”。

而归根结底，“场景”才是所有安防服务的核心要素，陈刚就认为要在“用户可以通过”和“能够防止攻击”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比如在一些不涉及财务及敏感信息的生活娱乐服务中，目前的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够用了，但在支付这样的场景中，多种验证方式并行也许才能确保用户的安全。

在实际应用中还有很多路要走

不同于各个计算机视觉领域内的创业公司，微软亚洲研究院一方面专注于纯粹的技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借助自己庞大的业务线面向全球的普通用户率先推出了一些相关的应用尝试，Windows Hello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如果你用过Surface Pro 4这款平板电脑产品，那你一定使用过由Windows Hello所提供的面部识别解锁功能，不需要手动输入密码，只需双眼平视摄像头就能在大概一两秒内解锁电脑。虽然在一些光线条件限制的情况下会出现识别失败的情况，但总体的使用体验已经基本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了。“在商用电脑的使用场景下是一个相当牢靠的登录方式了。”陈刚对本刊说道。

但除了“安防”这个人脸识别技术的天然应用场景之外，作为生物特征识别领域的一项分支技术，人脸识别在其他应用场景中面临的竞争还有很多。

事实上，自从苹果在2013年率先在iPhone 5S上开始使用指纹识别解锁之后，指纹识别直到今天都还是市场及用户接受度最高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此前，由于没有配备指纹识别功能，罗永浩在2015年底发布的锤子T2手机就在市场上招来了很多用户的不满。

而从“生物特征识别”这个更大的概念来看，除了指纹识别、人脸识别之外，还包括虹膜识别、声纹识别以及指静脉识别等多种细分技术。其中，指纹识别、人脸识别和虹膜识别既同属“图像识别”，又是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所以他们目前各自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三星公司在去年下半年推出的旗舰产品Galaxy Note 7因为爆炸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他们却是全球第一款使用了虹膜识别技术的大众级智能手机产品，在今年推出的Galaxy S8中，他们继续使用了这项技术。相比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由于虹膜在胎儿发育阶段形成后，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基本保持不变，所以这也决定了虹膜识别拥有极为精确的特点。但作为面向用户的识别方式，因为虹膜识别要求用户必须睁大眼睛近距离对准摄像头，所以它在使用体验上不够友好。

邓亚峰对本刊承认，如果用户愿意接受使用条件的约束，“虹膜识别的成功率要比人脸识别更高一些”。但它在识别率已经达到实用要求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得到大规模应用的重要原因就是“不够易用”。旷视科技也认为“总体而言，人脸解锁的速度更快(毫秒级别)，体验更好”。

至于指纹识别，它的优缺点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体会。而几乎所有的人脸识别厂商都强调“非接触”是人脸识别区别于指纹识别的一大优势，既有便利性上的提升，同时也是最自然的一种解锁方式。

但就未来的市场应用来看，究竟哪种技术会成为用户使用的主流还并不那么确定。

作为手机行业的资深观察者，蒋鸿杰认为仅就手机而言，如果“屏下指纹技术”能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达到成熟，那它可能会成为更受手机厂商欢迎的方案，毕竟它一方面符合用户已有的使用习惯，同时也满足了解放屏幕空间的目的。但如果屏下指纹技术无法在短时间内成熟，“那可能大家就都转向3D结构光，把指纹抛弃掉”。而IDC中国研究经理金迪则对记者表示，“像人脸识别这样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肯定会是未来的主流趋势”，她同时认为长远来看，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硬件厂商加入人脸识别的行列。

微软作为更加专注于研究方向的大公司代表则表现得更为谨慎。他们认为从目前来看还很难说会有哪一种技术占据主导地位，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多种生物识别技术的结合”。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CEO徐立博士认为，推动新的交互方式的重点还是“如何在应用场景中定义问题”，“只有搞清楚了每一个应用场景下使用人脸识别是否能带来更好的效果，然后在技术层面上实现突破，达到工业应用的红线，用户的使用体验才能获得平滑的升级”。

而急需解决的最大问题既来自技术上的持续提升，更来自整个产业的探索。但作为一个还处于发展阶段的技术，不同的公司各有自己的想法。

“我更认同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要做到垂直领域中，结合这个领域的情况去解决这个领域的问题，而不只是提供一个标准化的人脸识别技术。”邓亚峰说道。作为一家创业公司，他们觉得自己相比大公司的优势就是可以深耕某一个细分领域，比较灵活。

徐立给我们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它可以用于银行、餐厅等线下服务行业，针对前来的顾客进行身份识别，当遇到VIP客户时，便可自动激活后续的定制化服务机制，如此一来，VIP客户将不需要主动出示VIP会员卡，大大增强了用户的体验。”

而微软这样的公司则有更开阔的目标。除了“更快更准更安全”的大方向之外，“我们希望我们现在这个AI算法能够像人一样去认知周围的世界，然后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用的工具，它未来能够帮助这些设备更智能。”陈刚如此说道。

摇滚的“新晋网红”：黑豹乐队 30 年

记者 吴丽玮 摄影 蔡小川

（蔡小川 摄）

黑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30周年纪念演唱会彩排现场

“谁知道哪片云彩下雨呢，真是想策划也策划不了这么好的营销事件。”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新网红赵明义

黑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30周年纪念演唱会前夕，有项订票网站上统计出的数据，购买门票的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就是说，黑豹乐队出道的时候，这群观众还未出生。听起来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黑豹乐队多么渴望走出窦唯时期先入为主的印象，那只是黑豹的两年，但直到现在还在被人反复念叨，也再没有哪首歌能超过《Don't Break My Heart》和《无地自容》两首至尊金曲的影响力。

但年轻人的到来并没有改变黑豹乐队留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坚持要让新歌占据表演曲目的绝大多数，于是换来了舞台之下的平静。而只有在老歌终于奏响时，现场才真正被点燃，全场大合唱“Don't break my heart，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两首让黑豹演绎无数次直至早已厌倦的作品，观众也几乎做到了倒背如流。

年轻人承包票房的局面恐怕会被归结为老鼓手、新网红赵明义一次无心插柳的力挽狂澜。我们约好见面的前一天，采访被他临时取消了，当天晚上他在朋友圈发消息，黑豹演唱会门票已全部售罄。“本来想让你们上周发稿，能帮我们多卖点票，现在用不着啦，卖得一张票都不剩，最后我们还回购了好多送给合作单位。”最终我们跟赵明义在机场见了面，在演唱会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跟着他们去青岛参加一次商演。“你说你们这些媒体，我之前求着你们来，你们都不来，现在一窝蜂扎过来，我这边时间都排不开。”

确实，如果不是因为他拿着保温杯走红网络，演唱会这个事，于媒体于歌迷，吸引力似乎都不算大。

“您的保温杯呢？”我看赵明义如此开门见山，自然也不必担心他会因保温杯引发的“中年危机”大讨论而恼火。“我只有在录音棚才用保温杯，而且

（卢北峰 摄）

黑豹乐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出（摄于 1993 年）

就拿它泡点茶喝。这事儿能不能过去了？”赵明义苦笑，“不过现在的商家反应太快了。”保温杯这个梗一火，保温杯品牌马上推出了黑豹版限量款，赵明义接电话时于是又多了一个被调笑的点，“限量版保温杯啊，我一定给你留一个”。全国最大的枸杞基地也在微博上私信他想谈合作，“但我不泡枸杞啊！”

50 岁的赵明义自从“网红”标签加身，潜藏在身体里的“摇滚愤怒”便开始勇敢地往外喷。“怼网友”是他最近在演出期间最乐此不疲的事儿。30 周年演唱会进入倒计时，依然有很多网友忘不了窦唯时期的黑豹，根本不在乎之后他们的努力，这一次积郁多年的话终于说了出来：“音乐没有好与不好，只有喜欢或者不喜欢。小窦每年都有专辑面世，你不去好好听，天天跑到黑豹这儿骂来骂去？你觉得有意思吗？你生活得不如意，别在我这找存在感！”跟网友怼了半宿，第二天赵明义依然神采奕奕。“我把他们咔咔全都骂回去了。所有话都说完，我把文章全删了个光，让他们想骂也没处骂去。”语气像一个得胜的小孩。

虽然觉得很意外，但“网红”的感觉挺不错的。最初只是采访他的摄影记者的戏谑，“不可想象啊！当年铁汉一般的男人，如今端着保温杯向我走来”。老哥儿也不恼，索性在排练室里举着保温杯拍了张照，自己发微博：“听说我的保温杯火了？”花白头发、涂鸦 T 恤和有些中年发福的肚子，引出了各种探讨中年危机的帖子。“反正我没中年危机。”赵明义意犹未尽地开了保温杯番外篇——国产小电驴，“我喜欢开摩托，但我没本儿啊，只能骑小电驴。那天接受完媒体的访问，我骑着小电驴从他们眼前开过，我看见那些记者眼睛都直了。”赵明义发张自己骑小电驴的图，做成电视购物的样式：“赵老师亲情代言，今天只要 998。前 100 名订购观众还送赵老师同款保温杯。”

当然他也要有意无意地透露些自己的真实情

况，大多在朋友圈里。他转发朋友在公号里写的一篇自己私生活的“大起底”：赵老师早已获得美国绿卡，美娇妻和一双子女已经在洛杉矶生活，配了好多两口子秀恩爱的美美照，还有他在美国买的豪车豪宅。微信里的朋友们看着都乐哈哈，越发觉得老赵这人有点儿意思。

铁打的“三大件”，流水的主唱

他们去青岛参加的是啤酒节的闭幕式，在海边圈出一大块地，不同啤酒品牌各搭一个临时的大棚，分别请些表演嘉宾助兴，闭幕式则在中间一个最大的露天场地上举行。这样的演出对黑豹来说非常轻松。乐队不需要彩排，演出前一晚调音师检查设备、调试音响即可。原定要唱八首歌，五首新歌加三首老歌，因为晚会时长问题，演出当天临时改成了只唱三首，两首新歌加一首老歌。“无论去哪，总是想让我们唱老歌，我谈合约的时候都会明确说，唱老歌可以，但是必须新歌比例更大。”赵明义说。

黑豹作为压轴嘉宾最后登台，在他们前面出场的是在央视平民选秀节目中走红的一位女歌手，载歌载舞，但是全场反应极平淡。演出前，主唱张淇戏称“这就跟玩儿似的”，没想到乐队弹出第一个音，所有人都立刻变了脸。调音师调好的音响被主办方弄乱了，乐器的声音极大，不但把哥儿几个几近震晕，也把张淇的声音完全淹没。三首歌唱完，已经气爆了的张淇举着麦克风大骂，“什么他妈玩意儿！”不过音响设备实在太差了，台下一点儿都没听到。全场报以稀稀拉拉的掌声，虽然完全不能跟演唱会上的阵势相比，但对比前面的演出，还是能够感觉到观众对黑豹的认可。

这就是黑豹乐队的商演日常——随便混混也很容易，但常有些极不专业的失误也会气得他们七窍生烟。

“黑豹乐队”的名字是1987年几个年轻人从大兴排练场走回前门的路上琢磨出来的，当时还是一群爱好摇滚的北京孩子在一起松散地玩，吉他手李彤曾经回忆说，最初他们想给乐队起名叫“黑马”，觉得有点俗气，李彤想豹子比较稀有，干脆就叫“黑豹”吧，于是中国摇滚史上最资深的乐队诞生了。乐队定名前，李彤和贝斯手王文杰都已经加入，他俩是黑豹乐队最最骨灰级的元老。

1989年，在军乐团当鼓手的赵明义也进入了这个“神秘的圈子”。“那时北京玩摇滚的就是这么一小撮人，后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分出去，周围再聚拢了一些新的人，我很想加入，但苦于找不到引荐人。”赵明义告诉我们，机缘巧合之下，他通过军乐团的同学，认识了当时在黑豹玩键盘的栾树，终于也跻身了摇滚圈。“是李彤带着我去听国外的摇滚乐磁带，能说出名字的有Bon Jovi、Pink Floyd，还有好多已经翻录过好几手，早就查不到名字了。”

乐队初创时原本由丁武任主唱，但他后来找到了更好的条件，离开黑豹创办了唐朝乐队。1989年秋天，黑豹听说一个民间乐团有个叫窦唯的歌手非常不错，大家去看了窦唯的演出。“觉得他很有范儿，唱得也好，还在台上跳霹雳舞。”赵明义说。双方一拍即合，窦唯加入黑豹当主唱，乐队留下了李彤、王文杰、赵明义和栾树，阵容齐整而稳定的黑豹乐队正式成立。

黑豹乐队成立时，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叫郭传林。他原本也是吉他手，后来开始专心做乐队经纪人。“最开始想法很朦胧，就是想找一些人组一个乐队。”赵明义说，郭传林是组建黑豹乐队最有力的推动者。“先认识了王文杰，王文杰推荐了李彤。那时弹吉他只是李彤的爱好，他正式的工作是在西苑饭店当服务员。没有他的电话，只能去他家里堵他，问他愿不愿意攒一个乐队。”除了寻找成员，为乐队拉赞助也全靠郭传林，在他的奔走之下，黑豹成为北京沙棘汽水厂下属的电声乐团，乐器设备的问题于是就解决了。“那个年代流行企业办演出队，通过演出可以给企业做些宣传。”王文杰向我们回忆说，黑豹在汽水厂的赞助之下参加的走穴演出渐渐多了起来，但是汽水厂本身宣传品牌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一年多之后，汽水厂觉得买卖不划算，把器材留给了黑豹，但不再跟他们继续合作。黑豹变成了演出市场上的散兵游勇。

1989年唐朝乐队参加了“深圳之春”摇滚音乐会，由于没有自己的作品，黑豹乐队没有获得邀请。王文杰说，这件事刺激了他们，第二年，他们带着《脸谱》和《无地自容》两首歌终于来到了“深圳之春”，1991年，他们又带来了《Don't Break My Heart》。香港经纪人陈健添曾在采访中回忆说，当时他签下的新艺人王菲给他打电话，问能否陪她一起过关去深圳看朋友的演出。“王菲让我给她爸爸打电话，知道我会陪她去，她爸爸才同意。”陈健添说。他一到音乐会现场吓了一跳，“包括‘宝丽金’在内的香港五大唱片公司都来了。那时候摇滚乐非常小众，香

港唱片公司又非常保守，没想到这些唱片公司老总都来看演出选人”。陈健添回忆，听到黑豹表演《Don't Break My Heart》，“我一下就觉得这歌会火的”。演出结束之后，王菲又让陈健添跟她父亲撒个谎，说没赶上回香港的末班车，只能在深圳逗留一晚，这样，他就跟王菲、黑豹乐队成员一起吃了夜宵。“我得知他们并没有签唱片公司，于是决定跟他们签约。”

黑豹乐队在与香港劲石唱片签约两个月后，开始录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里，窦唯、李彤、王文杰是创作主力。《无地自容》由李彤作曲，在他的描述中，一切都是妙手偶得。“排练完回家，从公交车上下来，20 分钟能走回家。路上先把副歌哼出来，回家赶快记下来，主歌顺着就出来了。”谱曲之后，李彤把作品交给窦唯填词，于是成就了这首不朽的名曲。第一张专辑《黑豹》里的歌词部分大多由窦唯来完成，他的创作才华又体现在完全由他包办的《Don't Break My Heart》《别来纠缠我》《怕你为自己流泪》等歌曲中。在乐队中总是很安静的王文杰创作了《靠近我》《眼光里》两首情感充沛的曲子，体现了他铁汉外表之下的柔情一面。

《黑豹》在香港发行之后，迅速风靡全港。“那时香港歌迷都以为我们是香港人，没想到内地也有这样的乐队。”李彤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在会展中心演出时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举一面 A4 纸大小的五星红旗，我们演出时她在台下一趟趟地跑过来跑过去。”等他们从香港回来，发现在内地同样也达到了殿堂级乐队的待遇。“我们都纳闷，专辑没有在内地发行啊，歌迷怎么知道我们的？原来我们还没从香港回来，专辑的盗版就在内地传遍了，甚至有朋友在拉萨都买到了不止一种盗版的版本。”李彤说。1992 年，黑豹乐队在昆明体育馆演出，歌迷们重重包围了他们入住的酒店。“楼层电梯口都需要保安把守，不然歌迷们全冲进来了。我们不敢下楼，歌迷们就在楼下不停地喊我们的名字，没办法，栾树签了一沓照片，只能从窗户扔下去。”

“我们都纳闷，专辑没有在内地发行啊，歌迷怎么知道我们的？原来我们还没从香港回来，专辑的盗版就在内地传遍了，甚至有朋友在拉萨都买到了不止一种盗版的版本。”

1991 年 10 月，在与黑豹完成了第一张专辑录制后，窦唯离开了乐队。尽管黑豹没有正面做过回应，但窦唯离开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大家都是兄弟，王菲是栾树的女朋友，事已至此，我们没法再合作下去。”成为网红后的赵明义敢于吐露更多心声。

窦唯离开后，栾树接任了主唱，在接下来的 4 年时间里，这支乐队完全被第一张专辑的光芒所笼罩。双方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是栾树酷爱骑马。在一场重要的演出前夕，栾树决定去内蒙参加马术比赛。“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台湾厂商在赞助乐器，条件就是每年参加一场他们的演出，如果爽约，赔偿会吓死人。在这种情况下，栾树还是执意要去参加马术比赛，没办法，只能换主唱。”赵明义说。

第三任主唱是秦勇，他是乐队里待得最久的主唱，时间超过了 10 年。对于 90 年代的歌迷来说，最有可能在各地巡演中看到的黑豹主唱就是充满爆发力的秦勇了。秦勇最终以照顾生病的儿子为由退出了乐队，但一位知情人告诉本刊，这只是一种托词，换主唱的真实原因是乐队当时看到了窦唯回归的可能性。网红之后，赵明义在微博上“怼网友”时也说过，2005 年他们确实曾经跟窦唯尝试过重新合作。对此李彤也向本刊回忆说，他们与窦唯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春饼店吃了饭，见面非常愉快，双方聊了整整一夜。“分开这么久，能在一起是最好的结果。”李彤跟窦唯约定在公主坟附近的一个排练场进行排练，“一排练傻眼了，窦唯坚持无人声的音乐，而且是纯即兴的演奏，跟我们要坚持的方向完全不符，等于说我们一开始接触时除了音乐都聊了，最后发现在音乐的理解上，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

接下来是唱京剧出身的张克芃担任主唱的 8 年。他是最有争议的一任主唱，在 2013 年黑豹录制新专辑前被换掉。接任者是现在的主唱张淇，年轻、帅气，表演风格是一股浓浓的欧美华丽摇滚范儿。他是乐队里唯一一个留长发的，不过也只是齐肩而已。当年在长城上拍 MV 时，乐队的老炮儿们一个个都是长发飘飘，现在有的是光头，有的是利落的短发．“我发现我也留不了长头发了。”无意中聊起这个话题时，张淇说，“以前我头发特别多，现在变少了。”头发的长度，也是他们之间年龄的差距。

何以 30 年

郭传林和黑豹的合作仅仅持续到 1994 年。当

时郭传林成立了经纪公司，旗下有了其他签约艺人。当沈永阁代表日本唱片公司 JVC 以 39 万元的价格买断黑豹第二张专辑《光芒之神》后，郭传林和黑豹乐队之间就这笔钱的使用产生了分歧。“那时的 39 万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我们希望能把这其中一部分钱用作乐队进一步发展的资金，但他把这笔钱用在签约艺人身上。”赵明义说。于是双方解约，黑豹乐队在此后 8 年时间里一直没有签经纪公司，有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危难成就了赵明义这个日后的金牌乐队经纪人。“那时候大家都在找门路，联系演出，最后是我找到的最多，理所当然就当了经纪人。”

1993 年和 1998 年，崔健和何勇分别在演出时因言论不当，导致公安机关对整个摇滚乐演出市场始终进行着严格的限制，摇滚乐一直没能成为官方主流，长期在民间游走。上世纪 90 年代的民间演出市场生机勃勃又混乱无序，王文杰和李彤就是在走穴时认识的。“一说北京站西大钟，我们都知道。”李彤说，当时组织演出的穴头也叫作“瓢把”，攒一台综合性的演出，要找一群唱歌、跳舞和说相声的演员，这些人可能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大家相约在北京站西边的大钟底下集合。“经常是好多个‘瓢把’都在那等自己的演员”。李彤说，80 年代中期演出报酬极低，“可能劳务费只有 10 块钱，而且‘火穴’少，‘水穴’多，有刘晓庆这样的腕儿的演出队就是‘火穴’，那些‘瓢把’哭着穷，演出还没结束就卷着钱跑掉的就是‘水穴’，被骗之后，我们还得自己解决回程的车票”。

黑豹走红之后，赵明义在帮乐队寻找演出机会的同时，也开始跟朋友们主动攒拼盘演出。“那时我家里一摞一摞都是演出主办方打的欠条。”赵明义回忆说，“到后来，就是必须钱全打过来，我们才让演员出发。有一次在绵阳演出，我在成都见着主办方，他老婆把项链、耳环都取下来，说自己实在是没钱了，能不能等演出结束再付钱。我跟他说：‘你敢从窗户跳下去，我就答应你。’其实我是试探他，他如果真站起来，我会一把抓住他，那就说明他确实没办法了。这个主办方呢，马上嬉皮笑脸起来，我就知道他是跟我玩心眼呢。”30 年的老江湖，靠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经验，也少不了危难时的仗义。“有一次在杭州开演唱会，开演前主办方写了 13 万元的欠条，我让他把车给我扣下。演出开始之后，看他确实拿不出钱了，只要不是跟我过心眼，欠的钱就不是大事。我把车还了他，欠条撕了，这事就算了了。”

一场演出通常是赵明义等人作为主办方，负责联络艺人，再由各地的大型演出商来承办。“他这些年一直在积累各地方上的合作伙伴的资源。办一场演出要接触三教九流，哪个都得罪不起，老赵脑子特别活络，到哪人们都特别认他。”赵明义曾经的演出合伙人王兵告诉我们。至于联络艺人这一块，难度并不大。林依轮的哥哥林东通过弟弟拿到了很多歌手的联系方式，他和赵明义在 90 年代一起搞过很多演出。“那时大家手里都各自有艺人资源，相互凑在一起就能联系到很多人。”林东从 2003 年开始不再做这一行。“其实啊我们占的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优势。90 年代最火的内地流行歌手出场费 10 万元，最火的港台歌手出场费二三十万。以前我们还能拿到这些港台明星的独家代理，到了 2000 年之后，港台经纪公司开始在北京开分公司，等于直接跨过我们。”

为了乐队的生存，赵明义不会轻易离开这个演出市场。前些天，他被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授予演员经纪人联盟顾问，另两个顾问称号给了田京泉和那辛，同时他还是 001 号高级演出经纪人，彰显着江湖大哥的地位。“这是跟黑豹在一起 30 年的历练换来的。”赵明义说，“之所以敢那样去怼网友，也是因为这几年底气足了，放到前几年还不敢这么去做。”赵明义也摔过不少跟头。十几年前，各地的演出市场都被《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等央视综艺演出节目所垄断。“有一次我跟朋友闲聊，评价《同一首歌》，我说它是种掠夺性的演出。‘地方政府邀请，提供当地服务，当地企业掏钱，最后全国播出，比花钱投广告效果强太多，演员的出场费又被压得很低。《同一首歌》所到之处，至少三年内不会再有其他演出的需求，这对我们打击太大了。’没想到旁边有个记者回去就写了篇稿子，孟欣看到了大怒，我被要求去找那个记者，请他撤稿，挽回声誉。最后黑豹还是被《同一首歌》封杀了。”那是黑豹最艰难的几年，只能寻找一些酒吧的演出机会，演出费也降到了每场三五万元。

艰难的时候赵明义开过网吧，开过火锅店，但黑豹始终没有解散。跟黑豹初次接触时，除了赵明义天然就很容易接近之外，乐队其他人多少都有些不太熟悉时的距离感，但消解掉这些也只需一顿酒就够了。酒上来不一会儿，乐队成员们就开始拿老赵开涮，“今天没有保温杯泡枸杞，但是有啤酒泡红枣”，咔嚓拍一张发微博，配的文字是“赵老师养生

（蔡小川 摄）

1

（蔡小川 摄）

2

（蔡小川 摄）

3

之道”。30 年下来，老哥儿几个交换一下眼神就可以默契地互抖包袱，吃饭时跟做东的青岛朋友逗闷子，明明他们想吃梭子蟹，几个人绕着弯非让朋友自己把话说出来。一会儿赵明义和李彤又表演起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一场饭局上偶遇，夹带着有些幼稚的好笑。最后几个人都喝得挺高兴，主办方本来配了辆商务车给黑豹，把他们送到饭店之后，赵明义就打发司机回家了。“让司机等我们几个小时不合适。我们就是从来不想给主办方添任何麻烦，所以才有了 30 年的好口碑。”喝好的哥儿几个叫了辆车，路上我问他们，你们是最好的朋友吗？李彤瞪着本来就很大的眼睛，“你觉得呢？ 30 年了！”

4

王文杰（图1）、李彤（图2）、赵明义（图3），三人被称为黑豹乐队“公务员”编制成员

4. 黑豹乐队准备登上青岛商演的舞台

李彤是乐队在音乐上的核心，被评价为是一个“从内而外的摇滚人”，喝多了酒，依然能从他冒出的几句对当下的不满中感受到一个艺术家的愤怒。赵明义就圆融很多。他真的很会为人，即便窦唯跟乐队闹掰了，但在私下仍能跟窦唯、王菲保持很好的关系。“那时王菲在俄罗斯大使馆旁边买了套两居室，我和常宽一起去他们家打麻将。”不过终归是要表现一些原则性，赵明义说，常宽坐他下家，他就故意喂牌给常宽，笑嘻嘻的，但还是想敲打敲打，不让窦唯和王菲胡牌。

因为老赵情商最高，乐队里开除人的事全都由他来操作，“换主唱都是李彤来评估，最后得罪人的事让我来做”。2012年，沉寂多年的黑豹乐队准备筹备新的唱片，从美国请来了录音师和制作人。当时正好有场黑豹、唐朝和黄家强联袂演出的“光辉岁月”演唱会，两个美国人看完演出后，在庆功宴上悄悄起了争执，赵明义上前询问才得知，两个人对主唱张克芃的意见不统一。“制作人跟我说：‘看了你们的演出，所有人都很棒，只有一个人是差的，就是你们的主唱。’他不同意让张克芃录制这张专辑，但录音师觉得这是乐队的事，录音师和制作人都不应该拿主意。”赵明义说，制作人表态说，如果不换主唱，他就没法帮黑豹制作专辑。低迷的商演环境还可以容错，一出唱片问题就没法掩盖了，最后乐队成员开会讨论，决定换掉张克芃。“张克芃走时，老赵给我打了40分钟的电话。”王兵告诉我们，“他非常难过。即便很多人都觉得张克芃有问题，但是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都没舍得换人。”

王文杰则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话不多也不爱应酬，但是在很多关键时刻决定了乐队的重大事务。“我们乐队从来都是一票否决制，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件事就办不成。”赵明义说，他们的某一任前主唱，现在经常仍以“黑豹主唱”的名义演出，“少了一个‘前’字，意思就完全不对了”。有一次这位前主唱要参加电视台的真人秀节目，节目组想邀请黑豹乐队一起参加，可以当面澄清，双方做个了断，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只有王文杰不同意。“劝了他几次，他都说不同意，只好放弃了。现在想想还是老王考虑得周全，我们去干嘛呢，还不是为别人站台。”窦唯当年离开乐队的时候，郭传林跟他达成

（蔡小川 摄）

（蔡小川 摄）

左图：为黑豹乐队制作最新专辑的混音师李军

右图：上世纪90年代与赵明义一起做商业演出的林东

协议，以后不许在外面唱黑豹的歌，此后人员流进流出，到底谁能代表黑豹一直都是乐队最看中的敏感问题。“我们已经把‘黑豹’注册商标了，商标权由我一个人拥有。”赵明义说，“就怕有人离队再生出事端。我给乐队免费做了20多年的经纪人，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吗？”

从小众到大众

1991年，在日本JVC唱片公司工作的沈永阁回到北京，想发掘本土的摇滚乐市场。“80年代是日本唱片业的黄金时代，我去了香港，发现全都在翻唱日本歌，回到北京，发现港台明星又对内地的影响很大，但我们想寻找的是原创的东西。”沈永阁说，“日本是追着西方市场走的，每个年代都受当时西方摇滚乐的影响，井然有序。但中国很闭塞，从西方接收来的有限信息是很混乱的，最开始那一小圈人听得很杂，他们的音乐也很难找到西方摇滚乐发展的规律性，这让我觉得很新鲜。”与JVC签约后，黑豹发行了三张专辑。

约期满后，双方没再续约。沈永阁分析说，从1998年开始，电视台开始大量播出MTV，办歌友会和娱乐节目，推动了流行音乐的大发展，相比之下，从未成为主流的摇滚乐界显得更加冷清。2002年，黑豹才重新签约唱片公司，在两年后发行了第五张专辑，此时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6年。但这张专辑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因为彩铃的横空出世，传统的获取音乐的渠道被颠覆性地改变了，娱乐策划人杜侑澎回忆说：“2000年我们帮许巍办唱片签售时，现场能来几百人，到了2004年，朴树的签售会只来了几十人。他们俩都是当时最红的歌手，只能说唱片这种形式不再受欢迎了。”

2008年，国家限制公款消费的规定结束了《同一首歌》垄断市场的局面，纯商业运作的演出模式回归。2010年，黑豹签约的风华秋实唱片公司决定办一场名为“怒放”的摇滚乐拼盘演唱会，找到了杜侑澎帮忙。“当时除了许巍的‘绝版青春’，所有的摇滚乐演唱会反响都很一般。前几年赵哥他们也试过其他的摇滚拼盘演唱会，但是都失败了，我觉得他们这一次有点不信命的感觉，想再赌一把。”

杜侑澎告诉我们，在赵明义等人找到他时，距离演唱会开始只有 20 天时间，但票房非常不理想，总投资是当时天价 500 万元，但是一个月只卖了十几万票房。“摇滚圈还是在炒作窦唯，长久以来都没有新鲜点，我们决定跳出来，以泛娱乐化的方式来做演出宣传。”杜侑澎告诉我们，当时微博已经兴起，他们首先做的是让明星在微博上发起有趣的话题。“赵老师跟于谦的关系很好，我们就放出消息，猜测现场可能会有郭德纲、于谦表现摇滚相声。”第二是“大明星专区”策略。“很多明星都是摇滚乐的粉丝，王菲跟窦唯、黑豹的关系，周迅跟朴树的关系，歌迷们都很清楚，我们就宣布很多大牌明星已经买了 VIP 专区的票，结果 VIP 的票第二天就卖光了，大家都想着去看演出的时候能够见到这些大明星们。”

最后演唱会票房以每天几十万的速度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崔健也决定加盟演出之后，单日票房突破了 70 万元。最终，4.4 万张门票收入超过了千万。杜侑澎说：“在现场，很多四五十岁的观众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媒体也跟着狂欢。在这场演出之后，所有的摇滚艺人演出费都翻了一番，在这之前，很多人是被遗忘了的。”

在黑豹成立的第 30 个年头，他们发行了第七张专辑《本色》。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混音师李军看来，黑豹能够坚持自己，重建各种摇滚经典风格的精神非常可贵。“非常经典、非常传统，所有的技巧都在为音乐本身服务。”“音乐只要还在做就够了，不必过于纠结歌迷到底是缅怀过去还是欣赏现在。”杜侑澎希望黑豹能够从“怒放”的成功中，明白该以一种怎样的娱乐精神面对市场。“怼网友是赵老师个人的娱乐方式，走红是个意外。他们还需要打破传统社交方式的壁垒，呈现出更丰富的公众形象来。”

张淇的加入让几位老哥儿非常满意。“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状态，换张淇好像是最后一搏了，好在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乐队的上升趋势。”黑豹乐队多年的好友杨樾如此评价。“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增加黑豹的曝光度吧，别每次一出来就有人问，黑豹是复出了吗？我们根本就没解散过啊。”李彤说，他们还不太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娱乐方式，会很谨慎地筛选那些综艺节目的邀约。跟音乐无关的，不行；突出张淇个人的，不行；如果能有一个专门为乐队打造的节目更好，不然同台的都是单个的歌手，不具有可比性。但谁都得承认，这次赵哥跟他相伴多年的保温杯意外走红，虽然跟音乐无关，但帮了黑豹太多忙了。这些年来，除了个别歌手之外，大多数演唱会都是无人赞助的“裸奔”状态，只能单靠票房盈利，这一次黑豹却得到了保温杯厂商的冠名。“谁知道哪片云彩下雨呢，真是想策划也策划不了这么好的营销事件。”行走江湖多年的摇滚老炮面对这个问题，惊喜之余也是一脸蒙。

北京小区内围栏之争：阶层差异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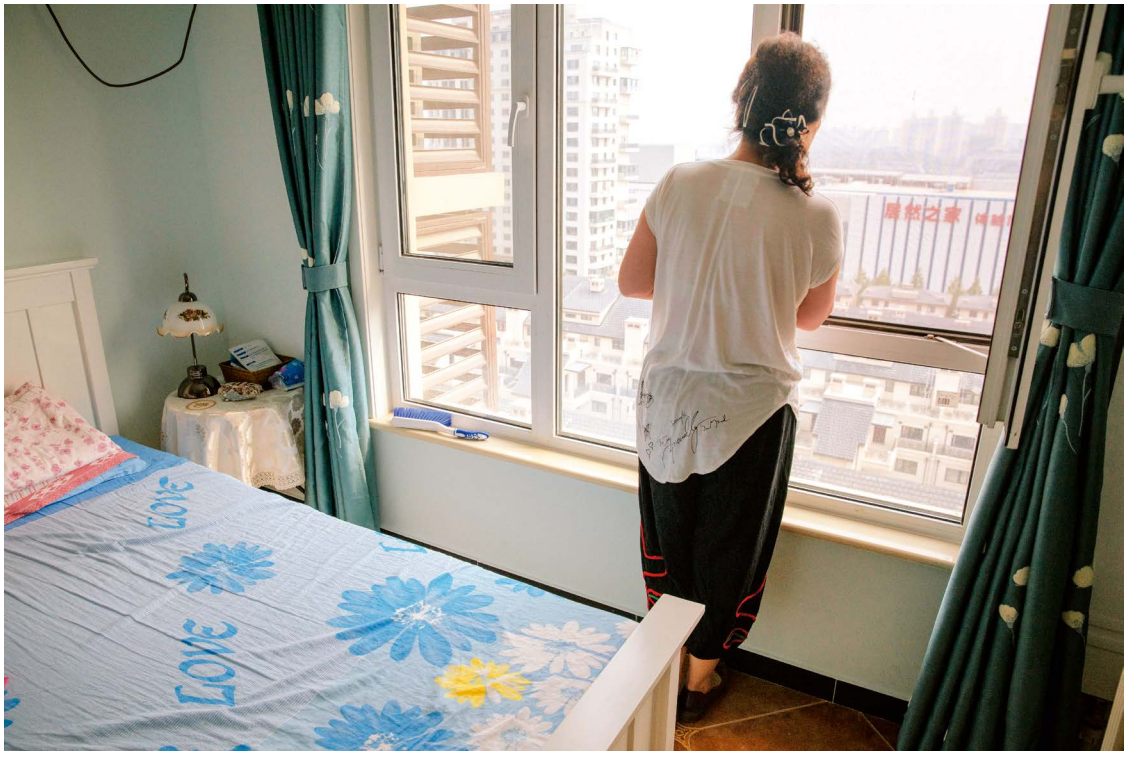
记者 刘畅 摄影 蔡小川

北京市丰台区三环边上的玉璞家园小区里，一道约 200 米的围栏，将高档住宅“西宸原著”与保障房“玉璞家园”隔开。半年来，这道围栏成为商品房业主与保障房业主间的战场，家境一般的保障房居民呼吁拆除，维护自己购房时应得的绿地和路权，而高收入的中产阶层坚决反对，希冀围栏能够围住自己高额买到的舒适与安全。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在北京商品房配建保障房出让的土地有几十宗，交房逐步展开，邻里之间的“硝烟”也才刚刚开始。

楚河汉界，中产阶层的住房梦

西宸原著小区在西三环西边，出门就能上三环，离西局地铁站也不远。极佳的位置，加之超大的户型，动辄千万元的售价，看起来只能是富豪们的选择。但实际上，对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也是为自己工作的方便、家庭的安全，几乎倾其所有构筑的住房梦。

“小区对面的居然之家施工了半年，周边都是在建的工地。如果我有 2000 万元现金，我才不会在这里买房，”业主顾先生告诉我，“还不就是图个上班、接送孩子方便？这还背了 1000 多万元的贷款。”顾



左图：北京丰台区玉璞家园小区门口

右图：玉璞家园小区居民在家中远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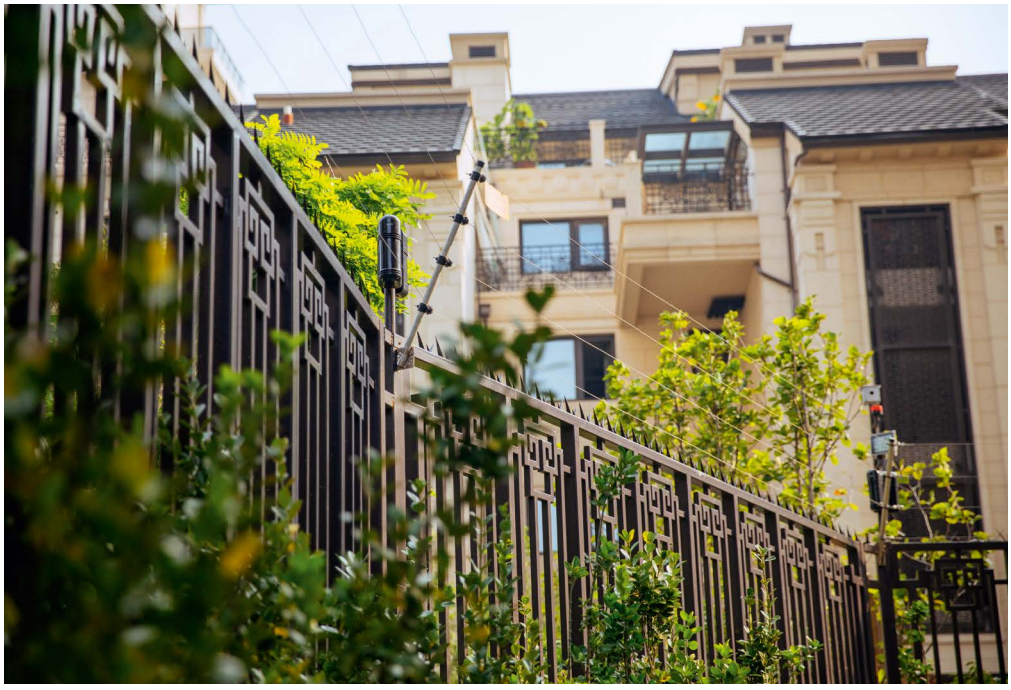
先生是 2007 年来北京的，从农村走出来的他没有任何依靠，先前在郑州工作，觉得天地小，就与妻子来北京做生意。起初，他和妻子租住在一间一居室里。夫妻二人打拼八九年，开了自己的公司，在马连道买了一套 80 多平方米的二手房，还有了两个孩子。老大上小学，老二也要上幼儿园，顾先生的父母来帮忙带孩子，一大家人挤在一起。去年初，顾先生开始在周围找房，选定了两公里外的西宸原著小区。“这里离孩子上学最近，我骑电动车 20 多分钟就可以把孩子送到。”

西宸原著小区是某知名地产公司售卖的高档住宅。2014 年初，这家地产公司拍下三环边的地块，并承诺配建限价商品房，建设玉璞家园小区。其中，高档住宅的推广名为“西宸原著”，均价每平方米 10 万元以上；限价房在其北端，名为“玉璞家园”，项目限价每平方米 2.1 万元左右。两类住宅均由这家地产公司旗下的物业公司管理，但由两个团队提供服务。在两部分之间，龙湖地产修建了一条不到 200 米的围栏，下面是水泥，上面是铁栅栏。

顾先生是 2016 年 8 月看的房，他看上了西宸原著小区高层中的一户。物业是地产公司自己管理的，每家都能有一位专职的管家。“当时沙盘上标明了西宸原著的小区和玉璞家园是隔开的，开发商也向我们说明了。觉得他们物业口碑也很好，我们就定了。”

可是，他签合同时发现，合同上的小区名是“玉璞家园”。顾先生回忆，“售楼人员反复告诉我，这里就是西宸原著，但申请名字的时候没申下来，所以用的玉璞家园，对外一律都是西宸原著，以后也如此。”顾先生没有太多怀疑。交了定金后，他把旧房子卖了，又几乎掏干家底，付了首付。年底拿到了新房。一番装修后，准备今年 9 月份入住。

然而，今年 3 月 31 日，物业告知十几个业主，要他们联名签署建委的信访信，北边的围栏开始引起业主们的注意。第二天，顾先生和其他的业主便面见物业询问情况。顾先生告诉本刊记者，物业反馈，限价房的业主写了要求拆除围栏的信访信，并收到了丰台区规划委的回复。物业同业主们说，既然限价房业主写了，商品房业主也要写。他们也向商品房的业主承诺，限价房卖房时，他们都已写明分区



左图：高档住宅“西宸原著”与保障房“玉璞家园”间的围栏

右图：玉璞家园小区里的住户和施工工人

管理的说明，限价房的业主是无理取闹，并且他们保证不会拆除围栏。“我们当时相信了物业的说法。”

直到 5 月中旬，业主们通过玉璞家园小区业主的文章，发现他们信访的依据是 2015 年 7 月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等住房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不得通过增设围栏将保障房与商品房分割。据此，小区北边的围栏判定为违建，并要交由丰台区城管处理。他们发现被骗了，围栏似乎也岌岌可危。

“没想到会碰到这种事。”顾先生一脸焦急地向本刊记者倾诉，他生怕围栏拆了，家里的房子贬值。本来他生活压力就大，每月要还 6 万多元，都要他和妻子两人承担。“如果围栏一拆，我们瞬间就会损失 200 多万元，那是我们含辛茹苦三到五年的收入。”

在西宸原著，有如此顾虑的业主并不在少数。顾先生向记者介绍，“我觉得‘中产阶层’最适合表述我们这个群体”。大部分的业主是像顾先生一样开公司的人，或是从事律师、医生之类的工作。“在这里买房的人基本都是改善性用房，没有人会出租。”

蒋阿姨也是一家三代住在这里，但临退休的她不能享受含饴弄孙的老年生活，即使卖了城里的小房子，她也仍要工作，帮助子女分担每个月数万元的房贷。蒋阿姨对本刊记者说：“这么一大家子人，子女在城里上班，你让我们去哪儿找房子住呢？”

本刊记者中午到访时，她刚忙完早上的工作，忙不迭地又来接待调查的记者。她带着记者在西宸原著的小区里转了一圈。小区不大，不足 10 分钟，便走到地下车库，穿过绿墙上的一面小白门儿，来到玉璞家园绿色的地下车库。走出来，就来到了玉璞家园一侧的地面。这是直通两个小区最简洁的路径。

一路上，蒋阿姨等业主向记者指出玉璞家园小区前的豪车，以及门口出租房屋的中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作为政府福利的保障房小区前，会停着许多上百万元的豪车，又有那么多租客？他们怀疑玉璞家园业主的身份。“谁能摇到在三环边上的限价房？限价房很多业主是公务员，据说还有建委员工，所以他们干完一系列事情后，把围栏定性为违建，我们才知道被他们给欺负了。”蒋阿姨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围栏另一侧的人

“凭什么污蔑我们？”截至本刊发稿前，感到无助和愤怒的西宸原著的业主们在楼外挂上了13米长的条幅，中有“贪污腐败”“挑头闹事”“入侵我家园者”之类的字眼。玉璞家园的业主胡先生看到后，感到十分委屈。“我们两限房的业主就是洪水猛兽吗？我们也要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和尊严。”

两限房是保障房的一种，属于期房，面向家庭状况不是很富裕的人群出售。售价较商品房便宜，但业主同样拥有产权，只是在上市时会受更多限制，作为限价的商品房也可以出租。据研究显示，自1999年，北京确立保障房制度以来，保障房的布局呈越来越远离市区的趋势，2012年以后，保障房大多分布在四环至六环之间。不但如此，保障房供应量少，需要摇号，且中签概率很低。

这样的背景下，难怪蒋阿姨会质疑玉璞家园业主们的身份。但是，胡先生告诉本刊记者，依他们所见，这里的两限房业主大多是把房子交给子女的无房老人、无房大龄青年，以及军转干部。“我们这里的业主平均要摇五六年，我算幸运的，到2014年，也摇了4年。”他向记者回忆，“摇上之后，你却发现，面临的是一个接一个没有退路的抉择。”

当时有三个选择首先摆在胡先生面前，三环边的玉璞家园项目、五环外太子峪、六环边青龙湖。“只有玉璞家园的项目有900多套，剩下的两个都只有几十套。”胡先生分析道，虽然玉璞家园的单价达到了创历史的2万多元，户型也不如那两个项目好，“但那是有生之年唯一可能在三环边生活的机会，也是选择限价房这种形式买房唯一的机会。另外两个地方实在太远了。如果放弃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再中签，房价也会涨上去了”。抱着这样的心态，业主们踏上了选房的路。

拿到图册选房，看到限价房在整个规划图的上方，下方大部分被黑色虚线括住的是一大片空白，写着“未来规划住宅”，胡先生觉得只是确认了限价房在小区中的位置，并没有太在意，便着手签合同。据业主们后来向本刊记者展示的销售合同显示，小区的南界为西宸原著正门所在的西局北街，西宸原著中的绿地也包含在其中。虽然合同附件中说明“3号楼南侧距离铁艺围栏较近，可能影响低层住户窗景美观，最终以设计图纸为主”，但据开发商交给市规委的规划图，上面并无围栏。

终于等到2016年冬至，楼盘开放，业主们满心期待地去看房，结果却出乎意料。业主邹阿姨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小区的入口只是一道大铁门，上面还写着消防门。她就感觉不对劲。一进门，按照胡先生的形容便是，“开发商把能挪走的都挪走，能留下的都留下”。小区里只有一条大路，地上布满了十几个污水井盖。而楼南边紧挨着一排围栏，把活动的空地都隔在了南面，绿地面积与合同中不符。“栅栏上的铁丝网沿西宸原著四周都有，只有冲我们的这面向我们倾斜了60度，还挂上‘高压有电’。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业主们感觉受到了深深的歧视。

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根据2007年北京市规划委公布的《北京市“十一五”保障性住房及两限商品住房用地布局规划（2006～2010年）》，商品房项目入市前必须按一定比例配建保障房项目。而从2010年起，北京在土地出让中，将保障房地块配建到商品房地块中的力度加大，商品房业主和保障房业主混居的现象逐步显现。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北京出让的自住房地块在竞价到达上限

业主们怀揣着不满，找开发商交涉。开发商回应，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围栏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有权分割。

后，开发商继续竞配保障房，导致保障房在整体项目中的占比较高，而商品房占比较少。而律师协会房地产专委会的王占辉律师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北京这样的地块大约有几十宗。

小区内设置围栏是这类项目中的普遍现象。相关从业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保障房的价格一般低于地价。因此，商品房的定价和销售情况，是决定开发商能否盈利的关键。为了能够将商品房卖出高价，在建设中，小区的资源大都会集中到商品房上。使用围栏隔开是保证商品房业主能够获得更加独立的环境的一种方式。

但这也影响了保障房业主的居住品质。胡先生看着两幢 30 多层的楼里密密麻麻的房间，和楼下唯一的一条不到两米宽的主路，心里就担忧。“这要是发生了火灾，可往哪儿逃？”而且，不像西宸原著的正门可以直通三环。他们出门去三环，之前需要从西边绕 3 公里的路。可西侧数百米的工地，不但荒凉，也没有路灯，晚上漆黑一片。本刊记者采访时，胡先生告诉记者，“虽然最近从东边开了一个门可以直接到三环，但那个门不归我们小区管，早上 7 点之前，晚上 10 点以后都要关门，我们的出行还是受限。”消防安全和交通都没有保障。

3 月 7 日，业主们怀揣着不满，找开发商交涉。开发商回应，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围栏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有权分割。业主们回来自己查文件和过往媒体的报道，找到了 2015 年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通知》，围栏是违建。他们可以通过呼吁拆除围栏，找回绿地和正门。

业主们认为，开发商侵害到了他们的权益。“我们想，绝不能让我们这里成为历史问题。”胡先生告诉本刊记者，一边工作，业主们一边开始了维权行动。3 月 16 日至 20 日，开发商交房，业主们分头行动，在收房前的 3 月 14 日，就向市区两级的政府、住建委、规委反映拆除围栏的问题，希望表明他们不是既成事实。3 月 27 日，他们收到丰台区规划委回复《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认定围栏未取得《建筑工程许可证》，交与丰台城管处理。在得到认定后，业主们又在 4 月、5 月分两轮赴丰台区城管大队，督促执法。6 月 8 日，城管做出限期拆除围栏的决定。

拆与不拆的舆论战

“已经认定是违建了，为什么就拆不了呢？”贺先生质疑。从 3 月底确认违建至今，围栏一直没有动静，玉璞家园的业主们开始怀疑物业联合有权势的西宸原著业主运作阻挠，并在网络上收买专家，雇用水军制造舆论。

但是，西宸原著的业主也早已用和他们相似的方式进行维权。5 月中旬，获知围栏危险后，业主们挨家挨户贴二维码，组织了 200 多人的微信业主群，与物业反复沟通的同时，也走上了上访维权之路。7 月和 8 月两个月，他们几乎走了与隔壁邻居相同的路，分别到市区级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上访。在向北京市第一环保督察组做网上申诉时，获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8 月 3 日，业主们联名向丰台区城管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回决定。城管受理，拆除的趋向静止下来。

玉璞家园的业主不会答应，而虽然在行政复议期，但西宸原著的业主上访获得的回复均对自己不利。8 月，两方在楼上交替挂条幅发声，玉璞家园谴责开发商欺诈、呼吁尽快执法，西宸原著谴责欺诈的开发商和无良的限价房业主。

这样的交锋不可避免。“不要说是保障房和商品房的住户绑在一起会有矛盾，即使是期房的小区里，早期的业主和晚几期的业主都会有矛盾。”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顾俊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不同时期的期房价格不一，阶层不一样，希望享受的服务不一样，业主都要求围墙隔离。把保障房业主和自住房业主放在一起，还要拆除围墙，这是作茧自缚，业主肯定会闹。”

舆论战烧到网上。本刊记者采访伊始，从同一条微博下面的评论中，找到了双方业主。双方业主对彼此的诉求皆有所耳闻，又坚持己见，最终引向了相差的目标。

古先生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拥护保障房的政策，将围栏视为“柏林墙”，抵制开发商人为地在一个小区中划分出两个阶层，“平等的身份被打上阶层的烙

印，在业主心中竖起一道隔离墙”。他们希望推倒“柏林墙”，重塑小区的和谐。而西宸原著的业主们却认为，并不存在身份上的不平等，限价房业主是想强行追求经济上的平等。“坐飞机也得分头等舱和商务舱。”蒋阿姨告诉本刊记者，物业费包含服务居民的费用，以及公共建筑、绿化、交通等相互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交 3 块钱物业费的业主不应与交 9 块钱物业费的业主共享同样的小区权益。不劳而获的行为，会引发流血事件。”“但飞机都要停在停机坪里，飞机里也有走廊，”玉璞家园的业主称，“合同中的物业费包含了整个小区的公共资源部分，绿化和路权本身就是公共资源，我们也并没有享受私人管家的服务。”

西宸原著的蒋阿姨担忧小区的安全，“如果把围栏打开，3000 多口人涌入狭小的空地，还有不少租客，势必造成拥挤和安全隐患”。玉璞家园的贺先生却认为:“如果小区环境差，只能引来更多的租客。人多正考验物业的管理能力。”

争执不下，双方均看到这一事件的影响。王律师告诉本刊记者，玉璞家园小区是颁布禁止修建围挡的通知后，最先入市的小区，其他类似项目即将陆续交房。此小区的争执将波及之后所有商品房配建保障房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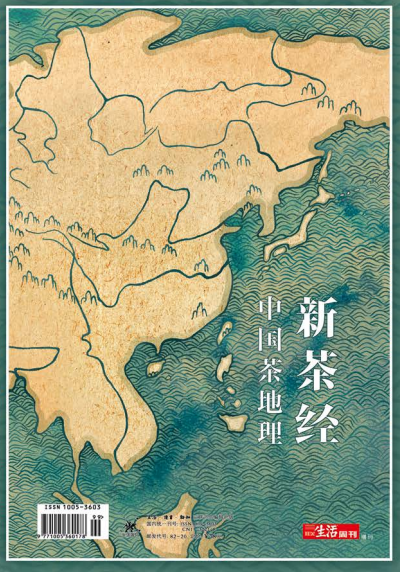
于是，双方均把呼声上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西宸原著的业主从经济角度向本刊记者分析：“商品房业主看到西宸原著业主的巨大损失，势必产生恐慌。今后就没人愿意高价购买商品房配建保障房小区。既然商品房卖不了高价、保障房需要贴钱，开发商今后建设保障房的动力就会大大减少。反过来对于保障房长远建设不利。”玉璞家园的业主则申明：“既然有法律，拆墙的问题反映的就是法律严肃性和政策的一贯性的问题。政府的公信力不容践踏。”

8 月 23 日，北京市住保办组织召开“北京市商品房配建保障房小区分隔治理工作部署会”，指出分隔问题是政府重点督办问题，要求存在分隔措施的项目于 8 月 31 日前自行拆除。会议提出，9 月 1 日起各部门将组织专项检查，如未拆除的进行强制拆除；对不予拆除的单位列入黑名单，不排除在资质、网签等方面进行处罚。

西宸原著的业主们为此焦头烂额，蒋阿姨告诉记者，真希望在那里挖一条沟。

（文中顾先生、蒋阿姨、贺先生、古先生均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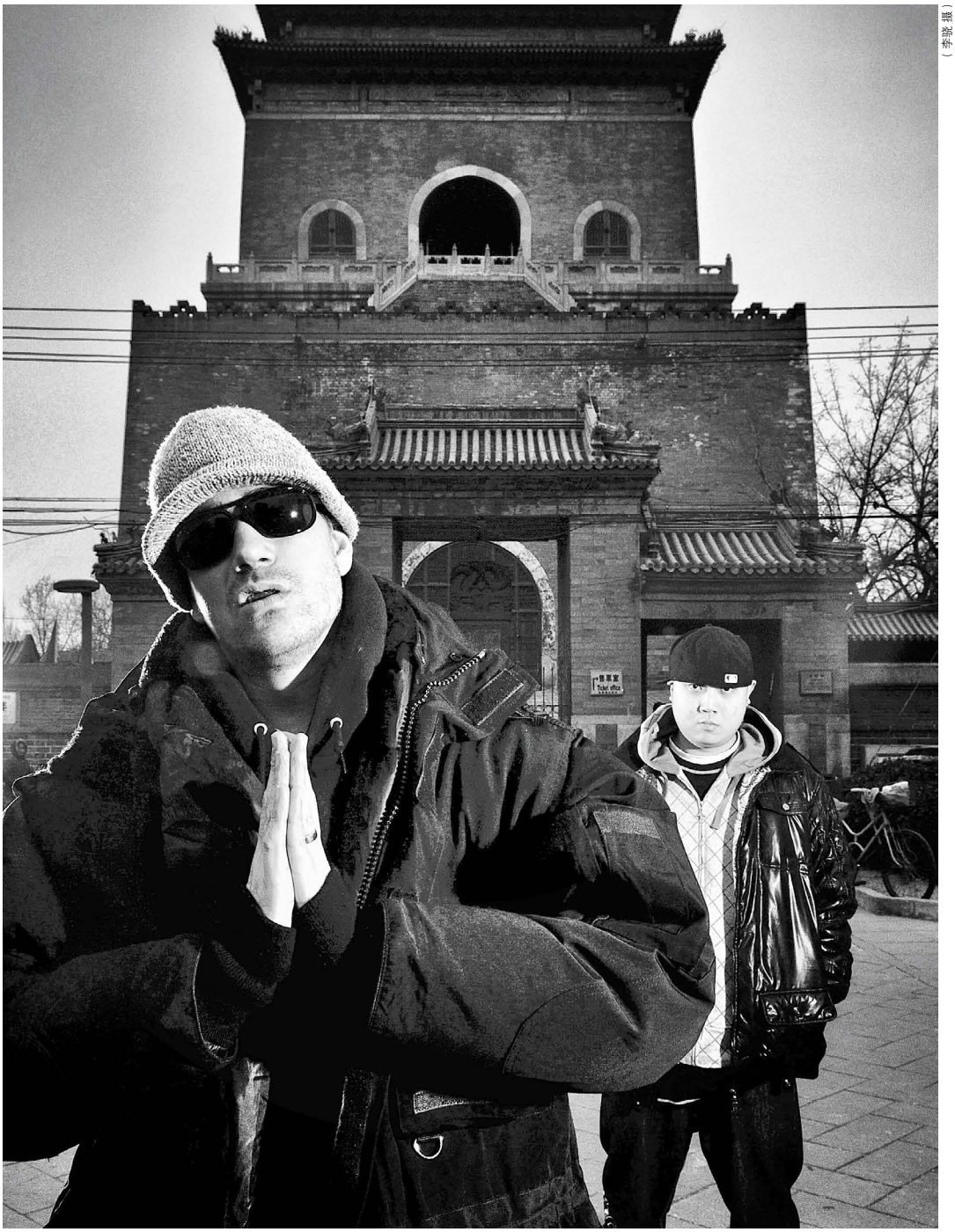
新茶经
中国茶地理
茶叶起源于中国，它原生于澜沧江畔的原始森林中，亿万年间一路向东迁徙，覆盖南中国的大部分省份。
一杯好茶，离不开地理、风土、气候、技艺的共同作用。《新茶经》以地理考察的方式讲述中国茶的故事。
历时七年，写作者十数人，足迹深入皖、浙、川、闽、滇、鄂、桂七省市，倾尽心力，无一篇不是亲自考察所得。



《三联生活周刊》天猫旗舰店

为什么“嘻哈”会这么火？

记者 黑麦



（李骁 摄）

隐藏乐队成员老郑（前）和马克

“嘻哈”，“说唱”，正在成为中国年轻人的一场亚文化运动。

《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录制现场更像是一个工业感的Livehouse（室内演出俱乐部），几百个观众站在舞台的下方，这与多数国内选秀节目的场面设置不同，舞台是这个场地的核心，站在台上，不会有一种被导师和评委审视的感觉。主办方试图在节目中造出一种地下音乐的现场画面，尽管如此，它还是很难让选手们想起这与他们平日里演出的场面有多大关系，明星、制作人、导演、镜头、挥动着荧光棒的职业歌迷、广告牌等等，不断提醒着现场的人们，这仍是一档综艺节目。

然而这个以“嘻哈”为主题的说唱比赛在网络播出后，似乎得到了比预期更高的热度，一些词语成为新的网络词汇，不少地下说唱、音乐人也开始浮出水面，陆续登上各地的演出舞台，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音乐人也就此热度成为话题人物，此外，选手之间、音乐人之间的对抗和挑战的硝烟也弥漫在了这个节目之外的地方。

一种自白

嘻哈音乐就像是年轻人的心理描写，打破了固有的“抒情”音乐审美。以往的中国选秀节目常常表现出一种焦虑，一种个体极度缺乏的内在焦虑。从“超女”到《中国新歌声》的十几年时间里，一些流行歌曲被重复唱了上百遍，即便是标榜原创音乐的《中国好歌曲》也从未在流行性和曲风上找到更大的突破，而这场纯粹以说唱为主的节目，既带有风险，也像是一种挑战。现实中的素人，唱起他们自己的音乐，尽管节目组还拿捏不准这些人的秉性和潜能，剪辑师的配音偶尔还是埃米纳姆（Eminem）在90年代的热门曲目，但是这个节目如同一个起点，也预示着某种选秀节目的新生态，一些如《中国乐队》这样的节目也在摩拳擦掌，总之，这档节目在互联网上打开一个口子，让一些相对真实、原创、有态度的声音，进入了主流的视线。

从20年前的北京、上海地下乐队说唱，如隐藏、阴三儿，再到之后广州、西安的Chillgun、红花会等团体，直至今天的炙手可热的“川渝地带”，中国的说唱音乐也经历了数代音乐人和音乐风格的交替。在民谣之后，这种入门简单、玩法无限的音乐方式随着短视频、潮流文化，伴随着段子文化和酷文化的兴起，成为一种很容易被接受的音乐形式。

在嘻哈音乐中，方言促生了地域、文化上的冲突和音乐风格的划分。之所以四川成为新锐的说唱地带，除了那里的文化特质外，方言也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四川方言与所谓“川普”的发音都模糊了普通话中四个声调的限制，在这里，人们常常拖着尾音讲话、聊天、谈情甚至与人争执，清口的调子，让它形成了天然的音乐韵脚。而自从重庆成为直辖市后，这个城市有了一种接近于北京的“中心市侩文化”，它所聚拢的文化生态与越来越国际化的成都圈子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两种文化背景下，促生出发音相似而声音不同的嘻哈音乐。在成都，马思唯的CDC凭借着几首制作精良的“陷阱”作品备受西方世界的关注；而重庆的Gai所专注的本土音乐创作，也勾勒出一个典型的码头文化生成的说唱江湖。

“嘻哈”是一种音乐文化，“说唱”是一种音乐风格，“中国有嘻哈”的英文名称the Rap of China似乎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与《中国有嘻哈》的参赛选手不同，更多的说唱音乐人对于这个节目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他们觉得这种音乐既不是这些人的发明，又不是今天才出现在中国的，没什么好评论的，而关于《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着一个中立的态度：好，也不好。

总之，很多国内玩说唱的人都不喜欢“嘻哈”这个翻译，但是他们也找不出一个词替代“Hip-Hop”。除了“一种态度”“一种文化”，很少人说得清楚到底什么是嘻哈音乐。他们更喜欢用自己的方言来将其称为“黑泡儿”“黑帕”，或者干脆使用英文来表示“说唱”，因为他们觉得“饶舌”太土，“嘻哈”太“港台腔”，听起来像是一种“有殖民文化色彩”的舶来品。

独立音乐人认为音乐本身比“嘻哈”这个名字更值得尊重。“阴三儿”的陈昊然曾经说过，说唱音

乐是来解决问题的，因为它直面你所遇到的问题。或许这更像是年轻人投身说唱的目的，他们在漫长的青春期中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开始对生活抱怨，也抱有幻想，他们更喜欢直接的态度，排斥遮掩，关于歌词，他们不选择“拿来”西方的，更多是开始有了自我的认知和文化上的自觉。

美国人曾经给中国的“80后”定义为“Me Generation”，说他们是婴儿潮长成后的“自我中心一代”。2007年8月6日，这个词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里，“自我中心一代”即是“迷失一代”（Lost Generation）的进化版，也是今天互联公民的最大特征。在这个趋势下，中国的说唱青年最终成为第一批“酷一代”（Cool Generation）的代表。

无论如何，《中国有嘻哈》都让大众看到了另一种流行，听到了流行在年轻人中间的另一种语言流派；如同一次“反集体主义”的亚文化的爆发，混杂着青春和理想，混杂着期待，混杂着现实世界中很多不真实的东西，让一大批年轻人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符号和自我认同。

边缘岁月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崔健用一种类似说唱的方式唱着《红旗下的蛋》，很多人在他的音乐里听到了流行音乐之外的类型：Funky、摇滚、布鲁斯，还有一点类似说唱的声音。于是，崔健的键盘手臧天朔开始在自己的专辑里尝试了一些说唱和念白。

1993年，图图、谢东、尹相杰发表了一张名为《某某人：中国RAP》的专辑，那是中国音乐人的第一张说唱作品，和当年宏大的摇滚乐政治题材相比，这张作品中有很多市侩和小人物的内心思绪。很多年后再听这张专辑，除了一点点可笑和生硬之外，还有些心酸。

10元一盘的磁带是那个时候的重要文化生活，彼时“西北风”“校园民谣”“港台流行”层出不穷，说唱音乐离我们很远，那会儿即便是听音乐的人也会觉得，说唱只属于黑人，一旦脱离了底特律、布鲁克林、哈林区，这种音乐便没了意义。

那会儿，还有个名叫李小龙的说唱歌手，和尹相杰、何静等人做过一张名为《盗版》的说唱合集，很多年后，这张专辑的四首歌出现在了日本电影《涩谷二十四小时》中。李小龙在音乐圈沉浮多年，演过路学长的电影，偶尔给人写歌，1998年，他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演唱的片头歌《幸福生活》，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说唱作品也传遍了大江南北。那时候有乐评写，这是中国的数来宝嫁接了美国的街头说唱。几年后，北京的第一支嘻哈乐队CMCB推出专辑《谁动了我的炸酱面》，封面是主唱王铮的父亲，德云社的王文林。他端着一碗炸酱面站在DJ台旁，乐队当时想表达一种“北京味”的感觉，却被诟病不正宗，更像曲艺。

批判中文说唱在当年可不是少数的声音，的确，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一种虽然好听但有明显外域特征的新作品，在中国耳朵守旧的老百姓面前确实显得“苍白”。当年的说唱音乐大多被认为是非旋律性的，天生“简陋”，况且，那会中文创作还有很多顾忌，新潮的音乐也都是英文的，中文韵脚还总被认为是曲艺创作的一部分，就此，很多人几乎忘了当年李小龙在歌里都唱了些什么。

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人都觉得“嘻哈”、说唱音乐只是夜店文化的一部分，所以那会儿的说唱歌手、DJ不得不进入“北上广”的夜场演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个位于北京工体北门的Mix夜店，确实有资格在之后称为北京嘻哈音乐的发源地。2006年的夏天，后来成为《中国有嘻哈》选手的欧阳靖来到Mix演出，那时候很多人已经在YouTube上看过了欧阳靖和黑人MC的即兴过招，觉得他是华人之光，当晚的演出聚集了近千人围观。号称中国第一说唱的戴兵在暖场时唱了一首《十二生肖》，很多穿着潮牌的年轻人觉得这首歌简直是冯小刚电影《没完没了》里的快板，一下子哄吵起来。不久，欧阳靖穿着肥大的衣服走上舞台，当人们听到了“Learn Chinese”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原汁原味的嘻哈音乐和北京夜店里常放的音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无论是哪一代的中国说唱歌手，几乎都与“铁麦克”（Iron Mic）即兴说唱比赛有过接触，它是中国说唱圈里最重要的比赛，很多说唱艺人在这里相识，开始合作；也有人在这里与他人结下梁子。1999年出生在底特律的黑人大学生Dana“Showtyme”Burton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在中国的嘻哈夜店里诧异地看到了杰克逊的模仿秀，他决定把最真实的嘻哈文化带入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

从2001年开始，不断有人拿起“铁麦克”与素不相识的同行Battle（较量），后来有人按照发音给“Battle”起了一个接地气的名字——“掰”。有很多瞬间直到今天都能被人提起，例如“阴三儿与上海MC的‘对骂’”“贝贝与马思唯的对战”“孙八一的商务说唱比赛”“小青龙的绝杀”等等，几乎所有实力

（李骁 摄）

2008 年，王波（左一）和陈昊然（右一）在北京现场体验乐队（Beijing Live HipHop Experience）表演现场

唱将都登上过这个舞台，因为在说唱文化中，即兴是一种必备的能力。MC 陈昊然在某年铁麦克做评委的时候说，有一种人在家背词儿，上台一句也说不出来；还有一种人，上台前喝大了，结果赢了比赛。他说，这两种事他都干过。

王波（MC Webber）曾经在最早的“铁麦克”上拿下三连冠，他那会儿有个乐队名叫“隐藏”，成员是两个老美和一个加拿大华裔，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在北京》，完成于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在那个网络刚刚兴起的年代，这首有趣的歌曾被广泛流传和翻唱。隐藏乐队的“老外”北京话很地道，也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有个名叫 Jeremy 的得州人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儿叫老郑，他在中国结婚，生了孩子，坚持玩地下说唱音乐，自己在北京录了两张专辑。那几年老郑住在北京胡同，当时的街坊还不像今天这样见过这么多“老外”，他觉得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问题想要问他，后来他总结了这些人的话，写了一首《50 个问题》。

那时候还有个叫“黑暗论坛”的，云集了中国早期的说唱歌手、制作人、乐评和嘻哈音乐爱好者，这是 2Pac 和阿姆以外的说唱世界，随着这个群体的壮大，上海的竹游人、喷嚏、黑棒，广州的天王星，成都的 Big Zoo 等开始慢慢崭露头角，其中的成员 PQ 在多年后拍摄了中国说唱纪录片《中国大舌头》。2008 年，中国说唱迎来第一个快速爆发期。先是孔令奇在中国国际音乐电台做了一档《嘻哈公园》，到场的嘉宾都是说唱圈里的“大咖”，他们不断把美国最流行的音乐搬到中国，随后 My Space 的出现让中国的地下制作人看到了境外独立音乐人的实力。不久，美国人也开始见识到了中国的说唱团体。

“阴三儿”成员有三人，都来自北京，他们强调身份与唱词的一致，这是他们认为的真实。和世界上所有的地下嘻哈音乐一样，他们用歌曲表达愤怒、叛逆，脏话连篇，喜欢的人认为其真实有力量，讨厌的人说其粗鄙不堪。或许正是他们的“接地气”，让他们的音乐走得更远。2008 年他们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第一代本土说唱”。崔健说：“他们就唱北京的故事，那种我觉得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没过多久，“阴三儿”就因为那首著名的《老师好》被禁，这些年轻人说：“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城市真的变得干净了，我们的歌也就不会有脏话了。”

在“阴三儿”之后，不少说唱歌手和音乐人都

开始了中文甚至方言的创作，很多人突然在日常的口语中，找到了一种创作的自由。2011 年西安的“红花会”成立时，马思唯还是个大学生，他喜欢说唱，无心上班，最终成为成都说唱会馆的成员，凭借着国际化的作品和他的团体“Higher 兄弟”不断出现在欧美最权威的嘻哈网站上。

本土说唱，让很多音乐人重新找到了一种创作的理由。中国的“陷阱”（Trap）音乐里保留着浓重的口音和俚语，同样来自成都的谢帝善于用四川话讲故事；“B$IDEMOB”来自福建；“Go$h Gang”盖世帮来自重庆，方言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局限，反而网络让他们的四川话说唱有了某种强烈的地域风格。

2014 年谢帝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的比赛，获得全国总决赛四强;同年 3 月,他凭借四川话说唱《明天不上班》获得“第三届中国嘻哈颁奖典礼”最佳原创方言歌曲奖，歌词中不断出现的“老子”和他张狂的歌词“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见客户装孙子，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让很多人感到一种发泄，同时也让一些人变得愤怒。毫无疑问，因为歌词过于直白露骨，在《中国好歌曲》播出时，原本名为《老子明天不上班》的歌曲名还是被改为《明天不上班》，并且连字幕都没有出现“老子”两个字。谢帝解释道：“‘老子’这个词不是要说我自己多嚣张，而是带着一种无奈和自嘲。”

中国有嘻哈

2017 年 5 月初，一条“中国有嘻哈”的发布会视频被传到网上，在视频里，除了吴亦凡和潘玮柏等明星，一些在说唱圈里的熟悉面孔也相继出现。尽管很多人对吴亦凡、张震岳等人产生了疑惑，但是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地下音乐人会来到选秀的舞台，甚至有些期待着这些来自地下说唱的声音。

嘻哈音乐确实让中国观众耳目一新。几年前，民谣刚刚复兴的时候，也出现了一大批音乐人投身嘻哈和说唱之中，与摇滚乐和传统音乐制作相比，民谣和说唱音乐不需要歌者具备演奏上的反复技巧，或者说,一个找不到同伴的音乐人即可以借由现成的科技，独立完成制作。此外，往往那些直白的唱词，在这种音乐的配合下，也有着更充足的表达。

《中国有嘻哈》的整个舞台上没有一句脏话，没有即兴的对战、冲突，对于说唱音乐人来说一切都平静地发生着，像一场按照台本进行的松散表演，海选、分组、淘汰……没有人多说一句，只会做出不满的样子，当然，和众多的音乐比赛相比，这种小情绪在观众看来已经算是非常有态度了。

无论“双冠消息”是否被提前暴出，在《中国有嘻哈》接近尾声时，场面仍有一种失控感。

首先是一次奇怪的直播，虽然周六的首播是录播，但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Vava 已经被淘汰，而 Jony J 的复活则显得莫名其妙，有传闻他在被淘汰期间完成了一场巡演，就连 Pg one 等人的表演作品中，也多次强调 Jony J 的回归让人摸不着头脑。节目组似乎并不想对复活的选手做出任何解释，但是在直播时候的票数差，又让人觉得前后矛盾，场内外的投票数字差别能有多大？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投票，此刻，选手的命运和购买平台会员的数量绑定在了一起。华少的出场，让《中国有嘻哈》回归主流视野，观众们熟悉他的主持套路，更熟悉他口播广告时比 Jony J 还要快的语速，这一次，他挽起了袖子，露出小臂上的文身，表现出与选手们一致的态度。

其次是四强决胜与 4 进 3 的比赛，在这两场比赛上，苏醒、周笔畅、信等与说唱毫无关联的歌手走上舞台，与这些选手合作，就像是在考验地下音乐人的忍耐力和应变能力，乔衫、大鹏和小青龙合作的曲子更像是为新电影《缝纫机乐队》植入的广告；所谓的乐坛金牌音乐制作人中，钟心民、捞仔、涂惠源似乎对说唱并不感冒，不确定他们所理解的嘻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风格。总之，有太多不相干的人跳上这个舞台，有的为了撑场面，有的只是为了告诉大家他还存在，总之，在一个节目火了之后，所有人都想蹭一下热度，而其中最可悲的是，连一些选手自己都想要蹭一下自己的热度。

VICE 拍摄的纪录片《川渝陷阱》线索是成都的马思唯和重庆的 Gai 之间的 Beef。说唱歌手所说的“Beef”就是梁子、恩怨，它是音乐人之间的矛盾，也是音乐人的创作灵感之一，更是说唱歌手之间心照不宣的小游戏。在 PGone 选唱了一首 Diss（挑衅）所有选手的音乐时，来自重庆的另一个冠军争夺者 Gai 放出狠话：“想赢冠军想疯了。”自此二人开始在微博和微信上对骂起来，一些相关的团体马上加入战斗，一些人还为此发表了几首“Diss 作品”来指责 Gai 的软弱，说“Gai 爷只会打字”。在事件发生一周后，不知道是因为节目的签约关系导致了 Gai 的继续沉默，还是“双冠”的可能性让 PGone 有所收敛；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场早已安排好的“营销”,不得而知，只因为事件的热度已经过去，没有人会继续关注这二人莫名的恩怨。

90 天明星

如果你查看所有的音乐 APP，就会发现老百姓手机里的歌单是靠娱乐节目推荐的，在娱乐影响文化的时代，“嘻哈”可能是一次性的受益者，它比起其他类型的小众的音乐似乎有着更大的舞台。陈冠希是嘻哈文化的受益者，他做潮牌服饰，也玩音乐，在一场关于“中国嘻哈”的采访上，他直言主持人不懂音乐，他说没有 MC 仁、见不到王波，不知这些人到底在搞些什么。陈冠希对于“嘻哈”的生产和赚钱方式似乎仍旧停留在上个世代，有一件事他搞不懂，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音乐一旦走上舞台，走进电视，就不再是单纯的音乐了。

正如《中国有嘻哈》的导演车澈在一场音乐论坛上所说：“我的职业是导演，我不是音乐圈的人，也不是嘻哈圈的人，我生产的是一个节目，要生产流行的、明星的，还是素人的，对我来说是产品层面的概念。最近很多朋友问《中国有嘻哈》成了爆款，你以及你的团队、你的平台，对中国的嘻哈音乐青年文化的价值、推广，承载了什么样的责任？我说我不承载这种责任。”

中国十余年的选秀工业，玩出了一套“90 天造星计划”的商业模式，这个庞大的舞台上挤满了年轻人的理想，而舞台会重新加工、榨取他们的新理想，将他们转化成“最佳赏味期 90 天”的明星，年轻的选手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觉得自己应该趁着年轻及早出名，他们知道这 90 天意味着什么，他们甚至知道 90 天之后，会有怎样的副作用发生。

张东（化名）是一个综艺选秀节目（不一定是嘻哈）的选手，他说：“我知道两个多月的节目完结之后，自己可能就不再是明星了。”

飞机降落在长沙机场，张东和一起参加选秀的李明（化名）走下飞机，他们的穿着较几个月前更夸张，或者说，他们最近更在乎自己的穿着了，李明还画了眉毛，戴着墨镜，同行的节目组工作人员把他们夹在中间，走向行李提取处，这使他们看起来更像个明星。其间，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职业粉丝，戴着口罩和棒球帽，挎着 5D 对他们一阵猛拍，随后，有助理冲他们摆摆手，几个人便职业性地散去。张东知道这些粉丝可能不是节目组安排的，因为节目播出后一个月，他常常遇见这种情况，他随便数了数，今天堵他们的粉丝有十来个。

张东和李明是时下热播的选秀节目选手，李明很早就被淘汰了，但是作为高颜值、有粉丝的素人，节目组依然和他签了约。他们这次来长沙的主要任务是上两个综艺节目通告，参与几个广告的拍摄，具体拍几个、拍给谁、什么时候拍，二人并不知道。

给他们的拍摄脚本很长，导演都说不用看，临场随便发挥几下就好，客户只需要他们露个脸，如果能来段现在流行的说唱就更好了。李明很不客气，他告诉导演：“你不能想让我唱我就唱，我们不是卖唱的。”这话说得让客户很有感触，连忙起来安慰，表示尊重。第二场广告的拍摄比想象中还要莫名其妙，张东不知道为什么找到他们两个男生拍摄彩妆，李明却饶有兴致，毕竟这场广告他是主角，两个人所分得的费用应该是不一样的。

张东蹲在摄影棚门口，点了一根“黄鹤楼”，他脚上的黑色匡威鞋很旧，这是他做独立音乐人的符号之一。他说节目组不喜欢旧鞋子，给他们借了很多衣服鞋帽，希望他们穿出一种潮流感。张东把烟头弹得很远，讲了个故事，两年前，自己参加过另一个选秀节目，觉得怎么也能进全国前十，临行前在 Live House 办了一场“告别演出”，平时票价三五十元，那次涨到了 150、200 元，就是想赌口气，结果去比赛“海选”都没过。

他对这个节目倒是很满意，之前做了那么多年音乐，微博粉丝一万出头，没什么人转发。最近每播出一期节目，粉丝都能涨几万，转发能上千，上热门的时候也能破万，好多事跟做梦一样，有时候他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做的这个决定来录节目。

上节目前一周，一切都变得不可控，张东说好多事都是安排好的，谁唱什么、谁和谁 PK、你最好去选择哪个导师。一开始他不乐意，后来制作人连哄带威胁，“咱们都是同行，来这儿干什么的自己不清楚么，谁都别找不痛快，交个朋友”云云。张东说：“一切都按照做了，上了台，剪辑出来，看起来倒真实了，倒像没什么内幕。”

张东说：“你是什么人节目组比你清楚多了，你说这个节目有黑幕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会来事儿的、有关系的，一定是被人照顾的，制作人给你的音乐里放了什么、造型师给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包括你在节目里有多少镜头，都跟这个有关系。录制的过程我们是觉不出有什么内幕，但有的感受是不公平的，毕竟你有合作的价值人家才会在乎你。”

张东说这几个月跟谁都不聊音乐，不想聊，他想等节目热度过了休息一阵，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说：“一个人对一个陌生人的多巴胺只分泌三个月。”

自由是一种态度

记者 黑麦

在《中国有嘻哈》的对战中，川妹子 Vava 是潘玮柏战队留下的最后选手，潘玮柏说她是一张“杀手牌”。

歌手 Vava

8月末，在击败了来自新疆的“沙漠兄弟”艾福杰尼后，Vava成为全国四强。作为十强之后的唯一一位女选手，Vava在舞台的表现一直被网友评论为“稳准狠”，这似乎也是她对于自己天蝎座的个性评价。不过Vava并不喜欢别人在Rapper(说唱歌手)前加个女字，她觉得自己跟舞台上的所有Rapper一样，都来自地下，没有分别。

出生于1995年的Vava是“周杰伦一代”，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周杰伦的流行中文嘻哈音乐曾经是那个年代青少年的集体记忆。“我出生的时候音乐就已经很新了，第一次听到周杰伦就觉得他的音乐很不一样，歌还能这么唱？后来对音乐有了些了解才知道他的很多音乐风格就是嘻哈。”由于母亲是舞蹈老师的缘故，Vava还从小学习舞蹈，在那里她耳濡目染地接触到了作为伴奏的欧美的说唱音乐，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她发现自己似乎对节拍有一种天赋。

后来，性格像男孩子的Vava开始喜欢文身，亮色的指甲油，穿肥大的衣服，她在青春期来临之际也开始变得叛逆，成为学校的问题少年，离家出走。在高中时期，她想成为一名歌手，于是在17岁的时候来到酒吧做驻唱歌手，那是她闯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她当时能找到的与音乐最为接近的工作，每天唱几首流行的情歌。

后来，Vava辗转于北京、深圳、上海，在不同的酒吧唱着不同的情歌，那时候她很倔强，喜欢装成熟，总跟人说自己是1991年出生的，那会儿，也是她最为困惑的一段时间，“我在那个时候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跟随别的音乐人走过弯路”。直到两年前，她才想清楚自己要做的就是说唱，她觉得自己在这种充满节奏与直言的音乐里找到了自己。

Vava在歌里唱的一直都是自己的故事，2016年，在深圳Listen up说唱歌曲创作大赛上，她唱的是《谁比我有范》，那会儿她关注衣着和态度，总觉得要为自己树立一种“符号”；2017年初，她参加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万人演唱会的时候，她改编了SHE的《不想长大》，有一段歌词是“长大以后所看到的一切景象，都不是我想的模样，捏造不出好的形状，承受折断翅膀的伤，我跌跌撞撞地闯，揭穿了所有的谎”，Vava说那时候的她刚刚度过自己的音乐转型，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

不久前，在《中国有嘻哈》的9进6比赛上，Vava选择了一首《生活是挣扎》(*Life is A Struggle*)。这首歌的原曲是中文说唱被传唱最多的曲目之一，原唱者宋岳庭在19岁时被朋友陷害入狱，23岁病死狱中，一年后家人把他在狱中写下的这首粗糙的音乐制成专辑，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对儿时的痛苦回忆，轻狂年少、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无奈和呐喊。虽然没有经历过宋岳庭那般的生活折磨，但是Vava仍觉得自己在过去21年经历的故事有些普遍性，她生长在一个问题家庭，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问题学生，经历了不同的人生，生活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只为了回到最正常的轨迹，在歌里她唱道“我打架逃学我成为了全家人的耻辱”，唱出了一种年轻人对于过去和叛逆的反思，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年轻的女孩到底有过怎样的经历，才能写出“我慢慢从横冲直撞到变牢固，我在肮脏的泥泞里面找宝物，没经历苦难怎么叫作生活，每一次分叉口我都仔细斟酌”这种歌词。

Vava说这是比赛前自己在家就写好的一首歌，她说那是她第一次用歌词把自己感动。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妈妈都不喜欢Vava做的音乐，因为她听不懂自己的女儿到底在唱啥，Vava就告诉她，“这都是现在流行的，你别管”。后来她开始在电视上看到女儿参赛，也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转发起来。“尽管她听不懂，但能看出来好像有些骄傲。”Vava说。直到那天妈妈在电视上听到这首《Life is A Struggle》，从第一句“1995年我来到这个世界在此我想给我的母亲最真诚的致谢”一直听到“Life's a struggle，日子还要过，品尝喜怒哀乐之后，数不清的troubles”，她用微信打给Vava，说自己听哭了。

Vava还有一首歌名叫《都想搞说唱》，歌里唱的是很多玩说唱的都被说唱搞了。她觉得这些人不真。真实（real），一直都是说唱歌手强调的调性，它是一种态度，也可以是一种称赞。在参加《中

（东方IC供图）
5月2日，吴亦凡出席爱奇艺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媒体发布会

国有嘻哈》之前，Vava也曾经担心这个节目“不real”。“我和很多选手都是独立音乐人，没有专业的团队，在节目现场我们看到很多练习生（偶像团体成员）的时候，总觉得会有黑幕，后来到70强的时候，这些人被陆续淘汰，才觉得安心。”

最终站在舞台上的几个人都来自地下说唱，此前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中，这些人不断出现在地下的舞台，参与着一场场演出和即兴（freestyle）的说唱比赛，他们用音乐描绘着自己想象的世界，也用diss（挑战）的方式回应着不同的意见和想法。站在“嘻哈”的舞台上，不会有流行歌曲那样心平气和的比赛心态，批判、伤害、承受、指责，发起新的挑战，是嘻哈音乐生生不息的存活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中国有嘻哈》为什么会这么火？

Vava：我觉得只是时候到了，毕竟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做说唱做了这么久，而且我觉得音乐水准，唱的技巧都是时候拿出来秀一下了，现在的音乐人意识比较好，和听音乐的人比较同步。

三联生活周刊：你看过选秀节目吗？

Vava：我上小学的时候看过一季《超级女声》，那个时候节目特别火，当时就很想上这个节目，后来长大了就想，千万不能参加这种选秀。后来还我看过第一季《中国好声音》。

三联生活周刊：那为什么还决定参加《中国有嘻哈》？

Vava：我还是很想让大众知道我们这种音乐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嘻哈音乐，虽然你说这个节目这么火，但很多人就是听着新鲜，歌词能明白，但是音乐上的理解还需要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在节目开始，你们好像对练习生（偶像团体）选手很抵触？

Vava：不喜欢练习生主要是因为他们没实力，如果他们的技术够好，我们肯定会很尊重啊！还有，我觉得自己不写音乐绝对是个问题，因为rapper必须要唱自己写的东西，那是你心里的想法，不然就不够真实。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节目里，你比较喜欢谁的音乐？

Vava：音乐上我喜欢Bridge（布瑞吉），他的音乐很多变，但是每一首都有他的符号在里面；唱的技巧我喜欢PGone。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样的音乐会吸引你？

Vava：主要是人声的部分，有腔调的，如果唱腔很拽，我就会喜欢，比如Lil Uzi Vert、Pryde，国内的我喜欢Blow。

三联生活周刊：觉得自己年轻吗？

Vava：我之前觉得自己年轻啊，到哪里都是最小的，那时候我还要把自己往大了说，后来有很多年轻人出来，做说唱的也有，很厉害，比如刘昱妤Lexie，她是历史上第一个登上美国SXSW音乐节的中国女歌手，1998年的，我很喜欢她做的音乐。

三联生活周刊：大多数选手和你音乐经历都很相似，你怎么看这个节目给你们带来的改变？

Vava：这个节目一下子火起来了，对每个人的影响都很大，之前的小摩擦，好像都被放大了，因为突然有很多利益显现在每个人的面前。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会怎么办？

Vava：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吧，诱惑也很多，但是我觉得突然变得这么红，我也知道这些东西来得快，去得快，做音乐不能只靠这些，还有几周这个节目就要完结了，一切都要回到过去的样子，我之后会发我的新专辑，名叫“21”，我想可能是对我过去21年的一个小的总结吧。这之后我会做新专辑的巡演，回到地下，回到过去的演出场地，回到以前的样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平时都做些什么？

Vava:偶尔看看古装电视剧、游泳、打《王者荣耀》。

三联生活周刊：你想拥有一种什么样的能力？

Vava：读心术。

传祺 GS7 为“乐趣进享者” 打开“探享新天地”的大门

2017 年初，北美底特律车展惊艳全球，4 月在上海车展轰动预售，8 月 26 日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传祺 GS7 一路惊艳，成为消费者关注、追逐的对象。

作为一款敢于与途观、CR-V 竞争主流市场的产品，传祺 GS7 集“新锋尚运动设计、大 5 座宽享空间、T 动能畅行驾控、无边界智联娱乐”四大卖点于一身，为“乐趣进享者”打开“探享新天地”的大门。

新锋尚运动设计，创大 5 座 SUV 外观新典范

广汽传祺以创新性的光影雕塑 2.0 造型设计美学为基础，通过新锋尚运动设计语言，以非凡格调赋予传祺 GS7“与生俱来”的高颜值基因。贯穿式凌云翼家族脸谱格栅，在横纵间将力与美巧妙融合。传祺新一代全 LED 大灯、全 LED 双“U”形尾灯，展现富有冲击力的精致细节，提升整车豪华感。19 英寸轮毂采用五辐双色的切削式设计，轮辐造型强壮又不失灵动，强化了整车的运动感和高品质感。

大 5 座宽享空间，秒杀同级“大”有可为

作为一款真正的“大 5 座”SUV，传祺 GS7 空间和舒适性塑造秒杀同级对手。全面领先同级合资的车身尺寸，让 GS7 从容打造宽适大 5 座空间，980 毫米同级最宽后排腿部空间，第二排乘坐身高 1.8 米的乘客，腿部空间超过两拳。1910 毫米横向超宽布局，横向可放两个儿童座椅并乘坐一个大人。822 升超大后备厢空间，后排座椅放倒后最大达 1700 升，用户可以放心地带着多得超乎想象的行李携家出行。1.35 米超大尺寸全景天窗、豪华车级 360NVH 静谧空间，以及双区独立自动恒温空调带负离子森林氧吧空气净化系统，让车内空间和舒适性比肩豪车。

T 动能畅行驾控，随心驾驭撩拨探享欲望

GS7 搭载传祺第二代 320T/280T 发动机，应用数十项全球领先技术，1750 转即可输出 320/280 牛·米扭矩。匹配全新爱信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拥有 5 种驾驶模式，性能、品质稳定可靠。GS7 在同级中唯一拥有 6 种全地形驾驶模式，博格华纳 i-4WD 第二代智能四驱系统，可智能分配前后桥扭矩，拥有强悍的操控和脱困能力。专业级全地形反馈功能 +6 种驾驶模式，用户在驾驶途中无缝切换，轻松应对复杂路况。而 GS7 也是同级唯一采用 95% 驾驶舱高强度钢 +8 安全气囊配备的车型，德国博世第九代 ESP 塑造的“14 位 1 体”主动安全能力，为用户智能化解行车风险。

无边界智联娱乐，创造人车互动新天地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祺 GS7 诚意为用户打造三屏智联、信息自由切换的互动新体验，让车主轻松徜徉于互联时代的前沿。炫酷三屏智联，中控屏、仪表屏、手机三个屏幕的信息可自由切换，造就媲美豪华车的智能驾控感受。10 英寸哈曼顶级液晶大屏，整合并支持多媒体音像，集成了北斗 +GPS 双模 3D 语音导航。同时，GS7 可为手机无线充电，让用户告别电源线依赖。GS7 还匹配智慧传祺 3.0T-BOX 系统，拥有远程启动发动机、远程开启空调、远程开启后备厢等 17 项强大功能，用户更可享受紧急救援服务（SOS）、路边救援、碰撞自动求助。

多年来，广汽传祺以坚定的信念打造世界级品牌，率先走出了一条“定位高端、品质优先、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坚持原创设计，坚持国际高品质标准。继传祺 GS4 创造行业现象级热销“祺迹”之后，传祺 GS8 在高端 7 座 SUV 与合资品牌直面竞争并站稳脚跟。传祺 GS7 凭借广汽传祺在原创设计、匠心品质和尖端智能科技的合力塑造，有望在中高端 SUV 市场创出一片新天地。

《二十二》：深情凝视还是直面历史？

实习记者 吴扬

近期上映引发公众热烈讨论的国产电影，除了一举打破内地票房纪录和观影人次纪录的《战狼 2》，便是这部让“慰安妇”议题重回公众视野的纪录片《二十二》。这样一部原本小众的“现象级”纪录片，持续引发了观众有关慰安妇群体的关照、历史的真相与遮蔽、纪录片的社会介入等问题的讨论。在某种程度来说，这成为一件比评判电影本身的优劣更有意义的事情。

抢救式纪录

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前一天，冯小刚导演发了一条微博，转发了演员张歆艺写给他的信。信中张歆艺说道，导演郭柯几年前因为经费紧张，找到她出资赞助《二十二》的拍摄。电影即将上映，面临排片少关注低的困境，呼吁大家给予如此重要的题材应有的关注，保护电影排片。这条微博被转发了 13 多万次。由此，这部原本几乎不为人关注的纪录片，进入了公众视野。

作为国内首部进入院线，以慰安妇受害者为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选择于 8 月 14 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天上映。电影首映当天，我去看了早场，早上 10 点，出乎意料，60 多人的影厅差不多全坐满了。放映过程中，时不时能够听到观众的啜泣声。放映结束，片尾曲《九重山》响起，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场，全都安安静静等到片尾字幕结束。

“真诚”“感动”“了不起”几乎是所有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观感。而早在 2016 年年底，因为电影宣发经费不足，郭柯在网络发起众筹，获得超过三万名观众的支持。这些人的名字，也被郭柯一一写进电影片尾感谢名单中。

《二十二》排片一路逆袭。从上映当日 3955 场到 16 日 2.9 万场，仅仅两天的时间电影排片占比从 1.5% 飙升至 10.9%，此后连续一周保持近 10% 的排片比。电影票房也一路走高，上映六日票房即突破一亿元，一举打破之前由陆川导演影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保持的 6656 万元国内纪录片票房纪录。目前，《二十二》票房已达 1.68 亿元，创造了一个属于国内纪录片领域的“票房奇迹”。

一部原本从题材和类型来看都属小众的电影，获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郭柯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连连表示没想到，“是大家合力把它推到现在的高度”。

作为一个初涉纪录片领域的新手，郭柯此前唯一的纪录片拍摄经历是同为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短片《三十二》。郭柯说，2012 年偶然读到《中国新闻周刊》一篇关于慰安妇韦绍兰的报道，起念拍下她的故事。这部讲述生活在广西桂林的九旬“慰安妇”老人韦绍兰和她的中日混血儿子罗善学故事的纪录片，正是郭柯接触“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开始。

和慰安妇老人的接触让郭柯意识到：这些老人实在太老了，从 32 个幸存者到 22 个幸存者，不过一年多时间。“她们走得太快了，再不拍的话，可能连 22 个都没有了。一定要赶紧做这件事。”抱着与老人生命赛跑的紧迫感，2014 年开始，郭柯带领团队实地走访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五省 29 个地区，记录下 22 位老人的生存现状。电影呈现给观众的便是这 22 位老人的群像，片名《二十二》也由此而来。

8 月 12 日，电影上映前两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在家中离世。至此，影片中 22 位老人仅剩 8 位在世。急速锐减的数字提醒着人们：对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关注和纪录开始实在太晚了，以至于《二十二》变成了很多老人一生中最后的影像记录。正因如此，电影被观众誉为一场“抢救式纪录”。

深情凝视

作为一个此前从事影视剧拍摄的导演，《二十二》是郭柯导演的第一部纪录长片。他的剧组同他一样，“全是剧情片剧组的配置”。此前没有任何人有过拍摄纪录长片的经验。

拍摄伊始，他就和剧组明确了任务：当时幸存的 22 位老人全部要拍到，“一个都不能少”。在纪录

上图：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剧照

下图：纪录片《二十二》工作照。导演郭柯（右）与林爱兰老人

（赵峰 摄 / 东方 IC 供图）

纪录片《二十二》导演郭柯

群像的同时，郭柯考虑到老人们性格、身体状况和拍摄条件等综合因素，重点讲述了毛银梅、林爱兰、李美金和李爱连四位老人的故事。

回想拍摄《三十二》的过程，自己让韦绍兰老人细致回忆痛苦过往，甚至为了丰富故事情节，还专门设计了让老人挑水、上坟等摆拍场景，郭柯说他心里过意不去：为了故事消费了老人，“太折腾她们了，我们不应该再去挖掘她们的痛苦”。

于是在《二十二》中，他放弃之前介入式和控制性的拍摄方式，不再过度询问老人们的过往经历，只做好“如实记录老人当下生活现场”这一件事。明确这一点后，郭柯在拍摄和后期剪辑时设定了严格的限制：只拍摄她们的当下，不引用历史画面，也绝不刻意剧情化。正因如此，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这些瘦骨嶙峋、脸上满是岁月沟壑的老人不再是“历史的物证”，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当这些老人回忆过往，忍不住哽咽流泪时，镜头会刻意拉远，摇向疏朗的天空、一动不动的云层、大雨如注的屋檐。

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正是电影对老人们最大限度的尊重打动了他们。那句“深情凝视”不打扰的口号，在郭柯看来，不仅是他个人对待这群老人的态度，也是整个剧组的共识。本片剪辑指导、台湾著名剪辑师廖庆松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毕恭毕敬、非常有诚意的观点。不打扰老人，让她们自由表达想法，是一种极度的尊重。很尊重的凝视，带着真情和珍惜，这个态度才是完成这部片子最重要的基础。”

当被问及为何电影中大量出现天空、云、飞鸟等空镜和缓慢摇移的长镜头时，郭柯告诉我：“这是我看到的老人们的真实生活环境，平淡而枯燥。”这些按照统一方式缓慢移动的镜头形成了一种模式化处理，恰恰取消了镜头可能有的感染力，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但与此同时，这些镜头也给电影赋予了情感节奏：在时间的缓慢流逝中，凝视成为唯一选择，感受由此生发。能否直面老人生活中的平淡和枯燥，则是对观众的考验。正如一位观众所言：“99 分钟的电影平淡冗长吗？那老人她们又是怎样日复一日熬过这份平淡冗长的呢？”

这种深情凝视的记录方式，让《二十二》得到

了一些电影奖项的认可。电影入围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时，组委会如此评价："镜头小心而安静地倾听和观察，像水晶一样透明地记录故事。留白和沉默比语言表达了更多。"

历史缺席的疑问

《二十二》的豆瓣页面，一条"不谈技术，这部纪录片本身的意义值得五星"的评论获得了7000多次点赞。这也让讨论电影本身的优劣、导演处理慰安妇题材的方式是否妥当等问题，似乎变成一件不怎么"道德"的事情。在很多观众眼中，拍摄本身就意味着成功。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二十二》的表现方式，"深情凝视"在表达尊重的同时也引发了历史缺席的疑问。

电影聚焦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她们当下的喜怒哀乐。对于平静生活下涌动多年的痛苦，只有老人们的只言片语：韩国老人毛银梅自从年轻时被日本人骗到中国当慰安妇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提及以往她噙着泪水，连连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我记不住了"；山西老人李爱连特别爱笑，可一旦提及往事，她也露出悲伤的神情："这些我之前都不说的"……过往一经提及，她们心底的怪兽就会瞬间苏醒，咬噬心脏。这些巨大的梦魇，碰不得，说不得。

电影不断告诉我们：面对老人们的眼泪，追问伤痛和回溯历史变得残忍和不近人情。采访时，我问导演："你不觉得脱离历史语境的日常呈现失去了该有的重量吗？"他反问我："如果她是你的奶奶，你会去挖掘所谓的历史吗？"在导演看来，电影的呈现已经足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更深刻"。

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境，我们认同彼此，同样也无法说服彼此。对于这些曾经遭受过巨大苦难，一生都背负伤痛的老人们来说，"深情凝视"真的足够了吗？我们的"凝视"是否就能让这些幸存老人有尊严地度过余生？这是电影没有触及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1932年日本大举进攻上海，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效仿海军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方法，在上海设立慰安所。这便是慰安妇制度在中国的开端。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之下，20万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征强抢，甚至在广大农村地区，为了所谓"村庄的道理"（被日军占领期间，村民们觉得日军的长期统治已无可避免，为了保存村庄，使村子的日常生活继续下去，村庄便调整与日军的关系，包括通过维持会向日军供奉日用物资，甚至被迫完成日军强行摊派的女人数额），妇女们被村庄主动上交给日军，惨遭蹂躏。战争结束之后，这个悲惨的群体非但没从泥淖中脱身，等待她们的反而是更为持久的，乃至伴随一身的屈辱和污名化。"慰安妇就是妓女"的标签和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贞操观，让她们在传统道德体系中也被贴上了耻辱标记。她们不但要忍受旁人的闲言碎语，更要忍受自己父母、丈夫甚至孩子的嫌弃厌恶。"慰安妇"——这一原本意味"性暴力受害者"的词语——变成了老人们一生说不出口的污名。这种无声无助的巨大苦痛，影片中所展现的平静安详的生活能够真正疗愈吗？

现实中老人们的生活远比电影呈现得复杂残酷。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教授曾讲述过自己研究中遇到的故事："经济上，她们没有收入，生活窘迫，很多人无儿无女，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系……在我们调查的早期，有一个武汉受害者由于贫病交加，孤身一人，实在无法活下去，就卧轨自杀了。"也因此种现实，《二十二》把个人从历史剥离出来，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置换成"经历过苦难的邻家老人"的方式，会让一部分观众觉得，老人们遭受的苦难失去了历史的重量。

对于历史叙事在电影中的缺席，郭柯有自己的看法："我拍电影不是为了挖掘历史，还原历史。我没有这个义务和任务，我不是历史研究专家。我只是看到这些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老人，觉得她们很可爱。我就想拍下她们当下的状态，没有那么多束缚。"如郭柯自己所说的：《二十二》里面全是捕捉，捕捉她们的生活。不要去控制她们，跟着她们的节奏走，她们是怎样就怎样拍。

作为一部纪录片，《二十二》更像一个抽离了背景的陈述句。

现实中老人们的生活远比电影呈现得复杂残酷。经济上，她们没有收入，生活窘迫，很多人无儿无女，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系……

《猩球崛起 3：终极之战》：恺撒的最后一役

文 宋诗婷

“猩球崛起”系列走到第三部，观众见证了猿族文明的诞生，也目睹了人类文明的衰弱。《猩球崛起》不仅仅是科幻片，也是寓言，其中有人性的阴暗、社会的不平等和人类文明的更迭。它讲述的不是猿类与人类的故事，而是人类自己的故事。

猿族的隐喻

2011 年，首部《猩球崛起》上映，这部讲述猿族反抗人类的电影被认为是当年最好的科幻片。好莱坞向来喜欢讲猩猩与人类的故事，在《猩球崛起》之前，好莱坞最著名的猩猩是“金刚”。如今，《猩球崛起》中的“恺撒”已经成了能与“金刚”一争高下的名角。

六年前，恺撒和同伴们摆脱了人类的奴役和迫害，它们回归山林，以为从此与世无争。三年之后，《猩球崛起 2：黎明之战》和猿族领袖恺撒一起回归，人类自食其果，肆虐的猿流感病毒蔓延全球，危急时刻，他们将生存的希望凌驾于承诺之上，再次踏进猿族领地。经历了艰险的战斗，体验了兄弟反目成仇，也学会了妥协，恺撒再次带领猿族化解了危机。又是三年之后，《猩球崛起 3：终极之战》来了，这或许将是《猩球崛起》系列的最后一部，电影结束后，观众将与恺撒和猿族告别。

在这部最新的《猩球崛起》里，恺撒不再年轻，他已步入中年，多年的争战让他身心疲惫，连眼神都多了几分沧桑。和前两部电影相比，《终极之战》里的恺撒更像个人类了。他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已经会说出完整的句子，也能表达抽象的思想。他的生活也更像个中年男人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牵挂，也有责任。经历过几场战役，他内心平静，但心中也有个永远补不好的洞——为顾全大局，他亲手杀死了曾经的好友科巴，这个黑洞在他心里悄悄生长。

当情感黑洞遇到极端考验时，恺撒开始改变，他变得越来越像科巴。与其说《猩球崛起 3》是又一部猿族反抗人类的电影，不如说，它是恺撒的自我救赎之旅。

人类军队攻入猿族聚居地，恺撒的妻子和儿子

左、右图：电影《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剧照

被杀害。恺撒心中的仇恨无法消解，在复仇和保护猿族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恺撒带着毛里斯等好友上路，他们逆猿族而去，向人类驻军地走去。

在导演马特·里夫斯眼中，《猩球崛起3》更像是一部公路片。它具备公路片的诸多要素：一个迷茫的人，一段未知的旅程，遇到一些人和事，解决困惑，重新发现自我。

为了呈现被仇恨蒙蔽的恺撒的自我发现之旅，导演马特·里夫斯参考了很多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黑泽明的武士系列着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里有西部的狂野，也有男人的软弱，以及男人之间的情谊。这两位导演的作品给了里夫斯灵感："拍这些影片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在于能够为这种经典剧情带入很多新科技和新的电影形式。"

《猩球崛起》系列作品和以往的猩猩电影不同，它不以奇观取胜，而是赢在价值观。电影里没有脸谱式的坏人，有的只是努力生存但因立场不同而冲突不断的族群。《猩球崛起3》里的大反派是伍迪·哈里森饰演的上校卫斯理·麦卡洛。同时担任导演和编剧的里夫斯在为反派寻找行为动机上花了很长时间。他和另一位编剧马克·鲍姆贝克不希望上校是个讨厌的人，他们希望赋予他行为的合理性，也希望从他身上折射出一部分恺撒的心理。"既是仇敌，又有一点惺惺相惜。"鲍姆贝克。

最后，他们把上校写成了一个为抢救人类文明而不择手段的人。猿流感有反智的威力，它让感染者失去语言能力，大脑也渐渐退化，人类所遭遇的这场浩劫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若不找到应对之策，人类文明就有彻底消失的危险。上校不允许这一切发生。

恺撒和其他猿族经历了《猩球崛起》前两部中的成长，已经进化得越来越像人类，他们成了与人类对立的族群，二者之间的联系却越来越弱了。但《猩球崛起》系列终究是部要把猿类和人类绑在一起的电影，它需要新的联结点，让观众理解人类与猿族之间剪不断的矛盾关系。

这时候，坏猴子和小女孩诺瓦就出现了。他们都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是人类与猿族的桥梁。坏猴子曾生活在动物园，学会了不少人类的语言和习气，他从人类手中逃脱，但也无法融入猿族。女孩诺瓦感染了猿流感，她的行为能力在退化，无法用语言表达，却在情感上与恺撒建立了联系。

与《猩球崛起2》不同，《猩球崛起3》减少了打斗场面，一部猿类与人类大战的电影，导演和编剧却用大量镜头来塑造人物，以及展现主角的心路历程，这种方式让这部纯粹的工业大片有了些手工质感。

动作捕捉技术的未来

《猩球崛起》系列的成功不仅在于它高于同类

安迪·瑟金斯在《猩球崛起》系列影片中饰演恺撒

电影的深度，也因为它对动作捕捉技术的运用。如今，饰演恺撒的男主角安迪·瑟金斯已经是行业内公认的最会用动作捕捉技术演戏的男演员。他那双敏感的眼睛，即便躲在恺撒的身体里，依然能发光。

制片人彼得·谢尔尼说，决定如此大面积地使用动作捕捉技术，他们的确下了一通决心。“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我们在第一部片的时候非常担心，因为从来没看过什么动态捕捉的技术，但却出现开创性的逼真演出，甚至在情感层面也是。第一部片拍完后改变了一切。”

就像卢米埃尔兄弟最早的电影《火车进站》、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电影领域每种新技术的流行都需要一部现象级的电影来推动行业发展。在动作捕捉领域，《猩球崛起》就是这部电影。

与前两部相比，几年间，动作捕捉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猩球崛起 3》第一次在雪地里实现了动作捕捉拍摄。“我们拍《猩球崛起》的时候，动态捕捉技术从没用在摄影棚以外的户外环境，我们是第一个把这技术带到森林里的团队，现在还要把它带到高山和雪地里。”彼得·谢尔尼说。

谢尔尼的得意正是瑟金斯和其他演员的灾难。他们要穿着单薄的满身是圆点的衣服站在雪地里拍摄，这滋味并不好受。采访时，瑟金斯对《猩球崛起 3》的拍摄过程发了很多牢骚，但他一点也不否认，自己是这项技术最大的受益者。他不仅凭恺撒一角赢得了大众的喜欢，还因此有机会了解这项技术，并为他所用。

如今，瑟金斯正在经营一家名为 The Imaginarium 的公司，公司主要研发与动作捕捉有关的产品，涉及视频游戏、电影和虚拟现实等时髦领域。他正在制作的两部电影《奇幻森林》和《一呼一吸》也都运用了动作捕捉技术。可见，这项技术对于瑟金斯而言不仅是一门生意，也是他灵感的来源。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电影正在使用动作捕捉技术。但在奥斯卡和欧美几大电影节上，使用这项技术的作品并不如想象中讨评审欢心，甚至技术类评审也不买账。

瑟金斯一边告诉大家不要急，给新事物一点时间，一边不断给这项技术正名。在他看来，动作捕捉不是高深的科技，不过是另一种演出服罢了。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演员和他一样，穿上这件演出服，抵达更自由的表演境界。

对话安迪·瑟金斯

三联生活周刊：《猩球崛起》已经拍了两部，这系列故事的世界观很稳定了，你觉得，这系列继续拍下去的意义是什么？还可能有哪些突破？

安迪·瑟金斯：我至今觉得，《猩球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故事。它有关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有关科技与伦理道德，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当我们封闭了同情心和同理心，变得麻木，只是膝跳反应似地来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时，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类的电影总会有批判社会和反映现实的企图，《猩球崛起》第一部带我们回到了讨论公民权利的起始点上，用猿的反抗来隐喻当下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在这种方式下的隐患（比如，政治动荡）。但我想，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还是因为它的娱乐性，它不仅有社会批评的功效，也是一部情感丰富的娱乐性极强的电影。因为娱乐性，它可以吸引更多普通观众，引发更多人思考，我相信，这一系列电影一直会有这样的效果，这就是它继续下去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部《黎明之战》里，你的角色更像是个父亲，而不是领导者，这一点似乎和之前的两部不太一样。

安迪·瑟金斯：没错，这也是我希望让观众感受到的。这三部电影一路走来，恺撒有很多变化，他首先属于猿族大家庭，然后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而他作为首领来管理猿族的方式又是家庭式的。恺撒越来越像人类，在他看来，家庭其实是他所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来源。冲突发生后，他渐渐发现，同情心不是天生的，也会被仇恨蒙蔽，在这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中，他也渐渐理解了自己的兄弟科巴。所以，《猩球崛起》本质上就是一个家庭生存的故事，眼前这一部把这个家庭的情感进一步放大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中，你扮演的角色恺撒有什么新的变化？你如何来呈现这些改变？

安迪·瑟金斯：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太习惯我的角色了，习惯把自己隐藏在恺撒的面具之下，可以说，这几部《猩球崛起》下来，我和恺撒共赴了一段旅程。在《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中，恺撒走了段弯路，这是一段他发现自我的旅程，这个过程不容易，在电影开篇他一度走向了自我毁灭。他强烈的复仇心理一度把这个角色和背后的我引向了黑暗，你看了整部电影就会理解我的心理过程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刚提到的是剧情上的，在动作捕捉技术方面，第三部《猩球崛起》和之前两部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安迪·瑟金斯：技术一定是越变越好的，相机越来越轻，清晰度越来越高。从它捕捉眼睛和微表情的精细度，到渲染效果，再到纹理、细节的处理，《终极之战》所使用的软件设备有很大的提升。表演时的穿戴设备是靠远红外灯发出信号，这部戏有很多雪中或者雨中的镜头，所以它必须是坚固且防水的。除了这些，《终极之战》的穿戴设备和第二部《黎明之战》没有太大区别。

三联生活周刊：你被公认为是动作捕捉技术里最好的演员，这项技术改变了你，也成就了你，你如何看待它带给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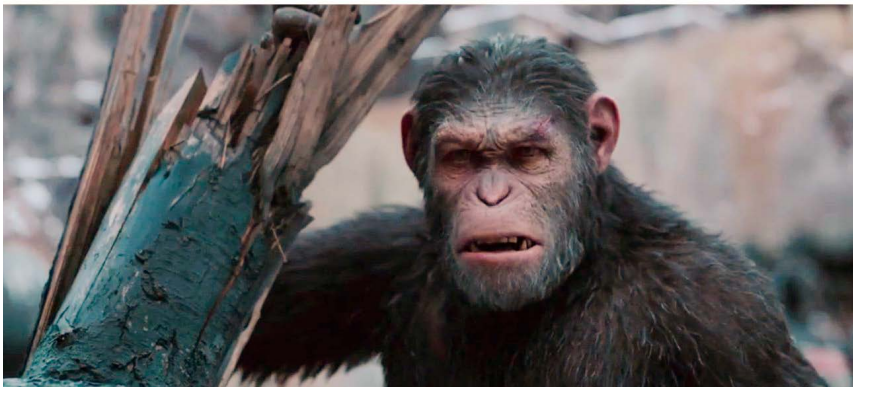
安迪·瑟金斯：如果没有演这几部动作捕捉技术的电影，我可能会拍更多的实景电影和演更多舞台剧。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剧院演出了，从2012年开始就几乎没演过，如今，我有点怀念舞台。当然，这项技术带给我的远比我失去的要多。它把我带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改变了我的事业轨迹。如今，我可以用动作捕捉技术做更多尝试，比如把它和实景结合起来，尝试让这项技术和真实的舞台表演相结合，这些都将是有趣且创新的尝试。动作捕捉技术在未来一定会更被重视，在我心中，这项技术与服装、道具一样，它只是演员表演的工具，重点在于如何让它真正为电影和故事本身服务。

《猩球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故事。它有关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有关科技与伦理道德，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

超级巨猩如何养成?

主笔 曹玲

“我们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任何视觉效果，更大的挑战是人的想象力。”



上图：电影《猩球崛起 3：终极之战》剧照。恺撒的外形一直根据剧情发生变化，在困境时，他眼圈和面颊发红，眼里布满红血丝

下图：拍摄时，安迪·瑟金斯穿着灰色的紧身衣，戴着特制的头盔，身上和脸上贴满圆点，动作捕捉装备会记录他的每一个表情，传输进电脑用于分析调节

长官慢慢走进士兵队伍中，士兵们尊敬地让开。他仔细检视他们，脸上的表情夹杂着愤怒、痛苦和不屈服的决心。这不是人类的指挥官，它是“恺撒”，“猩球崛起”系列电影的主角——一只猩猩。这一幕出自此系列的新片《猩球崛起 3：终极之战》，从它脸上，你能体会到它内心的感情，就像跟随着人类演员亦喜亦悲一样。

“猩球崛起”三部曲的视觉特效均由新西兰维塔数码公司（Weta Digital）负责。这家公司自从制作了《指环王》之后名声大噪，后续参与了《金刚》《阿凡达》的特效，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特效制作公司，堪和美国老牌特效制作公司工业光魔相媲美。

8 月 24 日，“猿来如此，《猩球崛起 3:终极之战》动作捕捉大揭秘”维塔大师班活动在北京举行，维塔工作室的视觉效果总监安德斯·朗格兰斯（Anders Langlands）介绍了片中的“超级猩猩”如何养成。朗格兰斯负责《猩球崛起 3》的特效制作，有十余年的特效从业经验，获得过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及奥斯卡最佳视效奖提名。

据他介绍，为了得到这些逼真的猩猩，维塔工作室动用了 998 名工作人员参与到了幕后制作中，甚至一度有 430 多人同时为同一个特技项目工作。电脑 CPU 的处理时间耗费了大约 1.9 亿个小时，折合起来等于 5400 年。影片中有 1440 个特效镜头，占据了整部电影 95% 的镜头量。“与前两集相比，这一集采用的技术让猿类看起来更逼真，光线、毛发等细节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朗格兰斯说。

制作《猩球崛起》三部曲的特效，主要采用的是动作捕捉技术。动作捕捉由两个元素组成，一是身体动作的捕捉，二是面部表情的捕捉。所谓动作捕捉就是捕捉演员表演时的动作，然后把这些动作同步到电脑中的虚拟角色上，使虚拟角色的动作和真人毫无差别，以达到逼真、自然的效果。传统的动作捕捉技术需要在绿幕前拍摄完成，目的是方便抠图，将人置于虚拟的场景中。绿幕技术不一定非要使用绿色幕布，但必须避免拍摄物体含有背景幕布的颜色，由于人的皮肤介于红色和黄色之间，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蓝色、绿色和青色的幕布比较常见。

而《猩球崛起》系列已不用在传统的绿幕片厂摄制，转战到实际的拍摄场地进行。目前，动作捕捉设备进化得更加稳定和可靠，能够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天气，即使是大雨天也可以照常进行。朗格兰斯展示的画面上，演员穿上灰色的紧身衣，戴着特制的头盔，身上和脸上贴满圆点，对着莫须有的场景进行表演。头盔上诸多传感器可以捕捉面部表情，并以无数个小光点的形式传输进电脑。电脑软件分析这些动作数据，应用到面部动画系统中，再进行后期调节。

猩猩们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猩球崛起 3》里有个新角色，一个从动物园逃出来的“坏猩猩”，它会说人话，给电影带来了一些幽默感，朗格兰斯很喜欢它。对于这个坏猩猩，他们希望它有一点智慧和一点天真烂漫，同时又非常厌世。第一步，他们在动物园找到一个酷酷的大猩猩当作原型，调整眉毛、眼袋、口角等部位，并希望能从它的眼睛里看到儿童般的天真烂漫。做出 3D 模型后，他们想给大猩猩的肌肤增加更多的纹理。新西兰惠灵顿动物园允许他们在大猩猩睡觉的时候去做手膜，工作人员在得到的手膜外覆盖一层硅胶涂层，揭下来就能获得非常精细的肌肤纹理。他们把硅胶薄膜放到水中进行扫描，获得了皮肤纹理图，在此基础上进行后期渲染。此外，他们还会对坏猩猩进一步进行修饰，比如让它的口角更红润，鼻子、眼睛部分加上湿润的效果。

主角恺撒的塑造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起初它身体健康，经常在丛林里活动，皮毛上挂着水滴，看起来心事重重。随着故事的推进，它和另外一个角色发生冲突，情绪激动，眼底变得微红。之后它的眼角遭受枪伤，左眼出现暴露的血管。再后来每况愈下，被抓到寒冷的监狱里，此时它的枪伤正在恢复，但是脸色非常苍白，呈现死亡之色。“整个过程有延续性，我们对人物刻画比较满意。”朗格兰斯说。

为了让观众相信这些猩猩是真的，维塔的工作人员要对动态的部分进行调整，比如肌肉的收缩和颤动、肤色的变化、毛发的晃动。当地动物园向维塔分享了大猩猩的核磁共振成像图，让他们了解了大猩猩肌肉的密度、位置，以及骨架连接之间是否存在韧带等细节，从而建立起大猩猩的模型。因为大猩猩比人壮实得多，所以在设计时要附加上一些肌肉，还要调整肌肉的颤动、关节运动的速度、肌肤的褶皱和皮毛等细节，让猩猩们看起来更真实。

毛发的处理也是他们工作的重点。每一只猩猩大概有 500 万根毛发，所有的毛发都必须对重力和光线做出反应。毛发之间的交互、与皮肤的交互，以及与环境和光的交互都很复杂。维塔使用了 Wig 工具对每一根毛发进行建模，以调整它的长度、密度以及卷曲度。工作人员把一整片毛发进行复制粘贴，很快就可以把一个人物身上的毛发处理完。此外，他们还更新了对毛发上色的做法。之前采用的是人体毛发模型，但是人的毛发结构和猩猩不同，当折射角度不同的时

《猩球崛起》导演马特·里夫斯和主演安迪·瑟金斯在分析动作

候，猩猩毛发的变动和光泽与人类有些差异，后期制作时每一帧都需要调整。在《猩球崛起 3》中，他们启用了新的模型，减少了很多后期制作的时间。

毛发制作的技术这几年进步很快。在《猩球崛起 1》里，恺撒大部分时间待在家和办公室，只有少量的室外镜头。之后，维塔和《猩球崛起》第二、三部的导演马特•里夫斯合作进行第二个项目《生人勿进》，他们实现了毛发在潮湿森林中的交互效果，毛发和水的交互以及更多其他的元素的互动。在《猩球崛起 3》中，拍摄环境变得更加严酷，超过一半的镜头是在雪地里拍摄的，这个对于复杂的毛发系统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随着猩猩的移动，雪落在毛发上，然后又从毛上落下。雪的状态有时候像粉末，有时有点潮湿，有点黏，还有重量感，有时候又结了一层坚硬的外壳，常常一个环境中混合了不同类型的雪。当猩猩们在地上翻滚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只对毛发上的雪进行简单的叠加，是不会得到栩栩如生的效果的。“雪花不能像糖霜一样均匀沾染到毛发上，一定是有的地方还结了冰块，光线照射下来呈现出不同的反射、散射和漫反射效果，一切必须看起来是真实发生的。”他们对粉末状的雪花进行计算，将一些雪花变成雪花团，在毛发的外层结块，看起来更加真实。

这一切都让人在观影时无法意识到银幕上的角色是穿着动作捕捉服装的演员，你会觉得自己在看真正的猩猩，即便它们骑着马，带着突击步枪穿梭在雪地里。或许，特效的最高境界是你知道这是特效，但是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因为它在你眼里是“真实的存在”。

影片更让人感到真实的是猩猩们栩栩如生的表情，它们的表情能勾起你内心的情绪。它愤怒，你会跟着生气；它伤心，你也会跟着难过。

每个猩猩都有一个数字文件，比如眼睛的眨动、嘴角的开合都有相关的动作指令。维塔采用 GPU 的动画效果能很快进行测试，查看每一次调整和变化会出现怎样的效果。此外，他们用 FACS 的编码系统进行编码，通过人的表情变化来刻画心理活动，但不能让人的表情过多干扰到猩猩，因为它毕竟是猩猩。

“猩猩是由人来饰演的，但是它们的面部结构和人类不同，尤其是口角、口鼻和眉毛三部分。”朗格兰斯说。比如猩猩的眉骨比较大，毛比较多，它们和人皱眉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幅度要大很多。再比如，

猩猩的嘴唇形态更适合捕捉食物，而非讲话。“人的表情如果完整地还原到猩猩脸上会很诡异，这就需要在人脸和猩猩脸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我们要进行很多调整，每拍一个新场景都要进行这样的调整。”

朗格兰斯展示了“恺撒变脸”的过程，短短40秒内饰演恺撒的英国演员安迪·瑟金斯魔术般地由人变为猩猩。只见安迪的脸上贴满了用于动作捕捉的白色标记点，伴随着慷慨激昂的台词，脸部肌肉因愤怒而微微抽搐，眼睛微凸，布满血丝。在动作捕捉技术的帮助下，这种表演被完整地迁移到了恺撒的脸上。安迪的脸逐渐呈现出猩猩的皮肤纹理纹，脸颊慢慢凹陷下垂，眉骨一点点突出，眼睛深陷，眼纹、眼袋逐渐清晰，鼻翼变成猩猩独特的扁三角形，嘴巴凸起，脸上的毛发浓密，画面最后定格为恺撒。如此无缝转换令人惊叹不已，好像在变魔法一样。“我们要分析演员的表演，每一帧拍摄背后的意图是什么，非常深层次了解人的生理和猿的生理，才能进行无缝转接。”

虽然技术的魅力无穷，但是朗格兰斯再三强调是演员表演的重要性。“真人表演是一切的根基，没有真人表演就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把你变成猩猩，但是你不是安迪·瑟金斯，你演不出恺撒。”

英国演员安迪·瑟金斯因为完美饰演了咕噜、金刚、恺撒等角色，被称为“动作捕捉第一人”。在他心中，动作捕捉是数字化妆手段，可以让演员饰演以前演不了的角色，但演员仍是动作捕捉的核心。没有了不起的演员，动作捕捉便无从谈起，技术只是一种手段，而表演才是精髓。詹姆斯·卡梅隆也持同样的观点，“表演捕捉”的关键在表演而不在捕捉，动作捕捉的目的是记录演员的精彩表演，并以此来驱动虚拟角色，表演不应该受限于技术本身，而任何一种技术，都只是为了讲好一个故事所采用的辅助手段。

美国影评人史考特（A.O.Scott）在《猩球崛起2：黎明之战》的评论里写道，恺撒是“数字时代继续重新定义大银幕表演的角色。它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如此生动精准，无法说它的演绎将止于何处，维塔的精良技术又始于何处”。

精彩的特效让普通人也想体验一把。在维塔大师班上，快手科技Y-Lab实验室负责人郑文展示了如何在手机上把他的一位同事变成恺撒。“一般人们认为特效是非常专业的，计算量很大，我希望在低耗能设备，比如手机上实现特效，将精彩的特效技术带给每一个普通的用户，用手机就能拍出电影般梦幻的特效效果。”郑文说。Y-Lab实验室通过深度学习技术最新开发的手机软件，成功标注了摄像头中人体影像的各个关节点，实现了关节点随着人体运动的实时捕捉。未来，这项人体姿势估计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特效，简单操作就能让视频中的人变身特效角色。

朗格兰斯觉得这很有趣，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能够代替很多复杂的手工工作，让人更加专注于创意。“我们正处于一场技术革新的起点，我也很好奇，技术会将我们带向何处。”

他也承认技术的弱点，在所有的特效中，数字化的人类影像是最难制作的。他们已经创造出非常逼真的猩猩，但是创造真实的人类仍然很困难。

郑文解释：“我们对人类的表情和动作太过熟悉，一些造型如果过于接近真人，但凡有一些不自然之处，人类就会敏感地意识到这些角色看上去不对劲，让人反感，这就是恐怖谷效应。只有跨越了恐怖谷，人们才难以区分CG人物和真人之间的区别。而对于猩猩，我们并不熟悉它们的表情和细节，略有不自然之处我们也不会察觉。”

所谓的恐怖谷效应，是1970年日本学者森政弘提出的人类对拟真机器人的情绪假说：一个机器人表达出来的外观和情感与人接近到某一个点上的时候，会导致人对它产生强大的排斥力。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CG人物的塑造，想要跨越恐怖谷，尤其是表达真实的人类角色，至今为止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电影《贝奥武甫》和《极地特快》，包括最早的《最终幻想》都证明了一点：现在的技术还无法真正突破恐怖谷效应。之后的《阿凡达》和《猩球崛起》都理性地往后退了一步，比如《阿凡达》中的纳威人和恺撒一样，毕竟不是真人，角色通过皮肤颜色、质地、纹理，以及鼻子、耳朵的形状等设定，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外星人，从而聪明地规避了恐怖谷效应。接下来的《创战纪》《速度与激情7》《本杰明巴顿奇事》《终结者4》《终结者5》让老人变年轻、让死人复活，也是适度使用技术制造了以假乱真的效果，但是离塑造真正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都非常丰富的CG人物，还有一段距离。

在美剧《西部世界》里，当机器人和人类已经分不出彼此的时候，人类对他们的情感反应会再度回到正面，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移情作用。如果人类能突破恐怖谷效应，我们将彻底分不清银幕上究竟是真正的人类演员还是他们的智能化身。

除了真实的人类，朗格兰斯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他们做不出来的东西。“电影特效开创了以前只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世界，我们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任何视觉效果，更大的挑战是人的想象力。”

BBC 电视电影《死于独特》剧照

死于独特

文 悦涵

这是一出英伦“恶少文化”导致的悲剧，然而离我们的现实也并不远。

《死于独特》是今年 6 月 BBC 推出的一部电视电影。影片根据兰开夏郡一起真实案例改编，并得到了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合作与支持，还原了整个事件。

2007 年 8 月，苏菲·兰开斯特（Sophie Lancaster）和男友罗伯特·莫尔特比（Robert Maltby）在公园被一群青少年地痞袭击，21 岁的罗伯特身受重伤，20 岁的苏菲因保护他被活活打死。而这一切似乎只是因为他们造型独特的哥特装扮，片名《死于独特》（*Murdered for Being Different*）就是由此而来。虽然事后，幸存者罗伯特认为将苏菲的死简单归结于她的外表，这种说法“太简化”，苏菲被杀，就是因为施暴者本身的邪恶。但无论如何，这个片名本身还是极易吸引人的眼球。

影片刚开始，唇环、脏辫、黑眼线等哥特打扮的罗伯特和索菲，被当地青年麦克在超市中搭讪。他欣赏他们的穿着、发型，邀请他们一起去午夜的公园中玩。在现实生活中总遭人误解和排斥的哥特，不太经常遇到欣赏他们的陌生人，于是，罗伯特和苏菲前往了。他们受到了这群年龄比他们小四五岁的青少年友好的欢迎。一群年轻人，一起拍照、聊天、笑闹，这本该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结识新朋友的午夜。谁料，画面很快切换，罗伯特和苏菲双双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

接下来，影片将这对情侣两年前的生活片段与遇害当晚的抢救片段交相剪接，继续增加这一事件的悲剧性。这两个互相依偎、互相取暖、在空旷楼顶点煤油灯一起读《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的灵魂，内心都

有着丰富自我，本不该这么年轻就死去或受伤。

这部电影，引出了英国社会长期存在且政府一直没有推出有效措施避免的“恶少文化”（Yob Culture）。

“Yob”(恶少)这个词,是一个英国特有的口语词汇，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它最初只是“男孩”的意思，如今指粗鲁、不懂礼貌、无知的青少年，尤指这些人中实施暴力行为者。而英国臭名昭著的“恶少文化”，通常指一大群举止粗野的青少年、足球队成员、问题少女，群聚在一起，喝酒、胡闹，并时常伴以暴力袭击他人行为。2005年4月，震惊曼城华人社区的外卖店主、中国移民黄锦全被当地青少年狂殴致死事件，就是这一“恶少文化”暴力伤害的典型代表。

午夜的英国大街，时常能见到一伙一伙的年轻人，手上拎着从超市买的酒和零食，找任何一个僻静隐蔽、可以喧闹的场所，一起喝酒、聊天、玩闹。酒吧太贵。于是年轻人的这种消遣方式，在英国并不少见。可是，据BBC新闻，这些“恶少”所犯下的暴力罪行中，大都和酒精有关。据英国内政部数据，英国40%的暴力案件、78%的袭击者以及88%致损性犯罪，都是在酒精影响下进行的犯罪行为。

英国浓厚的酒精文化氛围，使得青少年过早接触饮酒。全英约有8万多家形式各异的酒吧。在英国，饮酒是一种像喜爱足球那样的全民现象。当处在一种所有人都以为“晚上喝一点小酒”是一段愉快时光的社会背景下，很难禁止荷尔蒙活跃的青少年进行效仿。《哈利·波特》系列的主演丹尼尔·雷德克利夫说，在英国年轻人中，有一种以狂饮、滥饮、一醉方休为荣的不良文化，很多年轻人经常因受同伴压力被迫拼酒。

《恶少王国：英国恶少文化真相》（*Yob Nation: The truth about Britain's yob culture*）的作者弗朗西斯·吉尔伯特（Francis Gilbert），认为政府与贪婪的制酒行业因巨大的利益互相勾结，加重了青少年群体中的“酒精犯罪”。同时，撒切尔时代鼓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现实主义，为如今日益激烈的童党犯罪埋下了种子。英国旧有的“社区”观念，在这一时期被注重个体的新观念打破。同住一片社区的人，联系没有了过往的紧密，开始“各扫门前雪”。

为试图预防恶少犯罪，布莱尔政府曾试图推行一系列措施：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宵禁或对未成年饮酒者立即去往最近的ATM机实施现金罚款。但这些措施均因破坏未犯罪者的人权等原因，还未推出就被否决。

《恶少王国》的作者弗朗西斯·吉尔伯特（Francis Gilbert）走访全英社会，采访各社区青少年帮派、恶少事件受害者、毒贩、警察、记者、社工、便利店主、酒吧工作人员……他甚至去了地中海区域最受英国年轻人欢迎、以“24小时狂醉”而著称的Ayia Napa（位于塞浦路斯），最终，得出一种并不乐观的事实：英国年轻人大量受“不顾一切”的文化影响，虐待型、色情的语言和口头禅，霸凌、饮酒、毒品、青少年性行为等被认为是很“酷”的事。电视等流行文化中大量暴力和粗俗言语、色情画面以及霸凌场景的增多和鼓吹，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形成。

“招摇，是恶少文化的核心。”弗朗西斯·吉尔伯特在一次采访中说，“恶少和通常意义上的罪犯并不一样。通常罪犯是希望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罪行、尽可能隐藏起来的，但恶少们却希望他们的恶行被看到、被谈论、被同龄人仰视。”

在《死于独特》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见打出第一拳的那个男生，是受不了同伙的激将法。而当第一拳挥出后，更多的拳脚才随之下来，一切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不可控。吉尔伯特曾采访的一个恶少告诉他，当他欺负人时，他喜欢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让他们来看，“我喜欢那种公开羞辱受害者的感觉，享受于看到他们脸上的恐惧”。

《死于独特》开拍时就定义为针对青少年群体推出的电影。主创及参与的受害者家属，均希望这部电影能唤醒年轻一代严肃的认知，从根本上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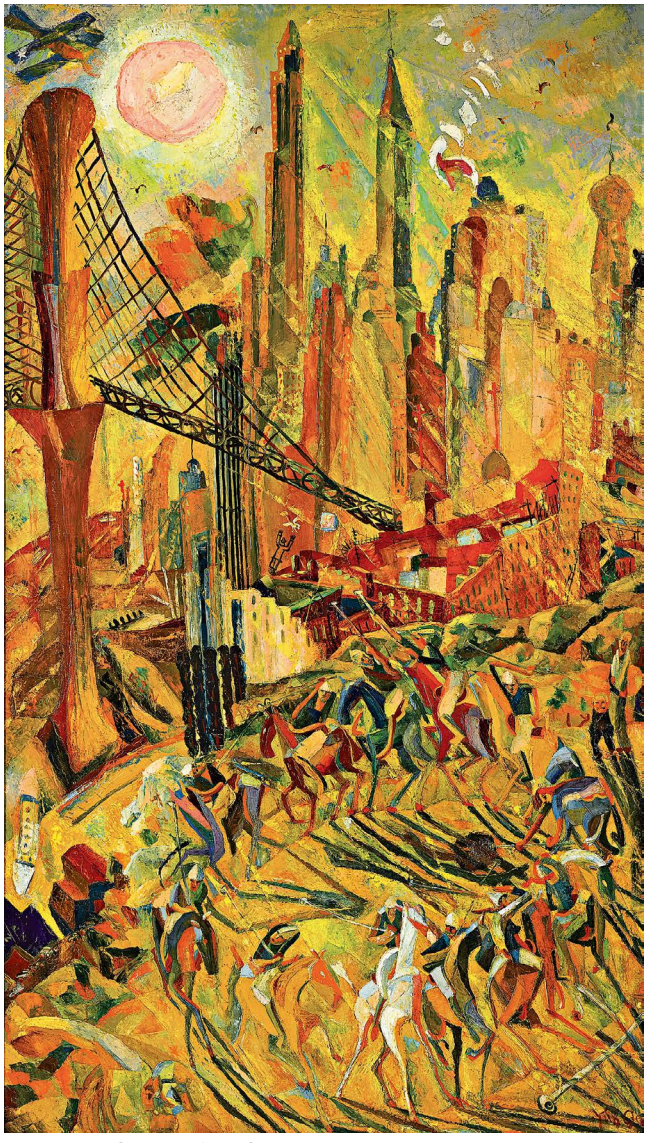
想得到群体认同，是罗伯特和苏菲当初走进那个公园的根本原因。想得到群体认同，也是恶少文化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吉尔伯特认为，中产阶级恶少的出现是由于父母永远不懂如何正确在子女间设置“界限”、不懂对孩子说不。工薪阶级（Working Class）恶少是由于为了融入其所属的阶层和大环境，再加上教育的缺失，使他们没有正确引导。大量青少年怀孕现象以及青少年单亲妈妈的出现，也是恶少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电影《死于独特》中，童党里有一个稍具良知的麦克，他没有参与殴打但也只是呆呆站在那儿什么都没做。麦克就是出自一个青少年单亲母亲家庭，他母亲生下他时自己还是个孩子。长期没有男性角色模范又缺少男性认同，使他过早地加入恶少团体。

古老的兰开夏郡，景色依旧。这种平静小镇下的罪恶和远处美到发颤的景色，在影片中形成一种触目的反差。影片所揭示的英国独有的“恶少文化”，让人震惊，但也具有更广泛的全球意义。因为放眼望去，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童党霸凌现象，都不算少见。

第一代旅美画家朱沅芷在纽约

记者 张星云

9 月底，第一代旅美华裔画家朱沅芷的代表作《工业之轮在纽约》75 年来首度被拍卖。作为 20 世纪初中国第一代留学海外艺术家的一员，朱沅芷的绘画风格、艺术追求，乃至人生轨迹，都显得与众不同。



（Courtesy of Estate of Yun Gee 供图）

朱沅芷代表作《工业之轮在纽约》

与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吴大羽、庞薰琹等当时一众旅日、旅欧派画家相比，同时期旅居美国的朱沅芷并没有学成回国，像那些画家一样投入到“革新国画”“融合中西”的阵营中。他 15 岁离开广州老家移居旧金山，之后选择留在了美国，参与到美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还曾两度闯荡巴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那场欧洲现代艺术运动的亲历者。

可惜的是，朱沅芷在创作生涯晚年处处碰壁，并在贫苦中离开人世。他前卫的艺术风格和自己命名为“钻石主义”的绘画理论，直到他离世几十年后才被逐步发掘研究。而《工业之轮在纽约》这幅作品，便是他回避奇观似的东方主义，而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的绘画探索的证明。

布鲁克林与曼哈顿

《工业之轮在纽约》其实是一个命题作文。1932 年，纽约现代美术馆搬迁至现址，策划了开幕展览“美国画家和摄影家壁画展”。朱沅芷得到展览命题“战后的世界”后，决定将纽约最经典的景观布鲁克林大桥和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作为自己作品的主要对象。

朱沅芷采用了一种近乎宋代山水画式的垂直全景构图，展现的却是美国的城市景象。画面色彩丰富，元素复杂，构图布局却十分和谐。他通过大城市、工业社会与机械文明的各类元素的叠合，将美国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高速发展的现代国家气象在画布上呈现出来。画面整体呈现暖黄色调，将纽约表现得生机勃勃。

朱沅芷所展现的，是在经历“狂飙 20 年代”之后，已经成为国际大都会的纽约。画面左上角呼啸而入的双翼飞机，象征着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科技的腾飞，而曼哈顿高楼和耸立的布鲁克林钢铁大桥，则把一尊古希腊罗马雕像“掷铁饼者”挤到了整幅画面的左下角，预示着 20 世纪的美国产物将压倒欧洲文明的源头希腊和罗马。

12 位玩马球的企业家围绕成圈，被置于近景处，占了整幅画面将近一半的比例，凸显他们的地位，代表着美国的工业社会精神——虽然美国立国源自欧洲移民，但社会没有根深蒂固的贵族阶级，财富不源于

世袭，而来自个人智慧和努力。随着19、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发展，美国成功走出欧洲阴影，反客为主领导世界。画面中打马球的企业家们围成了圆形逆时针转动，与作品名中的“工业之轮”寓意呼应，也与展览命题“战后的世界”吻合。

《工业之轮在纽约》的诞生，标志着朱沅芷将精神内心具象化的“钻石主义”绘画风格趋于成熟。

两次巴黎之旅

《工业之轮在纽约》创作于朱沅芷两次巴黎之旅之间，因此更被视为他独特的作品。

1921年，初到美国的朱沅芷考入加州美术学校，师从欧蒂斯•欧菲德（Otis Oldfield），深受立体派、野兽派及共色主义的影响。1926年冬，学成后的朱沅芷举行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并结识了穆哈特王子夫妇，他的才华被这对法国贵族所赏识，经由他们赞助，朱沅芷得以前往巴黎深造。

第一次去巴黎，投入美术馆和前卫艺术家沙龙的朱沅芷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与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成了朋友，深受象征主义影响。他的作品进入了独立沙龙的展览，而且在巴黎历史最悠久的画廊举办了个展，艺评家对他的作品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这是他短暂一生最为意气风发的阶段。

可惜好景不长，在巴黎的风生水起随着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戛然而止，赞助人无力继续对艺术家资助，失去庇护的朱沅芷只得黯然返回美国。回到美国后的朱沅芷在1932年用尽之前所学创作了《工业之轮在纽约》，尽管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时受到《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艺评家的称赞，但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机会。当时在纽约，抽象表现主义处在上升中，而朱沅芷的作品大多有着象征风格以及3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审美风格，因此并不得当时美国画商和艺评人的青睐。

在纽约未取得期待的成功，朱沅芷于1936年再次返回巴黎。怎奈此时的巴黎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边缘，他曾结交的先锋派画家们正在忙于逃离，朱沅芷待了三年后，便赶在大战前回到了美国。尽管短暂，但在他回到美国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了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达达画派对他创作的影响。

在美国，晚年的朱沅芷更不得志。他不得不在画室中以教授艺术课程为生，并多次变换不同的工作，贫困潦倒，但其艺术创作并未停止。1962年他在纽约举办了最后一次个展，一年之后，他病逝于家中画室，仅57岁。

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朱沅芷在艺术史上近乎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康涅狄格大学的威廉·本顿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首次朱沅芷作品回顾展，他作品的命运才发生了改变，有关他的人生经历及其艺术价值逐渐被挖掘研究。美国艺术档案馆总监保罗·卡尔斯特罗姆指出，朱沅芷绘画作品包含了三个维度：现代性、个人主义、种族和世界主义。他认为，朱沅芷本身明确的华裔身份标签不但没有限制其艺术创作，反而将众多元素融合在了一起，既有世界主义的眼界，又将个人生活经历用视觉化的手法表达出来。

东西方融合的母题

融合东西绘画精神是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求学海外的画家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这种结合对朱沅芷来说并不存在矛盾。当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像一个中国画家那样作画？你为什么不画些花鸟？”朱沅芷回答：“因为我身处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我又不是站在山顶上俯瞰大自然。”他还曾经批评一些东方派画家，认为他们一味迎合西方人对于东方情调的想象。

在朱沅芷的作品中，不容易找到明显属于东方或西方的绘画元素，他深受亚、欧、美多种文化的熏陶，将自己的各种经历与现代的表现形式融合统一。在《工业之轮在纽约》中，我们看到他是站在西方色彩和构图语境下，表明他要展现他所生活的现实土地的样子，而非曾经的乡愁或者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朱沅芷被重新发掘研究后，他的作品陆续进入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等重要美术馆收藏。

在海外漂泊几十年后，朱沅芷的作品也得以回到故土中国。1992年台北市立美术馆举行了“朱沅芷的艺术”大展。2007年，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在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当代艺术馆策划了“美国艺术三百年”大型巡回展。在展览图册中，朱沅芷被作为美籍华人艺术家的先驱重点介绍，其中《工业之轮在纽约》被视为朱沅芷的代表作品。

在艺术市场，1992年，苏富比最早将朱沅芷作品带到香港与台北。与《工业之轮在纽约》同时诞生的三联屏《旋转木马；日光浴者；现代公寓》，曾在2014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被以两倍于估价的价格购入收藏。

1

2

3

格子，格子，还是格子

记者 ✎ 杨聃

这些横竖条纹相交的图案兼并了老气与时髦，反叛与正统。

威尔士亲王格(Glen Plaid)、斯图尔特格(Royal Stewart tartan)、千鸟格（Houndstooth)、玻璃格(Windowpane check)，哪怕是餐布格（Gingham)，只要能穿对一种就算是赶上了 2017 秋冬的主题之一——格纹潮了。从年初的纽约和米兰时装周上都已经发出了预告，T 台上林林总总的造型中，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阵营，要么是保留传统的套装风，要么是具有视觉冲突的混搭派。

前者自然少不了主打“复古华丽”的古驰，红红绿绿的大面积格纹搭配同样高饱和度的动物印花针织衫和配饰，着实要把“极繁主义”进行到底。香奈儿收紧了千鸟格阔腿裤套装的腰线，在领子和

1. Celine2017 秋冬时装

2. 玛丽莲·梦露穿着餐布格裤

3. Delpozo2017 秋冬时装

4. 渡边淳弥 2017 秋冬时装

5.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2017 秋冬时装

6. Sea2017 秋冬时装

肩膀的部分增加了膨胀感。芬迪如果去掉那颜色醒目的毛茸茸的袖口，那件灰白格长风衣恐怕和古装店里的存货就没啥分别了。从葆蝶家的秋冬广告主打款看来，双排扣、渐变色与修身剪裁，老气与时髦仅是一念之间。

后者的翘楚是被拉夫·西蒙斯改造过的 Calvin Klein，今年的格纹混搭 PVC 雨衣的设计有一种让老花穿出潮牌的感觉。Off White 用威尔士亲王格西装搭配仙女裙，脚踩一双球鞋，时尚绝缘体们可能会觉得这看起来有种“三代同堂”的即视感。然而最具“魔幻现实主义”的非普拉达莫属了：反戴围巾，把 60 年代的小说封面当印花，不同颜色和质地的拼接让这件具有红黑呢格元素的外套既文艺又摩登。

事实上，把所有横竖条纹相交的图案统称为格子的做法有点不够严谨，就拿斯图尔特格和餐布格来说，它们不仅国籍不同，各自代表的“刻板印象”也相距甚远。

人人都知道斯图尔特格来自英国。在罗伯特·贝恩（Robert Bain）所著的《苏格兰的宗族和格子呢》（*The Clans and Tartans of Scotland*，1983）一书中，讲述了苏格兰格子呢可被用来区分不同地区的居民和宗族。岛屿和大陆的高地居民穿着并不一样，即便是岛屿之间，各种格子呢的纵横方式的排列和颜色也有所不同。伴随着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创作的奥西恩（Ossian）诗歌，以及被沃尔特·斯科特（Sir Walter Scott）的著作启发的“高地浪漫复兴运动”（Highland Romanticrevival），格子呢在 19 世纪的民间获得了

左图：奥黛丽·赫本的经典格子装形象

右图：范思哲2017秋冬男装

更广泛的普及。同时，在格具（Tartanware）如首饰盒、鼻烟盒、餐具、缝纫机配件等生活用品中，“麦克唐纳”（McDonald）格、“麦格雷戈”（McGregor）格，“麦克白和查理王子”（MacBeth and Prince Charlie）格都是被经常用到的装饰纹。

当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购置了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 Castle），并聘请了当地的建筑师将城堡改造成为“苏格兰男爵”风格时，阿尔伯特亲自主持了室内设计，他大量使用了红色“皇家斯图尔特”和绿色“狩猎斯图尔特”格子呢地毯，就连窗帘和室内装饰也采用了“斯图尔特”格子。维多利亚女王还为此创立了吉利斯舞会，每当她入住巴尔莫勒尔堡就会邀请周边的邻居和城堡里的人来热闹一下，舞会要求皇室的绅士们穿上“高地”服装，而皇室的淑女们则要穿晚礼服搭配斯图尔特格子绶带（sash），这一传统被延续了下来。

在1971年吉利斯舞会上，伊丽莎白女王穿那件缎面刺绣晚礼服的绶带比以往多了一丝短披肩的意味。礼服的设计师是诺曼·哈特奈尔（Norman Hartnell），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为伊丽莎白置装。这个设计后来也被亚历山大·麦昆借鉴过，2006年麦昆和萨拉·杰西卡·帕克出席大都会博物馆的酒会时就穿了“异曲同工”的苏格兰格纹装——Widows of Culloden系列，其实这一系列是为了讽刺时尚界是如何商品化英国化原材料的。

相比之下，餐布格则少了这份“持重”。据说，原产于法国甘冈（Guingamp）小镇的条纹布料在17世纪随着贸易全球化传遍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曼彻斯特的面料厂将原本的两色条纹纵横相织，相交处的颜色叠加产生了第三色，便形成了现在所谓的餐布格状。作为面料，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正反之分。

如果没有吉尔伯特·阿德里安（Gilbert Adrian），恐怕餐布格真的离不开餐桌和野餐绿地了。这位当年领导着好莱坞电影工作室服装部门的设计师，不仅创建了女演员的着装风格，还制造了各种时尚热潮，餐布格裙子就是其一。这是他专门为朱迪·加兰（Judy Garland）在电影《绿野仙踪》（1939）

中的设计，凯瑟琳·赫本在《费城故事》（1940）里也穿过。

后来，玛丽莲·梦露在杂志的大片中，那身黑色高领针织衫搭配餐布格裤装的造型成为经典。《窈窕淑女》中的奥黛丽·赫本、《与我同舞》中的法国女星碧姬·巴铎都成了银幕上餐布格的“代言人”。碧姬·巴铎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以粉色餐布格连衣裙代替了婚纱，从而引发了法国餐布格布料的供不应求。到了90年代，餐布格被做成胸衣套装被辛迪·克劳馥、娜奥米·坎贝尔这些超级名模演绎后增添了高级的性感。

不可否认，女人爱格子，男人也是如此。西装一直在“深色、亮色、格子以及条纹”这四种流行趋势间反复了几十年，近年来，格子衬衫更是无处不在，作为一种对过于精致的都市型男和全套定制的花花公子的对抗。随着“木匠美男”(Lumbersexual）的出现，这些身形健壮、留着杂乱胡子的男士们把棉质格纹衬衫当成了一种宣言。被称为木匠美男是因为看他们的装束感觉随时都可以去野外求生，他们是时尚潮人和户外爱好者的结合体，混迹于酒吧，手里把玩着苹果电脑。

“这种花纹具有两面性，”《格子：改变世界的织物》（*Tartan：Textiles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乔纳森·费尔斯（Jonathan Faiers）博士对《卫报》说，“它融入了氏族，贵族和军事等历史的建立。一方面它是粗犷的男子气概的制服，讽刺的是它也成了亚文化如垃圾摇滚（Grunge）、朋克和同性恋文化的表达。”在费尔斯看来，在经济衰退时期，格子又能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你可以把它放在社会学的范畴里，能这样做的材质并不多。”

70年代在朋克音乐兴起的时候，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就开始使用格纹元素。她为丈夫所管理的乐队设计服装，其中就包括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韦斯特伍德的商店SEX，也是当时朋克青年喜欢光顾的地方。她自己就喜欢穿紧身衣搭配格纹外套。因为图案原本包含英式传统的保守与权威，那些迷失的青年们通过格纹服装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怒，比如把它撕成一条条，或者当作枷锁等束缚物来佩戴。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展览“朋克：从混乱到高级定制”中，表达了朋克对于后工业化的材料的使用和其非常规的对称性激发了时装设计师的灵感。

法兰绒格纹衬衫成了90年代垃圾摇滚的标配，涅槃乐队、Breeders和珍珠果酱乐队都穿着格纹衬衫演出，这也激发了设计师马克·雅可布臭名昭著的Grunge风格。从1993年开始，他也加入了“格纹控”的大营。流行文化似乎铁了心要保持格纹的这种“亦正亦邪”的立场，于是就有了1995年电影《独领风骚》（*Clueless*）中女主角雪儿的着装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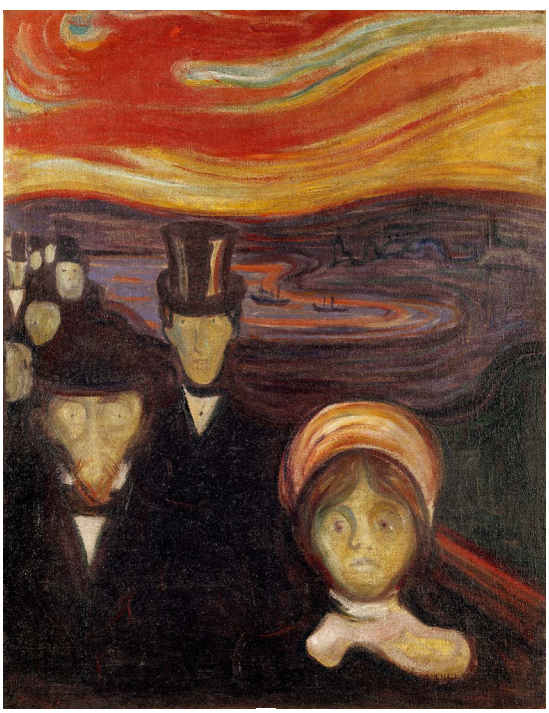
再回看2017年秋冬的秀场，日本设计师渡边淳弥（Junya Watanabe）的设计毫无疑问汲取了朋克的元素，比如模特色彩艳丽的头发，和靴子搭配网袜。不论是其自有品牌还是Comme des Garcons，他一直在努力将其代表性的格纹运用到不同设计当中。通常亚文化风格中的格纹呈现的都是粗糙及漫不经心，此次渡边淳弥反其道而行，通过解构与重新拼贴，呈现了一番魅惑与精致。

似乎时尚很难逃离格纹这个主题了，谁让这些横竖条纹相交的图案兼并了老气与时髦，反叛与正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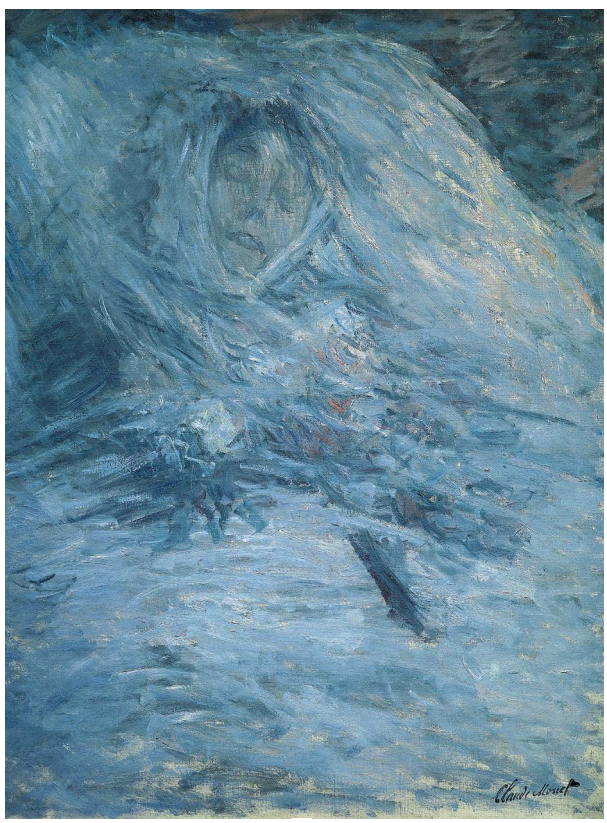
香奈儿2017秋冬时装

1

2



3



4

天才与疯子

——创造性大脑的秘密

主笔 陈赛

在数学家约翰·纳什的传记《美丽心灵：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生中的天才、疯狂与再度觉醒》中，作者西尔维亚·娜萨曾经写过这么一个故事。

纳什在迈特仑精神病院的时候，一位同事来看他，问："您是一位数学家，献身于理性与逻辑的真理，为什么会相信外星人在向你发送信号，招募你拯救世界这种无稽之谈呢？"

纳什的回答是："因为关于外星人的想法进入我的脑子，与数学创见进入到我的脑子的方式是一样的，我同样认真对待。"

有些人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是错的，我们管他们叫疯子；有些人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是对的，我们管他们叫天才。对有些人来说，比如约翰·纳什，则是两者皆是。

不久前在做抑郁症的封面时，我发现人类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天才人物都曾经患过抑郁症或者双向躁郁症。在与精神障碍的战争中败下阵来的自杀者名单里，有一连串光彩夺目的名字：凡·高、叶赛宁、海明威、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亚·普拉斯、马克·罗思科、安妮·塞克斯顿、戴安·阿勃丝、阿希尔·高尔基……

为什么这些最才华横溢的大脑，同样承受最大的精神痛苦？精神障碍与天才之间真的有关联吗？如果有，到底是精神障碍造就了这些创作者独特的创造力，还是在他们年轻时期短暂的爆发之后破坏了他们的创造力？或者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天才与疯狂

最近，我在读美国心理学家N.C. 安德里亚森的一本书《创造的大脑：关于"天才"的神经科学》，发现她也为这些问题着迷，而且她花费了30年的时

1.《加歇医生的肖像》，凡·高，忧郁症

"我有一张加歇医生的肖像，带着这个时代无比忧伤的表情。你可以说，有一点像耶稣在橄榄花园里。"—— 1890年，凡·高写给高更的一封信。

凡·高患有严重的躁狂抑郁症，他的很多作品映射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逐渐走向疯狂时的竭力挣扎。据艺术史专家分析，《鸢尾花》中线条的交错表现了他因疾病而产生的内心烦躁，《橄榄树》中弯曲的线条造成了橄榄树正在进行斗争的感觉，《阿尔卑斯山麓》表现了他强烈的内心痛苦，而《星夜》中陷入一片黄色和蓝色漩涡的天空则让人生出一股绝望的恐惧。

凡·高于1890年6月，也就是在自杀前一个月，为精心照顾他的加歇医生画了这幅油画。加歇医生与凡·高之间的关系很特别，他本人热爱艺术，是一位业余艺术家，同时他也患有抑郁症，也以自己的职业获得情感与智力上的满足。

2.《仙女们的妙举》，理查德·达德，精神分裂症与精神病

理查德·达德，英国画家，维多利亚时期最有才华的画家之一，被认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26岁时他精神分裂症发作，亲手用刀捅死了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伪装的魔鬼。后来他逃亡到法国，并企图杀死一名游客，最后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治疗。他大部分最知名的作品都是在精神病院期间完成的，包括这幅《仙女们的妙举》。画家运用幻想与荒诞的手法，描绘了神灵的世界。人物形象或被扭曲，或被夸张，或被变形，或大或小，都穿行在植物的枝叶间，这是仙女们对他们开的玩笑。

3.《焦虑》，蒙克，焦虑／愤怒

蒙克一生充满忧患离散。5岁时母亲去世，14岁时姐姐去世，两人都死于肺结核。他自己也得过肺结核，但幸存了下来。他的父亲患有精神病，他一再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对地狱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如果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犯有罪孽，就会注定被投入地狱，没有任何宽恕的机会。

《焦虑》是蒙克1892年的作品。据说是一天傍晚，他在镇上遇见一群默默走路、脸色苍白的人们，像是一群活的幽灵在赶往自己的墓地。蒙克曾经描述这种景象使他的焦虑达到顶峰，进入一种抽离了一切情感的静默状态。评论家认为，这幅画体现的是集体的绝望，不像《呐喊》那么尖锐，但包含了持久的愤怒。也有人认为表现的是悲伤和心碎。

4.《临终的卡米尔》，莫奈，居丧：应对失去

这是莫奈为妻子卡米尔临终前画的一幅画。当时卡米尔只有32岁，后人猜测她可能是患有盆腔癌。这幅画在莫奈有生之年从未展出过。40年后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回忆这幅画说，"在卡米尔的病床前，我十分本能地对那已无表情的年轻面孔仔细端详，观察搜索死亡在她面孔上引起褪色的迹象，看到的是蓝色、黄色和灰色的细微变化。于是，萌生出一个念头，要为这即将离开我的爱人画最后一幅画。"

莫奈的传记作者保罗·塔克认为，很可能是居丧哀悼前期的悲伤以及与之相伴的拒绝与否认，让他以如此客观的姿态画下了这幅画。这幅画不仅仅是莫奈被变幻的色彩所震惊，也是他唤起平静与痛苦、悲伤与庆祝——那些正在应对死亡的现实的人所感受到的。

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

间，从文学、历史、心理学、神经科学中，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安德里亚森被认为是20世纪创造力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她之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精神障碍的神经科学基础，后来转向“天才的科学”，探究到底是什么元素造就了那些极富创造力的大脑。

安德里亚森读幼儿园的时候测过一次智商，被宣布是一个“天才”,不过那是30年代,母亲警告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女博士，但她最终还是成了一个文学女博士，后来又做了神经科学家。

在书中，她特别谈到自己的人生与美国著名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她们同一年获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普拉斯靠着这笔奖金去了牛津大学，而她拿着奖金去了剑桥大学，都是学英国文学。相似的天赋、经历和人生旨趣，结局却完全不同。为什么？她说，这个问题一直影响着一生的研究。

1987年，她在爱荷华大学工作期间，第一次运用结构性访谈、对照控制组等科学方法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对作家躁狂抑郁症的系统缜密的研究。这项研究历时15年，研究对象包括30名爱荷华大学的作家研修班（美国最古老、最著名的创意写作课程），其中包括库尔特·冯内古特、理查德耶茨、约翰·契佛等。而且，她的诊断是根据当时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进行的。

一开始，她的假设是，创造力与家族精神分裂症之间可能有关联。据她所知，乔伊斯、爱因斯坦、罗素都有精神分裂症的家族遗传。

她设想，创造性想法的出现可能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思维过程——无意识状态下，各种联想自由组合飞舞，各种思绪在成型之前暂时处于无组织状态。这个过程与精神分裂症发病时的状态很相似。瑞士精神学专家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最早发现并发明“精神分裂症”这个疾病名称时曾经描述它最重要的特征是“联想松弛”。

事实上，疯狂与天才之间的关联是西方文化长久以来的一个迷思。如亚里士多德曾说：“那些在哲学、政治、诗歌和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都有忧郁症的倾向。”

莎士比亚的戏剧里，疯子与天才，也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仲夏夜之梦》里，雅典大公希修斯观察，“疯子、情人、诗人都是想象的产儿”。

19世纪的意大利医生切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1835～1909）是犯罪学领域的先驱，但他同时也对天才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充满兴趣。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天才与疯狂乃是精神错乱的一体两面。”

1891年，隆布罗索写了一本《天才论》，考察

了文学、艺术和其他领域中数以百计的天才人物，总结了天才特征如下：左撇子、禁欲、口吃、早熟、神经质、精神错乱。他认为这些特质可以在很多具有创造力的人身上找到，包括卢梭、牛顿、叔本华、达尔文、拜伦、波德莱尔、舒曼等。他特别举了叔本华的例子——“（叔本华）向我们表现出是一个十足的疯癫的天才。”

叔本华的妄想症症状包括：“他总是住在底层，以防发生火灾；不放心让理发师为他理发；把金币藏到墨水瓶里，把信压在床单下。他害怕拿起剃刀；害怕不属于自己的被子会传染某种疾病……”

叔本华本人也写过《论天才》的论文，特别提到了天才与疯癫的关系。他认为：“天才与疯癫直接临近的事实可以由天才人物如卢梭、拜伦、阿尔菲耶里的传记得到证明。”同时，他还以自己的亲身见闻作为佐证，“在经常参观疯人院时，我曾发现过个别的患者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禀赋，在他们的疯癫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天才……”

他解释这种天才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的生理结构异于常人。他认为，天才人物是因为“智力的异常剩余”，比如普通人是 1/3 的智力加 2/3 的意志，天才则是 2/3 的智力加 1/3 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智力忽然摆脱意志的羁绊而自由奔放”，而人的智力一旦超出通常的限度，作为一种反常现象就已经有疯癫的倾向了。

天才与情绪障碍

安德里亚森的研究第一次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证实了关于创造力与精神障碍之间，两种众所周知，但又互相冲突的观念：

“一种观点认为，天赋异禀的人在很多方面是超常的。我研究的这些作家显然如此。他们幽默、自律、善于表达，极富个人魅力。他们每天的日常安排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早起，将一天最早最好的时间用于写作，与朋友和家人之间也维系良好的关系。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符合弗洛伊德对幸福所下的定义，‘爱与工作’。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展现了人们关于天才的另一面的想象：很多人经历了痛苦的情绪障碍，这些情绪障碍发作时会阻碍他们的创造力，但并不是永久性的，很多时候甚至为日后的写作提供强有力的素材，如华兹华斯所说的‘宁静中回忆的情感’。”

但是，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研修班里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显示有任何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真正的关联是双向躁郁症——30 位作家中出现情绪失常和嗜酒的比例极高，有 80% 的人至少发作过一次狂躁症，而控制组的比例只有 30%。

这是安德里亚森最意外的发现。对此，她的解释是——艺术创造的本质，尤其是文学，可能与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精神障碍无法相容，因为精神分裂症导致的认知混乱与社交孤僻，无法支持写作这样一种需要长期、持续专注力的创造性活动。

事实上，她的发现与之后不久英国心理学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英国做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贾米森分析了英国 47 位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发现其中 38% 曾经因为情绪障碍而就医，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剧作家，其次是诗人。

贾米森本人也是双相障碍症患者。她曾经在自传《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 30 年》中提过，她很长一段时间明知自己有病却不愿意服药，就是因为不愿意放弃躁狂发作时的创意迸发。

爱德华·蒙克，另外一位双向情感障碍症患者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对生命的恐惧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就像我的疾病……没有焦虑与疾病，就像船没有舵。我的苦难是我和我的艺术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它们无可分辨。毁灭了它们，也就毁灭了我的艺术。”

20 世纪 50 年代，哈佛医学院的约瑟夫·希尔德克劳特（Joseph Schildkraut）曾经专门以画家为样本，收集了 20 世纪中期 15 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发现其中一半有精神障碍病史，大部分是抑郁症和双向抑郁症，一半的画家没有活过 60 岁。

“天才”如何测量?

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科学界普遍的认可，一是因为其中大量材料来自历史文本或主观经验，样本对象也过于狭隘；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人对天才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弗朗西斯·高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对天才的标准是很高的。他认为 100 万人中大约只有 250 人的智力属于优秀，只有 1 人可算是“杰出”，称得上天才的人物更是少之又少。

而且，他认为真正的天才是天生的，他曾经著有一本《遗传的天才》，提出了大量关于智力遗传的

论据，还提出智力能力在人群中呈正态分布的观点。他以相当严谨的方法研究智力天赋的家族谱系，列出了来自 300 个家庭的近 1000 个知名人物的数据，比如巴赫家族有 20 多位杰出的音乐家，勃朗特家族中 3 位杰出的作家，可见天才是有强烈的遗传因素的。他还深入探讨了天才的发展之路上先天与后天之间的关联。

事实上，弗朗西斯·高顿本人就是天才天生的最佳案例。他的外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是一位诗人、医生、进化论理论家。他的表兄是查尔斯·达尔文，他自己也从小聪颖过人，4 岁能写诗，5 岁能背诵苏格兰叙事诗《马米翁》，6 岁熟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7 岁能欣赏莎士比亚名著，对博物学产生兴趣，并按自己的方法对昆虫、矿物标本进行分类。

1904 年，英国医生艾利斯（Havelock Ellis）也是创造力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出版了《英国天才的研究》。他翻阅了 66 卷本的《英国名人词典》（*British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3 万名公众人物的传记，从其中挑选了 1030 名他心目中的天才（其中只有 55 名女性），发现其中 8.2% 患有忧郁症，4.2% 属于精神失常。

“美国智商之父”路易斯·特曼（Lewis M. Terman）是最早试图通过客观手段测量天才的心理学家之一。正是他开发了美国的第一个 IQ 测试。他对于天才的兴趣很可能也与个人经验有关，他从小就呈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特曼也从小天资聪颖，后来成了一名卓越的工程师，曾经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并对硅谷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人称他为“硅谷之父”。

从 1921 年开始，特曼启动了一项长达 35 年的天才跟踪研究计划（他去世之后，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他在加州招募了 1000 多名 IQ（Stanford-Binet 标准）超过 135 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作为研究对象，代表当时加州该年龄阶段最聪明的 1% 人口，并追踪他们之后的事业和人生发展轨迹。

他的目的是，第一，了解天才儿童的最佳培养环境；第二，打破关于天才儿童的一些刻板印象；第三，测试隆布罗索关于天才与疯子一体两面的说法是否成立。

这项研究的确打破了不少关于天才儿童的刻板印象，比如这些高智商儿童总体的身体状况都优于对照组——更高、更健康、运动素质更好，唯一的身体缺陷是近视。他们在社交上也更成熟、更适应。他们的智力优势和人格特质一直伴随他们成年，因而他们也有着更好的婚姻状态和更高的薪资水平。

但令人失望的是，他的“天才军团”中大部分长大后都没有对社会做出什么创造性的贡献，他们很多人从事的都是很普通、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包括警察、文员、海员、打字员等等，其中 30% 的男生和 33% 的女性甚至没能大学毕业。反倒是两位当年因为 IQ 不足 129 而被拒之门外的少年得到了两个诺贝尔奖：半导体的发明者之一威廉·肖克利以及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茨。

所以，这个研究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就是，IQ 与创造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后续的研究多次验证了这个结论，并确立了所谓“阀值理论”，即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智商对创造力的影响不大，大部分有创造性的人很聪明，但并不需要那么聪明，至少不是由传统的智商测试的意义上。智商达到 120，对于一个有创造性的天才而言已经足够。

在大脑里搜寻“天才”的痕迹

如果高智商不等于创造性的天才，那么，创造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多少是先天的遗传，多少是因为后天的努力？如果创造性确实在家族中流传，遗传的到底是什么？作家与情绪障碍之间的关联，是因为写作本身是孤独和内省的活动吗？如果是科学家，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在当下的心理学领域，创造力的测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小 c，即设计创造力的标准化量表，这种方式遭受很多争议，因为人们对于创造力到底是什么无法达成共识。这类量表中对创造力的定义常常是发散性思维，即对一个既定问题给出尽可能多的答案。比如“一个砖的用途”，擅长的人会给出很多可能性，比如筑墙、建花园、作为武器、挡书板……但聚合思维中就没有创造力吗？比如牛顿的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 $E=mc^2$，不都是聚合思维的结果吗？

另一种是大 C，根据一个人的实际成就衡量其创造性。选择一批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发明家、科学家、商业创新者等，这些人都曾经因为某种创造性的成就而得到社会认可（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等）。不过，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其内在的

主观性。比如什么叫“创造”？艺术上的创造性可以与科学、商业的创造性相提并论吗？甚至，科学、商业创新可以被认为是有创造性的吗？

安德里亚森坚持第二种测量方法。十几年后，她选择了第二批“天才”作为研究对象：乔治•卢卡斯、数学家 / 费尔兹奖获得者威廉 • 瑟斯顿，普利策奖小说家简 • 斯迈利，以及六位诺奖得主，分别来自化学、物理、生理或医学。

这一次，除了深度访谈之外，她还要扫描他们的大脑，观察创造力到底是如何出现在大脑里的。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那些我曾经研究过的作家的大脑到底是什么特别之处？通过先进的大脑成像技术，我们能直接在大脑里搜寻‘创造力’的证据吗？”

这件事情的难度可想而知：首先，创造力不可能被浓缩为单一的精神活动过程；其次，即使只考察创造性洞见产生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也不可能通过强迫或者命令产生；第三，即使通过核磁影像技术在大脑中捕捉住了某些与创造性相关的精神活动，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种过度简化的推导，就像之前媒体上轰动一时的所谓破解“爱”“负罪感”“自由意志”的神经学机制都指向单一的大脑区域，但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所以，她真正可以考察的，只是使创造成为可能的那部分精神活动，比如无意识状态。

无意识状态是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德里亚森的很多研究对象都向她确认了这一点。他们通常是酝酿和准备了很长时间，然后在心智比较放松的某一刻，比如开车、洗澡、锻炼甚至午觉时，创作灵感突然造访。比如尼尔 • 西蒙（著名喜剧作家，《欢乐一家亲》的编剧）所说的，“我从不有意识地写作——就好像缪斯坐在我的肩头，突然滑入一种与现实分离的状态”。

怎么在实验室条件下诱导大脑的这种无意识状态呢？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自由联想——没有限制、即兴地表述脑子里正在出现的任何念头——是理解无意识的窗口。

安德里亚森发明了一种随机片段性冥想(Random Episodic Silent Thought，简称 REST）的技巧，可以让实验对象进入一种自由联想的思维状态——让实验对象躺下来，闭上眼睛，放松，让各种想法随意进出脑子，也就是让思维漫游。“这种状态下，大脑的活动非常活跃，但又至少部分处于无意识状态，这是创造力、梦以及宗教体验的源头。”

除此之外，她还设计了其他的诱发创造力的任务，包括单词联想、图像联想、模式识别。她认为，创造力的本质就是制造连接和解决难题，高度创造性的人更擅长辨识关系、制造联想与关联，以原创性的角度看待事物——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因此，这些任务也能帮助她视觉化创造性发生的部分过程。

大脑成像技术证实了她的假设：当执行这四种任务时，“天才组”实验对象的大脑解析联络皮质的活跃度都明显高于控制组（根据教育、年龄、性别与之匹配的普通人）。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如此，说明两种创造性活动的神经机制是相似的。事实上，很多创造性的天才都是博学家，有着广泛的兴趣与领域，这是她的第二批研究对象的一个共同特点。

解析联络皮质

人类大脑中与“自由联想”最为相关的区域。人类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主要来自大脑皮层。大脑皮层分为很多不同的区域，包括视觉皮层、听觉皮层、运动皮层等，分别负责收集外界的视觉、听觉等感官信息，但这些信息必须经过解析联络皮质的处理，才能被读解和利用。比如你看到纸上的一行字，如果不经过解析联络皮质的处理，这行字对你而言只是一团视觉符号，毫无意义。这些信息必须先通过解析联络皮质获取意义，然后到大脑颞叶的语言联想区域，这些字不仅彼此连接，而且与各自的记忆连接，从而获得更丰富的意义。

至于天才与精神障碍之间的关联，与她之前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第二批实验对象的精神障碍家族史明显高于控制组，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分布平均，最常见的精神障碍诊断为双向抑郁、抑郁症、焦虑、酗酒。

但是，在深度访谈的过程中，她又一次次被这些天才们对自身才华的强烈喜悦与兴奋所感染。如一位科学家说：“做好的研究是世界上最愉悦的事情。就像做爱，它全方位刺激你，让你觉得自己强大、完整。”

最后，她得出结论说，天才与精神障碍之间，很可能不是因果关系，而出于共同的人格特质的问题。“这些实验对象的个性特征，大都是好奇心重、喜欢探索和冒险，尤其在科学上，最高的成就永远都在新的领域。他们必须面对怀疑与拒绝。但他们又不得不坚持，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价值。这可能导致心理上的痛苦，呈现为焦虑和抑郁的症状，或者求助于酒精、药物减轻不适。”

（视觉中国供图）

宇宙是否经过“微调”

记者 苗千

宇宙到底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似乎太过空洞。宇宙为什么是现在这样的状态？这样的问题似乎也毫无意义。人类意识到可以把宇宙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才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人类发现宇宙必然会有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大约是在 140 亿年以前。

在宇宙诞生初期的一些过程，宇宙的年龄，乃至目前宇宙中大多数星系与天体的分类和分布已经成为宇宙学研究的共识。而随着对宇宙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更多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例如我们所观测到的宇宙状态是否算是非常特殊？宇宙中的规律，一些常数，为什么会是某些特定的数值？这些问题并非全无来由，因为它们与生命的存在的可能性息息相关。

生命因何而存在

人类在地球上生生不息，早已经对周围的环境习以为常。但实际上，作为目前宇宙中唯一一个拥有生命的行星，地球是宇宙中一个极其特殊的天体，它以适当的距离围绕着一颗稳定的恒星运转，表面平均温度恰好可以允许液态水的存在，它处于银河系的边缘，因此不必担心受到超新星爆发或是其他天体的威胁……正是在这一系列偶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之下，地球上才出现了生命——人类只有放眼整个宇宙，才会真正明白生命的偶然与可贵。

另一方面，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越深刻，就越明白生命的出现要依赖于宇宙中的各种“初始条件”。宇宙作为时间和空间的总和，在其间不仅有各种物质，还有制约物质运动的物理规律和各种常数。物理学家们发现，这些规律和常数似乎是经过某种“设定”一样，搭配得非常精确，才使生命的出现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成为可能。

物理学家们意识到，宇宙中存在着四种最基本的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的强度各不相同，而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种相互作用，或者强度与人们所观测到的强度不同，整个宇宙的形态都会发生极大变化，生命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如果引力作用不存在，或者其强度大大弱于其真实强度，那么宇宙间的天体和星系自然也就都没有机会因为引力作用而聚合形成；如果引力作用稍稍弱于目前的强度，那么恒星的温度就会比真实温度更低，从而无法形成超新星爆发——也就无从在宇宙中产生出重元素，生命自然也就无从出现和演化。另一方面，如果重力的强度高于其真实的强度，那么理论上只需要更少的材料就可以形成恒星，恒星的体积就会更小，寿命也会更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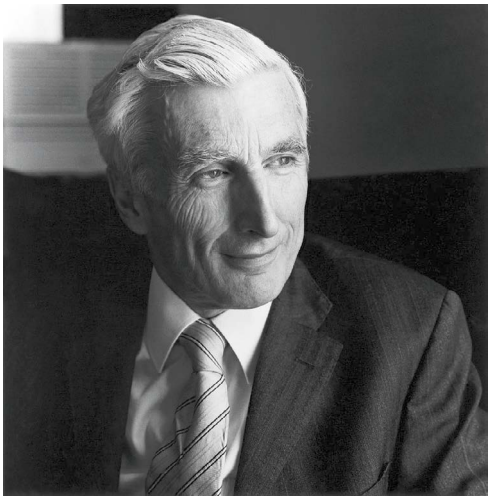
除了引力作用之外，强相互作用用以维持原子核内部的稳定性。如果强相互作用的强度比它的真实强度高出 50%，那么宇宙中几乎所有的氢元素都会在宇宙的早期燃烧掉，在恒星内部进行的恒星核合成也会比真实情况少得多。而且强相互作用强度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宇宙中碳元素和氧元素的合成影响巨大，而这两种元素都是构成地球上的有机生命最重要的元素。与之类似的，支配核辐射效应的弱相互作用如果远小于它的真实强度，那么在宇宙早期就会出现更多的中子，恒星可能根本就无法形成。

除了这几种基本相互作用的强度之外，还有其他更微妙的数值对于宇宙的状态和生命的产生影响巨大。例如在总共六种夸克中最轻的两种，上夸克与下夸克之间的质量差别大约是电子质量的 10 倍，这个数字发生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影响到构成原子核的粒子：质子和中子的稳定性。质子和中子都可以看作夸克的某种束缚态，如果上夸克和下夸克之间的质量差发生变化，那么夸克就有可能形成新的束缚态而非质子和中子，整个宇宙中的物质形态可能会更加简单，无法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另外，一些宇宙常数，能量密度等数值，如果发生变化，都可能极大影响宇宙的形态以及时空的性质，无论发生任何变化，可能生命的产生都无从谈起。

这样来看，似乎整个宇宙状态，从各种常数，到相互作用的强度，乃至物理定律的形式，全都“配合”的恰到好处，仿佛经过精心的“微调”（Fine-Tuning）以确保生命形式可以在宇宙中产生，这难免让人感到迷惑。根据人类的研究，从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地球上的生命形式也只有几十亿年的历史，而宇宙已经有了大约 140 亿年的历史，而且经过了不同的演化过程。为什么从刚刚诞生开始，各种宇宙常数和定律就都“恰到好处”地允许生命出现？这种“巧合”会让一些人认为宇宙的状态是被一位万能的造物主所设计好的，而让生命可以出现，正是宇宙存在的意义之一。除了宗教情感之外，对于这种堪称特殊的宇宙状态，很多相信多重宇宙学说的宇宙学家也认为，这正是在宇宙中存在着无穷多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宇宙的最好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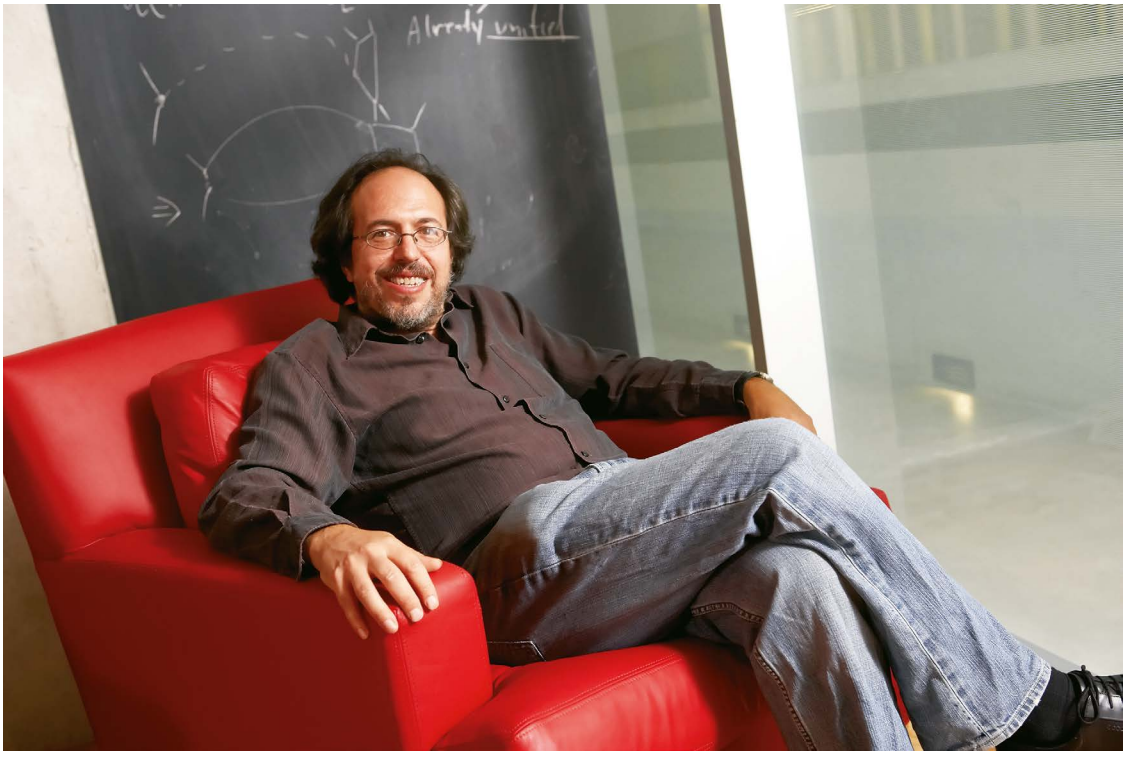
如何理解多重宇宙?

如果任何一个宇宙常数都可以是任何数值的话，那么这些数值恰好是落在生命可以存在的区间的可能性可以说微乎其微。因此，有一类多重宇宙学说认为，正是因为存在着无穷多个宇宙，在不同的宇宙中分布着各种常数的不同数值，因此生命的出现也就不是一个巧合——因为生命只能在允许出现生命的宇宙中出现。



左图：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兰·古斯

右图：剑桥大学理论天文学家马丁·里斯



美国物理学家李·斯莫林

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宇宙学家把人类所观测到的宇宙的状态作为多重宇宙存在的证据，剑桥大学著名的理论天文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Rees）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多年来他始终坚信多重宇宙理论，尽管他也承认人类有可能永远都无法发现多重宇宙存在的科学证据，但他仍然坚信其他形式的宇宙确实存在。里斯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的状态在大爆炸发生时就已经被决定——这样的状态，以人类的观察来看，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宇宙膨胀的速度、宇宙中各种元素的分配、各种基础相互作用的强度，似乎是专门为了生命的出现所准备的。例如，我们的宇宙中充满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原子，这是生命出现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如果要出现有机生命，那么这种生命形式必须远远大于原子的尺度，在时间上，这种生命所存活的时间也有要远大于原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

如果宇宙中没有大量原子的存在，那么宇宙中主要的存在形式有可能是黑洞，或是不活跃的暗物质，或者是物质全部平均分布的毫无差别而言的宇宙，在这样无聊的宇宙中自然不可能有生命存在。在里斯看来，这种独特的宇宙状态说明生命出现在了一个恰好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中。这也正是所谓的“人则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一个被观测的宇宙环境，必然是允许观测者存在的。想要理解宇宙的状态为何如此，似乎只有“神创论”和“多重宇宙”两种选择了。剑桥大学的唐宁学院在2007年甚至举办过一次名为“上帝还是多重宇宙”（God or Multiverse）的研讨会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的宇宙到底是否经过“微调”，或者说宇宙环境是否专门为了生命的出现而设定，尽管对于这些问题以人类目前的科学发展程度还不能够给出明确的解答，但显然还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正如此前人们曾经认为如此精妙的生命结构的出现只能是上帝精心设计的结果，人类必然是造物主精心设计的“微调”的产物，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完全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生命形式何以从简单发展到如此复杂。在物理学领域，人们认为也有可能会出现某种理论解释宇宙中生命出现的必然性。有人认为这种局面恰好可以催生新物理学的诞生。比如说，目前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以构建出足以解释宇宙中一切现象的“大统一理论”作为研究的最高目标——这样的一种理论，应该不仅可以解释宇宙中发生的一切现象，还可以解释其自身。一些宇宙常数究竟为什么必须为一个特定的数值，而不是可以取一个任意的实数，大统一理论理应也

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所不包的理论就可以证明，我们所观测到的宇宙并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其唯一可能具有的形态。

生命究竟是什么

关于宇宙是为了生命的存在而经过“微调”的看法，还有一个原因使其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那就是人类至今为止都还没有一个关于“生命”，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清晰明确的定义。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是否只能在地球上存在？生命到底可以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生命是否可以被定义为宇宙的观测者？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之前，所谓宇宙的特性是为了生命而微调也就失去了根基。即使以目前人类所认识到的生命状态来说，宇宙常数和物理学规律也不是最适合生命存在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以幻想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之中，在不同的物理学规律的支配之下，可能会出现其他形式的生命——这不仅取决于宇宙的状态，还取决于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

宇宙中的各种常数到底为什么“偏偏”是这样的数值？关于这个问题，加拿大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李·斯莫林（Lee Smolin）认为，必须采取一种科学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应该可证实、可证伪，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解答。这个解答必须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论，可以被实验确认或者否定，而且这个解答所给出的结果必须是独特的，没有其他更加简单的解答可以得出同样的预测。从这个立场出发，关于“微调”问题的很多解答都不可取。在斯莫林看来，不仅所谓的造物主创造宇宙的解释不可取，所谓的从多重宇宙学说出发，通过人则原理给出的解释同样不是一个科学解释，因为它不可能给出任何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测。

关于宇宙的状态是否经过微调的争论，在科学界可能仍然会继续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最终会有怎样的解释尚未可知，但答案不会只是二选一的简单选项。例如目前人类观察到宇宙空间的曲率非常接近平直，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平坦的空间之中。在一些宇宙学家们看来，这正是宇宙状态被微调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学家阿兰·古斯（Alan Guth）提出的宇宙暴涨假说，宇宙在刚刚诞生之后就发生了一次暴涨，这次暴涨的结果就是把空间从初始状态拉伸到了平直的程度。也就是说，无论宇宙诞生之初空间的状态是怎么样，暴涨都能够确保把空间拉伸到平直状态。正如一个气球，在没有被吹足气的时候可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状态，但是当它被吹满了空气，气球的表层就会呈现出一种平均且相对平坦的状态了，这与气球的初始状态并无关联。需要注意的是，宇宙暴涨假说目前也还没有得到最终证实，而且这个假说一旦成立，人们也就必须接受它所引发的另一个推论：暴涨从来不会停止。一个暴涨会引发出无穷无尽的暴涨，虽然在我们所生活的区域宇宙暴涨已经结束，但是在我们所无法观测的宇宙其他区域仍然在发生着无穷无尽的暴涨，这也正是多重宇宙学说的另外一个版本。尽管如此，宇宙暴涨假说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我们可能最终会找到一个科学理论，为宇宙当前适合生命存在的状态提供合理的解释。

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是否一切常数和规律都被调整到恰到好处，正好适合生命存在？也有科学家认为并非如此。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唐·佩奇（Don Page）认为，虽然我们的宇宙允许生命存在，但是显然并非完美。例如整个宇宙正处于加速膨胀之中，这个加速度可以用一个“宇宙常数”来表示。虽然有宇宙学家认为，宇宙常数如果过大、宇宙加速膨胀的速度过快，那么星系就不会形成，生命则不会出现。但在佩奇看来，这一点恰恰也可以用来证明宇宙没有经过微调，因为更小的宇宙常数，甚至稍微呈负值的宇宙常数才最有利于星系的形成，自然也就更有利于生命的产生和进化。宇宙加速膨胀，实际上使生命形式更难获得材料，这并非是生命存在的最佳条件。

我们必须意识到，生命在地球上出现有数十亿年的时间，人类文明的长度与之相比只是短短一瞬，而人类真正意识到宇宙的状态，开始用科学方法研究宇宙，才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与生命的历程相比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自身，或是对于宇宙的认识产生出任何迷惑都属正常，人类绝不能够放弃的是科学精神。对于宇宙学家们来说，遮挡宇宙真实面貌的大幕还没有拉开，还有更多的实际问题需要解答。

〔本文写作参考了《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有关微调的内容以及其他相关报道〕

运动国度的年轻态与健康度

文 张斌

7 月 12 日，美国波士顿市的一群孩子在罗伯茨公园球场打球

果然是“同一世界，同一梦想”，不仅我们在拼尽全力倡导运动价值，地球村中无一例外都在为此劳心劳力，催生运动人口，唤醒年轻群体。最近几天，在美国有的论坛便专注于此，参与和发起者众，通通被称为“利益相关方”，目标只有一个——遏制青少年运动参与度下滑趋势，缔造繁荣运动国度。

美国，一向是运动参与和产业的好榜样。但仔细沉淀其中，你会惊异地发现，美国人其实也很焦虑的。首先，绝大多数体育运动的受众平均年龄日益中年化甚至老年化，能越活越年轻的项目屈指可数。不爱看赛事转播，并非行业末日，但只要平日里积极参与运动也就是了，健康与小康兼得。但是统计数据很不乐观，一家名叫阿斯潘的专业研究机构近两年始终在进行美国区域性青少年运动参与状况的调研，探访超过 3 万个家庭，针对 120 个运动项目，一年一个报告，描绘运动国度的年轻态与健康度。

最新数据不乐观，6 ～ 12 岁少年群体的运动积极参与度低至 26.6%，近十年前这个指标还能超过 30%。同时，这个群体的集体项目参与度仅为 36.9%，从去年的 38.6% 继续下滑，与五年前的状况——41.4% 相比，更是刺目。当然，乐观趋势还是有的，最近两年，纯粹不运动的青少年群体比例已经由 19.5% 悄然回落到 17.9%。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一进步主要来自于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家庭，而年收入在 2.5 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不参与运动的孩子比例已经攀至历史高点 30%，贫穷和窘迫在剥夺孩子们的运动权利，全世界皆是如此吧。如果再细致分析，白人家庭的孩子运动参与比例可以超过 60%，美籍非裔大约为 30%，墨西哥裔不足 20%，没有华裔家庭的运动选择数据，我想不高不低吧，项目选择也会越来越多的美国本土化。

去年开始，基于青少年运动参与的不良趋势，与体育运动产业和生活方式相关联的利益各方总计数十家机构联合发起了“运动规划 2020”（Project Play 2020），试图用未来三年的时间，激励更多青少年将运动作为生活选择。发起的利益关联方，既有职棒大联盟、NBA 这样的顶级职业联赛，也有影响力巨大的美国奥委会，还有耐克公司、NBC 广播公司、PGA 巡回赛、纽约路跑协会等角色，这要是在中国，需要怎样的力量才能如此跨越产业，超越利益组成如此澎湃的社会力量呢？

去年，米歇尔以第一夫人之尊莅临这个论坛，发表了主旨演讲，力促运动规划的实施，以求消除因为生活境遇不同而造成的青少年运动参与的不公平。在这一号召之下，更多的社会组织汇聚在一起，该计划第一年提出了两项战略目标，首先竭尽全力改善青少年运动参与的条件，进而关切更多的运动项目状况。

专家认为，造成美国当下青少年运动参与度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运动场景和设施日益私有化倾向，而这种趋势未来将很难改变，除非政府和公共资金针对青少年体育有更大的投入，让低收入群体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运动契机，否则即使没有没有围墙的体育场馆也会将人群割裂开。

当运动成为孩子们和家庭的共同选择后，更多一个层级的诉求便是运动参与的多样性，而很显然这并非是家庭选择便可以迎刃而解的，需要运动价值观的整体适配和调整。这个问题在伦敦奥运会前后也曾在英国引起关注，那些“50 后”的老人家回忆说，自己在学校里最多可以尝试不少于十个运动项目，而如今的孩子们有个两三项运动参与就算是活跃分子了。

我们一定也有类似于“运动规划 2020”的各种行动，但大多是源自政府驱动，未来这一领域的巨大力量还是要有赖于社会群体，利益关联方凝心聚力，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关岛只是个“幌子”？

文 宋晓军

9 月 3 日下午朝鲜宣布，朝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令进行了氢弹试验，试验取得成功。看到这则消息，我想到了 4 天前一家朝鲜媒体发文嘲讽美国海军接连两次发生“撞船事件”的新闻。据 9 月 1 日美《新闻周刊》网站披露，朝鲜媒体在文中说：当美帝的“宙斯盾”舰沉入海底时，弹道火箭从东方飞向太空，巨大的雷声震撼了世界……想到了这则新闻后，我也就想到了这篇专栏的题目——关岛只是个“幌子”？

8 月 30 日，美“北纬 38 度”网站发表了一篇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导弹防御专家埃尔曼（Michael Elleman）对朝鲜 8 月 29 日试射“火星 -12”的分析文章。文中埃尔曼最担心的是，8 月 29 日朝鲜试射的“火星 -12”虽然按正常弹道只飞行了 2700 公里，但假设朝鲜是在 3 次分别采用“高吊弹道”试射“火星 -12”和“火星 -14”后，第一次用“火星 -12”测试用于提高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和命中精度的“末级助推器”（PBV），那就说明朝鲜要发展弹道导弹威胁美国及海外基地是认真的。当然，埃尔曼分析 PBV 可能没有启动工作，因此“火星 -12”只相当于搭载了一枚 1200 ～ 1300 公斤的弹头飞行了 2700 公里，最后分 3 段溅落入日本以东的北太平洋海域。而这 3 段很可能分别是“火星 -12”的主火箭壳体、PBV 和弹头。埃尔曼认为，也许再过 1 ～ 2 年“火星 -12”的技术就会成熟，而这将是朝鲜弹道导弹技术一个“令人不安的进展”。

（视觉中国供图）

2017 年 8 月 29 日，朝鲜发布的弹道导弹“火星 -12”发射现场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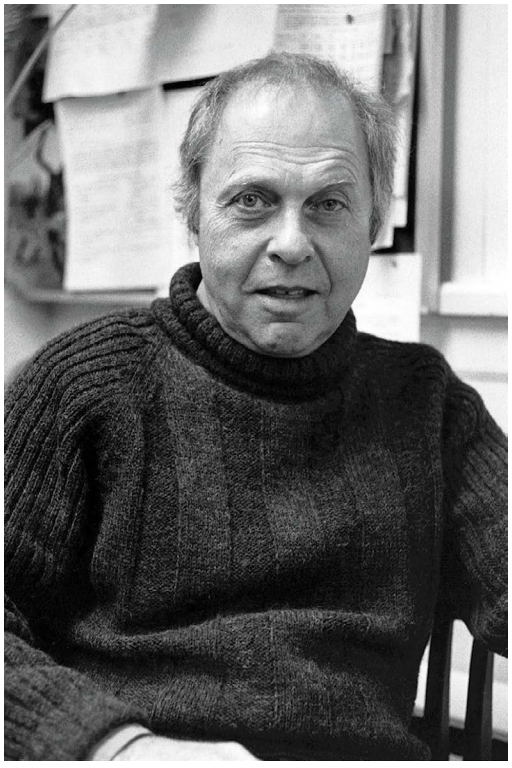
说到这儿，再说美海军的“撞船”与朝鲜对关岛的“导弹威胁”。根据今年 3 月 17 日美国会研究局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 2017 年底海军将有 34 艘反导“宙斯盾”舰。负责西太平洋至印度洋区域的第七舰队有 10 ～ 14 艘“宙斯盾”舰。在“菲茨杰拉德号”和“麦凯恩号”两艘“宙斯盾”驱逐舰先后被撞“失能”后，就意味着第七舰队的海上反导能力下降了 14% ～ 20%。考虑到第七舰队的反导舰艇还有维护与训练的非部署时间，第七舰队很可能在朝鲜试射弹道导弹时会出现监视 / 拦截空白的“窗口期”。虽然现在还不能得出判断，朝鲜是在借助这个“窗口期”故意用向南“射击关岛”作为“幌子”而实际上是要向东对“火星 -12”进行 PBV 测试，但从客观结果上看的确是有这种可能的。如果再进一步推论，假设第七舰队的“宙斯盾”舰不仅没有发生“撞船事件”，而且也装备了可拦截射程在 3500 公里以上弹道导弹的“标准 -3Block2A”拦截弹（美国会研究局“报告”显示在 2019 年才能装备 15 枚），此前朝鲜声称要对关岛进行“包围射击”的这个“幌子”还会有吗？换句话说就是，在美海军第七舰队有了足够多的搭载了“标准 -3Block2A”拦截弹的“宙斯盾”舰后，朝鲜对关岛进行“包围射击”的这个“幌子”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媒体吸引力”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前面所说的是基于假设，但朝鲜借助关岛这个“幌子”进行了“火星 -12”的飞行试验及随后进行了“氢弹试爆”却是不争的事实。朝鲜第三代领导人接任后，不仅进行了 4 次“成功”的核试验，而且还进行了远比他父亲多 N 倍的弹道导弹飞行试验。应该说，朝鲜的“核、导能力”在近两年来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不仅说明了奥巴马政府之前的“战略耐心”没能遏制住朝鲜“核、导能力”的进展，而且也说明了特朗普新近推出的“极限施压”也未必就能奏效。那么接下来特朗普政府会接受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进”的思路吗？如果不接受，他有什么办法止住朝鲜“核、导能力”进展呢？

向原始人学习

主笔 薛巍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说，狩猎和采集者只获取足够满足自己需求的物质，不会去囤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具可持续性的，值得现代人去学习。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

悠闲的原始人

请想象一下这种生活：每周只需工作 12 ～ 17 个小时。社会是平等的，各种性别和阶层的人都受到尊重，一切资源都会被共享而非被囤积起来。在空闲时间，你可以安心休闲，把时间花在陪伴家人以及创建一个强大的群体上。这不是乌托邦。南部非洲的布希曼人至今仍过着这种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在大约 1.2 万年农业革命发生时，人类一直过着那样的生活。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说，如果按照一种文明延续的时间长度来判断它是否成功，那么南部非洲的布希曼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新的考古数据和基因组数据发现，布希曼人跟其他群体隔绝，尤其是跟现代性和农业革命隔绝。他们已经存在了非常长的时间，很可能可以追溯到 7 万年前，甚至更早。这能让我们了解智人在人类历史 95% 到 98% 的时期是如何生活的。

过去 400 年间的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几乎摧毁了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只剩下了 8000 ～ 1 万布希曼人，他们基本上生活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称狩猎采集者是原初丰裕社会。他们每 15 ～ 20 人组成一个群体，只从环境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虽然有的年份会歉收，但他们努力维持 2300 卡的饮食构成，他们知道如何寻觅大约 100 种水果、茎、树胶、种子、花、梗、根、块茎和球茎。

布希曼猎人的整套装备重量只有 5 磅重，这个重量实现了一个平衡，使它足够轻，不会成为负担，但又重到能在猎人奔跑时稳稳地原地待着。猎人的装备中最重要的是弓。弓弦传统上是用长颈鹿或羚羊的后腿或腿后腱制作的，现在许多猎人更喜欢使用尼龙，因为尼龙下雨时不会变软，也不会很快被磨损。最能体现弓箭的先进性的是箭。他们能够捕猎大型猎物，是因为虽然他们用的弓箭很小，但是会给箭抹上毒药，各地猎人使用不同的毒药，有的是用从蓖麻中提取的酸制作的，有的是沙漠玫瑰根部的树液熬制的，有的是用在没药树下面找到的小甲虫制作的。制作能够进入动物的血液、杀死动物但又不会使肉变得有毒的毒药，一定经历了多次危险的试错。

苏兹曼说，猎物的踪迹就像诗歌一样，有它的一套语法、韵律和词汇。跟诗歌一样的还有，解释它们比阅读一系列字母要复杂得多。猎人根据草叶上微小的弯折或者岩石上没有意义的磨损就能推断出留下这些踪迹的动物的心情、状况和意图，能解释它们要去哪里、去过哪里，它们的性别、大小，它们是否健康、饥饿、紧张、骚动。在这样的社会，情人之间不正当的联络必须十分小心，偷羊的贼会

偷穿别人的鞋来掩盖自己的身份。猎人对各种动物的特征如数家珍，却不太区分人类和其他动物，这部分是因为人类跟其他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人类能像猴子那样爬树，能像大型猫科动物那样跟踪猎物，能像野狗那样奔跑，能像豪猪那样挖洞，能像公象那样凶狠地搏斗。动物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是人类可以吃的肉。如果猎豹能够跟其他动物交谈，它们大概也会把人类称作可以吃的肉。

布希曼人在村子里还有肉的时候很少去打猎。那样会被认为过分、不恰当。可能会招来神灵的惩罚。但如果人们需要肉的话，他们不会放过路过的动物的机会。豪猪、跳鼠、鸟、豺都会被他们猎取。

苏兹曼说，人类目前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布希曼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可持续性的文化，了解他们是如何组织自身的，能够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说："我成长于一个看重工作的社会。在研究布希曼人时你会发现，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这种态度从何而来呢？它显然不是来自打猎和采集者的生活，他们满足于最少地工作。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沉迷于忙碌和充分就业。现代人对工作的态度是农业革命的产物。但农业革命是一种偶然，在发展出它之后，我们成了它的人质。人口成了其自身增长的人质。我们仍沉迷于增长，虽然已经没有多少增长的空间了。"

当原始人遇到现代文明

50 年前，纳米比亚奈奈自然保护区的布希曼人仍然靠打猎和采集为生。1966 年，年轻的加拿大人类学家理查德·李前往研究他们的生活。直到那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仍然认为，打猎采集者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只有农业降临之后，人类才开始从严酷的自然中解放出来。但理查德·李说，布希曼人不仅比工业化世界的人吃得更好，而且每天只需要觅食大约两个小时，余下的时间都在休闲，打瞌睡、玩游戏或者制作艺术品。他们几乎只关心短期内的事情——如果环境总是能够提供食物和物质，担心未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们存储食物不会超过几天的量。他们会相互分享他们的食物，认为积累财富或者形式化的交换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会送朋友礼物。

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一切突然被改变了。1979 年，南非在奈奈建立了三个军事基地，开始征召布希曼人参军，几乎所有 18 ～ 35 岁的布希曼人都成了军人。因为军队决定付各个种族的人同样的军饷，成了士兵的布希曼人收入非常丰厚，每个月能拿到 2000 多美元。凭着打猎采集的思维，他们不会存钱，许多人领到钱之后立刻买酒用光了。慢慢地，他们对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钱不多的时候，没人在乎钱，当更多的钱涌进来之后，它的价值就高了。突然增多的钱让打猎采集者感到困惑。钱是不是也要像肉或者食物那样分享？如果要分享，该跟谁分享多少？把钱当礼物送人是否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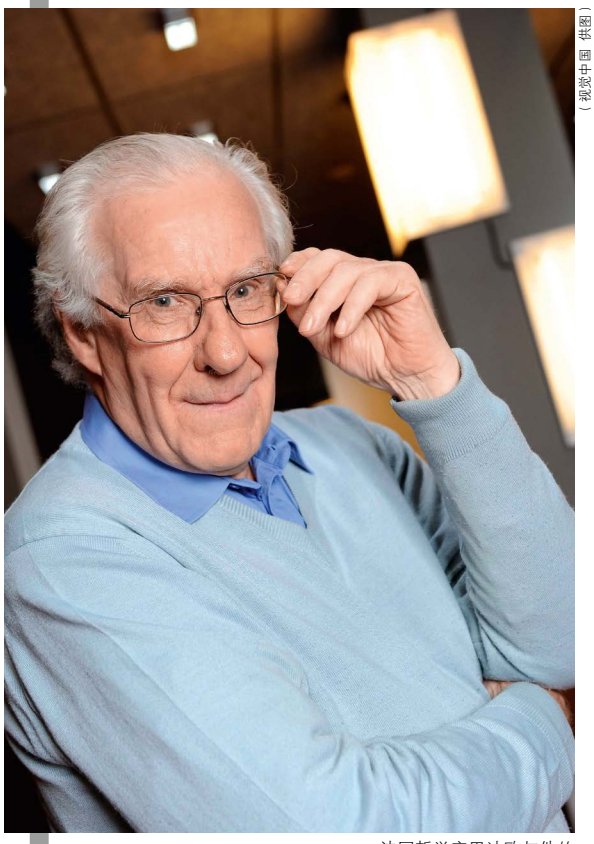
许多没有收入的布希曼人认为，那些领到钱的人有义务跟其他人均分，而领军饷的人则认为钱是对他们的工作的回报，他们理应把大部分留给自己。结果布希曼人内部的冲突给军医带来的工作量比战争带来的还多。到 1990 年，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布希曼士兵被遣散，他们失去了收入，却松了一口气。

苏兹曼说，一位布希曼萨满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他们对钱的看法：贾寇骑着驴旅行，骑累了之后他决定停下来，做点肉吃。肉热起来的时候，他看到几个农民朝他走来，他迅速把火弄灭。几个农民到他跟前时，他说："瞧，这是一个神奇的锅。它做饭不用火。你只要拍它三下。"他拍了三下，然后让农民看看还在嘶嘶作响的肉。他说："我可以把这个神奇的锅 1000 块钱卖给你们。"他们接受了。不久，农民饿了，就打算试试他们的新锅。但敲了三次之后，发现肉仍然是生的。他们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回去找贾寇。贾寇看到顾客回来后有点害怕，连忙把钱藏到了驴屁股里。农民要求他退钱，贾寇说不行，钱已经被他花了。但他话音刚落，驴放了一个屁，钱掉了出来。贾寇大惊失色，但随后微笑着说："瞧瞧这头驴，它很神奇，因为你喂它草，它能拉出钱来。"他要价 1000 元。农民们觉得这头驴确实很神奇，又掏了 1000 块，贾寇愉快地上路了。

遇见巴迪欧：从爱的哲学而来

文 刘梁剑

法国哲学家巴迪欧说：“捍卫爱，这也是哲学的一个任务。”这句简短的话意味深长。正如整本书，篇幅小而义理丰赡。



（视觉中国 供图）

法国哲学家巴迪欧与他的著作《爱的多重奏》

书名《Éloge de L’amour》本可以简单地直译成《爱之颂》，译者邓刚教授却煞费周章意译为“爱的多重奏”，正是要突显巴迪欧这位老法师（时年71岁）在不足5万字（中译本）的狭小空间里腾挪跳跃，演奏“爱穿梭在不同形态、不同时代的多重变奏以及爱与政治、艺术、哲学的多重交响”。他把科学（首先是数学）、政治、艺术和爱视为哲学的四个前提，它们彼此贯穿（参见巴迪欧:《哲学宣言》）。然巴迪欧似乎没有明说，哲学和四个前提之间也是相互贯穿的。至少《爱的多重奏》展示了爱与哲学的相互贯穿。

捍卫爱是哲学的任务，因为爱受到了威胁。现代人看穿爱的虚、幻、伪，干脆代之以愉悦和享受的性关系，代之以通过精确计算达到零风险、在消费的脉脉温情中准备配偶关系的相亲。在虚无主义的时代，爱者巴迪欧相信爱，通过对爱的思考捍卫爱。爱是冒险，始于邂逅和偶然相遇，这种相遇具有一种“事件”的本体论地位，“无法依据世界的法则加以预计或者计算”（第62页）。冒险、偶然、激情，这些大致符合我们对法式浪漫的心理预期。然而，巴迪欧的浪漫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忠诚是爱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把瞬间的激情延续一生，不断地跨越空间、时间、世界所造成的障碍，持之以恒，把偶然变成命运。

爱始于邂逅，仅仅这么讲就卑之无甚高论了。中国先秦便有诗句云:“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诗经•野有蔓草》）巴迪欧用“事件”说明爱，而“事件”概念关联着一整套形上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理论，这样他实际上建构了一种爱的哲学捍卫爱。哲学家巴迪欧服务于爱者巴迪欧。然而还有另一个面向：爱者巴迪欧服务于哲学家巴迪欧。捍卫爱是哲学的一个任务，现在是因为爱对于哲学的重要性。“爱有着普遍的意义，是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可能的个体经验。就哲学而言这是本质性的。”捍卫爱就是捍卫哲学。爱直接就是一种真理，同时彰显出一切真理的建构性质：“在我的哲学术语中，我把爱称作‘通向真理的步骤’，也就是说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某种类型的真理被建构起来。这种真理简单说来，就

是关于‘两’的真理，关于如其所是的差异的真理。”

因此，巴迪欧“爱的哲学”有两层含义：关于爱的哲学，通过爱的哲学。现代汉语曾经严格区分了“底”与“的”，前者表示领属关系，后者表示修饰关系。一些中国现代哲学家还着意借助二者之别表达哲学思想。比如，金岳霖《论道》有一个命题：“可能底关联有可能的关联。”牟宗三更是区分“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与“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s of morals），后者要对道德做形上的解释，前者以道德为进路展露本体，在牟氏看来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充分证成的形上学”。如果借用这个已经过时的“底”“的”之分，那么，关于爱的哲学是“爱底哲学”，通过爱的哲学是“爱的哲学”。爱与哲学相互贯穿，展开为“爱底哲学”“爱的哲学”二重奏。在人类的后经学时代，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交通需要爱的经验，需要从“两”出发体验世界。

按照一般的印象，法国哲学和文学、艺术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巴迪欧的哲学与众不同，除了诗，它还和数学密切相关。1988 年，巴迪欧出版《存在与事件》，建立了以现代集合论（康托尔、哥德尔、科恩等）为根基的数学本体论，提出“数学即本体论”。在 1989 年出版的《哲学宣言》，我们看到巴迪欧的数之颂。1963 年，数学家 P.J. 科恩证明，连续统假设和 ZF 公理系统彼此独立。巴迪欧赞曰：这里“有一种思想的凝聚，一种开创性的美，一种概念的震惊，一种有着风险的断裂，一种理智的美学”，它可以媲美于伟大的诗歌、政治中的大胆创造，或者“一对爱侣邂逅迸发出来的最强烈的激情”。数之颂进一步落实为“两”之颂：“‘两’支撑着整个对爱的分析。”人们在爱中“获得一个‘两’（Deux）。爱，处理的首先是这个‘两’”。

然则，何为“两”？在汉语中，我们说“一对恋人”“一对夫妻”。“对”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以二为一，一不在二之外，但不化约为二。这个“对”接近于巴迪欧的“两”。巴迪欧说，一个“两”（Deux）。表示“二”的数词 deux 往往修饰别的名词，但如今它在形式上转化为大写的名词“Deux”，进而可以由数词“一”（un）加以修饰。这在思想上意味着，大写的“两”是一个可以主题化对待的整体。大写的“两”（Deux）之中包含小写的“二”（deux），小写的“二”之中有小写的“一”（un/une），相爱中的个体。小写的“一”在相遇之前原本有自己的世界，从各自的“一”出发的世界。在相遇之后，如果这种相遇成为爱的事件，那么，他或她就不再封闭于原来的“一”。“变天”了，“生生之谓易”，一个与过去孤身之时迥异的世界（天、天地）氤氲化成。

在此意义上，巴迪欧说“两”的时候强调去自我中心、差异与生成：爱“以一种非中心化的观点来建构一个世界，而不是仅仅为了我的生命冲动或者我的利益”；“在爱中，我们具有的第一个因素，是一种分离，一种分散，一种差异”（第 60 页）；“爱，不再简单的只是相遇和两个个体之间的封闭关系，而是一种建构，一种生成着的生命；但这种建构和生命，都不再是从‘一’而是从‘两’的观点来看。这说是我所说的‘两的场景’。”大写的“两”独立于小写的“一”而有自足的生命，它仿佛代替小写之“一”的个体性主体而成为新的主体。追随巴迪欧，设想一对爱人静观日落沉浸其中。“当此际，爱就是这种悖论，这种同一的差异性和差异的同一性；当此际，爱存在着。她和我，我们一同融入这唯一的主体（unique Sujet），这爱的主体。”

“两”的经验不限于爱情：“世界可以通过一种不同于孤独的个体意识的另一种方式来遭遇和体验，这就是任何一种爱都可能给予我们的新体验。”两的经验具有普遍性。易言之，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经验世界的基本范式，完全可以拓展到爱情之外，比如，不同思想传统的相遇。

按照一般的印象，法国哲学和文学、艺术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巴迪欧的哲学与众不同，除了诗，它还和数学密切相关。

大家都有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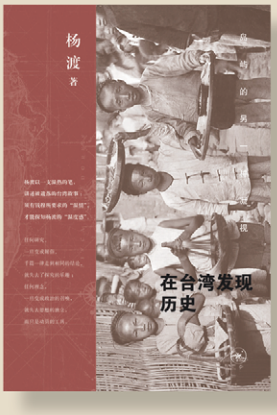
朱德庸

挣了一百万，不够。
挣了五百万，不够。
挣了三千万，还是不够。
因为钱不是让人觉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让人觉得爽不爽的问题。
大师，钱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有钱，那就是属于经济的层面。
如果我没钱呢？
那就是属于哲学的层面了。
大师，我会不会发财？
你是一个心底善良，有道德感又诚信的好人吗？
我是，我是。
那你永远都别想发财。
大师，钱到底是什么？
钱什么都是，钱什么都不是。
什么？股市大跌！
目前我的钱什么也不是……
发财是有命运的。
有人整天躺在床上也发财。
有人整天躺在床上还是穷光蛋。
我例外，我发不发财都得看有没有人躺在我这张床上。

“滇西抗战三部曲”

余戈 著　　定价：263.00元

云南的松山、腾冲和龙陵，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作战的核心战场，以滇西战场的胜利为先声，中国的抗日战争拉开了胜利的序幕。这段历史长期不为公众所熟悉。军旅作家余戈历时十余载，先后完成并出版了“滇西抗战三部曲”，以“微观战史”的方式，填补了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空白。



在台湾发现历史：岛屿的另一种凝视

杨渡 著　　定价：35.00元

“另一种凝视”，不同于“本土意识”的自说自话，而是将现在的台湾放在历史的大脉络下考量，将不被关注的另一种抗争引入视线。消失的凯达格兰人、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巨变下的一九四五年、“二二八”中沉默的母亲、迷雾中的将军……这是一部“有温度感的台湾史”，讲述被遗落的台湾故事。

教养身体的政治

[日]深町英夫 著/译　　定价：58.00元

日本学者深町英夫撰写的关于中国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专书。这场运动不仅包含了民国时期的政治，还涉及社会、文化、军事、对外关系等侧面，甚至凝聚了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趋向。若将其视作一个窗口，则可观察到民国时期中国五花八门的现象。

深思与省悟

梁漱溟 著　　定价：36.00元

梁漱溟一生著述颇丰，本书收录的文章由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精选点评，既有人生的思索与领悟，亦有自述经历、思亲忆旧的回忆文章，也有读书与论政的独特心得，其中《谈禅宗》《谈静》《纪念先妻黄靖贤》等皆为首次发表。

《三体》的X种读法

李广益、陈颀 编　　定价：32.00元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系列，不仅“将中国的科幻创造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更是造就了一个“文化现象”。本书是关于《三体》解读的选编，跨越多个领域和学科，它们各有特色，甚至彼此矛盾，这些文字与《三体》一样，有激发思考和想象的力量。

沪乡记事

沈月明 著　　定价：38.00元

似乎少有人提起，十里洋场之外，上海还有九成郊区土地，那是不同于外滩或万国建筑群的沪乡。本书以20世纪下半叶上海南汇为背景，依次囊括作者的家庭记忆、地方风俗、日常生活、特色美食、自然风光以及特定时代的历史事件。有了它，上海的记忆才算完整。

怀特古堡的女主人

文 唐娇　图 陈曦

今年夏天在伦敦开会的时候，我收到了莉丝的信息，她说自己刚好也在伦敦。我还挺好奇她是不是又涨了“身价”，就跟她约了饭。

8年前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结识了当时的室友莉丝，那时的莉丝拥有英国大众女性独有的肥胖身材和双下巴，带着鼻环抽着烟，顶着彩虹阴阳头。本着练习英语的目的，我克服了各种反感与恐惧，努力找着话题跟她聊天，顺带排解我初来乍到的孤单。没想到，莉丝人倒是很随和、很善良，一来二去我们也熟络了。开学没多久，她就把男朋友带回了公寓，一个男版莉丝。我问莉丝：“你和你男朋友怎么认识的？你为什么喜欢他？”她撇了撇嘴，说：“刚上大学，课很少，很无聊，总要有人陪你消磨时光，况且大家都有男朋友，我没有会很奇怪。”

我很好奇英国人的审美，继续追问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难道像贝克汉姆那种匀称健硕的帅哥不是每个女生的最爱？莉丝很惊讶地看着我说：“当然，我也会喜欢那种苗条的有肌肉线条和小麦色皮肤的帅哥。而且，我想，每个男生应该都喜欢苗条又阳光的女生。可惜我是个胖子，我只能找个胖子。”我随口说了句：“那你把自己也变苗条了不就好了。”顺带邀请她日后跟我一起吃五谷杂粮营养齐全的中餐。

自此，她一边跟我吃中餐，一边陪我夜跑。人，只要能迈出第一步，后面就会有无数可能。

等到“大二”开学时，她已经瘦了30斤了。在过去一年，只要有空不是派对就是狂欢的莉丝在新学年加入了网球和瑜伽社。她说，瘦下来的感觉太美妙了，她要继续瘦身。很快，她和胖男友分手了，网球社长做了她的正牌男友。

网球社长是优等生，而我们学校在英国相当不错，故而有很多英国贵族。“贵二代”在英国算是“高富帅”的代名词，可是“贵二代”的少爷们并非都是优秀的，得有一半是每天享乐人生、考试挣扎在及格线的。这时，班里优秀的学生就是他们要紧紧抱住的大腿。就这样，网球社长的朋友大多是贵族少爷们。

不知道成功追到网球社长的莉丝，是否在打入男友朋友圈后见识到贵族少爷们的那一刻，就已经向往贵族生活了，毕竟，人总是得陇望蜀的。那些贵族小哥即使不务正业，也是绅士帅气，谈吐文雅的。总之，莉丝回来后就卸掉了整个脑袋上各种的鼻环、耳环、唇环，把一头彩虹辫子全都剪掉了。她当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不想给男朋友丢人。

莉丝是一个英国普通人家的女儿，她家在伦敦只有一个普通的公寓。就是这样普通而平凡的女孩，在日后的大学生活中变成了一个乖乖女，毕业后经贵族朋友引荐，进入BBC工作。毕业那天，她和网球社长分手了，和引荐她的贵族少爷在一起了。莉丝说，英国贵族们比较讲究门当户对，所以她工作后就一边写稿子一边写剧本挣外快攒身价。终于，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升职加薪，拥有了伦敦的一处高级公寓。

在跟莉丝吃饭前，我掌握到的消息还是她要努力攒身家准备和贵族男友结婚。果然，一见面她就给我看无名指上亮闪闪的大钻戒。我刚想祝他们多年情人终成眷属，她神秘一笑，说：“我的大老板，我的未婚夫。我马上就要成为怀特城堡的公爵夫人了，祝福我吧。”

她当然知道我想问什么，她微笑着说：“虽然我很像是一个励志故事，但是，当我还是个胖子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跟一个贵族结婚，更别说成为公爵夫人了，网球社长在当时都是很遥远的。可是当我变苗条后跟网球社长在一起时，我就想和他身边的贵族少爷交往。我进了BBC又认识了更多的贵族后，我就又燃起了新的欲望。你不会觉得我很贪婪吧？”

我摇摇头，她再正常不过了。动物的欲望是恒定的，而人的欲望却是会随着境遇变化的，这也是人得以进步的动力。莉丝说，我无论如何都要出席婚礼，就在她家自己的教堂。她给我看了她家的照片，蓝天、白云、青草地，鲜花、绿树和古堡，和童话里的一模一样。